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  
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毛泽东

# 中国人眼中的 朝鲜战争

[上册]

罗学蓬○著



# 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上

罗学蓬 著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 罗学蓬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229-13086-2

I. ①中… II. ①罗… III. ①朝鲜战争(1950-1953)—史料 IV. ①K3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48340 号

## 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ZHONGGUOREN YANZHONG DE CHAOXIAN ZHANZHENG

罗学蓬 著

责任编辑: 周北川 赵光明

责任校对: 杨 婧

封面设计: 胡 越

装帧设计: 白一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张: 46.25 字数: 770 千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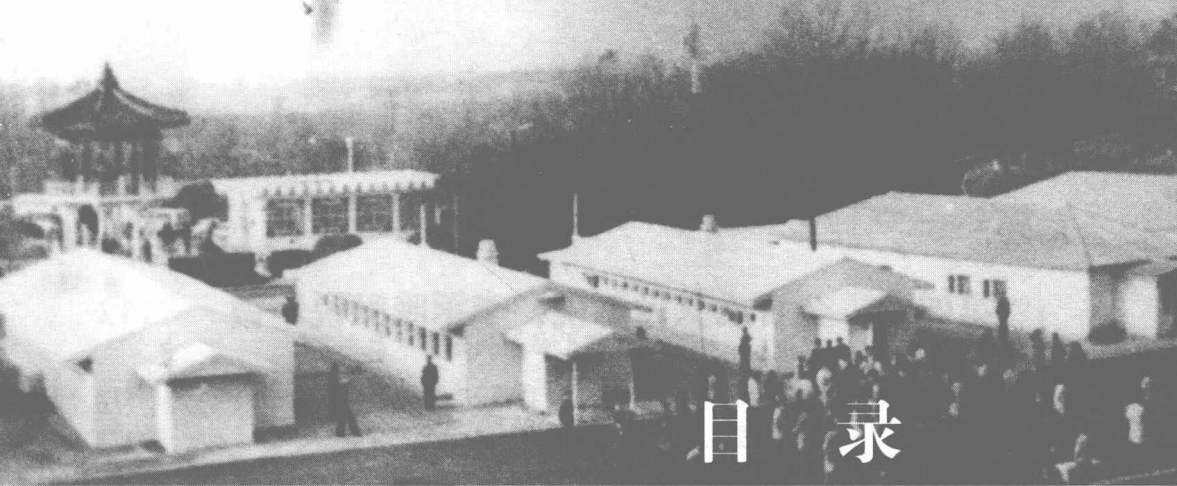
ISBN 978-7-229-13086-2

定价: 9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  
英勇牺牲的先烈们  
永垂不朽！



# 目 录

## 中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b>第一章</b>	<b>在“三八线”两边</b>	<b>1</b>
	1. 苏联解密档案与一位中国学者	1
	2. 朝鲜半岛	14
	3. 跳完舞，你死我活的争斗也就开始了	21
	4. 为什么是金日成	27
<b>第二章</b>	<b>半岛太小，容不下两个政府</b>	<b>37</b>
	1. 误会，还是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	37
	2. 意气风发的金日成	46
	3. 压在中国人民肩上的两副重担	52
	4. 李光耀敬佩的人中之杰	59
	5. 是谁丢掉了外蒙古	64
<b>第三章</b>	<b>巨人之间的较量</b>	<b>71</b>
	1. 把苏联人送来的死鱼扔回去	71
	2. 毛泽东会成为另一个铁托吗	79
	3. 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85
	4. 苏联同志开了中国人一个玩笑	90
	5. 巨人之间的较量	96



6. 谁是赢家	102
---------	-----

## 第四章 金日成只做不说，李承晚只说不做 112

1. 斯大林逼着金日成去北京	112
2. 黎明被炮声撕成碎片	122
3. 愤怒的牛仔	129
4. 汉城在号响	138
5. 麦克阿瑟突访台湾	145
6. 斯大林同意了朝鲜武力统一计划	150

## 第五章 金日成对毛泽东的三次预警充耳不闻 156

1. 来不及举行的庆功会	156
2. 美国将军进了战俘营	160
3. 斯大林趁火打劫	164
4. 怎一个乱字了得	172
5. 不是疯子，就是天才	178
6. 震慑日本	185
7. 毛泽东的“神机妙算”	188

## 第六章 没嘴的档案会说话 198

1. 虚心使人聪明，骄傲使人犯傻	198
2. 我把贵国的首都送还给你	203
3. 被忽悠的中国情报官	208
4. 金日成的求援信	215
5. 两份自相矛盾的电报	229

## 第七章 谁敢横刀立马 242

1. 朝鲜二号人物的倒台	242
2. 彭德怀给儿女们留下遗产	247
3. 岸英之死	252
4. 出而不战	262
5. 张作霖同志	271

## 第八章 出手就是当头炮 279

1. 彭德怀一骑绝尘 279
2. 志愿军师长光着脚上阵杀敌 286
3. 中韩两将军一决高下 295

## 第九章 大国风范 308

1. 打韩军没想打出了美国兵 308
2. 军法从事 318
3. 中国将军的两大遗憾 322
4. 麦克阿瑟命令：“沿着鸭绿江飞！” 327
5. 大国风范 336

# 第一章

## 在“三八线”两边

### 1. 苏联解密档案与一位中国学者

1950年，在围绕着北纬38度线的殊死对抗中，漫长的战线像钟摆一样来回往复地摆动，整个东北亚紧绷得如同一根“铮铮”作响、即将断裂的弦。

朝鲜战争到底是怎样爆发的？

中国为什么要出兵帮助朝鲜人打仗？

中国出兵的过程究竟是怎样的？

金日成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是求之不得，还是万般无奈，甚至心存疑惧，不愿配合？

这些重大问题始终是困扰着各国学者，甚至是困扰着当政者的一个个极大的谜团。朝鲜战争结束后仅仅过了10个年头，即使是在这个问题上参与过某些决策讨论的亲历者，对战争爆发的原因，和中国出兵的背景，就已经开始说不清，道不明了。

1960年6月22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与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举行正式会谈。

会谈中双方在许多问题上脸红脖子粗地互相指责，发动朝鲜战争的责任问题，也被赫鲁晓夫翻箱倒柜地作为攻击毛泽东的武器。

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让我们透过沈志华先生买回来的苏联解密档案，看看赫鲁晓夫和彭真当时是怎样激烈争吵的？争论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

赫鲁晓夫：我们在这个小范围里，可以讲，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是苏中两国都同意了了的。

彭真：不对，我们没有同意。我参加了政治局的讨论，这个问题我是知道的。

赫鲁晓夫：我们也看到了文件，毛泽东是同意了了的。

彭真：有两点必须说明：一、发动朝鲜战争，我们事先不知道；二、战争打起来之后，你们派罗申大使找我们中央，说苏联出兵不妥，斯大林想要我们来出兵。

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这些人担任领导，而不是斯大林的话，这场战争就打不起来了。但是，如果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是不会那样做的。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共同决定后才发动的。

彭真：你说得不对，毛泽东同志是反对打这一仗的。毛泽东同志在莫斯科就同斯大林说过，如果战争打起来，那就不是南朝鲜的问题，而是美帝国主义的问题了。即不是南朝鲜能否拿到手的问题，而是北朝鲜能否保得住的问题。这样的意见，毛泽东同志也向金日成同志当面谈起过。朝鲜战争打起来以后，斯大林说，如果苏联出兵，就意味着世界大战，因此才请中国出兵，因此我们才同意出兵的。我当时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讨论。

赫鲁晓夫：你说的是战争打起来以后的事，问题是发动战争斯大林和毛泽东是批准了的。

彭真：你说的不是事实，是造谣。我参加了讨论。我们始终认为是斯大林同志同意了了的。金日成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最有发言权。

赫鲁晓夫：你比我小吧，今年多大岁数？

彭真：58岁。

赫鲁晓夫：你比我年轻，但是记忆力却不如我。

彭真：我的记忆力很好，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政治局的讨论，我是参加了的。我们把意见告诉了斯大林。

赫鲁晓夫：事后诸葛亮，你们中国人就喜欢这样。



彭真：你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攻击，我告诉你，我们确实同斯大林说过。

赫鲁晓夫：他是从不听别人意见的，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偶像。

彭真：我们对斯大林是不满意的。我们也有委屈。

赫鲁晓夫：再说一遍，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个人共同决定的。

彭真：完全不对！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这一点，你可以问问当时参加过讨论的其他同志，这样你就会明白了。

赫鲁晓夫：我们不要谈死人了。我说，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错误！

彭真：根本不对！你们有人也参与了这件事，应该可以作证。我再一次声明，你说的根本不对！<sup>①</sup>

从这场双方脸红脖子粗，指鼻子戳眼睛的争吵中，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梳理出以下信息：

当年，中苏两党高层在内部，在“我们这个小范围里”，都完全不回避战争是金日成首先发动的这一事实。

他们争论的关键仅仅在于：到底是斯大林或者是毛泽东，批准或决定金日成发动了6月25日凌晨的那场差一点引爆地球的攻击？

1950年4月，斯大林首肯了金日成发动军事进攻的想法，这是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打开的第一盏政治绿灯。

5月，金日成在斯大林的再三催促下，不得不飞到北京，向毛泽东通报北朝鲜即将向南朝鲜发动军事进攻的计划。毛泽东很生气，当即停止会谈，派周恩来向苏联方面询问。

斯大林给毛泽东发电“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斯大林在电报中说得十分清楚，毛泽东对金日成即将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有否决权的，如果毛泽东不同意，金日成绝对不敢打响第一枪。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行使否决权，换言之，也就是说毛泽东为金日成发动朝鲜战争，开了第二盏绿灯。

不仅打开了绿灯，他还坚定地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支持金日成

<sup>①</sup> 引自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之《赫鲁晓夫与中国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0年6月22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的行动。

档案文献证明他是这样对金日成说的：“我们不是美帝的参谋长，做不了他的主，准备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3个军，如果美帝不干涉也没妨碍。如干涉，不过‘三八线’则罢，只要他敢过‘三八线’，我们就一定打过去，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现在既然你已经和斯大林同志商量好了，那你就先动手打，你要打得顺利，就用不着我们帮忙了，要是打得不顺，我们再接着帮你打。”<sup>①</sup>

这种以武力撑腰的坚定不移的支持态度，对金日成来说犹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对朝鲜战争问题，毛泽东后来说过：“我们三驾马车，有两匹马硬要往前拉，第三匹马也没有办法。”<sup>②</sup>

不过，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三驾马车，有一匹马埋头使劲硬往前拉，有一匹马帮着往前拉，还有一匹马如果真的不想动，那两匹马也没有办法。

虽然朝鲜战争停火协议签订时“火树银花不夜天”，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所有大大小小的国家都把它当作一场伟大的胜利来刻意庆祝。然而从彭真和赫鲁晓夫的争吵中，已经清楚地透露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这场战争的结果，中苏双方高层领导集体其实从来不曾有过半分胜利的欢愉。

赫鲁晓夫把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朝鲜战争）“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错误”。

对这一重大问题，这些年不断解密的档案资料，已经作出了清晰的回答。从客观事实看，由于中国的参战，朝鲜战争实质上立即演变成中美之间的一场大战。朝鲜半岛变成了世界两大阵营对抗和冲突的战场，而且最终确定了中、美、苏三角关系以及远东国际局势的格局和走向。

因此，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及其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30多年来，国际冷战史研究最热门的课题，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中最热门的领域。

在改革开放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方面的档案全部没有解

<sup>①</sup>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sup>②</sup> 引自苏维民著《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抗美援朝战争》，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密，所以研究的学者主要是美国人、韩国人和日本人、苏联人。但全都是瞎猜，因为他们手中没有主要参战方一星半点的档案文献，到底毛泽东怎么想的？斯大林怎么想的？金日成怎么想的？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湮灭在厚厚历史尘埃之下的真相。

后来，各国档案不断解密。特别是1989年苏联解体，国家大乱之后，大量机密文件被公开。1994年金泳三总统访问俄罗斯时，叶利钦总统又把216件关于朝鲜战争的秘密文件作为礼物送给了韩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方面随后也公开了一部分与朝鲜战争相关的档案文献。

在史学界值得浓墨重彩书写上一笔的是，当时还是草根史学研究者的沈志华先生看准时机，豪掷大把真金白银，飞到莫斯科，购回一大堆俄罗斯政府刚解密不久的苏联国家档案——当然也包括朝鲜战争档案。

沈志华原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生，后因卷入一桩说不清楚的“涉外案”，稀里糊涂坐了两年大狱。服刑期间，他仿效革命导师列宁，用牙膏皮搓成小棍做笔，以向狱中图书馆借阅的书籍作稿纸（写在空白处），用面盆扣膝做桌子，凭着对自己毕业论文的记忆和展开，完成了第一部学术专著《新经济政策与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一书，这部40余万字的学术专著也确定了他此后的人生事业走向。单是为了买回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俄国档案，沈先生就一掷140万。除此之外，他还花费了数百万元，长期资助中国青年史学工作者出版专著。多次主办国内和国际高层学术研讨会、讲座。直至55岁时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破格聘为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飞去莫斯科买档案这一重大行动的发轫，源自于沈志华1994年个人出资在深圳举办的探讨“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的学术会议。

沈先生在发言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重新振兴苏联史的研究要靠档案。他引用了一位外国档案学家曾经说过的话，“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这句话简明而又深刻地反映了历史与档案的关系。

说得通俗一些，历史学家与档案文献的关系就如同厨师与食材——毕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他认为，由于一件档案文献的公布而推翻一个早已形成的历史结论，或揭开一个历史谜团的例子，屡见不鲜。

当时他就已经知道，苏联的档案解密了，再不行动就晚了。

苏联档案的价值和意义对中国来说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因为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密不可分、“亲如兄弟”。苏联这个曾经令世界望而生畏的超级大国，几乎是在一瞬间便轰然倒下了。而这个庞然大物的解体，竟然就像当时一家西方媒体所描述的，“是在苏联全社会的集体沉默中完成的，甚至听不到一声叹息”。

沈志华的脑海里爆闪出一连串巨大的问号：苏联是怎么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一步一步走到崩溃的今天的？列宁创建的苏联共产党打天下夺江山，从理论上讲不都是想给人民带来幸福和自由吗？为什么当他的接班人被赶出苏共中央大厦和克里姆林宫时，竟然没有苏联人民带着哪怕是惋惜和同情的心情前去送送他们，最后再看一眼他们逐渐隐没在历史烟云深处那孤零零的背影？

这些重大的问题，只有在档案中才能寻找到准确的答案。

沈志华下定决心，乘虚而入，乱中夺宝，非把苏联解密档案买回来不可。

他不仅仅是嘴上说说，还真有行动。

他赶去社科院，直接请见两年前从中宣部长位置上退下来担任社科院党组书记兼副院长的王忍之，向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和所做的前期工作。

他对王忍之说：“档案就是历史学家的食材，苏联5年前解体，国家一直处于动荡与混乱之中，才给我们中国人提供了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无论如何，我们应当捷足先登。”

学历史出身的王忍之当然知道苏联档案对中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说：“中国当然需要苏联档案，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最理想的当然应该是我们社科院出面去买。可问题是，社科院是出了名的清水衙门，拿不出这笔钱啊。如果向上面要，得先报项目，等到立了项，层层审查完毕批下来，那就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沈志华大包大揽地说：“社科院拿不出钱没关系，我今天来见你，只是向你求个名分，请你在社科院内部立个项，以社科院的名义组成一个赴莫斯科购买档案的专家小组，我要人，你给我派人，我要去莫斯科，你给我办护照，开介绍信。至于买这批档案，以及



买回来后组织力量翻译，编辑出书等所需的资金，全部由我个人来承担好了。”

王忍之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慷慨热心且带有古侠士之风的沈志华的请求。双方谈定，此事作为社科院重点课题立项，由社科院出具一切必要手续，由沈志华负责全部课题经费，并主持全面工作。

而后，沈志华挑选了闻一等3名社科院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和俄文翻译，匆匆飞到了莫斯科。

谁知到了莫斯科，才知道问题多多，远非预案中那么顺利。

苏联档案开放最繁荣的时期是1992年到1993年，等到他们去时，已经开始压缩收紧，而压缩收紧的其中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比过去贵了许多。且不说由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两国交恶所形成的感情隔阂，很多重要档案俄罗斯人故意不对中国人开放，而且还下决心狠狠敲中国人一笔钞票：去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复印，一页1美金；去苏共中央档案馆复印，一页2.8美金。给人民币不行，给卢布朝你翻白眼，俄罗斯人眼里，似乎只有美元才是真金白银。

因为俄国在专制体制下过了70多年，那种恶劣的官僚体制长期形成的种种弊端办起事来真让人难以忍受。国家档案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只工作3个小时。说是10点上班，挨到11点才开门，中午休息，3点还要喝下午茶，4点半下班。这样的安排，大老远从中国跑来的沈志华还能干什么呢？

沈只好把做生意时种种行之有效的招数悉数使了出来。单请客吃饭不够，还得另想他法。

沈志华邀请俄罗斯档案馆和苏共中央档案馆的两位馆长吃了一顿饭，主多客少，6张嘴巴，就吃掉他460美金！

送礼也是件伤脑筋的事，几位中国秀才都不清楚俄罗斯人到底喜欢啥玩意儿，到商场里七嘴八舌穷尽心智好不容易把礼物买下来，还得打听送礼对象家住何处，再毕恭毕敬给送上门去。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下足了功夫后，有些原来不对中国人开放的档案也向他们打开了大门。

但时间问题却并未解决，4个人待在宾馆里，每天只能去档案馆查3个钟头的档案；档案文献浩如烟海，按照这样的进度，开销可就太大了。

沈志华作为商人的精明在这种处境下再次发挥了作用，一拍脑瓜

子，又让他想出个招来。

他了解到莫斯科城区与郊区的物价差异很大，为了节省开支，他让一名学者和翻译坐地铁去郊区乡下，到大卖场买面包、黄油、香肠、各种汤料、咸菜什么的，再直接钻到农户家里买蔬菜和家禽，然后背回宾馆自己动手，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大餐。

而他呢？却带着学者闻一，厚着脸皮去“公关”，什么俄罗斯历史所、远东所、东方学所，到处拜访，邀请俄国学者赴宴。

俄罗斯人爱喝酒，见了沈志华从北京带来的茅台、二锅头，搂着肩膀大叫“哈拉绍，哈拉绍”（顶顶好的意思），沙拉、凉菜、红肠、鸡鸭肉大盘大碗地摆了一大桌。幸亏中国学者们在家里大都有机会长期经受锻炼，烹调手艺相当不错。蜚声世界的中国美酒一瓶瓶打开，让客人尽着性子喝，一大杯茅台、二锅头一口就下了肚。

酒过三巡，红霞涌脸，沈志华这才向客人说明自己目前的难处，请俄罗斯学者帮忙去档案馆复印档案，复印费照付。而席间的高潮是他居然掏出绿花花的美金，塞给每人800元劳务费！

这办法比啥都灵！俄罗斯学者马上“心领神会”，积极建言献策说：“今后你们中国人就只管去档案馆抄目录，复印内容的事，交给我们办，俄罗斯人出面复印，比你们便宜多了。”

这样一来，沈志华既省了大把的票子，还省下了大把的时间。

为了尽快把档案文献弄到手，沈志华可以毫不犹豫一掷千金，可他对待自己的生活，却完全不是一个有钱人的做派，他和3名同伴在宾馆里待了两个多月，每天熬稀饭，煮点香肠就着大列巴（面包）对付。

沈志华花钱雇的人都是真正的行家里手，拿着他开的目录寻找档案文献轻车熟路。这批俄罗斯朋友还真守信用，沈志华等人在莫斯科待了两个多月后，实在熬不下去了，只好把扫尾工作托付给俄罗斯朋友们办，他们回到国内后，所有目录上的内容，俄罗斯朋友们陆陆续续全寄到了北京。

为了购买这批极为珍贵的档案，加上路费、食宿费、礼品费，沈志华总共掏了140万元——1994年的140万哪，那是个啥概念——他不仅没有一丝心痛，相反还大为庆幸。因为，就在他买回这批档案文献后不久，已经逐渐结束了混乱状态的俄罗斯政府，重新下令封存了所有国家档案。倘若迟去几个月，沈志华就是雇船运座金山去，也买

不回来了。

档案买回来还没完，紧跟着，沈志华又在全国组织了70多人的翻译和编辑队伍，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整理目录，并选择专题翻译成中文。一帮学者跟着他整整理头干了7年，一套34卷36册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终于问世了。

关于这段极具传奇色彩的经历，沈志华本人在《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的序言中是这样叙述的：

也许是机缘巧合，笔者在1990年代初弃商求学，回到北京从事苏联史和冷战史的研究，恰好碰到俄罗斯档案馆解密和开放——这确是繁荣史学和推进研究的大好时机。作为中国（大陆）学术界的独立学者，十余年来，笔者利用以前的经商所得，组织专业人员分赴俄国和美国，收集整理了15000余件俄国档案，并通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立项，建立了课题组，将其中8000多件翻译、编辑成册，于2002年8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34卷36册档案专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但是，由于朝鲜战争问题在中国大陆一直是极为敏感的研究题目，所以，尽管该档案专集是内部出版物（限正教授和司局级以上干部阅读），仍禁止收入任何有关朝鲜战争内容的文件。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对这批材料情有独钟，因而进行了认真的整理、编辑和校对，只希望有一天这些珍贵史料能为众多以中文为主从事研究和写作的学者所利用。

1996年，笔者曾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合作，将当时收集到的有关俄国档案（约270件）翻译和编辑成册，供内部研究参考（即所谓白皮书），后来又将其涉及中苏关系的文件（138件）加以注释，发表在1997年《世界史年刊》上。然而，由于上述出版物发行量极其有限，能够看到这些档案文献的不过百十人而已。况且，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笔者搜集和整理出来的有关朝鲜战争的俄国档案已有700余件，笔者很想出版一套有关朝鲜战争的中文版俄国档案专集。当然，这个理想暂时只能在海外实现。

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开放进步的步伐比沈志华预想的要快得多，2003年，就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了他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3卷）一年后，广东人民出版社便隆重推出了他的



《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一位知名的世界史专家说：“有了沈志华主编的这批价值连城的档案文献，不仅苏联史和中国近代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

过去在国内查找档案和有关文献的过程中，沈志华曾经受到过不少“刺激”。

某位学者手里有一本国外新出版的著作，沈志华想借来复印一下，不行。想问一下该书的书名、出版社，也不行。

某家研究机构订有一些其他单位没有的外文杂志，沈志华想去看。第一次，看到了一些。第二次再去时，那些杂志全被收了起来。

而以他当时的身份，要想在中国看到一些加了各种密级的档案，连大门都别想进。

十几年的酸甜苦辣，使沈志华非常体谅中国学者查找档案文献的难处。在购买到大量国外档案之后，沈志华并没有奇货可居，据为己有，相反，他要与他的同行们共享这些宝贵的史料。

因此，沈志华作出一个决定：“我带回来的档案，全部向社会公开，谁需要都可以查，都可以用。”

沈志华在他的绿茵别墅里专门腾出两个房间，搁放搜集到的20000多件档案史料，在朝鲜战争、中苏关系这两个领域内，他的档案全国最全。许多人做博士论文，专程到沈志华家查找资料，包括韩国、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学者也都远道而来向他求助。国内学者更是川流不息。他不仅把自己花巨资买来的档案供人免费使用，对外地来的专家学者还管吃管住。他还自购了复印机，为求助者复印资料。

后来上绿茵别墅查资料复印档案的学者太多，一者实在招呼不过来，二者，也需要保持个清静的环境著书立说，他索性把主要的档案材料复印了两套，一套放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套放在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这样让别人查阅起来就更方便了。他还把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原文自制成光盘，送给香港中文大学，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必须供人自由查阅，不取分文。

此外，他还把所有他搜集到的档案资料上网。在这一点上沈志华很得意，他说：“这些资料谁用我都欢迎，档案就是要让人利用，这样学术研究才能更好地发展。”



有了档案，随之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大家拿着同一份档案，解读却大相径庭，争论也相当大。中国学者、美国学者和俄国学者、韩国学者、日本学者的看法更是不尽相同，特别是涉及关于朝鲜战争的决策动机问题。

简而言之，两个重要问题阻碍了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者是因为很多档案还没有解密，比如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就有相当大一部分迄今为止依然深藏不露，这就很难让人完整地了解到决策的时候苏共中央高层是怎样讨论的。

二者，中国档案则更多的还没有解密。当然还有很多是根本就没有档案。比如中国决定出兵朝鲜的那几次最为重要的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形成了历史的空白。

没有档案的原因非常简单：不允许记录。

所以历史学家们就只能根据已经掌握的档案，和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再加上其他与此相关的有记录的会议留下的档案资料，来对毛泽东当时作出的决定，和他与斯大林、金日成往来的电报、信件，进行综合性的分析，然后再做出合理的推论与判断。

国外史学界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早在朝鲜战争之前，中国领导人就参与了这场战争的策划和准备，甚至中国出兵朝鲜也是事先与斯大林和金日成达成秘密协议的。苏联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材料公布后，韩国和日本更是出现了“东亚共产主义三角同盟理论”，认为朝鲜战争及中国出兵是毛泽东、斯大林和金日成早有预谋的。

然而，苏联解密档案证明，中国当时在朝鲜问题上的举措纯属被动反应，斯大林和金日成在策划朝鲜战争的过程中一直把毛泽东蒙在鼓里。毛泽东虽然一开始从战略层面支持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但有前提，那就是你得等我先解决了台湾问题，你再统一。后来同意金日成动手，是被迫的，派志愿军入朝作战，更是万般无奈，迫不得已。

从档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到，1945年8月决定出兵东北对日作战以后，斯大林就已经对战后远东的局势有了他的设想。

地处远东的朝鲜问题的解决，一直引起世界大国的关注。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在《开罗宣言》

中就提出了关于战后朝鲜的安排问题，宣布“我三大国怜悯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在德国投降前夕，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会议，罗斯福和斯大林单独会晤时，提出了朝鲜“托管”问题。

美国总统考虑到朝鲜40多年以来一直都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没有自己的军队，也没有自己的行政官员，觉得朝鲜人根本就没有管理自己国家的能力，于是提议在日本战败后，“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并主张战争一旦结束，应尽快使朝鲜获得独立。

罗斯福逝世后，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

关于朝鲜问题，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美、英、苏三国首脑“同意在俄国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后，应当在朝鲜整个地区就美国和俄国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范围划一条界线。至于地面上的作战或占领区域，没有进行任何讨论，因为当时没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地面部队会在短期内进入朝鲜”。“从美国本意来讲，最好是单独全部占领朝鲜。”杜鲁门还说，“国务院极力主张在整个朝鲜的日本部队应由美国受降，但是我们要是以必要的速度把军队运送到朝鲜北部，那就无法保证我们在日本抢先登陆。”

此外，美国估计攻占朝鲜将付出重大代价，因而想把攻占朝鲜的战役连同“可能遭到的重大伤亡”由苏联去承担，自己则坐收渔翁之利。因此，美国虽然知道苏联将于8月8日对日宣战，但并未准备近期内在朝鲜实施登陆作战。

根据雅尔塔会议期间的协定，在德国战败投降3个月后，即1945年8月，苏联实行对日作战。8月8日下午莫斯科时间5时（东京时间为8日夜11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召见日本驻莫斯科大使佐藤尚武，交给他一份苏联对日宣战的通告，当面宣布，苏联政府从8月9日0时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

1945年8月9日0时一过，苏联红军15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凌厉攻势，从各个方面突入中国东北的中苏边界，对日本关东军进行全线总攻击。

美国和苏联对日作战是有分工的，美国负责攻打太平洋和日本本土，苏联负责消灭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对于朝鲜半岛上的日本军

队由谁负责，在波茨坦会议上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分工。主要是谁都没有预想到战局会发展得如此顺利，美国人一扔原子弹，苏联150万大军立即兵分三路杀入东北。

其中，苏联红军第25集团军挥戈进入北朝鲜，势不可挡地占领了平壤，并立即乘胜向南方挺进。

8月10日，从东京传出日本内阁决定无条件投降和苏联红军迅速进入朝鲜北部的消息后，美国这下着急了。他们突然意识到整个朝鲜半岛倘若全被苏联红军控制在手中，今后极有可能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产生重大威胁。

当天夜里，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在国防部长助理麦克洛伊的办公室举行协调委员会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鉴于美军眼下正陷在太平洋地区和日军激战，根本抽不出兵力登陆南朝鲜。会议认为事到如今，最好的结果是由美国与苏联分别占领朝鲜。

而具体的做法便是赶紧划一条线，用它来挡住苏联人向朝鲜南部的大举进兵。

历史常常会因人为的因素而变得让后人啼笑皆非。

匆忙中承担划线任务的是美军上校迪安·里斯克。麦克洛伊只给了他30分钟时间，因为美国国防部、陆军部和海军部的一帮协调大员们，此刻全都坐在隔壁他的会议室里一筹莫展。

当前面临的关键问题是，苏联红军已经将百万日本关东军击溃，挺进朝鲜半岛北部，很快就会向南推进，完全彻底地占领朝鲜半岛。而远在太平洋上的美军，想抢在苏联红军之前进入朝鲜，已经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那么，究竟在哪里要求苏军停下来，才是合理的呢？这必须是一个既能让斯大林接受，同时也能满足美国的政治意愿，而且又符合军事现状的折中方案。

迪安·里斯克根本就不曾想到自己的一生从此将和朝鲜打交道，并且因为朝鲜战事他从此将官运亨通。他后来在朝鲜战争中任职亚洲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后来又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中占据着美国国务卿的宝座。

已经不太年轻的迪安·里斯克上校拿起鸭嘴笔，面对着眼前一一张陌生的朝鲜半岛地图，上面既没有现存的行政区域的划分，也没有任



何有关军事、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参考，而30分钟的时间远不足以让他做出更加细致缜密的思考。

于是，他提起手中的红色鸭嘴铅笔，干脆利落地在狭长的朝鲜半岛大约各占50%的地方，拦腰画出了一条直线。

就这样，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被一个从来没有到过那里的美军上校参谋分割成了两半。

这一道落在地图上的红色印痕，就是后来著名的“三八线”。

美国国防部赶紧在这一天发布了第1号受降令，规定苏军负责“三八线”以北，美军负责“三八线”以南，接受盘踞在朝鲜国土上的日本军队的投降事务。

朝鲜人民刚刚摆脱了日本的奴役，又开始陷入南北分裂的状态，从此埋下了朝鲜战争爆发的祸根。

## 2. 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是朝鲜民族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土地，并先后建立了多个王朝。19世纪末20世纪初，朝鲜半岛在列强觊觎与瓜分的动荡局势下，失去了往日的安宁。

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袁世凯，就是在朝鲜古都汉城（今首尔）发迹的。

袁世凯，民国初年中国政治军事大舞台上的重磅风云人物。中国历史给这个人的人品下了铁的定论：暗杀异己、摧残革命、伪造民意、欺国骗世。但是，甲午年之前的袁世凯仅仅是大清帝国的一名中级职业军官。这个出身于官宦之家的人曾经热衷于八股，但才学不佳最终使他走上了从武的道路。

不过，读者朋友恐怕不知，年轻时候的袁世凯，在朝鲜竟然是一个家喻户晓，人人敬畏的重量级人物。

1882年6月，邻国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10年前，12岁的李熙以支系入承大统，并由他的生父李正应监国摄政。按照朝鲜宫廷制度，凡是以支系入承王位的国王，其生父皆称为大院君。1873年，大院

君归政于儿子李熙，不料政权逐渐掌握在王妃闵氏手中。大院君眼见大权旁落，不由妒火中烧，他本是主张锁国闭关的，而闵妃偏偏喜欢标新立异，甚至花重金聘请外国教官训练新军，以代替大院君创建的亲军营。闵妃改革军制以来，大批士兵被裁汰，而留在营中的士兵，又常常得不到军饷。当时的朝鲜一贫如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882年6月，政府被迫发放了一个月的粮饷，可士兵买到的粮食里面尽是沙石秕糠，积压在心中的怒火终于爆发了。士兵带头造反，民众踊跃跟随。他们袭击中国大使馆，包围景武台王宫，和新军展开激战。闵妃一看局势已不可收拾，慌忙假扮成宫女，在新军护卫下趁乱逃出王宫。大院君利用人们对闵妃集团的仇恨，重新掌握了政权。

清政府在闵妃一再的敦请下，于同年8月，诏命丁汝昌率北洋水师3艘舰艇，与驻扎在山东登州的吴长庆率6营淮军，火速赶赴朝鲜平乱。袁世凯以“前敌营务官”的职务，从此开始了他在朝鲜12个年头的铁血生涯。

1882年8月25日，袁世凯率前锋进抵汉城南郊。中国军队到达朝鲜后，首先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将此时已重掌权柄的大院君诱捕到中国，扶持国王李熙及闵妃集团重新执政；二是平息兵变。

次日，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三位将军入城前往景武台拜会大院君。会谈时，气氛融洽，并约定第二天大院君亲赴兵营，回访中国诸将。

27日，大院君的回拜，实则是清军精心设计好的“鸿门宴”。袁世凯奉吴长庆之命，扮演了项庄的角色。

上午，大院君李正应如约来到城外中国兵营。吴长庆、丁汝昌、马建忠在辕门外恭迎。然后将大院君请到大帐之中，中军幕僚则在帐外，以酒肉阻止卫队随大院君入室。吴长庆将军见卫队被阻帐外，将酒杯一掷，早已埋伏在帐后的袁世凯率亲兵一拥而入，挽手抱腿，将大院君强行塞入准备好的肩舆之中，由丁汝昌火速护送到仁川附近的马山浦，押上军舰，解往天津；以后，则长期囚禁于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直至客死该地。

在他留在朝鲜的众多儿孙中，其中最最有出息的一位，就是时年7岁，后来成为大韩民国开国总统的李承晚。

大院君被抓，叛军自然是群龙无首。袁世凯在朝鲜国王李熙的全力支持下，率兵四处袭击叛军，终于将这场兵变平息下来。

9月12日，李熙迎接闵妃回銮返宫，袁世凯抢在众将之前，第一个前往景武台道贺。数日后，国王赐宴，吴长庆、袁世凯受到邀请入席；其后，国王又单独召见了在“壬午兵变”中表现出不俗才能的袁世凯。

10月，清廷下诏，袁世凯以“治军严肃，剿抚应机，得以同知分发省分，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

1884年4月，清政府下诏命吴长庆率所部3个营班师回国，退驻辽东半岛金州，其余3个营仍驻扎汉城。袁世凯得李鸿章奏请，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

“壬午兵变”两年后，朝鲜政府又起纷争，政权内部分化为新旧两派势力。一派是以闵妃为首的王室集团，另一派则是要求改革的激进派。1884年冬天，朝鲜激进派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之下发动政变，并和日本人一起劫持了国王，朝鲜政坛又一次陷入了危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甲申政变”。

如果说两年前的“壬午兵变”是考验袁世凯的办事能力的话，那么这一次“甲申政变”考验的则是袁世凯的决策能力。因为此时的局面更加复杂，吴长庆已经回国，临时统帅吴兆有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作为副手的袁世凯又一次抓住时机粉墨登场，出现在政治舞台的中央。

1884年12月6日，袁世凯率领在朝鲜的所有清军和3000名朝鲜兵向着王宫出发了。结果，袁军把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一直追赶到附近的一座山头上，但是日本人在山顶大声嚷嚷，说国王在此，你们要是把国王打死了看你怎么收场！在与日本军队对峙一段时间后，袁世凯最终果断下令发起攻击，并很快击溃了日本军队，成功将朝鲜国王解救回来。

在“甲申政变”中，要不是袁世凯一人当机立断，敢于负责，那么朝鲜不必等到甲午战争，便早已和清政府“拜拜”了，这一点是连那些最鄙薄袁世凯的人也不能不承认的。

这一次胜利，也是清政府在朝鲜和日本交锋的最后一次胜利。

袁世凯平息“甲申政变”不久，李鸿章就连升他几级，提拔他为驻朝鲜的总理通商事务大臣（相当于大清国驻朝鲜国大使）。

这个不久前还是吴长庆的“前敌营务官”的不起眼的小角色，转眼之间，便在朝鲜的政治舞台上成为了万众瞩目、一言九鼎的大

人物。

袁世凯在汉城生活了12个年头，不仅在政治上获得了日后发迹必不可少的资本，在个人生活上，也不无所获。他的9位姨太太中，便有3位是朝鲜女子。

关于这3位朝鲜姨太太的出身，正史野史说法不一，有的说是李氏国王赏赐给袁世凯的3名歌伎，也有的说这3位姨太太是袁世凯患病住院时，精心照护过他的3名护士。

我们还是听听袁世凯的三女儿袁静芬是怎么说的吧。

“我父亲原定娶朝鲜李王妃的表亲金氏一人为妾。可是，在金氏嫁过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两个陪嫁姑娘闵氏和吴氏。我父亲就一并将她们收为了姨太太。并按年龄大小，排定吴氏为二姨太，金氏为三姨太，闵氏为四姨太。还因为这3个人都是在大姨太太手里娶的，所以我父亲就让大姨太太沈氏负责教导她们。”<sup>①</sup>

金氏本以为是嫁过来做袁世凯正室的，不料过门以后，非但做不成正室，她带来的两个陪嫁丫头反倒和她一起被袁世凯收为扁担挑水一肩平的姨太太，其中一个陪嫁丫头的位置甚至还排在她前面。同时在她头上，还有一个被袁世凯当作“夫人”看待的大姨太太。金氏当时是一个16岁的小姑娘，在那样的情况下，她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但心情肯定是痛苦的。直到她为袁世凯生下长子克定，地位才陡然有了大的改观，心中也多少有了些慰藉。

1894年，日本军队袭击驻朝清军，挑起甲午战争。1895年4月，清朝战败，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承认朝鲜独立，被迫将自己控制了200多年的朝鲜，拱手让与日本。成为日本人傀儡的朝鲜政府也立即宣布，终止与清国的藩属关系。

1896年，沙皇俄国也乘机渗入，为了争夺对朝鲜半岛的统治权和日本大打出手。朝鲜国王李熙为避免亡国，于1897年改朝鲜国号为“大韩民国”。而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日俄双方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到了1905年，俄国在发生于中国东北土地上的一场日俄大战中失败，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乙巳保护条约》，剥夺了韩国的国权。1910年，就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紫禁城的时候，块头虽小，胃口却比中、俄两国还大的日本，索性强迫朝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宣布废

<sup>①</sup> 引自周岩著《袁世凯家族》，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除韩国国号，改称朝鲜，正式将朝鲜半岛一口吞掉。朝鲜成为日本的一个省，日本派遣官吏，废韩文习日语，韩人一律改日本姓氏。

“弱肉强食”，世界从来就是如此冷酷。处在大国博弈夹缝中的小国，是没有权利和能力决定自己命运的。

从“三八线”产生的那一刻起，世界上的强国都意识到远东这个被外部强权分割为两半的国家，必定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依旧需要士兵献出生命的地方，尽管这个国家的山脉雄奇险峻。

美国军史说：“那些巨大褶皱展开的面积，可以覆盖整个地球”，朝鲜半岛是“世界上最不适宜大兵团作战的少有的地区之一”。

从此后，“三八线”把朝鲜一分为二。

遗憾的是，半岛实在太小，容不下两个政府。

还没过多久，和被苏联占领军慧眼相中的金日成一样，具有正宗朝鲜王朝皇族血统、年过古稀、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李承晚博士，也进入了美国人的法眼。

李承晚被美国人用专机接回自己已分别长达40年，魂牵梦萦的祖国时，激动不已，用中文赋诗抒怀：

三十离家七十归，  
欧西美北梦依依；  
在家今日还如客，  
到处逢迎旧梦稀。

分裂成两个国家的朝鲜半岛，不管是李承晚也好，金日成也罢，作为国家领袖，最大的愿望与使命，就是实现祖国的统一。

而且他俩都认为只有自己建立的政府才是唯一合法的政府，才有管辖整个朝鲜半岛的资格。

他俩还同时坚信，用和平手段，是绝对不可能实现国家统一这个宏伟目标的——毫无疑问，对于朝鲜民族来说，这就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了！

地球人恐怕都以为北朝鲜的首都在平壤，其实不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黑字白纸地写着，这个国家的首都在汉城——所以韩国人后来干脆把汉城改名为首尔，只有汉城，才是朝鲜人心中



历史悠久的古都。

这年36岁的金日成与年过古稀，比他大了差不多一倍的李承晚都瞪大了眼睛，等着将对手一击毙命的机会。

苏联人和美国人都一致认为，同时拥有水火难容、你死我活的两个政权的国家，决不可能相安无事。

当时的美国驻韩国大使约翰·穆乔就说：“战争是早晚的事，说不定就在哪一天早上爆发。”

朝鲜半岛南北长约800多公里，东西宽约200多公里，面积约22万平方公里。朝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意义，它犹如一块伸向太平洋的跳板，既是强国入侵远东的最便捷的必然途径，又是抵抗外敌入侵远东的天然桥头堡垒。北朝鲜尽管面积较大，拥有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据时期建造的为数不多的工厂和大型水利设施大部分也都归北朝鲜所有。但它的疆域主要多为穷山恶水，不是那么富饶多产，而且1950年时才只有900万人口。南朝鲜面积虽然只有9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却比北朝鲜多了一倍多，达到了2100万，而且拥有半岛上最肥沃的农田、大部分轻工业和大多数相对繁华的大城市。

“三八线”两边大多是农民，在一个自然秀美的国度里，星罗棋布的大小村庄好像是从大地上生长出来似的，它们成为了这片狭长国土上最优美的景观。

这些相隔不远的村庄宛如未经雕琢的璞玉一样，散布在修整过的一块块绿色的田野风景线上，与“三八线”以北荒凉的、布满灌木丛或乔木的高山峻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还有无数从巍巍高山深涧中奔流而出的小溪一路欢腾喧闹着穿过田野，汇进大大小小的江河，然后注入太平洋。初到朝鲜半岛的人，很少不被那种处处可见的、质朴无华的美感所触动。

不过凡事皆有例外，从美国跑到朝鲜半岛来接手麦克阿瑟丢给他的烂摊子的李奇微将军，便对朝鲜随处可见的美丽景色视而不见，只对半岛上的种种恶俗深恶痛绝。

他以为朝鲜最大的特点就是臭气熏天，那是因为朝鲜农民普遍使用人畜粪来肥田。加之用一些大大小小的水桶和破漏的大车装运粪便，因而使得乡间原本清新的空气中，便时刻充斥着十分强烈的臭味，让人不堪忍受。

他看到在村庄和一些城镇里，路边的沟壕大都是敞开的下水道，里面流淌着的污水同样是臭气熏天。在朝鲜的农村，家家户户都喂猪，随处都可看到肮脏不堪的大猪小猪在污秽中到处乱窜。

晚年他回忆道：“警觉的饿狗连人们丢弃的最令人恶心的腐肉、下水也能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小孩子们在茅舍外面玩耍，小小的裤子恰好在后面开了个口，为的是能随时大小便。”

他对朝鲜人引以为豪的泡菜也出言不逊，“朝鲜人还大量种植卷心菜，菜常常长得很老了还不收割。他们把这种菜收进家门后，和鱼头以及其他美味一起贮存在大坛子里，作为泡菜食用。对于大多数西方人，这种东西实在不堪入口。可是，朝鲜人却吃得津津有味”。<sup>①</sup>

同样是这场战争亲历者的贝文·亚历山大——此君在朝鲜战争期间为美陆军部派驻前线的战史分遣队队长，后毕生为美国陆军及美国政府撰写军事方面的专题报告，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军事战略家——在他所著的《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也对韩国的大粪和韩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泡菜出言不逊。

“除了战争本身外，朝鲜还有两个方面跟嗅觉有关，使得这个国家看上去不像是一座伊甸园，至少对美国人和欧洲人来说如此。其一是那些无处不在的牛拉粪车，车上装着简朴农民收集起来的撒在自家田地里的自己的粪便，散发出一种极为浓烈而刺鼻的气味，简直能把西方人熏得头晕目眩。”

对朝鲜民族每餐必食的泡菜，贝文·亚历山大更是出语尖刻，“其二是朝鲜那种民族风味的菜蔬，由白菜、大蒜、辣椒、萝卜和其他物料混在一起腌制而成，通常叫作‘泡菜’。碰到这种菜的时候，比如，一位可爱的朝鲜姑娘呼出的气息，一般都会对西方士兵产生一种极强的影响，使他对她的兴趣顿时消失，更要命的是他的性欲也将消失得无影无踪。在这片外国士兵横行的国土上，朝鲜的许多姑娘得以保住贞操，她们的母亲无疑会感谢泡菜”。

---

<sup>①</sup> 引自《马修·李奇微回忆录》，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 3. 跳完舞，你死我活的争斗也就开始了

美国国防部单方面划出“三八线”之后，并没有奢望苏联人会接受这个方案，在预案中给苏联人留下了很大余地。从美国国防部解密的档案中可以看到，那时候就算是苏联人坚持要求把汉城划给他们，美国人也是打算同意的。

因为苏联第一远东方面军南翼部队第25集团军在太平洋舰队的配合下，迅速切断了日本关东军和日本本土的联系，12日便占领了朝鲜北部的雄基、罗津、清津、元山等港口，24日又占领了平壤。苏联红军的前锋，已经快兵临汉城了，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还远在离平壤上千公里的冲绳岛上。

但是，麦克阿瑟和杜鲁门、国防部谁都没有预料到，两天后，斯大林在回电中痛快地说，行，就按你们划的，以“三八线”为界，而且还把已经兵临汉城的军队，退到了“三八线”以北。

当时美国人为斯大林近乎愚蠢的慷慨非常惊讶，甚至开玩笑说这个格鲁吉亚农民的脑子一定是出了问题，给他个讨价还价的余地他都不懂得要。

后来杜鲁门的智囊班子仔细分析了斯大林的回电，这才明白真要是严格地按照美国人的划分，斯大林可捡大便宜了。因为斯大林在电报中说：以“三八线”划界没问题，但是，苏联政府要求所有东北亚地区的土地、海洋与领空，均以“三八线”为界。原来，“三八线”若是一直往东延伸过去，就把原属日本的千岛群岛和日本本土北海道，甚至新潟、福岛、仙台一大片日本国土，也都划到了“三八线”以北。

斯大林的真实想法是：我让你美国的军队在朝鲜半岛登陆，你让我苏联的军队在日本本土登陆。

杜鲁门当然明白其中的含义，赶紧给斯大林回了个电报，说你的要求可以商量，这个事情你可以直接和东京的麦克阿瑟将军谈。

斯大林自以为捡了个大便宜，给麦克阿瑟发了个电报后，马上下令已经越过“三八线”的苏军撤回到“三八线”以北地区，另一方面则命令已经控制了千岛群岛的苏军，迅速进驻日本北海道。

可斯大林没有想到麦克阿瑟的口气超出他想象的强硬，麦克阿瑟在回电中对斯大林说：“你们胆敢有一兵一卒踏上日本本土，我马上



下令扣押你在远东委员会的所有代表当人质！”

斯大林知道麦克阿瑟这个火气旺盛的美国老兵可不是说说玩儿的，真要打起来就笃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没办法，他只好命令满载苏联红军和各式战车的舰队，掉头返回千岛群岛，无奈地接受了美国人划定的这样一个现实。

就在苏联红军占领平壤不久，美军第7步兵师也在朝鲜南部的仁川港登陆，并且马不停蹄一路疾行，很快进入汉城，抵达了“三八线”。

在时间上占据充分优势的苏联军队，在“三八线”上等来的，是麦克阿瑟总司令麾下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兵。

美苏两国的士兵在“三八线”上举行了一场联欢会，互送礼品，狂饮伏特加。然后，被灌得醉醺醺的美军跳踢踏舞，苏军跳马刀舞。

跳完舞，你死我活的争斗也就开始了。

1945年9月7日，在美军登陆朝鲜南部的仁川港前一天，美国驻太平洋地区陆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广播了一项布告，其中第一条规定，“对朝鲜北纬38度以南地区及该地区居民的一切政府权力，目前暂由本人行使”。第二条规定，“原日本殖民政府人员继续留职履行公务”。第五条规定，“在军事管制期间，英语为通用的官方语言”。

美军进入南朝鲜后，立即解散了该地区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9月19日，美国占领军在原日本总督府的基础上，成立了南朝鲜军政府，各级官员均由美国军官担任。

美国人把美国式的“民主”带给了南朝鲜，南朝鲜一下子冒出了各式各样的政党，最多的时候达到100多个。这些政党大多是政治上的历史老冤家，人人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愿甘居人后，拿麦克阿瑟自己的话讲，“这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南方如此，北方也好不到哪儿去。

“三个韩国人凑在一块，至少得分成两派”。二十年代初，各种名目的共产党派别在朝鲜就多得了不得了，全都打着拥护共产国际，发展抗日组织，创建抗日武装的旗号，然后如同过江之鲫般争相涌到莫斯科去要钱。钱一到手，枪还没买回一支，子弹还没买回一粒哩，为分卢布的事，自己内部就先打起来了。

共产国际不堪其扰，他们也实在没有能力去分清楚谁是朝鲜的真共产党，谁是假共产党。到了1924年，共产国际索性来了个“一刀

切”，把门户林立的朝鲜共产党统统取消，明确宣布一个原则：一国一党。要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必须回到国内，组建成一个统一的共产党，发动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才能继续得到共产国际从精神到物质的支持，否则，就“断奶”。

美国人来后，汉城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委员会扬眉吐气了没几天，就被李承晚和美国占领军联手给摁了下去。

麦克阿瑟一生经历表明，他既是叱咤风云的一代超级名将，同时又是国际政治中的超级低能儿，他竟然把美军占领日本的那一套移用到了南朝鲜。太过自信的他甚至从来没意识到，朝鲜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二战后，都和战败国日本的政治地位完全没有可比性。

在战败的结局中惊魂未定、让原子弹炸得肝胆俱裂的日本人可以把麦克阿瑟视为统治、专制、社会法制和至高无上的象征，对他顶礼膜拜，百依百顺，变着法子讨他的欢心。但受尽日本奴役与掠夺的朝鲜，却对这个美国老行伍没有任何必须屈从的理由。朝鲜人民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长期受害者，他们渴望的是结束外国列强的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

于是，仅1946年间，大规模的示威、抗议、罢工、罢课等活动从年初到年尾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席卷了韩国73个郡。

美军出动骑兵和坦克镇压，制造了一桩接着一桩的大血案，结果使矛盾更加激化。以致到了10月，大丘爆发武装起义并持续了两月之久，成为韩国历史上著名的“十月抗争”。

麦克阿瑟后来的继任者李奇微将军在回忆录中承认：“美国的军事占领政策和措施不得人心，失去了朝鲜人民的信任与合作。”

对照这个时候斯大林为控制东欧国家，不顾一切强硬抵制英、美势力的所作所为，苏联在朝鲜问题上的反应，似乎并不符合斯大林的性格。因为，即使斯大林不愿因苏联红军强行在北海道登陆，而与已经占据日本全境的美军爆发冲突，他也完全可以为了报复麦克阿瑟的狂妄与无礼，不顾美国单方面划出的“三八线”，而一举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毕竟这个时候苏联红军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抢在美国大兵前面，也给美国人一个下马威。

斯大林为什么会在欧洲和在亚洲表现得迥然两样？

很简单，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对于遥远的远东地区，它的方针过去是，这个时候也依然是保持守势。



既然是保持守势，那么依据斯大林在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苏联在东北亚问题上只满足于取得对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大抵是恢复到日俄战争之前俄国在东北的状态——和把南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揽入囊中。对于朝鲜半岛，斯大林没有提出任何一点特殊要求，准备任由美、苏、中、英4国托管以后，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朝鲜政府。

也正因为如此，苏军占领北朝鲜后，不仅大肆拆运当初日本人留下的工厂机械以作战利品运回国内。而且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任由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曹晚植担任北朝鲜临时权力机构的最高负责人，却没有像在东欧国家那样，竭尽全力地去扶植一个苏联国家利益的代理人。

斯大林后来开始全力扶植北朝鲜共产党，与美苏冷战的发生，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直到1948年，美苏在欧洲已经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苏联在东北亚的政策依旧十分谨慎小心，因为它相信自己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完全无法与美国人抗衡。斯大林从来没有，也不打算在朝鲜半岛，或者朝鲜北方建立一个像东欧那样的卫星国。

因此，苏联首先呼吁美、苏军队同时撤出朝鲜半岛，而后又宣布苏联占领军主动撤出朝鲜北方，并承诺给予朝鲜人民充分的自治权，其程度远远超出了他承诺给一些东欧国家的自治权。

斯大林甚至不愿意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具有联盟性质的外交关系，也不愿意为他们统一祖国的事业承担任何责任，以免因此而刺激美国人的神经。

最能证明这一观点的是，1945年10月10日，苏联用“普加乔夫”号货轮把包括金日成在内的67名在苏联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受训的朝鲜军官送到元山港登岸。到了1946年初，苏联占领军就逐渐将权力向这批朝鲜同志手中转移。

在1948年以前，斯大林的战略部署一直是打算在北朝鲜建立一个亲苏的政权，并没有向南朝鲜渗透的意图。因为通过1945年强迫蒋介石政权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他已经在中国的辽东半岛轻易获得了通向太平洋的不冻港，朝鲜半岛在他的棋盘上，已无重要的军事价值。

所以，当南朝鲜劳动党受到李承晚与美国人联手血腥围剿、镇压

的时候，斯大林也坐视不管。

他认为，既然“三八线”已经划定，那么“三八线”以北是我的势力范围，以南是美国人的势力范围，他不愿意在这块并不具备军事价值的地盘上，跟强大的美国军队发生任何冲突。

到了1948年底，斯大林的第25集团军已经把北朝鲜牢牢控制在手中。而南朝鲜则不同，因为美国人在那里着力推行西方那一套民主体制，左派右派整天在议会吵来吵去，没完没了。有的议员脾气又特别暴躁，一上火便喜欢自刎手指，或者拿刀子往自己肚皮上捅，议员们还隔三岔五地在开会时来上一出“全武行”，看上去显得乱纷纷的。

而北朝鲜社会秩序很快就整顿好了——至少从表面上看，人民大众看上去规规矩矩，服服帖帖，经济也有了明显恢复。

斯大林觉得朝鲜的一切已经被苏联红军打理得让他足可放心，于是决定于1948年12月开始撤军。

但是，他提出的条件是：我撤，你美国人也必须撤。

可美国人在南朝鲜搞的民主社会还是一个烂摊子，连究竟让谁上台的问题心里也还没底哩，他就算想撤，也撤不了。

当时李承晚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是金九。

李、金二人各有优势。论威望，干出过许多惊天动地大事的金九，比皇室后裔李承晚不知高了多少。

金九号白凡，毕生投身于反日独立运动，曾多次被捕入狱。1919年朝鲜“三·一反日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后，金九和大批爱国志士流亡中国，寻求救国之道。

当年4月，金九在上海参与创建韩国临时政府。

1939年，得到蒋介石政府大力帮助的金九担任韩国临时政府主席，成为海外反日流亡运动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

金九率韩国临时政府流亡中国期间，坚持从事抗日活动。为了证明韩国抗日力量的存在，以及扭转韩国独立运动孤立无援的状况，在敌强己弱的情况下，暗杀日本军政界的重要人物，就成为了金九的主要斗争手段。

为此，他策划和组织了多次著名的暗杀行动。

1932年初，金九派李奉昌赴东京行刺日本天皇功败垂成。

同年4月29日日本天长节这一天，他又派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



日军为祝贺天皇生日举行的盛大庆典上，炸死了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大将、特务头子河端，炸伤第3舰队司令野村中将、第9师团长植田中将、村井总领事等一批日本军政要员。后来登上“密苏里”号战舰，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外相重光葵，也在这次爆炸中被炸飞了一条腿。

1945年日本战败，金九带领在中国的临时首都——重庆住了8年的韩国临时政府回国，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韩国进行了百折不挠的斗争。他积极奔走呼号，坚决反对美、苏、英、中4强对朝鲜进行托管，支持南北朝鲜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民主选举，建立统一的国家。为此，1948年4月19日，他不顾右翼分子的反对和威胁，冒险越过“三八线”，前去平壤与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商讨建立统一独立的新国家的问题。

1949年6月26日，半辈子策划组织暗杀重要人物行动的金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倒在了前朝籍日军军官、右翼分子安斗熙的枪口下。

金九被奉为朝鲜独立之父，受到了“三八线”两边朝鲜人民共同的尊崇和怀念，在如今南北朝鲜的首都，都塑有金九的铜像。

1993年，韩国国会重新调查金九遇刺一案，垂垂老矣的安斗熙被人抬着出来接受询问，他招供是受人指使的。

金九之子金信撰文披露，安斗熙暗杀金九后，只被短暂地关押后便逍遥法外，并且在一年内军衔连续晋升两级。

但安斗熙活得太艰难，成为人人唾骂的恶棍，经常有人找到安斗熙将他痛打一顿，然后扔下点钱让他治伤。他的家人也蒙受羞辱，走到哪里都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金九被刺身亡，替亲美的李承晚博士扫清了竞争对手，南朝鲜的开国总统，这下非李莫属。

斯大林要求美国政府同时撤军时，金九尚在，南朝鲜究竟该金九上，还是李承晚上，美国人还有些犹豫不决。

斯大林也不管美国人的态度，下令苏联红军首先撤军。到今年12月底，除留下3500名军事顾问外，第25集团军奉命将武器装备移交给金日成，随即全部撤回了国内。

苏联红军撤走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也在研判南朝鲜



的局势。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与苏联人不谋而合，认为南朝鲜没有军事上的战略价值，驻军毫无必要，遂下令美军撤出。

到1949年6月，美国人也一下撤走了。但和苏联人一样的是，美国也留驻有一个500人左右的美军顾问团，帮助指导和训练南朝鲜军队。不一样的是美步兵第7师奉华盛顿之命，撤走之前只将轻武器移交给了韩国国防军，一切重武器包括各种战车，则随士兵们同船返回了美国。美国人这么做的动机只有一个解释：我不给你大家伙，整天上蹦下跳嚷嚷着要用武力统一朝鲜的李承晚，便不敢主动去“三八线”上挑事。

老态龙钟的李承晚表现得像个角斗场上的斗士，他的风格和他的对手截然相反：年轻的金日成整天埋着脑袋，只做不说；老得步履蹒跚的李老头呢？光说不练。有美国人掐着脖子，他和他手下的将军们想练也没法练，只剩下嘴上功夫，整天鼓吹要用武力统一朝鲜。

1949年7月17日，大韩民国总理兼国防部长申性模在仁川的一次集会上发表演说称：“我们的军队已经准备好了，正随时等待着总统的命令，只要他一声令下，我们就会在3天之内占领平壤和元山。”

李承晚自己也大肆叫嚷“要结束南北分裂，就必须用战争来解决。我坚信我们能够在3天之内占领平壤”。并明确地给出了时间表，声称在“1950年用武力实现南北统一”。

所以说，对南北朝鲜而言，打是必然的。

唯一的区别是：谁抢得先手。

## 4. 为什么是金日成

如同南朝鲜政坛有李承晚、金九二虎相争一样，北朝鲜的金日成也有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斯大林最初看中的是曹晚植，而并非是年龄太轻、级别太低、影响也太大的金日成。

曹晚植是个固执地强调传统的人，但一点都不老土。他学过英文，上过日本的大学，看起来应该是个时尚人士。



可事实恰恰相反，曹晚植提出“靠朝鲜的东西，过朝鲜的日子”，他只穿用土布缝制的朝鲜袄裤、朝鲜长袍和朝鲜鞋袜，连名片用纸也必须是国产纸。

曹晚植也吃过日本人的牢饭，可是他一不跑二不避三不改做派，一直留在朝鲜国内和日本人死缠烂斗。这种硬骨头风格很符合朝鲜人的口味，于是他就被千千万万的粉丝们拥戴为“朝鲜民族运动的伟大旗帜”。这样一来，曹晚植在北朝鲜的地位就相当于印度的圣雄甘地，深受民众敬仰，甚至连他的政治对手，也都为他的人品所折服。

在当时的北朝鲜，曹晚植不仅是一位非常有威望的职业革命家，同时也是一面迎风招展的大旗。

不过，曹晚植是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按这面朝鲜“旗帜”的解释，在朝鲜半岛实行什么主义不是问题——曹晚植对共产主义理论也不排斥，甚至主张给民众分田分地——关键是必须由朝鲜人自己来干，外国人（无论是苏联人还是美国人，更别说在朝鲜半岛上仅仅是名义上存在负有托管责任的中国人和英国人）都应该卷起铺盖卷，尽快打道回府，坚决反对由4强托管朝鲜。他到处发表演讲，质问美、苏、中、英列强：“凭什么我们朝鲜人就矮了三分，不能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非得要托你们外国人来管理呢？”

这就惹得斯大林很不高兴了，我把你扶起来你居然还敢不听我的招呼，那就下去好了。

不久，曹晚植就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怎么失踪的？

朝鲜流传至今的一个说法是：

苏联占领军明知人微言轻的金日成无法与曹晚植巨大的影响和卓越的领导能力相比，便对其施行怀柔政策加以利用，背后却操纵整合朝共组织，帮助金日成尽快上台。

苏联占领军以软硬两手来对付曹晚植，他们首先暗杀了曹晚植的主要助手、朝鲜劳动党平安南道委员长玄俊赫。

金日成称不崇拜自己而崇拜自己的竞争对手曹晚植的革命同志玄俊赫为“假借共产主义名号的民族主义者”，并且早就在党内高层收集对玄俊赫的意见。

据苏联占领军政治部主任捷林杰·什特科夫中将的翻译苏籍朝鲜人俞在日后透露：金日成、金策、金容范、张时雨曾在政治部主任的

办公室里劝说什特科夫对玄俊赫实施暗杀。

而后发生的事实是，什特科夫亲自登门拜望了曹晚植，对其进行最后的“怀柔”劝说。

苏联将军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支持对朝鲜成功地实行托管统治，你就成为朝鲜的斯大林；但是如果你继续公开反对托管统治，我们将无法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曹晚植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什特科夫的利诱与威胁。

很快，噩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1945年9月28日中午，前往苏联占领军司令部谈完公事的曹晚植与玄俊赫坐在一辆货车驾驶室里，踏上了归途。

快到平壤市政府门前公路时，突然闪出一群身着便装的武装人员，对着他们举枪便射。

奇怪的是，如此近距离的抵近射击，当场被打死的只是玄俊赫与司机以及后面车厢内的几名保镖，曹晚植却完好无损。

袭击者将曹晚植拉下驾驶室，塞到一辆小轿车上，将他关进了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到了那里，曹晚植心惊胆战地看到了自己的儿子与儿媳妇。

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刺杀案震惊了平壤，舆论一边倒地认为是张时雨受控于金日成，导演了这场谋杀案。

金日成打着“打倒白色恐怖”的旗号，为玄俊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流着眼泪登台致悼词。

朝鲜人普遍认为张时雨是杀害玄俊赫的凶手，苏联军政当局不但没有将其逮捕，反而委任其为消费组合委员长。等到事态渐渐平息后，金日成又升其为商业部长并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但张时雨的人生之路至此已经走到了尽头。不久，他成了一名“美韩间谍”，倒在了“人民正义的枪口下”。

曹晚植一家三口先是被监禁在平壤高丽宾馆，之后被转移到寺洞，拘禁在过去日本海军的一处兵营里。

6月22日，也就是战争爆发前三天，金日成让副首相，过去的南方共产党（“南劳派”）头号人物朴宪永出面，向李承晚提出，用曹晚植父子交换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前些时候落入李承晚军警手中的两名南劳党政治局委员李舟河与金三龙。

李承晚同意交换，但要北方先把曹晚植父子送到汉城，他才释放



李舟河与金三龙。

但李承晚没有想到的是，双方还没谈拢，金日成就抢先动手了。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1950年10月中旬，“联合国军”即将兵临平壤之际，曹晚植父子被北朝鲜政治保卫局杀害。

为了取代德高望重却不喜欢与苏联人保持一致的曹晚植，斯大林让驻朝苏军顾问团重新推荐一个人。

这次被推荐出来的，就是金日成。

顾问团给斯大林的推荐电报说：金日成既年轻又能干，是苏联支持和扶植起来的东北抗日联军国际旅的一名出色的营长，在伯力生活训练了很长时间。

2004年底，俄罗斯历史学博士巴奇达列夫登门探访了时年95岁的苏联红军退役上校格奥尔基·梅克列尔。

从梅克列尔口中，一段关于金日成的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大白于天下。

据梅克列尔回忆，金日成在回到朝鲜之前，便已经引起了苏联高层的注意。

他向巴奇达列夫博士回忆道：

1945年中旬，苏联红军第25集团军解放北朝鲜不久，我作为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第7处处长，被召到了方面军司令员麦列茨科夫元帅的办公室。

我进去后，看见第25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捷林杰·什特科夫中将<sup>①</sup>也在座。

在简短的谈话中，元帅指出：“哈巴罗夫斯克郊区有我们一个以周保中为首的国际旅，该旅下辖部队主要有两个营：中国营及朝鲜营。你应当去那里并了解这个旅。和自己人谈谈，全方位地检查一下朝鲜营营长金日成是个什么样的人，能干什么。”

第二天，我就到了88旅，我也第一次见到了金日成。看起来，金日成并不是只会说自己的朝鲜语，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也知道一点俄语，虽然带有很重的口音，但却可以用于交谈。在和我

<sup>①</sup> 1948年11月，什特科夫成为苏联驻朝鲜的第一任大使。

的谈话过程中，他展示了一种思考能力及对时局评价上的成熟。我们认识了。我也和他的手下谈了话，而且还出席了一堂训练课，那堂课就是由金日成自己指挥的。他向我展示他是一位要求严格、认真但却在战士当中享有尊敬及爱戴的人。

总之，我在造访第88旅时，从金日成身上所发现的这些素质，我都在自己写给元帅的报告中写上了。看起来，在选择金日成作为候选人一事上，我的意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天，我带着金日成赶到了麦列茨科夫元帅那里。当金日成从元帅的办公室里走出来之时，我从他的胸前发现了一枚苏联红旗勋章。

我抓起他的手用力握了起来，祝贺他得到了勋章。

根据给金日成授勋的同一命令，第88旅216名军人因“战功”及“勇敢”，分别被授予了红旗、红星勋章及奖章。另有58人在9月10日被奖赏。

第88旅因何而如此著名？

首先是因为这是一支独立旅，属于一支侦察部队，直接隶属于远东军司令部侦察处。其成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中叶。在那些年里，在东北与日伪军作战时受损严重的游击队，会定期转移到苏联境内，在那里得到所有坚持战斗的必需品，然后再返回东北继续作战。

1941年7月中旬，在德国进攻苏联而且日本有可能进攻远东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决定在这批抵抗力量的基础上成立第88国际旅。部队主要由中国人及朝鲜人组成，其中包括抗联战士、华裔及朝裔苏联人和苏联少数民族成员。

中国人在部队中占绝大部分，朝鲜人只占10%。

该旅中的主官由中国人担任，但他们的副手必须是苏联军官。规定是主官必须听副手的。这支部队被列入了苏联红军的编制之内，所以，从排长以上的指挥官开始，军官们都有军衔。

而且为了提高部队的训练效率，远东军司令部还为该部队装备了各种新式武器。

金日成作为营长，他不止一次地从自己的中国和苏联的首长那里得到很高的评价。他纪律严明，做事认真，对部下要求严格。作为所



有朝鲜人当中军衔最高者，第一营营长成为了一个独特的中心，其他军官——挂有苏军军衔的朝鲜人，几乎都聚拢在他的周围。

金日成最大的特点是：他只听苏联顾问的建议，而对直接领导他的中国上司周保中等，常常会表现出前恭后倨，虚与委蛇的态度。

给金日成授勋之后，麦列茨科夫元帅把梅克列尔叫进去叮嘱道：“请着重研究这个人，他应当回到朝鲜，那里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他认识的人也很少。好好调教一下他，让他熟悉那个国家、熟悉那个国家里的人。”

“没错，苏联元帅用的就是‘调教’这个词儿。”梅克列尔向巴奇达列夫博士郑重地强调。

梅克列尔再次遇到金日成已经是在平壤了，第25集团军司令部及政治部都设在那里。而那时的金日成，已经成为了苏联红军警备司令部的副司令——一个在稚嫩的朝鲜政坛上屈指可数、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曹晚植神秘失踪后，莫斯科立即采取积极步骤，开始在北朝鲜大树特树金日成的个人形象：年轻英俊、精力充沛的苏联红军侦察大尉。

梅克列尔说，“所有部署在朝鲜半岛北部的苏联红军部队，都得到了一个宣传歌颂朝鲜人民的传奇英雄，为朝鲜自由独立而战的人民战士金日成的指南”。

金日成第一次在朝鲜公众面前的露面，就是由第25集团军司令部政治部准备并具体布置的。

1945年10月14日平壤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金日成首次正式登台露面。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成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迅速升起，广为人知的大明星。

梅克列尔朝夕相处地伴随了金日成整整一年。

当时，金日成在从政的道路上刚刚迈出第一步，如果没有苏联顾问的建议，他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做，也做不成的。

每天早上，梅克列尔都会准时到金日成官邸，问候完毕之后就开始制订工作计划。金日成几乎从来没有和苏联人争吵过。他非常感激斯大林，在各种场合习惯于充满激情地宣称：“北朝鲜和苏联世代代是亲兄弟，斯大林永远是我的亲兄长。”

当时，为了回击李承晚的反宣传，吹散笼罩在金日成头上的任何

一片疑云，苏军政工人员组织年轻人及记者徒步前往金日成出生的村子。那个村子距离平壤大约有10公里的路程。在见面会上，所有农家的居民都被聚集到一起，摆了一次鸡、鸭、鱼、肉全上的盛宴，给平素只能吃糠咽菜的农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开了他们的眼界。

金日成在异国他乡流浪多年之后，首次见到了自己已经高龄的奶奶、爷爷，以及侄子——他的父母都被日本人杀害了。

这次会面也拍了照，并且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

苏联人把整个活动组织得令金日成非常愉快。

17岁的侄子从此被金日成带到身边，并且很快被任命为朝鲜青年联盟中央总书记。

当时，出生在中国东北长白山抗日营地一座窝棚里的金正日才刚满3岁，梅克列尔把他抱在怀里，也让随行的苏联红军记者拍了一张照片。

金日成的确很年轻，那一年才32岁。他心气极高，把南北朝朝鲜统一成整体视为他此后生涯中最大的愿望。

对金日成的脱颖而出，美、韩、日三国学者长久以来的看法是：斯大林看中金日成，就是因为他资历浅，影响力小，跟大名鼎鼎的崔庸健、武亭没法比，甚至与同样是在中国参加过抗日战争，并在中共的扶持下长期率兵征战的金斗奉、朴孝三、朴一禹、金雄、方虎山、李德山、崔仁等相比也难望其项背；手中没有实力，便于控制；再加上长期在苏联红军中生活，对苏联人有深厚的感情。

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拒绝中共对他的控制。

中共上层对当时的金日成全然不了解，在毛泽东的心目中，能够成为朝鲜新政权核心的理想人物当然应该是崔庸健、武亭这样长期战斗生活在中国的朝鲜同志。他俩的资格都很老，在朝鲜的影响也远比这个嘴上没毛的年轻娃娃大得多。

崔庸健毕业于中国云南省讲武堂，是朱德的小师弟，后任黄埔军校教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高级指挥员之一。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担任民主联军第7军军长，后被中共中央东北局派往延安。在他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之际，苏联人抢先把金日成等68名朝鲜籍苏联红军军官送回了平壤。崔庸健后来归国担任朝鲜民族保卫相（国防部长），战后晋升为元帅，相继担任人民会议常务委员长、国家副主席等要职，被敬称为



“朝鲜的朱德”。谨言慎行，从不对金日成的领导构成威胁，所以才成为得以善终的极少数“延安派”主要领导人。

1976年，崔庸健在平壤驾鹤西去。

武亭的一生比崔庸健更具传奇色彩，充满了独特的血性与暴烈刚猛之气。

武亭也是年轻时来到中国闯荡，1924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炮科，系蒋介石与陈诚的校友，24岁时便在军阀部队里官至炮兵中校。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还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组织者之一。后来进入江西苏区，以精湛的炮兵技术，成为彭德怀手下一员著名战将。

彭德怀在自传中谈到了他的这位朝鲜族战友：“占领岳州后，英、美、日兵舰仍如在黄石港一样，很猖獗，对城岸乱轰。我们隐蔽地架好了炮。当时，还只有我自己和一个朝鲜同志武亭会用炮。待敌舰逼近时，还击了几十炮，大概10发以上打中了兵舰，从此它们再不敢抵岸射击了。”

彭德怀对武亭的信任还可见于美国人索尔·兹伯里写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彭德怀担心会和第1军团失去联系。由于没有向导，第1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派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联系。”

武亭相继担任过中央苏区红军特科学学校校长、红军首任炮兵团团长。长征到达延安后，武亭成为中央军委唯一的外籍委员，后来奉中央之命，与金斗奉、朴孝三、朴一禹、金一、徐辉等一起，到太行山区创建朝鲜抗日义勇队。

1945年8月11日，朱德总司令签署命令，着：“朝鲜义勇军司令武亭、副司令朴孝三立即统率所部，随同八路军及原东北军各部向东北进军，消灭敌伪，并组织在东北之朝鲜人民，以便达成解放朝鲜之任务。”

但是日本天皇三天后就宣布投降，使得这支军队失去了解放自己祖国的荣誉。

武亭、朴孝三、金斗奉、朴一禹、金一、徐辉等率领7个支队数千名朝鲜抗日义勇军于11月20日抵达中朝边境城市安东（今丹东），但是他们却被荷枪实弹守卫在鸭绿江大桥上的苏联红军，拒之于自己的祖国大门之外。



更让他们难以理解并怒不可遏的是，当他们涌过鸭绿江大桥，执意要踏上自己魂牵梦萦的祖国国土时，苏联老大哥不仅刀戈相向，将他们中的不少人打得头破血流，还缴了他们的械。

协调的结果是，允许武亭等部分朝鲜干部回国。

但是，他们必须“非武装地以个人身份回国”，而不能以军队或政党的身份回国。

武亭与他的战友们没有选择的权利。他们返回了祖国，但他们指挥的朝鲜抗日义勇军却遵照中共东北局的指示，在丹东改编成4个团，最后发展中国朝鲜族人扩编为东北解放军164、166、156三个师，卷入已经爆发的中国内战之中。

10天以后，武亭与金斗奉、朴孝三、朴一禹、金一、徐辉、尹公钦等82名干部——也就是后来企图与金日成分庭抗礼的“延安派”核心——渡过鸭绿江到达新义州，苏联人为他们安排了一节车皮，将他们直接送去了平壤。

祖国对归来的忠勇儿女们板起了面孔。没有激昂的音乐，没有飞舞的彩旗，也没有热烈的人群和手执鲜花的儿童前来欢迎这些回国的职业革命家们。荷枪实弹的苏联红军士兵在月台上布置开了警戒线，用阴沉的目光紧盯着他们。

只有几个戴着大盖帽的苏联红军的接待人员上前和他们握握手，然后匆促地让他们上了等候在火车站的军用大卡车，并迅速消失在夜幕之中。

武亭一行被带篷的军用大卡车送到太平洋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们对平壤的政治氛围一无所知，他们甚至没有未来的计划。

最重要的是，突然失去了枪杆子的他们在为之出生入死地奋斗多年、思念弥久的祖国土地上，就像一群过客，只能等待苏联人和一个曾经在苏联红军中担任过营长的同胞的发落。

有些人陆续被安排了职务，离开了旅馆，但大多数人还留在旅馆里，等待他们的是不可知的命运。一直等到1946年1月，最后一位归国者才被安排了职位，离开了太平洋旅馆。

武亭是朝鲜军民心中顶天立地的大英雄，但是在苏联人的眼里，他和崔庸健一样，也是忠于中共的讨厌家伙。

苏联红军的将军们对武亭和他带回去的“延安派”干部非常冷



淡，但他们又十分明白，武亭在北朝鲜享有极高的声望。

在武亭回国之前的1945年10月28日，新成立的北朝鲜行政局选举中，缺席的武亭被选为第二号领导人——行政局副局长。

而排在第一号的领导人是“北朝鲜圣雄”曹晚植，足见其声望之隆盛。

武亭回到祖国后，在劳动党内屈居于异军突起的金日成一人之下，担任第二号领导人不久，他便受到了广泛的指责——因为他把与他同时从中国回来的81名干部中的不少人安排在了重要的位置上，而排斥本土的、莫斯科回来的，以及随金日成乘“普加乔夫”号回来的“游击队派”干部。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成立以后，年轻的金日成成为了共和国名正言顺的第一号领导人。武亭则更加失意，他失去了党内的领导职务，改任民族保卫省副相（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兼人民军炮兵总司令。

在1946年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方脸阔腮，浓眉大眼，蓄着仁丹胡子，很有一副男人模样的武亭压抑已久的愤怒终于爆发了。

他猛地一把扯开自己的衣襟，向着震惊不已的同志们展示自己的枪伤弹痕，并且用沙哑得像摇滚歌星般的粗砺嗓门大声吼叫：“看看这些伤痕吧，我的同志们，这都是我为亲爱的祖国付出的代价，为什么你们现在就只是声嘶力竭地赞美他一个人呢？”

“一个人”，就是如日中天的金日成。

显然，这种只图一时痛快的感情发泄，只能表明擅长放炮和军事指挥的武亭在政治上的不成熟，而且必然会对性如烈火的武亭今后的生涯极其有害。

同样血气方刚、胸怀大志的金日成，绝对不会对武亭的大不敬充耳不闻，他在等待合适的机会。

## 第二章

# 半岛太小，容不下两个政府

### 1. 误会，还是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

1949年3月，金日成作为国家元首，第一次携次帅兼外务相朴宪永出访莫斯科，便十分迫切地向斯大林提出用武力统一朝鲜的问题。斯大林像老师教训学生似的教导他俩，统一当然是好事，但是你们不能用武力来统一，因为你们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你们最好通过政治手段，加强政治攻势，宣传北朝鲜是全世界最优越的社会制度，让南北朝鲜的人民都跟着你们走。然后你们再组织游击队，潜入南方去进行破坏，暗杀反动军政人物，这样里应外合，统一就能实现了。

他还特别明确地告诫金日成：“只有在对南朝鲜军队进行反击时，你的军队才可以越过‘三八线’。”

在东西两大阵营已经形成的世界冷战格局中，金日成作为苏联占领军扶植培养出来的北方领袖，在来自南方强大的军事压力下，他自然首先会想到求助于苏联，其次才会考虑与朝鲜一江之隔、各方面都与苏联不可同日而语的中国的帮助。

金日成把朝鲜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当成了天大的事情，牢牢记在心里。从莫斯科一回朝平壤，他就急不可耐地派内务副相兼朝鲜人民



军总政治局局长金一将军，到北平郊外的双清别墅求见毛泽东。

一见毛泽东的面，金一就迫不及待地说：“尊敬的毛主席同志，我们要解放南朝鲜，请你们给予帮助。”

然后，金一向毛泽东递交上一封朝鲜劳动党给中共中央的信，信的中心意思就是请求中共把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师转交给朝鲜政府。

而在此之前，中共已经送给金日成急需用来开国的一支小部队。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金日成在苏军保护下返回朝鲜北部，并于1948年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在建国前的1947年，中共应金日成之请，抽调了吉东警备1旅2团的两个营，计1200名朝鲜族官兵，连同武器装备送给金日成，作开国建军之需。

陪同金一前去双清别墅的，是代总参谋长聂荣臻。

“好啊，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嘛。”金一话音刚落，毛泽东便痛快地说，不过，马上话锋一转，“但是你们现在不能打，你们要统一，得等我们先统一完了，你们再动手。”

那是1949年的4月25日，百万人民解放军在5天以前打过长江。刚刚挥毫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毛泽东心情大好，不是小好。

毛泽东继续说道：“我先把中国统一了，再把部队往北边一调，很快就能帮助你们统一。解放军穿你们人民军的军装，悄悄过鸭绿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谁也分不清楚谁是中国人，谁是朝鲜人。”

毛泽东还对金一说，他同意金日成关于南北冲突在所难免，必有一战的看法，并认为即使美国不干涉，它也会唆使日本参加对北朝鲜的作战。毛泽东表示对此不必担心，因为“苏联和中国都坚定地站在北朝鲜一边，一旦情况需要，中国会派兵援助你们”。

但是，毛泽东同时也明确表示，他“不支持金日成立即实行武力统一朝鲜的计划”。

有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稍后派兵援助的痛快承诺，金一急忙谈到他此行的主要问题：“现在如果南朝鲜要打我们，我们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防御。主席同志，解放军部队里有很多朝鲜人，希望你能允许我把他们带回去。”

对历来高度崇尚国际主义精神的毛泽东来说，这完全不是个问题。他问聂荣臻：“我们在东北还有多少朝鲜族部队？”

聂荣臻回道：“两个朝鲜师，一个驻沈阳，一个驻长春。”

毛泽东点点头，对金一说：“我给高岗、林枫、李立三他们写封信，你可以先把这两个师拿回去。”

聂荣臻说：“还有一个156师已经被林彪带到南方打仗去了。此外，除了这三个全部由朝鲜同志组成的野战师，四野其他部队里，还有一些零散的朝鲜族士兵。”

毛泽东对金一说：“等我们的战事结束以后，这些朝鲜同志你们也可以全部拿走。”

东北解放以后，东北局将朝鲜族军队改编成3个师，李德山的164师驻长春，方虎山的166师驻沈阳，还有一个156师跟随林彪的四野入关，一直打到了海南岛。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朝关系极度恶化，两国相互攻击抹黑，鸭绿江两岸剑拔弩张。金日成在劳动党中央全会上宣称：“整个中国的解放战争都是我亲自指挥的，我英勇的人民军从黑龙江一直打到了海南岛，解放了全中国，我才把这个国家交给毛泽东治理。”

虽然咱们中国人肯定认为这牛皮吹得太大，可金日成理直气壮说这话的根据，就在于的确有一个由朝鲜族解放军组成的156师，从中国最北边纵贯神州大地，一直打到了中国最南边，并且在邓华和韩先楚的指挥下，参与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

7月20日，原四野的164师和166师携带全部武器装备，齐装满员开进朝鲜。

164师由李德山任师长兼政委，全师入朝时实有兵员10821人。

166师由方虎山任师长兼政委，全师入朝时实有兵员10320人。

两个师都在中国的内战中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属于训练有素的能战之师。

过了鸭绿江后，164师配置在新义州，166师配置在罗南。

朝鲜方面随即将164师的番号改为朝鲜人民军第5师，166师的番号改为朝鲜人民军第6师。这两个身经百战的师，马上成为朝鲜武装力量的绝对主力。

不过，先于156师回国的李德山的长春师和方虎山的沈阳师一过鸭绿江，受到的不是自家同胞弟兄的欢迎，而是劈头盖脸的挖苦和嘲笑，“你们这算是什么烂部队呀，一点军人的威风也没有”。

的确如此，朝鲜人民军穿的全是苏联红军那一套光鲜锃亮的行



头，军官清一色帽檐嵌有红色装饰线的高筒帽，厚呢子军装加马裤，十字交叉的宽匹武装带，油黑发亮的高统马靴，肩章领章胸章上军衔一目了然，下级见了上级，双脚一碰，“啪”地一个立正敬礼，看上去既英武，又神气。哪像东北过来的中国军队，无论官兵，人人头上戴着一顶臭烘烘的狗皮帽子，土布做的军装皱得来就像刚从坛子里抓出来的老盐菜。当官的也没个肩章领章胸章，站没站样，坐没坐相。彼此见了面勾肩搭背，扬着旱烟袋，亲亲热热就是一嗓子：“呃，老哥，今儿吃了没？”

朝鲜人坚持认为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争夺东北时期，他们给了中国共产党很大的帮助。

得人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事实的确如此，当时中共东北局在平壤设了一个办事处，主要用来筹集军费，购买各种战略物资和药品，还把自己的医院、物资基地设在鸭绿江朝鲜一侧。作战时林彪的军队占上风固然好，一旦打了败仗，落了下风，扯掉脚杆就往苏联红军控制的鸭绿江对岸跑。国民党的军队追到江边就非停步不可，他们一旦过江就成了重大国际事件，斯大林就有理由拿蒋介石开刀，蒋介石那副身板儿，哪里受得了？

不过，有一点应当说明，对东北中共军队的支持其实不太关乎金日成的事，更不关乎朝鲜人的事。那时苏联远东军区第25集团军占领着北朝鲜，朝鲜政府严格执行的是苏联替他们制订的国家政策，谁敢抗命不遵就让谁难受，比如悲情人物曹晚植。苏联人的势力在整个北朝鲜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是庞大的苏联顾问团在管理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一株小树，每一棵小草，而不是金日成。大事小事全得由苏联人说了算，金日成一点话也说不上。

真要算这笔人情账，也得算在斯大林头上不是。

毛泽东在与金一的这次谈话中着重强调，南北朝朝鲜统一的问题，要等到中共完全统一中国之后，再着手解决。

而且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先征求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后，才能展开行动。

显然，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派兵援朝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北朝鲜受到南朝鲜的攻击，而不是自己主动出击；二是必须等到中国完成统一大业，也就是拿下台湾之后，我才同意你金日成动手开打。

金一还向毛泽东提出：“这三个师所需的弹药，能否给予

支援？”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能够制造弹药，朝方需要多少，我们就给多少。”

实际上，不但弹药全部满足朝方要求，兵员上也进行了紧急补充。

1950年1月初，时在武汉的林彪给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发电报，称四野156师中的上万名朝鲜籍官兵在进军华南后，情绪出现波动，许多人强烈要求回国。因为中国的战争即将结束，故希望把他们和其他部队中的朝鲜籍官兵集中送回国去。

此时中国南方战事基本结束，规模庞大的人民解放军中众多官兵的复转安置，必然将是个极为棘手的大问题。

辽沈战役一结束，四个野战中四野一枝独秀，其他三个野战军加起来都没法和林彪的部队比。彭德怀的一野最弱，7.5万人，刘邓的二野从大别山出来时是12.5万人，陈粟的华野好得多，38万人。林彪的四野有多少？我的个老天爷——130万精兵强将！

金日成的南北统一战争准备已经是箭在弦上，挽弓待发。他不断催促中方按照毛泽东已许诺的，尽快把四野156师连同其他部队中的朝鲜族士兵移交给北朝鲜。中国方面正好乐得做个顺水人情，通知金日成，“由于作战行动结束，中国人民军队中现有的朝鲜族部队正在逐渐闲置下来，如朝鲜政府愿意，我们可以转交”。

金日成马上派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部长金光侠赶到武汉，从林彪手中接收朝鲜师。

金光侠要求让这批部队携带武器装备回国。林彪、聂荣臻请示毛泽东，1月22日，毛泽东批复同意。1950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命令，156师与其他部队中的朝鲜族官兵总共16452人集结于南昌，并于2月22日陆续用火车运往郑州集结。

3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该部队改编为独立第15师，毕业于延安中央党校的原156师副师长崔仁升任师长。在郑州市广场召开了独立第15师成立大会，四野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参加大会并讲了话。会后还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

在我国丹东，独立第15师番号改为朝鲜人民军第7步兵师，所有官兵换穿朝鲜人民军制式军装，各级军官一律佩戴朝鲜人民军军衔。

第7步兵师“衣锦还乡”，这就比前些时候回去的方虎山、李德



山两个师，威风多了。

3月24日，这支部队被运抵元山。

不久，第7师又改变番号为朝鲜人民军第12步兵师。

由此可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朝鲜人民军移交了成建制的3个野战师，共计38000人左右。加上此前送给金日成的吉东警备1旅2团的两个营1200人，稍后又在延边及周边各县征招4200人，总共达到了44000人。

金日成不惜用9吨黄金、40吨白银和1500吨其他珍贵矿石，来换取价值1380万卢布的苏联武器弹药，用以装备这批在中国战场上久经锤炼后归来的精兵强将。

而且根据金日成的要求，苏方还同意，北朝鲜可以提前使用原定于1951年才提供的7000万卢布的国家贷款，来装备自己的军队。

手里握着这样一支铁血洪流、虎狼之师，金日成满以为能够一举荡平李承晚那弱不禁风的军队，一马平川地解放南朝鲜。

于是，他的手指移到了战争机器的可怕按钮上，随时准备摁下去。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隆隆的礼炮声尚在晴朗的天空中回荡，大洋彼岸，华盛顿的政治家们睁大了眼睛，紧张地注视着新生的红色中国的一举一动。

不能让苏联人继续扩张在亚洲的势力，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毛泽东的态度，美国人不希望看到一个一边倒的结果——那对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个灾难！因为一旦中国倒向苏联，就意味着美国通过太平洋战争在亚洲获得的权益，将大大缩水。

秉承国家间的交往只有永恒利益这一信条，美国人果断开出了自己的筹码。

1949年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出第28号密令：《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

文件确定了美国官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同时文件确定了任何支持台湾政权的做法，都是对美国利益不利的，都会使美国卷入一场战争，都会使美国成为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文件更强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台湾无论从历史还是地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不能够分割的一个整体国家。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代表美国政府，公开发表了《关于台湾的声明》，再次确认《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中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条款，宣布美国无条件认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掠夺的野心。

杜鲁门的这一“声明”无异于表明美国向全世界声称可以放弃台湾的蒋介石——同时也就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将顺理成章地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紧跟着又在全美新闻俱乐部演讲时公开宣称：“美国的防线在阿留申群岛、日本、冲绳、菲律宾一线。”

偏偏漏掉了台湾和朝鲜——美国人为了拉拢中国，不仅放弃了台湾，连与中国紧挨着的朝鲜半岛，居然也不在美军的防线之内了！

美国人这一步，退得也太大了一点。

对美国人弄出的动静，瞪大了眼睛的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绝对不会无动于衷。

1950年2月17日，在莫斯科阴冷刺骨的寒风中，毛泽东踏上了回国的火车。

一个星期后的2月23日，莫斯科任命拉祖瓦耶夫中将为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替代自苏联从朝鲜撤军后一直兼任这一职务的什特科夫。此后，对金日成的要求，苏联政府无请不准，从飞机坦克、枪支弹药到手电筒、急救包，凡是战争所需物质，一律快速运往平壤。

紧接着，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在拜访毛泽东时，提出了金日成访华的要求。毛泽东表示同意金日成访华，但同时提醒对方，“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必须秘密进行”。

6月1日，斯大林批准作战计划；6月10日，北朝鲜召开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下达部队移动展开的命令；6月24日，北朝鲜7个师由西向东，在“三八线”以北完成部署。同日，苏联军事顾问视察了“三八线”阵地后，遵照斯大林的命令，所有军事顾问集体后撤到平壤。

斯大林的思路十分明确：从苏联的安全战略出发，莫斯科既要掌握这场战争的指挥权，又不能让苏联人公开参与到战争中去；如果实在迫不得已，那就让中国人冲到第一线，去和美国人拼杀。

韩国方面认为艾奇逊的声明表明美国已经放弃了韩国。在日本表示欢欣鼓舞的同时，李承晚政府却感到非常失望，不断批评和抗议美



国政府抛弃大韩民国的态度。

更让韩国人感到羞辱的是，在韩国政府的强烈要求下，美国总算同意援助韩国军队一批急需的通讯器材和装备零件。

首批援韩物资在美国出港的优先顺序被排得很靠后，直到战争爆发4天后才随远洋货轮运抵釜山，而且到岸的居然是价值250美元的几大捆军用电话线！

李奇微在回忆录里说：“南朝鲜军队所以缺乏武器装备，缺少受过训练的指挥人员，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朝鲜在战略上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关心的主要是自己不要在那里陷得过深，免得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作战。因此，我们不愿充分武装南朝鲜军队，不愿采取有力措施克服其指挥人员存在的不足之处。这些指挥人员的军事知识，确实太差了。”

除此以外，在美国的有意制约下，南朝鲜军队还没有重炮，没有坦克，没有反坦克武器，更没有空军和海军。

不断从“三八线”以北地区传来的各种军事情报，让深知自己的军事力量薄弱的李承晚，长期处于恐慌和沮丧、怨恨之中。

到了1949年，美国人完全受到了这样一种理论的支配：即将把美国卷入其中的下一场战争将是一场全球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朝鲜的地位完全不重要。

而且，无论怎样，三面临海的朝鲜都是无法防守的。

美国人对联合国充满了信心，原子弹又为他们构筑起一道心理上的马奇诺防线。这道防线使美国人民有充分的理由强烈要求陆海空三军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让尽量多的孩子重返家园，与亲人团聚。

李奇微说：“对这种举国一致，强烈要求遣散美国有史以来最庞大军队的做法，任何人都可以根据后来的种种情况，轻而易举地加以指责。可是，任何有前途的政治家，如果当时竟竭力主张国家继续保持战备状态，继续在距本国8000英里之外的地方驻扎大批部队，那他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成为千夫所指的角色。”

北朝鲜有着强大的突击力量，在“三八线”附近集结着大量军队，这些情况对美国的情报机构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问题在于他们的决策者在分析判断时出了问题。

他们过于自信地认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敢于冒着被原子弹攻击的风险，去发动一场针对美国的战争。

从时间上看，在中国处理朝鲜师回国的问题时，毛泽东根本不同意金日成通过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朝鲜统一问题，斯大林也没有同意金日成主动向南进攻的计划。

因此，中国军队中的朝鲜士兵回国，绝不能说明中国领导人当时就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策划。

1949年毛泽东同意朝鲜师回国，是因为他担心北朝鲜受到南方的攻击，从而出于国际主义的立场，对朝鲜革命政权表示的同情和支持。1950年批准朝鲜师回国，一方面是因为朝鲜战士有回国的强烈意愿，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已经在考虑军队复员和减少军费开支的问题了。因此，在朝鲜战争历史研究领域很有影响的美国知名学者、中国问题专家艾伦·怀廷很早以前就得出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这些帮助中国革命的朝鲜官兵回国是很自然的现象”。

不过，当最后一支全副武装，且经受过战火锤炼的朝鲜族部队陆续抵达元山港时，金日成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已经下定决心，要发动一场战争了。

因此，从客观上讲，3个经过长期战火锤炼的朝鲜师回国，对于金日成的突然袭击能够成功，的确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不知内情只看皮毛的某些国外学者抓住这件事情，以前嚷嚷得非常厉害。在中国的档案没有解密之前，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朝鲜战争是毛泽东、金日成，还有斯大林3人共同策划的。

主要的论据就是，早在1949年7月，中国就已经秘密派遣四五万人民解放军主力进驻了朝鲜。

历史的表象看上去果真如此，但实质上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朝鲜被日本吞并以后，大量不愿做亡国奴的朝鲜人逃到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居住在东北的朝鲜人，就已经超过了200万。

日本侵占东北以后，这200万朝鲜人与中国人一样成为了日本人的奴隶，也同样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了东北抗日联军，金日成就是其中一员。二战胜利后他们又被编入了林彪的东北民主联军，再后来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因为当时中国打内战，也没条件让这200万朝鲜人加入中国国籍，所以他们虽然在东北生活了很长时间，却依然是朝鲜国民。

一直到了1952年，朝鲜战争已经打了快两年了，战局进入到



“边谈边打”的僵持状态，中国政府这才着手处理这个问题。

当时的政策是让他们自愿选择，加入中国国籍的，欢迎；不愿加入中国国籍的，对不起，请限期离境。

那时候朝鲜三千里江山正打得一塌糊涂，“离境”去哪儿呢？所以绝大多数朝鲜人都选择就地加入中国籍。

中国档案解密后，事实就非常清楚了。所谓毛泽东在战争爆发前派遣大批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先期进驻朝鲜，与后来爆发的朝鲜战争，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 2. 意气风发的金日成

金日成像吹气球似的，突然之间手中便握有了一支精锐的部队。等到1949年6月美军撤离南朝鲜以后，他觉得这下机会来了。

9月，他和苏联大使什特科夫以及总顾问拉祖瓦耶夫中将共同策划了一个作战计划，叫作“瓮津半岛作战计划”。

瓮津半岛是靠西海岸“三八线”附近的一个三角形突出部。

金日成的设想是进行一次战略试探，把部队沿着“三八线”铺开，先打瓮津半岛，如果美国人没有什么大的反应，再顺势全线出击，一举荡平南朝鲜。

什特科夫把这个作战计划呈报给了莫斯科，政治局会议作出一项决议，委托葛罗米柯起草文稿。

最后发出的文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经再三讨论以后认为，不能采取军事行动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如果这样做，后果必然是导致美国干预，致使远东出现战争危机。”

9月24日，这份文稿以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发到了北朝鲜，同时还发去了斯大林给金日成的一封私人信件。

斯大林态度未变，仍然建议金日成坚持加强宣传，多搞游击队潜入南方，进行袭扰、破坏、暗杀。等到条件成熟时，再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实现国家统一。

金日成看完文稿与信函后大失所望，情绪低沉到了极点。

而就在这年的9月到12月期间，“三八线”上发生了几起比较重大的武装冲突，小冲突则多达2000多起，平均每一天就有20起左右。

10月14日，“三八线”附近又发生了激烈战斗。北朝鲜第3警备旅对侵入“三八线”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鲜军队展开反击，并越过“三八线”，占领了两处高地。

由于什特科夫参与讨论并默许了这一军事行动，而事后又未向斯大林报告，斯大林大发脾气，痛斥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无能。

斯大林愤怒地批示道：“留你们这些大使、顾问在那里干什么？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事先也不阻止，事后也不向我报告。”

挨了痛斥的什特科夫深感冤枉，因为未及时向斯大林报告并不是他的过错。按照工作程序，他只负责向外交部和国防部报告，并不直接向苏共中央报告。

10月26日，斯大林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说：“你两天前的电报收到，在朝鲜问题上，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金日成不能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统一的问题。这个事情你放心，由我来做金日成的工作。”

12月16日，斯大林与毛泽东在克里姆林宫会谈时，斯大林谈到可以保持5至10年甚至25年的和平，因而否认了在朝鲜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毛泽东一直不同意也不重视金日成的进攻计划，他担心的是出现相反的情况。

毛泽东说：“朝鲜的问题，现在不是北边进攻南边的问题，而是南边进攻北边的问题。南边的力量要比北边强得多嘛，还有美国军队在那里撑腰嘛。现在的问题是北边要壮大力量，时刻有所准备。”

毛泽东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解放新疆、西藏，但摆在第一位的，无疑是台湾的解放。对他来说，朝鲜即使要实现武力统一，也应当是斯大林的责任，因为斯大林才是全世界公认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当家人，而他不是。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金日成大举兴兵，也必须等到中国完成统一大业之后。

况且，虽然斯大林提议自己主管欧洲共产党事务，毛泽东主管亚洲共产党事务，偏偏北朝鲜不吃这一套，无论大事小事，金日成从不



主动向毛泽东征求意见和汇报，而是直接越过他这个“亚洲共产党的领导人”直接向斯大林请示。

久而久之，这种不正常的状况，竟然成了常态。毛泽东对此是既不快，也无奈。

但是，仅仅两个月以后，斯大林便给金日成发放了走向战争的通行证。

1950年1月份，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

1月17日，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马上要到北京（此时北平已更名为北京）赴任，中国驻平壤大使馆为他举办了一个欢送宴会，金日成、什特科夫、拉祖瓦耶夫都去了。

金日成嗜酒，酒量也大，这一天大家左一杯右一杯地敬他，结果喝高了，不知是酒后失态，还是借酒吐真言，他突然摇摇晃晃地站起身，一只手抓住什特科夫，一只手抓住拉祖瓦耶夫，眼泪汪汪，情绪冲动地大声嚷道：“什特科夫同志，拉祖瓦耶夫同志，现在中国的统一已经完成，就只剩下我了。几千万南朝鲜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受煎熬，做梦都盼望着我去解放他们，我不明白啊，斯大林同志为什么就不准我去解放我受苦受难的同胞呢？斯大林同志说必须要等到南朝鲜主动向我们发起进攻的时候我再搞个反击，一下子打过去。可我等了这么长时间，李承晚总也不来打我。再这样等下去怎么行呢？如果解放朝鲜南方人民和统一祖国的事业一拖再拖，那么我就会失去朝鲜人民的信任。不行，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马上去莫斯科，我要面见斯大林同志，和他讨论南方的形势和向李承晚军队发动进攻的问题。如果不能同斯大林会面，那么，我就马上去北京会见毛泽东。”

金日成还向两位苏联大员说道：“现在我的人民军比李承晚的军队强大得多，为什么斯大林同志不允许我进攻瓮津半岛，只要斯大林同志同意我进攻，我保证人民军在三天之内就可以拿下瓮津半岛。如果人民军发动一场全面进攻，几天之内，我就可以攻入汉城！”

什特科夫回去后立即把金日成在午餐会的表现，详详细细写了一份长长的电报，发回了莫斯科。

他提醒斯大林：“金日成有些醉意，整个谈话是在兴奋状态下进行的。看来，他说起这些话不是偶然的，而是预先想好的，目的是倾诉情怀，试探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在整个谈话过程中，金日成一再强调，他希望听取斯大林同志对朝鲜南方形势的看法，因为他（金

日成)一直都想发动进攻。”<sup>①</sup>

斯大林接到这个电报以后，过了11天，也就是1月30日，他与毛泽东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上签罢字，举起香槟碰了杯，送走客人后，他回到办公室，便立即提笔给刚刚由朝鲜人民军总顾问改任苏联政府驻朝鲜大使的什特科夫中将拟了一条电文：“你的报告已接到。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但他应当理解，他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需要有充分准备的。这件事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会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sup>②</sup>

不过，斯大林也附带了一个条件，他说：“我对金日成同志有个请求，苏联十分缺铅，我们希望每年至少能得到25000吨铅。如果朝鲜每年能向苏联提供上述吨数的铅，那么，朝鲜将给我们很大帮助。我希望金日成不会拒绝我们这一请求。也许金日成需要我们的技术援助和某些苏联专家，我准备向他提供这种援助。请把我的此项请求转告金日成，并替我请求他把他对此事的意见告诉我。”<sup>③</sup>

第二天，什特科夫电告斯大林：“金日成同志看了您的电报，欣喜若狂。他表示，他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就等着您的召见，什么时候叫，他什么时候到。”

2月1日，斯大林又追发了一份电报给金日成，称：“我前天说的那些事非常机密，不能告诉任何人。”还在后面特意加了个括弧，饶有深意地叮嘱金日成“包括中国人”。

斯大林态度的改变，主要在于保证苏联的战略利益。

因为毛泽东在莫斯科一待两个半月，最终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从而使苏联被迫放弃其在远东以中国东北为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即中国立即收回大连港，并在二至三年内，收回中长铁路和旅顺港。

苏联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旦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势必会千方百计地想要获得一个太平洋上的不冻港，来作为自己自由进出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和出海口。

① 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之《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提出向南方发动进攻问题致维辛斯基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引自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之《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准备访苏事宜致斯大林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③ 引自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之《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准备访苏事宜致斯大林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斯大林的战略考虑沿袭沙皇俄国，十分重视其在远东追求不冻港的历史传统，无论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还是在出兵中国东北时，斯大林都曾直言不讳地扬言：“苏联对日作战的目的，就是要收回沙皇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丧失的那些权益。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要取得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旅顺港。”

除了已经既成事实的外蒙古问题，莫斯科最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1945年中苏条约所保证的苏联在满洲的权益，眼看就要被毛泽东提出的新条约断送掉，斯大林必须采取补救措施。

而处于朝鲜半岛中部和南部的元山、仁川、釜山和济州岛几个港口，早在1945年，就已经是苏联外交部关注的目标了。

于是，为了保证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把整个朝鲜半岛纳入莫斯科的势力范围，就成了当务之急。

恰在此时，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的关于朝鲜半岛不在美国防御范围的演说，又为斯大林实现对朝政策的改变，创造了条件。

战后的斯大林不愿意在亚洲刺激美国，并不是什么新闻。至少，许多上年纪的人都知道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他不允许毛泽东“继续革命”，迫使毛泽东前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情况。

熟悉战后中共历史的人也都多少听说过当年八路军抢在国民党军前面进入东北，却被苏联红军阻挡在城市之外的故事。

以至于在不少中共高层人士的印象中，直到1949年春天，斯大林也还是因为害怕美国干预，有过让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想法。

既然如此，为什么到了1950年初，斯大林会突然改变态度，愿意冒着与美国发生战争的巨大风险，来支持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呢？

按照以往众多学者的观点，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艾奇逊1月5日和12日，关于美国太平洋的防御范围不包括朝鲜半岛与台湾的说法，给了斯大林错误的信息。

沈志华教授对此提出了异议。

他的解释是，促使斯大林根本转变对朝鲜半岛问题态度的关键，并不是杜鲁门和艾奇逊的讲话，而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苏同盟的建立，对于斯大林改变朝鲜半岛和远东政策所发生的作用，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因



为苏联感到其在远东的力量得到了加强，从而有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势力抗衡，并且战而胜之的把握。

恰恰相反，是因为中国政权的更迭和新的中苏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深感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权益必将会受到威胁或者完全丧失，从而才需要改变政策，以保证苏联战后确定的远东战略目标继续存在。

对莫斯科来说，新中国的成立极有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面是苏联在亚洲的安全防御地带——这无疑会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权益，另一面则是这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邻国一旦强大起来，有可能对苏联的安全和利益构成新的“威胁”。

同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对莫斯科也有着双重效应：中国与苏联结成同盟关系固然加强了苏联在亚洲的政治实力，但也迫使斯大林把他在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攫取的大部分政治和经济权益，还到了毛泽东手中。

是什么重要的权益要失去呢？

就是根据条约的规定，苏联在可以预见的短短两三年内，将失去其通过《雅尔塔协定》和蒋介石签订的旧中苏条约获得的，可以使苏联通向太平洋的中长铁路和旅顺、大连这两个不冻港。

精明过人的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到，支持金日成在朝鲜打一场统一国土的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因为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和釜山这两个港口将代替旅顺和大连的作用。

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主动要求苏联红军留驻旅顺、大连。

同时，由于中苏双方商定，一旦出现战争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长春铁路。这样，长春铁路自然也就继续在苏联人的掌握之中了。

显然，斯大林正是因为与中国结成了盟友，下决心借助中国和中国的经验推动亚洲革命，牵制美国，才会转而督促日本、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学习，甚至模仿中国，广泛地开展武装革命。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他得知金日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烈提出以军事行动来统一朝鲜半岛时，他才会一改以往的拒绝态度，答应了金日成的请求。

金日成急迫地盼望着斯大林召见，但是，莫斯科的电报迟迟不



来，让金日成在平壤急得坐卧不安。

什么原因？

因为毛泽东此时正在克里姆林宫做客，和斯大林“扳手腕”。

### 3. 压在中国人民肩上的两副重担

毛泽东首访莫斯科充满了戏剧色彩，在长达78天的时间里，他和斯大林之间发生的故事不仅妙趣横生，起承转合，高潮迭起，而且还横眉冷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更重要的是，此次访问与4个多月后爆发的朝鲜战争密不可分，有充分理由被视为朝鲜战争的重要前奏。

中国共产党从她成立的那天起，就决心以苏联共产党为榜样，通过自己的浴血奋战，建立一个像苏联一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一句指向明确，家喻户晓的流行口号。

但是，在日本投降以后，以苏联看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国民党控制着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还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共产党还相当弱小，居于中国偏僻地区的一些角落。因此，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把对中国的援助绝大部分给予了国民党。

直到进入1948年，共产党的军队奇迹般地在4个多月的时间里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144个师，加上非正规军29个师，总人数在150万人以后，斯大林这才猛然大吃一惊，开始对毛泽东刮目相看。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谨慎的斯大林仍然还是提出共产党和国民党“划江而治”。

斯大林担心的是：一旦解放军强渡长江解放全中国，美国就会参战，从而极有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把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的苏联也裹挟进去。

毛泽东把对长着一双“势利眼”的苏联人的愤怒埋藏在心中，对斯大林的建议毫不理会，指挥百万雄师，一鼓作气地打进了南京国民党的总统府。

结果斯大林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美国人一没有伸手拉蒋介石一把，二没有敢管毛泽东。

1949年6月，在刘少奇前去莫斯科为毛泽东的访问铺路搭桥时，斯大林已经明白绝不可以再轻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了。

于是，他小心翼翼地问刘少奇：“我们是否妨碍了你们？”

刘少奇以中国人通常具备的谦和态度客气回答：“没有，没有。”

斯大林仍然带着歉意说：“妨碍了，妨碍了。看来，我们还是不太了解中国。”

在刘少奇访问期间，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日后证明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且对毛泽东和中国每一个普通百姓的生活都有着深远影响的建议。

斯大林说，“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该多承担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担负一些对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斯大林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转移到了东方，而现在又转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因此，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指导责任”。

概而言之，就是从今以后，苏共负责欧洲地区的革命运动，中共则负责亚洲地区的革命运动。

斯大林作出的这一“革命分工”可不是一句简简单单的空话，它对新中国的领袖们此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制定党的路线与国家政策，都产生了极为重大深刻的影响。

斯大林所谓的“中共应当履行对东亚各国革命所承担的指导责任”，就是让中国共产党运用自己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来推动亚洲其他各国在野的共产党拿起枪杆子，推翻自己国家的现政府，早日走上革命成功的道路。也就是多年前中国老百姓耳熟能详的一句话——“输出革命”。

“亚洲革命负责人”这顶红色高帽，不仅给中国人民的肩膀压上了“援越抗法”（后来转化为“援越抗美”）这副重担，并且还直接影响到了不久之后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态度和作为。

7月4日，在莫斯科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写了一个请示报告。刘少奇采用和毛泽东在西柏坡与米高扬会谈时相同的策略，先借所谓“不明真相的民主党派及学生和工人”之口，抱怨苏军继续



占领旅顺和在日本投降后大肆拆迁东北的工业设施，然后又说明中共如何纠正这种“错误”的观念。

外蒙古问题也再一次以同样暧昧的方式被提了出来。

报告说中共如何教育国内群众认清蒙古人民是通过行使民族自决权取得独立的，并重复了斯大林关于唯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决定蒙古地位的观点。

可是报告依然没有把外蒙古独立看成是不可改变的，而是表示：“但蒙古人民共和国如果愿意与中国联合，我们自然欢迎。”

中共代表希望斯大林能对这些说法的正确与否表明意见。

报告还提出了几个关于如何处理中苏条约的方案，供斯大林同志选择：可以推翻旧的中苏同盟条约，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和我们签订新的条约；也可以暂时维持旧的条约，但是苏联政府有必要公开发表一个声明。

报告表示：“新中国将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集中力量去对付帝国主义及其走狗。”

报告还更清楚地解释了“一边倒”的含义：“关于联共（布）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联共（布）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布）发生争论，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

斯大林赞同中方报告所重复的他自己的说法。他还告诉刘少奇等人，对苏联政府来说，外蒙古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有什么改变，必须由中国和外蒙古的同志们直接讨论。

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对报告的反应简单明了，拿笔在天头上批了一行字：“此事等毛泽东同志来后再说。”

斯大林的意思很明白，报告中涉及的许多重大事情，他必须亲自和毛泽东谈后才能做出决断。

刘少奇在莫斯科其他一切都办得很顺利，唯独苏联人闭口不和他提签订新条约的事。

其实，刘少奇起草这个报告的目的，就是一种政治试探，逼斯大林亮出底牌。

12日，刘少奇将斯大林的答复电告毛泽东。

14日毛泽东回电：“关于两党关系的那种提法，是因为现在两党之间没有共产国际及情报局一类组织，而现在又不适宜恢复或建立这类组织的情况下的一种实际上需要，而非形式上需要的处置或态度，不要采取任何文字的决议或记录，更不应当向党内外宣布。因此，请你们和斯大林商量，如果他们认为有必要的话，你们可以从书面报告中撤销那种提法的文字，但我们实际上这样做，以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如果把中苏关系看成一部连续剧，刘少奇出使莫斯科是继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之后，中苏之间党对党外交的非同寻常的第二幕。

刘少奇等人在同斯大林的交往中显得小心有加，十分尊敬。这不但是因为斯大林在中共以及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也因为中共急于消除斯大林对自己的猜疑。

中方报告一方面反映了中共对莫斯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的明确尊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中国领导对苏联外交意图的曲折试探。

在了解到中方报告中关于中共服从莫斯科的内容后，毛泽东立即致电刘少奇，要他删除报告中“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定”这一段文字。

1949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洲理事会的会议上，成立才两个月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他向亚洲各国提出了必须坚持武装斗争的方针。

他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以及日本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他指出，“不同帝国主义及其傀儡——亚洲各国的政府进行武装斗争，工人阶级不仅不能满足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要求，反而会被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傀儡的优势力量所粉碎”。所以他号召亚洲国家的所有工会工作者，都必须团结在工人党的周围，建立人民解放军，或不遗余力地起来支持这些国家已有的人民解放军。

包括苏联代表团团长在内，各国理事对此提法惊诧莫名，一致表示异议，因为他们都已经习惯了不要去刺激美国及其所在国的政府。

然而，问题提到莫斯科之后，在斯大林的干预下，刘少奇的做法得到了鼓励，其报告被苏共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及时的，建议在报

刊上公开发表”。

刘少奇的报告中有什么使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害怕的呢？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解释称：“刘少奇对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起草的决议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决议轻描淡写，毫无分量，有意回避了亚洲国家工人群众的最关键问题——同亚洲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进行武装斗争问题。世界工会联合会执委会的同志们，其中包括路易·塞扬看过刘少奇的草案后，对他声明说：‘如果通过这一草案，那我们就得赶紧收拾行装，从巴黎逃到莫斯科去。因为通过类似决议之后，处在帝国主义国家领土上的世界工联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不可能。号召印度支那、缅甸和其他国家的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自己就不可能再在巴黎、伦敦和其他帝国主义掌握政权的城市里平安地居住下去了’。”

显然，斯大林改变了以往的做法，支持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接下来，毛泽东又义无反顾地从斯大林手中接过了“援越抗法”的重担。而且从“援越抗法”到“援越抗美”，这副沉重的担子，让中国人民一挑就是几十年。

历史上，越南长期为中国领土，公元968年正式脱离中国独立建国，之后越南历经多个封建王朝并不断向南扩张，但历朝历代均为中国的藩属国。19世纪中叶后越南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1945年“八月革命”以后，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也曾经把中国当成老大哥。可以说，越南就是在中国的倾心支持下，才自立门户的。

1945年5月，德国败降以后，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奄奄一息，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族解放联盟（简称越盟）已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在中国活动已久的胡志明及时指出，总起义条件已经成熟。

根据胡志明建议，8月13—15日党的全国会议在宣光省新潮举行，决定立即发动全国总起义。

越南的“八月革命”取得了胜利，9月2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胡志明就任临时政府主席，并发表了越南人民的《独立宣言》。

1946年3月，胡志明以自己在越南人民中的崇高威望和杰出贡献，当选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可是，国家建立了不等于就万事大吉。很快，越南这个新生儿就

遭到了法国殖民者的武装干涉而危在旦夕。

此时的中国，刚刚欢庆完抗战胜利，内战的硝烟又起。经过3年摧枯拉朽的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新政权。

当《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在中国大地上响起不久，胡志明仿佛看到了越南人民解放的希望，立即给毛泽东写来祝贺信，并且希望中国新政府能伸来援助之手，与越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样，中国就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承认越南并与之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

建交的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援助，没有多久，胡志明秘密进入广西求援。

刘少奇建议胡志明去苏联，拜会斯大林。利用毛泽东、周恩来均在莫斯科访问之机，共同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

可是斯大林却别有用心。

在莫斯科，斯大林征求了毛泽东的意见后会见了胡志明，听取他关于越法战争的介绍。胡志明向斯大林当面提出了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援越，并且提供各种军事物资援助的要求。

斯大林对胡志明的请求未置可否，其实此刻的斯大林自有他的打算。他对毛泽东说，他希望援助越南抗法战争这个职责，还是主要由中国方面来承担，因为中国和越南在历史和现实中有许多联系，双方比较了解，地理位置也接近。

就这样，在莫斯科，中苏两国政府对援助越南抗法战争问题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援助中国的建设，越南抗法战争则由中国援助。

当时，新中国成立才4个月，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尽管面临很多困难，中国仍然作出果断决定。

7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建立。79名干部、250名随员，在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邓逸凡率领下，于8月12日拂晓到达越军总部所在地广渊。

随后，中国大批援越物资，开始源源不断地运进越南北部根据地。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训练，庞大的中国军事顾问团也做好准备，即将入越。

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打通与中国的交通线，取得中国的直接援助，巩固和扩大越北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打好以后的战役，越共



中央决定发起边界战役。越方除了要求中国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和军事顾问团尽快入越外，还要求中国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

最后，此人选定为毛泽东爱将陈赓（也是胡志明点名邀请的）。

陈赓不辱使命，在他的策划和指挥下，胡志明的军队渐渐壮大，并最后将法国人赶出了越南。

可法国人刚被撵走，美国佬又提着刀枪棍棒，神气活现地来了。

于是中国人再次出手，把这场战争打了下去。到1978年止，按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计算，中国对越南的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左右，其中包括：足够装备200万陆海空军军队的轻重武器弹药和军用品；450个成套设备项目（已完成339项）；3.46亿米棉布；3.5万辆汽车；几百公里铁路的修建工程以及全部铁轨、机车和车厢；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多公里的油管 and 6.35亿美元的现汇。

抗美援朝时期，中国累计向越南派出专家、顾问2万余人，工程和防空部队30多万人，最高年份达17万人。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援越抗美战场上伤亡多达5000多人，其中1000多人的遗骨安葬在越南国土上。

继“援越抗法”之后，东南亚各国包括印度、日本、尼泊尔的共产党，组建起各种各样的武装游击队，走向山区和农村，学习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实施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向着他们的国家政权打响了第一枪。

中国不仅负责为他们提供武器与经费，以及一切打仗所需要的物资，还利用昆明、重庆、南京、北京的多所军事院校，免费为他们培养各种各样的军事人才。

一直到毛泽东逝世几年后，明智务实，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力挽狂澜的邓小平才痛下决心，卸下了这副压得中国老百姓喘不过气来的重担。



## 4. 李光耀敬佩的人中之杰

2011年3月，李光耀出版了回忆录《经济腾飞路：1965—2000》。

别看书名冠着“经济”二字，其实谈的大都是国际政治。书中回忆了他这一时间段里主要的政治生涯，其中相当详细地谈到了1978年他与当时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的经历。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78年11月，这位74岁高龄、矮小精干、敏捷硬朗，不到5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了正式会谈。”

1976年，李光耀访问过北京，但当时的邓小平还受着“四人帮”的排挤“靠边站”，他们未能见上一面。

在两人的首次会面中，两个半小时内邓小平一直强调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认为，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 and 人民，都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

邓小平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

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倒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

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还会变本加厉地反对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援助的。

中国当时总共已为越南提供了现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停止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重担，却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所以邓小平说，苏联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



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了东欧国家来共同承担。

邓小平担心的问题是，“越南有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办？”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有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当邓小平结束谈话时，太阳快下山了。李光耀问邓小平是否需要他立刻发表意见，或是到第二天再继续谈。

邓小平说：“那就先吃饭，别让饭菜凉喽。”

晚宴上的邓小平“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总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

李光耀追问道：“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阁下，以实际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

邓小平一再强调：“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

李光耀回忆说：“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旦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了。”

晚宴上，邓小平盛情邀请李光耀到中国访问。

李光耀谢过，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来。”

邓小平说恐怕那需要很长时间。

李光耀表示异议：“你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素质远比我们高嘛。”

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据李光耀追述，当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4个亚细亚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出逃，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

而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3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

印尼的代表为什么要这样说，印尼人对中国人做过什么？

苏哈托铁腕统治印尼32年，给华人留下了无数伤痛。

1965年9月30日，拉提夫上校和乌坦上校率领一批陆军军官，逮捕了6名军方将领，强迫苏加诺总统解散国会。

时任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的苏哈托浑水摸鱼，宣称这是一次“共产主义政变”，迅速平息了政变，并窃取了国家最高权力。这就是印尼历史上著名的“九三〇事件”。

次年3月11日，苏哈托宣读了一份“命令书”，宣告“在军方的拥戴下”出任印尼“代总统”。

军权在握的苏哈托宣布印尼共产党是非法组织，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共运动”。

其间，印尼军方曾诬称有9名大雅族（印尼高山原住民）长老被华人所杀，挑拨大雅人对华人的仇视。报仇心切的大雅人，在许多华人住所前放置盛有鸡血或狗血的红色土碗。这就是大雅人复仇的记号，任何大雅人见到红碗，都必须将屋里的人斩尽杀绝。

究竟有多少华人在“红碗事件”中被杀？至今没人说得出确切的数字。根据幸存者的陈述，至少有好几个地方发生“屠村”事件。

“沟水都变成红色”，“大雅人杀华人，就像杀鸡杀鸭一样”。美国中央情报局曾把这段悲剧称为“20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从此以后，印尼华人被禁止使用中文，不得取中国名字，不准开办华人学校，不得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32年后的1998年5月，苏哈托故伎重演。

当时，一些印尼大学生举行游行，号召进行民主改革。警察开枪射杀6名大学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暴乱。眼看局势即将失控，苏哈托再次制造种族议题，宣扬“华人在偷盗印尼的财富”，指使亲信率先掀起血腥的“排华”暴行，以转移国内矛盾。

一场反对苏哈托的政治运动，随即演变成了骇人听闻的排华“五月暴行”。1200多名华人在骚乱中丧生，5000多家华人住宅和商店遭焚毁。

当时，印尼一个妇女组织的主席、华人奈达，在接受路透社记



者的采访时说：“雅加达的强奸案件是同时发生的，同一条街道上的华人妇女全都遭到强奸或遭到性骚扰。暴徒先是闯进房子里，如果他们发现有两三名妇女的话，就会向年纪最轻的下手，然后再纵火烧房子，这是有组织的。就像采取一项集体行动一样，每个地方所发生的强奸案都是这样的……警察和军队近在咫尺，但对呼救声置之不理。”

直到今天，尽管印尼总统一再说“‘五月暴行’是印尼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事件”，并宣布成立独立委员会调查此事，但真正的主使仍逍遥法外——他就是苏哈托长女的丈夫、印尼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普拉博沃中将。

从1965年的大清洗，到1998年的“五月暴行”，苏哈托执政32年，逾50万华人惨遭屠杀。倒在苏哈托屠刀下的华人，几乎都是已经加入印尼国籍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华人移民，因此，是否追究苏哈托的屠杀罪行，已属于印尼内政，取决于印尼民众自己的意愿。

然而在历史的记忆里，这一抹血色终难就此消逝。

就在这次会面中，李光耀努力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他告诉邓小平，中国的电台广播直接向这些亚细亚国家的华人发出号召，在亚细亚各国政府看来，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颠覆行为。

他还说，马来西亚的马来回教徒同华人之间，以及印尼人同华人之间，一直心怀猜忌和敌意，主要的原因就是“北京不断向东南亚各国输出革命”，结果导致新加坡的邻国都希望新加坡能够跟他们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不是为了抵抗苏联，而是同中国对抗。

李光耀接着说，也许邓小平从来没有这么看：中国怎么仗着世界强国的姿态，逾越区域内的各国政府，煽动他们的公民来推翻现有政权。

但是，要这些国家听从他的建议，组成联合阵线来合力对付苏联和越南，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

“邓小平的表情和身体语言都显示出他的错愕。他知道我所说句句属实。”李光耀本来以为“邓小平态度多半跟1976年华国锋在北京同我会谈时没两样，不会理会我的看法”。

然而突然地，邓小平问李光耀：“你要我怎么做？”

李光耀吃了一惊，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未遇见过任何一位共产党的领袖，在现实面前会愿意放弃一己之见，甚至还问我要他怎么做。”

要告诉这位身经百战，久历风霜的革命老将他应该怎么做吗？李光耀犹豫了一下，然后直率地说：“停止那些电台广播，停止发出号召。中国要是能不强调同亚细亚华人的血缘关系，不诉诸种族情怀，对亚洲华人来说反而更好。其实无论中国是不是强调血缘关系，亚洲各国原住民对华人的猜忌都难以消除。只是中国越是这么诉诸中华民族的血缘情结，就越发加深了原住民的疑虑。中国必须停止对马来西亚共产党和印尼共产党在华南所进行的电台广播。”

邓小平强调，中国人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发表声明说，一旦美国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不能坐视不理。美国人却不加理会，结果全世界都看到了。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不玩虚的那一套。

邓小平还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虑，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贻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人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邓小平也向李光耀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

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然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究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这第一次会面，李光耀对邓小平印象深刻，以至他在书中写道：“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已年届70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却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两年后，中国同马来西亚和泰国两地的共产党分别做了其他安排，果然从此终止了电台广播。”



认错是痛苦的，一个伟人面向全体人民和全世界认错，更要经受巨大的心灵痛苦。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总得有人站出来担其责，重启新航；一个时代的失误，总得有人来画个句号，另开新篇。这不是喜气洋洋的剪彩，而是痛定思痛，发愤图强的誓言。

只有那些敢于担负起世纪责任的人，才会有超越时代的思考；只有那些出以公心为民造福的人，才能不图虚名，面对现实，实事求是。

当13亿中国人民今天沉浸在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功的喜悦与幸福中时，请不要忘记当年一代伟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痛苦的思考和艰难的抉择！

### 5. 是谁丢掉了外蒙古

1949年12月6日到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待了长达78天。那是他和他的同志们辛辛苦苦创建的新中国刚刚诞生两个月之后，用日理万机来形容他的工作强度，绝不为过。

毋庸置疑，作为新朝元首，他一个人在最不能离开的时候，能够撇下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国家的首都待上那么长的时间，必然是遇到了什么令他不爽的事情。

依中国湖南人那种倔强刚烈的个性，遭受主人的冷遇而没有选择愤然拂袖而去，更表明所遇之事，非同小可。

过去，俄国学者普遍认为：此次毛泽东来莫斯科主要是休息和养病。中国学者则认为：斯大林对毛泽东此行的目的不甚清楚，双方在会谈中发生了误会，才导致毛泽东义愤填膺。

斯大林其实非常清楚毛泽东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来和他谈中苏条约问题——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废旧约，立新约；推翻1945年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与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由毛泽东代表成立才两个多月的新中国，重新与斯大林签订一个《中苏同盟友好互助条约》。

要捋清楚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白1945年那个旧条约，是在

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下和斯大林签订的。

它的内容都有什么？

毛泽东为何要煞费苦心争取废弃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时候，罗斯福总统从美军攻占冲绳和琉璜两座岛屿的激战中感受到了日本军队的顽强，国防部作出评估，如果以目前的战争形势，要夺占日本本岛，美军大约还需要付出100万人的代价。

罗斯福被这份评估报告震惊了，为了在以后与日本人的战斗中减少美军伤亡，他迫切希望已经结束了西线战事的斯大林，马上出兵帮助攻打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

斯大林则说，好哇，要我打日本人可以，但是我有政治条件。

罗斯福问他的条件是什么。

斯大林说，苏联必须收回俄国在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失去的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这些权益主要包括三项内容，一，占有中长铁路的经营权；二，租用旅顺港和大连港；除此之外，就是让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

而这些权益，只有通过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条约才能得以实现。

罗斯福为了减少美国人的牺牲，居然不惜牺牲中国的重大利益，背着蒋介石政府答应了斯大林的条件。

然后美苏两大强国，一个来软的，一个来硬的，逼着蒋介石派出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

蒋介石深知这次谈判是一个硬仗、苦仗、屈辱之仗，所以选派国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领衔，外交部长王世杰副之，还让蒋经国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参与其事。

宋子文一行飞抵莫斯科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公布雅尔塔协定。

中国代表到达莫斯科的第一件事，就是礼节性地对斯大林进行拜访。斯大林态度还算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不友好的面目一下就显得出来了，他拿出一份文件向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地问：“你看过这个东西吗？”

宋子文瞥了一眼，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

斯大林以不容反驳的口气强调说：“你们和我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文件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虽然心里早有准备，但万万没有估计到斯大林会如此蛮横无理。三人顿时紧张起来，这简直就不成其为谈判，而是强取硬索！

但是，弱国无外交，心里再气愤，既然千里迢迢来到莫斯科，总还得忍气吞声和他谈下去。

斯大林恃强凌弱，最后提出了几个条件，对中国代表说：“如果贵国政府满足我的要求，第一，我可以马上把新疆的匪患给贵国彻底解决了；第二，苏联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正统的国家领袖，并说服中国共产党加入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第三，苏联出兵东北三个月后马上撤军。如果贵国政府不能满足我的要求，那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以后，什么时候撤军，我就知道了。”

所谓新疆匪患，即史书上说的“三区革命”，实际上就是苏联人怂恿和煽动的。斯大林的目的就是要在新疆建立起与东北一样的苏联势力范围。“起义部队”一直打到离乌鲁木齐只有60公里的地方。而蒋介石那时候既要忙着和日本人打仗，又要防范中共武装对他的政权的颠覆，鞭长莫及，根本无力顾及遥远的新疆。

谈判过程中，双方为两个问题争执得非常激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

而临离开重庆之前蒋介石给他们有过明确指示：“无论如何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国的一贯用语，中国人对这两个字尤为反感。”

所以中国代表要求删去“租借”二字。

第二，中国代表认为，凡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绝对不能谈判。

通过中国代表的奋力争取，斯大林也作了某些让步，比如同意不使用“租借”二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等问题，也都表示愿意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

但是，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斯大林咬紧钢牙不松口，坚持决不退让！

如此重大的问题，宋子文无论如何不能同意。

这一问题马上成为最大症结，谈判一下子被卡住了。

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让中国代表团所处的内外环境变得来更加险恶。

1945年8月9日，当中苏谈判正处于僵持状态的时候，由于美国



在日本投放原子弹所引起的形势急剧变化，斯大林等不及中苏条约签字，便迫不及待地对日宣战了。面对150万苏联红军顷刻之间分三个方向杀入中国东北，并且很快完全控制了东北的现状，本已处在绝对弱势地位的宋子文、王世杰、蒋经国更加感到了斯大林咄咄逼人的巨大压力。

蒋经国在他的《自传》里写道：

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个人资格去看望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我遂以私人资格去见斯大林，斯大林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

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8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了。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苏联。”

我说完之后，斯大林接着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帮我的忙，而是你要我帮你的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败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斯大林说这番话时态度非常倨傲，露骨地表现出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

我也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斯大林干脆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出于军事战略的观点。”他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苏联就完了。”

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有力

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正在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并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是要起来的。”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截了当地表示：“我们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作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力量侵略俄国，你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一旦统一起来，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就是害怕我们中国统一起来，强大起来。

接下去，斯大林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种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

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

他回答说：“当然！”

我心里暗暗地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了斯大林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他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最大的敌人！

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才算数。

斯大林同意了。

斯大林说过：“条约是靠不住的。”

我们绝不以人废言，只要自己能发愤图强，有了力量，反抗俄才能够胜利，外蒙古还不是仍旧可以归还到我国的版图吗？而且，《中苏友好条约》，经俄帝彻底破坏之后，我们已经明白宣布其“无效”；依理依法，外蒙古仍然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

就这样，在严酷的既成事实面前和强大的国际压力下，无可奈何的蒋介石只得指令宋子文接受苏方条件，就是在苏联出兵击败日本

后，在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三个条件下，允许将依公正之公民投票的结果决定是否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

无论如何，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脸面总是要的。

对于蒋介石的指令，宋子文感到十分愤怒，他非常清楚，谁签订这个条件，谁就必然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他可不愿在历史上留下这个骂名。宋子文索性扔下王世杰，带着蒋经国飞回重庆，然后马上提出辞职，撂挑子坚决不干了。蒋介石拿他这舅子无奈，只好于8月14日下令由王世杰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签署了这份丢人现眼的条约。

第二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王世杰签完字一回来，果然就在国民参政会上被国大代表们骂得狗血淋头。堂堂外交部长，成了千夫所指的卖国贼！而且被人打掉了牙齿还得含血带泪往肚里吞，半点不敢说这个条约是斯大林和蒋介石首肯的，而不是和他这个外交部长签订的。

其实，所谓“公民投票”，也不过是蒋介石为了下台阶而采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所以，后来奉命前往观察外蒙古“公投”的国民政府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回忆道：“苏俄侵略外蒙古，而又欺骗世界，迫使我国承认其独立，本为一复杂万端之国际大事。政府当年抱定忍辱负重之宗旨，从权应变，实具有重大苦心，不容否认，法章奉命之后，深感责任艰巨，不敢稍有错误……”

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地位。

蒋介石在败退台湾后，又想起了外蒙古问题。他似乎有点“悔不该当初”了。同时，蒋介石对斯大林没有信守“不援助共产党”的承诺更是耿耿于怀。1952年，蒋介石一纸诉状告到联合国，指责苏联违约，要求废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美国掌控的联合国确认苏联违背了条约规定，裁定条约无效。

1953年，蒋介石宣布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中关于外蒙古的换文，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并下令把外蒙古重新纳入“中华民国”的版图之内。而且还在国民党的中央会议上，沉重地“检讨”了一番，说：“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仍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



当然，这种可笑的举动，已经无法改变历史铸就的事实了。

2013年10月14日，94岁高龄的郝柏村<sup>①</sup>在接受名记吴小莉专访时说：“蒋介石一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接受了《雅尔塔密约》。”

---

<sup>①</sup> 笔者注：郝柏村，参加过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曾担任蒋介石的侍卫长长达五年，之后任台湾“参谋总长”、“行政院院长”。

## 第三章

# 巨人之间的较量

### 1. 把苏联人送来的死鱼扔回去

在中国内战期间，莫斯科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中国成为他的邻居。其原因对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来说，既难于理解，更难以想象。

当任弼时在1946年首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国名时，谁也没有想到，胜利会来得如此之快。

毛泽东在元旦献词中说：人民解放军必然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这一点，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尽管苏联大使仍然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旨意，履行着外交使团的使命，随南迁的国民党行政院来到了广州，但是，这并未给浩浩荡荡的人民革命蒙上阴影。“南北朝”的呓语，“中间道路”的空想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白日梦，都不能给这场深广的人民革命，施加一点哪怕是咒符的作用。

若干年后，中共领导人试图理解斯大林在内战期间对中共的犹疑态度，认为斯大林想阻止中共打过长江，在中国搞“划江而治”，以保持和美国在雅尔塔达成的对各自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的谅解，避免美苏冲突。

即使是在这种事后分析中，中共领导人也没有窥探到苏方对一个



共产党强邻的疑惧心理。

1948年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和国民党政府内务部次长彭昭贤的一次谈话中，即已对这种心理表露无遗。

罗申承认莫斯科担忧中共会有铁托主义倾向，表示希望中国内战可以在国际调停下结束。

罗申指出：“一旦一个共产党大国在苏联东部边境出现，这将会给苏联政府带来一连串严重的麻烦。”

显然，苏联人担心，一个奉行独立外交方针的共产党中国，会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重翻中苏外交的旧账。

1949年1月31日，即农历正月初三。

凌晨，一架苏联的军用飞机降落在河北省石家庄机场。

从飞机上下来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陪同他的是联共（布）驻北平的代表兼中长铁路局的负责人科瓦廖夫——科瓦廖夫的秘密任务实际上是负责苏联在中国的情报工作——以及苏联翻译、警卫员共4人。

米高扬是奉斯大林的派遣，专门来中国同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进行秘密访问与商谈事情的。

毛泽东早已得到消息，这一天派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俄语翻译师哲，和中共中央机关办公处副处长汪东兴，带了一辆吉普车赶去石家庄迎接苏联客人。

米高扬等苏联客人一走下飞机，立即由师哲和汪东兴陪同，乘坐吉普车向西柏坡疾驶而去。

吉普车驶到毛泽东住处门口时，穿了件旧棉军大衣的毛泽东立刻热情地迎了上去，同米高扬亲切地握手说：“欢迎！欢迎！”

米高扬一边同毛泽东握手寒暄，一边说：“司巴塞巴、司巴塞巴。”

师哲翻译说是“谢谢、谢谢”的意思，毛泽东这才热情地大笑起来。

米高扬对毛泽东说“兹特拉司特乌依节、普列些达节里毛”，还说“奥琴、普里亚特那”。

师哲翻译说是：“毛主席，您好！非常高兴见到您！”

毛泽东爽朗地大声笑道：“米高扬同志好！我们都是共产党人，

一律称同志，不要称我主席么！”

师哲将毛泽东的话翻译了，米高扬随即改口说：“兹特拉司特乌依节、达瓦里西毛泽东！”

师哲又将米高扬的话翻译了：“毛泽东同志，您好！”

毛泽东笑着说：“这就对了么！”

米高扬穿戴得很气派，圆领皮大衣，圆筒皮帽子，显得很神气。

这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都来了，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每个人身上穿的全都是旧棉军衣，毛泽东的棉大衣上还堂而皇之地贴着一块大补丁。

大家随随便便地围着火炉坐在一起，“中苏两党非正式会谈”这就算开始了。

人多嘴杂，毛泽东担心师哲一个人忙不过来，还临时把毛岸英叫来帮着翻译。

米高扬通过苏联翻译对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讲，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残酷的战争中，亲临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只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打了这么多的大胜仗，解放了大半个中国，他由衷地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感到高兴！”还说：“斯大林同志让我代表他和苏联人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客气地笑着，通过儿子翻译说：“谢谢斯大林同志的关心，谢谢斯大林同志派你们来，和我们一起研究我们的意见。”

米高扬继续说：“我受斯大林同志的委托，专门来听取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的意见，回去以后好如实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只带两个耳朵来听，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这一点，希望能得到中国同志们的谅解。”

毛泽东挥着手说：“我是想要到苏联去的，同苏联同志谈谈，同斯大林同志谈谈，以便你们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我等斯大林同志的答复已经等了很久了，现在斯大林同志派你到中国来听取我们的意见，这样安排也很好。”

其实，毛泽东对米高扬的来意，估计得并不完全准确。

聂荣臻在回忆录里写到了毛泽东在城南庄就此问题和他的一段谈话。

毛泽东对他说：“斯大林对我们不放心，派米高扬来，无非是



想深入地摸一摸底，了解一下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的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在他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已经没有剩下多少人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

几句客气话过后，毛泽东再也愉快不起来了。

米高扬一改刚才的亲切态度，也一改他刚才声明的只带耳朵的立场，像钦差大臣传达圣旨似的对中共五大书记说：“鉴于中国目前的形势，苏共中央的意见是：中共应该立即停止内战，实行南北分治。”

毛泽东早就对斯大林的种种做法窝了一肚子火，没地方发泄，此刻又见米高扬神气活现地出现在他面前发号施令，心中十分不快，但考虑到大局和有求于斯大林的援助，只能把这股怒火拼命往肚子里压。

谈到当年国共内战，聂荣臻以两人打架做比喻：“苏联就算不援助我们，只要这个巨人站在我们背后，这就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锐气，大煞了国民党的威风。”

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他都太需要斯大林这个巨人站在自己背后了。

所以，吵归吵，事情还得接着往下谈。

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就达成了共识，因为蒋介石背后也有一个巨人美国撑着，中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最大程度地依靠世界上的另一个强国苏联。

已经解密的毛泽东与米高扬的几次谈话记录，以及师哲的回忆录均表明，毛泽东再三强调、保证：“中国共产党一定会以苏联为榜样，一定会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旗。”

米高扬听了非常高兴，把准备好的“礼物”送给了主人，说：“你们马上就要夺取政权了，我们可以把旅顺港还给你们。”

“我们不要旅顺港。”毛泽东马上把苏联人送上门的“礼物”扔了回去。

他说的是实话，解放军那时别说军舰，连条商船也没有，旅顺港是个军港，捏个军港在手里，中看不中用。

而且，到时候他要收回的岂止区区一个旅顺港？而是整个沙皇时代被俄国夺去，如今又转移到斯大林手中的整个东北的权益。



两人谈了整整三天，毛泽东却始终不谈外蒙古问题，米高扬反倒沉不住气了，主动就外蒙古问题，让毛泽东谈谈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当然明白他的用意，也不好就这个蒋介石政府造成的历史问题急于表态，委婉地说：“米高扬同志啊，过去外蒙古独立，我们是全力支持的，因为那个时候政权在国民党手里嘛。可现在呢？情况起了变化，我们中国共产党马上就要夺取政权了。有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认为呢，如果中国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是不是能让外蒙古合并进来呀？”

米高扬心中一跳，顿时变了脸色，严肃地说：“这可是《雅尔塔协定》确定的事情，罗斯福也签了字，是绝对不可能更改的。”

毛泽东见米高扬一触即跳，反应如此激烈，只好压住怒气说道：“好，好，我们暂时不谈这个问题。”

你毛泽东可以提出暂时不谈这个问题，可米高扬却不能不和他谈。他此行来见毛泽东，弄清楚毛泽东对外蒙古的想法，正是斯大林交代给他的两大任务之一。

当天晚上，米高扬就给斯大林打了个电报，说大事不好，毛泽东现在就已经惦记着外蒙古了，还总想着怎么把它拿回去。

第二天上午斯大林就回了个电报，口气如同当初对待蒋经国一样强硬蛮横，大意是：你明确地告诉毛泽东同志，外蒙古问题中国人说了不算，苏联人说了也不算，必须得由外蒙古人民自己作出决定。如果毛泽东同志硬要和我们谈蒙古统一的问题，那就不是外蒙古统一到内蒙古的问题，而是要把内蒙古一并统一到外蒙古去。

米高扬原原本本地把斯大林的电报内容转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但又清楚在这样的时候和斯大林撕破脸皮，是极不明智的负气之举。

他此时的愤怒，想必绝不压于当初在莫斯科受辱的蒋经国！

毛泽东沉默了很久，一连抽了两支烟，最后表示：“既然如此，那我们就谈这个问题。”

接下来谈中长铁路问题。

毛泽东跟米高扬说了很长的一番话，这段话在苏联解密档案里清楚记载着，表达得很曲折，既不能刺激斯大林，又想拿回属于中国的利益，弯来绕去，煞费苦心地说得很长，很委婉……

其实简而言之就是：现在东北的老百姓埋怨中国共产党有点向着

你们苏联人，这让我们很为难。

米高扬同样把毛泽东的埋怨报告了斯大林，斯大林又来了个电报，说：“这件事不要着急，我们派人进行调查，等今后局势平定以后，该挂谁的牌子，就挂谁的牌子。”

在同米高扬长达三天的谈话中，毛泽东谨慎地避免采取任何明确针对苏联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也是为什么在涉及旅顺和新疆时，毛泽东只是借中国其他党派之口探测苏联意图。这种策略可以使急欲争取苏联支持的中共避免与莫斯科直接发生碰撞，而视苏方反应决定自己的态度，为自己争取到最大的回旋余地。

毕竟米高扬来者是客，虽然毛泽东心里很不痛快，但作为主人，总得要招待米高扬吃饭。

五大书记一共宴请了米高扬一行三次。没想第三次宴请时，竟然发生了一则小插曲，让毛泽东很不高兴。

米高扬他们带来了许多苏联生产的罐头食品，什么鱼子酱啊，凤尾鱼啊，熏肉啊，还有十几大箱“伏特加”酒，每次吃饭时，都要拿出来摆满一桌子。

西柏坡是个偏僻的小山村，没有什么上得了台面的好吃东西可以拿出来招待客人，只有现宰猪羊鸡鸭。再就是让叶子龙组织村民去滹沱河上凿开冰面，捕来新鲜的活鱼。

在酒席上，苏联人虽然不会用筷子，但却很能喝酒。

米高扬用一只玻璃杯喝中国的汾酒，就像喝凉水似的，满满一大杯酒“咕咚咕咚”一口气就灌进肚里去了。

中共五大书记中只有周恩来有些酒量，此时却也不敢和米高扬比。毛泽东是沾酒脸红的人，只能简单应酬一下。朱德因喉炎不能喝酒。刘少奇平时就喝得不多，现在也只是用小酒盅喝那么一点点当地酿制的、烈度不高的白酒。任弼时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身体一直不好，更是滴酒不沾。

酒席上，整个气氛是很愉快的。可每次苏联人喝酒似乎都未能尽兴，对此未免有些遗憾。

一盘盘的菜肴端上桌，客人都赞不绝口地夸奖说：“哈拉绍，奥琴哈拉绍！”

毛岸英翻译说，客人们这是说“好，真的很好吃”。

米高扬礼节性地恭维说：“人们都说中国的饭菜好吃，我们就是

不会做；将来中国革命胜利了，我们要派人来中国学习做饭烧菜，增加西餐的花样。”

米高扬的话被毛岸英翻译成汉语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相信，一个中药，一个中国菜，这是中国对世界的两大贡献哩！”

说话间，卫士李银桥端上来一小碟炒辣椒，红通通、油亮亮的很诱人。米高扬示意翻译问一问这是一道什么菜，翻译向毛泽东请教。

毛泽东先是用筷子夹一大口津津有味地嚼在嘴里，然后才说：“这在中国叫作炒辣椒，是我们湖南的家乡菜，好吃得很喽！”说罢，毛泽东亲自动手，用公筷为米高扬夹了一撮辣椒，并且打趣说：“在我们这里，不能吃辣椒，就是不能革命哩！”

苏联翻译把毛泽东的话翻译过去，米高扬先是点头笑着将毛泽东夹给他的辣椒统统送进了口中，没等嚼上两口，便像被电打了似的尖叫起来，辣得他张大了嘴巴直哈气，泪水都被辣出来了。

毛泽东笑道：“你们能喝酒，比不过我们能吃辣椒，辣椒比酒味儿更浓更烈么！”

临时被叫来帮忙的毛岸英反倒成了主要的翻译，他将毛泽东的话翻译成俄语后，米高扬略显尴尬地不知说什么好。

周恩来急忙缓和气氛说：“在我们的革命队伍里，也有许多同志吃不了辣椒呢！在中国，只有湖南、四川两地的人，才敢像毛主席这样不怕辣，别的地方的人，很少有不怕辣的。比如我，就不能吃辣椒。”

米高扬听自己的翻译解释后，连忙摇着头用俄语说：“涅特，涅特！”

毛岸英翻译说是：“不，不！”

米高扬随即又说：“我们这下领教到毛泽东同志的厉害了！”

当毛岸英把米高扬的这句话用汉语讲出后，在座的人都放声大笑起来……

但紧接下来，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李银桥把红烧鱼和熘鱼片端上桌时，毛泽东热情地举筷相邀：

“来，尝尝我们滹沱河里的大鲤鱼！”

不料，米高扬用叉子往鱼头上戳戳，满脸狐疑地问：“外面冰天雪地的，这是河里新捞上来的活鱼吗？我们苏联人可是从来不吃死鱼的。”



毛泽东心中很不高兴，仍笑着告诉他，这是让人去凿开冰面刚从河里抓上来的活鱼。

米高扬居然不相信，还当着主人的面吩咐苏联翻译跑到旁边的厨房里问了大师傅，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动叉子吃鱼。

毛泽东一则对米高扬在外蒙古和东北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气，二则也看不惯米高扬在饭桌上表现出的对主人极不信任的举动，这年年底他去莫斯科时，即向随行的中餐厨师严格下令：“记住，你只能给我做活鱼吃，苏联人要是送来死鱼，就马上给他们扔回去，对他们一点不要客气。”

果然，苏联人送来了几条大鲤鱼，是克里姆林宫特别警卫队的一名上校带着人送来的。毛泽东的厨师一检查，发现几条鱼全都死了，遂遵照毛泽东的命令，说：“我们的毛主席只吃活鱼，从不吃死鱼，对不起，请你们提回去吧。”

上校慌了，向翻译一问，才知毛泽东只吃活鱼，不吃死鱼，赶紧向中国客人保证，马上抓活蹦乱跳的鲤鱼送来。

于是，克里姆林宫里的大小人物都知道，毛泽东吃鱼特别讲究，不是活鱼不吃的。

其实，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拒绝吃死鱼的真正原因是米高扬西柏坡之行在饭桌上的表现，更不了解毛泽东在国内是从何等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过来的，莫说死鱼、剩鱼，长征路上，凡能入口的，他哪样不吃？什么没吃过？进北京乃至此后的晚年中，他对生活的不讲究，是出了名的。

领袖也是人，同样具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毛泽东这样做，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后来毛泽东再到莫斯科访问时，苏联方面早早就为他准备好了活蹦乱跳的大鲤鱼。

米高扬离开中国两个多月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把斯大林的“最高指示”抛到一边，下令解放军一鼓作气打过了长江。

很快，已经住进北平郊外香山双清别墅的毛泽东又收到一份斯大林的电报，电报对中共不听他的劝告，执意打过长江进行了严厉批评。

当晚，毛泽东气得浑身发抖，不吃不喝睡在床上。江青怎么劝说也不听，无奈之下只有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赶到双清别墅，看到毛泽东和衣躺在床上，脸色铁青。

毛泽东愤愤地对他说：“过去，斯大林明里支持我们，其实暗地里并没少帮他们（指国民党）。现在，我们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就要成功了，他还在帮他们……”

毛泽东话犹未尽，已经泪水涟涟，这是极少有过的场面。

米高扬回去汇报以后，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政治态度甚感满意，于是小麦也不忙着收了，发出指示，让苏共接待中共代表。

## 2. 毛泽东会成为另一个铁托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蒋介石作为远东地区反法西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在中国以及东亚的威望如日中天。

面对战后中国的局势，斯大林选择了蒋介石，促使他作出这一决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对毛泽东和中共的军事力量，可以说疑窦丛丛，很不放心。

不过，事实很快证明，他这一宝押错了。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斯大林看到事情坏了，因为中共在整个内战战场上已经彻底扭转了战局，对蒋介石取得了压倒性的全面胜利，毛泽东取代蒋介石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斯大林这下着急了，他很想尽快和毛泽东沟通，主动冰释前嫌。但是，作为社会主义集团的“老大哥”，他得把架子端着，不能表现得自己比毛泽东还急。

而毛泽东呢？出于对未来新中国的诸多切身重大利益的考虑，也急于想去莫斯科走一趟，直接和斯大林见面谈谈。

1947年6月到1948年6月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给斯大林接连发了三封电报。第一次毛泽东要求去，斯大林谢绝了；第二次毛泽东又提出去，把自己的身段放得很低，电报写得非常诚恳，称斯大林为“大老板”，说我要面见大老板，向你汇报中共全部的情况，以及将来我们夺取政权以后的种种设想。不仅言辞谦恭，态度也十分急迫，说我怎么来，你定，海陆空都行。如果你既不派飞机也不派轮船，那我无论如何本月15日前后也要动身北上。

斯大林没法再推，只好回电同意了。

毛泽东于是立即着手准备，置办好了新皮鞋、新大衣、新皮帽子，就等着斯大林通知他启程的电报。

没想事到临头，斯大林突然又变卦了，说毛泽东同志啊，你现在还不能来。理由是什么呢？简直荒唐透顶！他竟然说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都下基层抓小麦征购去了。

把毛泽东气得不行！他不明白：究竟是中国革命的胜利重要，还是苏联人收小麦更重要？

真实的原因是，当时中国的内战还没有完全结束，蒋介石虽然在军事上连遭重创，但背后有强大的美国人撑着，使斯大林对中国的局势还不能看得十分明白。如果在这样的時候毛泽东去莫斯科，让美国人知道了，会认为苏联人公开站出来支持中共，要是美国人也公开搅和进来，就会使斯大林很被动，所以便找了个“全党忙着收麦子”的理由，拒绝毛泽东去莫斯科。

但是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考虑，斯大林又不能不对中共客气一点，于是就在1949年1月底，苏共中央派米高扬到当时中共中央的驻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考察一番。

米高扬回到苏联后形成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是由一群精通马列主义的、极其有能力的精英所组成，国民党的失败，是一种必然。”

米高扬此行密访毛泽东，解密档案表明其实有两个重要目的：

第一，更进一步考察和了解中共领导人究竟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1940年秋，斯大林对即将前往中国担任蒋介石军事顾问的崔可夫将军表明了对中共的看法，“中共主要依靠农民，对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这必然给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打上农民阶级狭隘自私的烙印，以致它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感发扬得不够”。<sup>①</sup>

而且，斯大林对中共的偏见，还直接影响到了苏共中央几乎所有领导人。

1944年8月下旬，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对途经莫斯科，前往中国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关系的罗斯福特使赫尔利谈到延安领导集体

<sup>①</sup> 引自牛军《中苏同盟的起缘》，发表于《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时，竟然这样出言不逊：“有人称他们为‘共产党’，实际上他们跟共产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不过是不满自己的经济状况罢了，只要经济状况一改善，他们马上就会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人。苏联政府与这样的共产主义分子毫无关系。”<sup>①</sup>

1944年和1945年，斯大林又在波茨坦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几次对罗斯福说：“中共是假的，是冰激凌似的、奶油似的假马克思主义者。”还轻蔑地说：“毛泽东顶多就是个中国的普加乔夫”。<sup>②</sup>

生于顿河的哥萨克普加乔夫是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之类的乱世枭雄。可是进入1949年以后，斯大林没来得及看上眼的这位“中国的普加乔夫”，竟然已经快把蒋介石的江山夺过来了。

所以，他急于了解毛泽东掌握政权以后，会不会加入他领导之下的社会主义阵营——换言之，就是毛泽东能否唯他马首是瞻？

第二，就涉及斯大林和蒋介石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了。斯大林担心毛泽东一旦执掌中国大权，会否定这个条约，收回实际上已经独立的外蒙古。

外蒙古在斯大林的外交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斯大林的战略思想和沙皇毫无区别，要求在苏联的周边不能有敌对国家存在，所以斯大林在战后处理欧洲问题时，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做的。只要外蒙古能从中国独立出来，中苏两大国之间就有了一块广阔的缓冲地带。

实际上当时的外蒙古已经被苏联军队完全控制，因为在1921年苏联内战时期，与苏维埃为敌的白俄和哥萨克被打败后纷纷逃到了外蒙古，苏联红军也趁机追杀进了外蒙古。

当然，苏联人一旦进来，就再也没有打算走了。随后与外蒙古共产党建立了联系，扶植乔巴山等人夺取国家政权，在1924年建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在这个新国家里发号施令的，都是充斥在各个领域的苏联顾问。

当时中国正值北洋军阀当政，和南方的革命党打得炮火连天，连自己的小命还顾不过来呢，谁还管得了荒凉得连屙屎都不生蛆的外蒙古？

① 引自牛军《中苏同盟的起缘》，发表于《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② 引自牛军《中苏同盟的起缘》，发表于《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斯大林眉头一皱，突然想起了外蒙古问题。他软硬兼施，逼着国民党政府派到莫斯科的谈判代表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同盟条约，解决了外蒙古这块心病。

作为回报，斯大林对国民党政府最为忧虑的苏联援助中共的问题信誓旦旦地作出了明确保证：“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不支持他们，不帮助他们，我们不打算这么做。众所周知，以前我们向蒋介石提供了援助，今后还将是这样。如果有必要援助中国的话，那么这种援助将提供给蒋介石政府。”斯大林同时还答应不向中共提供武器，并认为国民党政府力求合并军队和建立国家统一的政权，是“完全合法的愿望，因为国家应当只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sup>①</sup>

听到斯大林这样的表态，蒋介石想必会感动得涕泗横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远东战略的目标是，支持蒋介石领导的中国抗战，维持中国战场以确保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地对正在西线与希特勒德国交战的苏联发起进攻。

战后初期，斯大林远东战略目标调整为：通过兑现和落实《雅尔塔协定》，使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有利于苏联的变化，以此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安全。

具体而言就是：让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中正式独立出去，成为苏联可靠的军事基地；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使苏联获得太平洋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以此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起广阔的安全地带。

正是战后初期斯大林的大国合作政策和远东战略，决定了苏联战后初期的对华政策和对待中共的态度。

中苏条约一经签订，实际上就塑造了战后初期以苏联为主导的苏联、国民党政府和在野的中共这样的两国三方关系的框架。在这样的框架中，苏联使自己居于中苏关系的支配地位，将国民党政府确定为主要的合法的交涉对象和伙伴，而把中共置于一种次要的从属地位。和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及其协定的缔结，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并且满足了斯大林远东战略的基本目标和要求。

因此，斯大林有理由感到满意，并努力将其付诸实现。

按照对国民党政府的许诺和条约的规定，斯大林必然要努力维持

<sup>①</sup> 引自张盛发《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与国民党政府的同盟关系，以保证苏联在远东和中国的战略利益的实现。由此也决定了他必然要对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和中国革命采取消极冷漠的态度和立场。

这种消极和冷漠表现为：日本宣布投降后，不支持中共军队获得对日军的受降权；限制中共及其军队在东北的活动；削弱中共的政治自主权，逼迫中共通过与国民党谈判达成政治妥协；回避中共征求意见的要求，与中共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支持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

1945年5月，当苏军在欧洲战场胜利在望时，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和战后的作用，热切期待“国际无产阶级和伟大的苏联帮助我们”，并坚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不然马克思主义就不灵了”。为了鼓舞他的同志们的信心，毛泽东提高声调，大幅度地挥动手臂，加强语气说：“国际援助一定要来，如果不来，杀我的脑袋！”<sup>①</sup>

但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令他大失所望。

8月10日，中共中央给下属各局发出了准备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指示。10日、11日，朱德以八路军总司令的名义，连续发布7道命令，命令解放区军队收缴敌伪武装和接受日军投降。

8月15日，朱德在向美、英、苏三国政府发出的说帖中指出：“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宣言接受日伪军的投降，并有权派遣自己的代表参与投降后的工作。”

美国方面的断然拒绝是预料之中的，但是苏联方面以默不作声的态度同样不支持中共对日军的受降权，则多少令中共领袖们感到困惑、沮丧和愤怒。

此外，斯大林还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逼着毛泽东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结果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面对面把盏叙旧。坐下来一谈，中共只得被迫放弃了夺取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战略计划。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不久，斯大林便打电报给毛泽东，表明了苏共的对华政策，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放弃武装斗争，向蒋介石作出妥协，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中共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

<sup>①</sup> 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斯大林明确对毛泽东指出：“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否则，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

斯大林的态度让毛泽东既失望，又愤怒，看完电报后满心悲愤地对他的同志们讲了4个字：“无可奈何！”紧接着又很生气地说：“我就不信，人民为了翻身搞斗争，民族就会灭亡？！”<sup>①</sup>

在稍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痛定思痛的毛泽东终于被迫改变了对斯大林的态度，公开提醒全党同志：“要靠自己，不要靠外援。”<sup>②</sup>

为了回答斯大林，毛泽东在1946年4月写了《关于目前形势的几点估计》。文章认为：目前人民民主力量超过了反动的力量，美、英、法同苏联不会破裂，迟早会妥协。

毛泽东十分慎重，直到解放军打到外线，稳操胜券，才将此文于中央内部公布。由此可见当初斯大林的电报对毛泽东的压力有多大。

1948年在大决战前夕，苏联政府转给中共中央一封国民党政府给苏联政府写的信，信中请求苏联居中调解国共之争，要求首先停止内战。

苏方只说这封信是国民政府给苏联政府的，现将原信转给你们，供你们参考，未做任何其他说明。

由于中共中央内部团结一致，夺取革命彻底胜利的决心已定，此信未能引起波澜。但是苏联的这个举动客观上对即将面临大决战的中国共产党兜头泼了一瓢冷水，所以毛泽东写了1949年元旦社论，针锋相对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

斯大林虽然以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条件，迫使中国政府代表、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同意外蒙古独立的《中苏友好条约》上签了字，但后来发生的事情却给他造成了始料未及的麻烦。

短短几年工夫，他没有看上眼的毛泽东竟然率领中共打败了由美式武器装备起来的蒋介石的数百万大军。三大战役结束后，眼看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摇摇欲坠。当斯大林清楚他将来的合作对象已经肯定会由蒋介石变成毛泽东时，这才意识到事情麻烦了。如果毛泽东不承认1945年那个中苏条约，想把外蒙古收回去，那他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sup>①</sup> 引自何明《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sup>②</sup> 引自何明《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其时正逢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在国际事务中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和斯大林公开翻脸，相互指责，这更使斯大林对中共今后的政策方向疑虑重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情况，也直接影响到了中苏关系。

1948年斯大林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之后，世界上对中国共产党的议论颇多。如熟悉中国情况的记者斯诺著文指出，开除南斯拉夫一事“清楚地反映了俄国的政策在欧洲的根本目标和局限性，同样，也给我们一个观察中国目前发生的事态的角度”。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都不是苏联红军扶植起来的，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打出来的，“产生了一种以自力更生和功归自己精神为基础的强烈的自豪感和团结感”。他认为中苏两国之间迟早会产生摩擦。

一个西方记者都能看到的问题，毛泽东、斯大林会看不到吗？

铁托“不可饶恕”的问题是和斯大林闹独立，而毛泽东对莫斯科的意见置若罔闻，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肃清了从苏联回去的王明等人的错误思想，确保了中共的团结。

仅此一点，便足以证明毛泽东的独立性远比铁托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斯大林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共推行的是亚洲式的铁托主义。

### 3. 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

其实早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表明了对莫斯科国际路线的忠诚。

7月1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态度鲜明地表明中共站在苏联一边。

11月1日，刘少奇发表《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明确表明在两大阵营激烈斗争的时期，“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联合苏联，是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不论哪个民族走向进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刘少奇的文章既是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同时也是公开向斯大林表明中共的政治立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一成立，毛泽东就积极策划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的事。

那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领导人到莫斯科，十分频密，斯大林就是君临于一切领导人头上的最高精神领袖。

在去莫斯科之前，毛泽东还专门召开了一个高层政治协商会议，听取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的意见。

压倒性的意见，都是劝毛泽东不能去。

一位著名辛亥老人还打了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说出一句十分雷人的话：“哪有中国的皇帝刚登基就去拜见外国皇帝的，咱泱泱中华大国，新朝伊始，从来都是等着外国使臣毕恭毕敬前来朝觐的啊？”

但毛泽东的想法与这些人完全不同，他要去见的是在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一言九鼎的斯大林，谈的是有关新中国前途与安全的头等大事。他不主动去，以苏联的强大国力，以斯大林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难道还能指望他纡尊降贵，主动到北京来拜望自己？

新中国成立短短两个多月后，毛泽东便匆匆启程了。

中共领导人对处理蒋介石和斯大林1945年签订的那个中苏条约的态度也是相当复杂的。他们在早年都走过一段由爱国而革命、而信奉共产主义的道路。促使他们决心“走俄国人的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苏联在1919年和1920年两次宣布放弃沙皇统治时期在中国侵占的土地和攫取的一切特权。对于他们来说，“走俄国人的路”不仅意味着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而且意味着建立一种新型的国际秩序，其首要的表现就是在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虽然毛泽东曾当面向米高扬说过“我们不谈这个问题了”，但此一时彼一时，他心底从来没有放弃过收回外蒙古的念头，早在1936年接受斯诺采访时他就说过，“外蒙古必将回归到一个新中国”。

而此时毛泽东认为时机到了，因为他相信，1945年的莫斯科外交仅仅完成了一个苏联和旧中国之间的条约。一旦新中国诞生，这个条约就会变成明日黄花。这种对苏联盟友的热切期望既支持了中共领导对于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念，也造成了胜利到来时中共领袖们对苏联的极大失望。

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时至1949年年末，中共完成了从一个从事革命运动的在野政党到国家执政者的龙门一跃。而恰于此时，苏联政

策却阻止中共和外蒙古的“兄弟”关系向国家统一转变。

结果，外蒙古从一个沟通中国革命和苏联的纽带，一变而为引起欧亚大陆上两个红色巨人民族情感碰撞的第一粒火星。

师哲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主要是中苏双方事先没有沟通好，斯大林不清楚毛泽东到莫斯科干什么，所以造成了一些误会。直到后来才明白，毛泽东主要是为条约而来的。”

已经解密的档案表明，毛泽东既不是去莫斯科治病，更不是因为双方没有沟通好而与斯大林之间产生了什么误会。

没有误会，毛泽东第一次和斯大林会谈便单刀直入，端出主题。斯大林则居高临下，滴水不漏。弄得毛泽东一气之下，才称病闭门谢客。国家初创，百废待举，作为中国的最高领袖，他在莫斯科的国宾馆里托病待了两个多月。

更不存在双方沟通不好的问题。11月10日，周恩来受毛泽东委托，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当罗申问及毛泽东的访苏目的时，周恩来明确回答：“除想与斯大林建立个人的友好接触之外，将与斯大林当面商讨中苏两国的签约问题。”

可见毛泽东访苏的主要目的有二：一、与苏联结成同盟，向世界昭示中国的“一边倒”政策；二、以新的中苏条约的形式，赋予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同盟关系以及法律保障。

再者，毛泽东赴莫斯科之前，他还直接给斯大林发了三封电报，明确告诉斯大林：“我来莫斯科，主要就是为了和贵国签订一个新的条约。”而且特别希望斯大林能给予明确的答复。

可是，斯大林偏偏就不给他任何答复。

当时斯大林高高在上，毛泽东也不好屡次坚持自己的意见，到发第三封电报时，他就巧妙地拐了个弯儿，貌似谦恭地说：“你看我是否需要带周恩来同志一起来莫斯科？如果你要是觉得可以和我们签订一个新条约的话，周恩来就跟我一起来？”

斯大林仍然不作任何答复。

毛泽东着急万分，却也无可奈何，1949年12月6日，索性带上政治秘书陈伯达，机要秘书叶子龙，负责警卫的汪东兴，加上翻译师哲就出发了。

此外，他还带了满满一火车礼物，因为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的七十大寿，他总不能空着一双手上主人的门吧。



寿礼规格之高，在我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分别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三家一起给斯大林送寿礼。中共中央的礼品有大元帅丝织像、清代蓝花瓷花瓶、景泰蓝茶具、烧瓷寿盘，以及象牙雕刻的大花瓶、宝塔、龙船、翡翠球、八仙人、女英雄等共10种22件（套、对、帧、座），外加祁门红茶和龙井茶。政府的礼品除大元帅陶瓷盘10个和每套99件的景德镇五彩瓷具两套外，还有“中国农民所献蔬菜果品”——山东胶东和济南产的白菜、莱阳梨、大葱，北京鸭梨、雪梨，天津和山东大萝卜，北京绿皮圆形红心萝卜，江西小金橘等。

双方的礼物极不对称，斯大林回赠给毛泽东的礼品全是金手表、金项链、金烟盒等，还有一辆防弹小轿车。

万里迢迢祝寿，还特意带上蔬菜水果当寿礼，正应了中国人“礼轻情意重”这句古话。当然，这恐怕也是毛泽东不拘小节的独特个性，与中国诗人的浪漫气质使然。

途经沈阳时，发生了一件让毛泽东极为愤怒的事。

1991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冈察洛夫对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苏联铁道部部长、斯大林的特使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瓦廖夫进行了采访。

科瓦廖夫回忆说：“1949年12月，我陪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科注：当时中国的报纸上说毛泽东去苏联是为斯大林祝寿）时，毛泽东指示在沈阳停车，并邀我游览市容。我一下就明白了未预料到的停车是出于什么原因。他想确证政治局关于肖像一事的决议是如何执行的。在沈阳所有高大建筑物上，都挂着斯大林身着元帅服的巨幅画像，没有一处挂毛泽东的画像，毛泽东当时很生气。当我们回到专列上时，市委书记向毛泽东报告说，东北各省人民以及高岗同志、林彪同志个人为斯大林寿辰准备了整整一节车厢的礼物，这节车厢已经挂在了他的专列上了。毛泽东愤怒地说：‘把车厢摘掉，把礼物卸下，一半拉到高岗家去，另一半拉到林彪家去。我代表全中国人民，已经给斯大林带去了礼物。请你转告这些同志，东北现在还属于中国。’”<sup>①</sup>

市委书记焦若愚被盛怒的毛泽东吓得目瞪口呆！

<sup>①</sup> 引自文博编著《中共往事钩沉（卷二）》之《前苏联援华专家组负责人谈高岗事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12月16日中午12时整，毛泽东的专列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时，斯大林给他的礼遇看似隆重，远远超过了任何一位共产党执政国家领导人的规格。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苏共核心领导班子的成员全都到车站迎接他。

不过，这样的规格很高但还不是最高，让毛泽东深感不快的是斯大林本人没有出现在欢迎官员中——而毛泽东肯定不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大林曾亲自到火车站，欢送前来与他谈判苏日中立条约的日本外相松冈洋佑。率性的毛泽东不加掩饰，故意把自己的愤怒挂在脸上，弄得前来迎接的苏方大员全都有些尴尬。

但是，毛泽东的不快很快便倏然而飞。当天傍晚6时整，斯大林率领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在克里姆林宫集体宴请了他。

一见面，斯大林不等工作人员介绍，便大步上前，亲切地握住毛泽东的手，注目端详了好一阵，才表情夸张地激动说道：“毛泽东同志，你红光满面，容光焕发，想不到你这样的年轻健壮。”

斯大林分明已经忘记了他当初对罗斯福所说的，毛泽东不过就是一个普加乔夫式的人物的评价，对眼前的毛泽东赞不绝口，“伟大，真是伟大！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不愧为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儿子。我代表全体苏联人民，祝愿你健康！”

毛泽东很激动，面对全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和无产阶级的最高领袖，他说出的第一句话颇有点游子归家的情调：“斯大林同志，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说到伤心处，毛泽东眼圈发潮，竟然哽咽起来。

毛泽东的悲情来自于当初他在延安发动整风运动时，被斯大林理解为是借此排除苏联最信任的王明，故而苏共对中共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斯大林当然明白毛泽东话里的意思，他亲热地在毛泽东的肩膀上拍了拍，一脸肃穆地说：“毛泽东就是毛泽东，胜利者就是胜利者。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全世界的真理！”

一席话说得苏共领导们哈哈大笑，毛泽东也怨气尽消，开怀大笑。

领导人聚会或是合影的时候，站在中心位置的斯大林，总不会忘记请毛泽东站在旁边，其他各国的领导人全都知趣地站到了他俩的



后边和两侧。而且开会的时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讲话都一律用俄语，只有毛泽东说的是一口地道的中国湖南话。

可是好景不长，一提到中苏条约，斯大林马上就翻脸了。

### 4. 苏联同志开了中国人一个玩笑

在接下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中，毛泽东说他这次来莫斯科，是想搞一个“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回去。

稍事寒暄，毛泽东又说：“斯大林同志，我来之前，中共中央作了一个决定。我们一致认为，应当废除贵国1945年与蒋介石反动政权签订的那个中苏同盟条约，和我们重新签订一个新条约。”

开门见山，单刀直入，这也是毛泽东的一种谈判手段。因为从米高扬到西柏坡，刘少奇去苏联，他这次赴莫斯科之前发给斯大林的三封电报，老是在试探，可斯大林就是不亮底牌，所以他始终搞不明白斯大林究竟是什么态度。这次干脆一上来就把最重要的问题摆到桌面上，让斯大林无法回避。

可斯大林十分蛮横，没等毛泽东把话说完，大手猛地一挥，沉下脸说道：“毛泽东同志，我明确地告诉你，苏共中央主席团也刚刚开了一次会议，也作了一个决定。政治局委员们一致认为，我们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中苏同盟条约，必须维持！”

从谈话记录上看，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第一次谈话还不到10分钟，就陷入了僵局。

在米高扬密访西柏坡之前，中共对莫斯科在外蒙问题上的态度显然存有某种幻想。中共领导人没有天真到以为乔巴山等外蒙领导人会自愿放弃独立，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认为外蒙问题纯粹是蒙古民族的自决权问题。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中共一直主张外蒙加入革命的中华联邦，这也是毛泽东在同米高扬谈话时希望得到莫斯科支持的目标。

然而，斯大林的态度不但使中共无法收回在国民党手中丢掉的外蒙，也使中共失去了恢复中国“大一统”的机会。

毛泽东没有和苏联人就外蒙问题进行一场马克思主义的争辩，这



并不意味着中共领导对苏方关于唯有蒙古人民才有权决定外蒙地位的观点心悦诚服。所以已经自认为今非昔比的毛泽东，首次访问莫斯科的目的，除了谈废旧约订新约的问题，其中也包括谈谈外蒙古问题。可没想到和斯大林刚一见面，他就是这副武断得不容商量的态度，不能不让毛泽东大感意外！

毛泽东接下来的谈话全都是离题万里，不着边际的兜圈子。

如果说中苏国家利益冲突的导火索已在米高扬密访西柏坡时被外蒙问题的火星点燃，斯大林在第一次与毛泽东会面时对旧条约问题的强硬态度，则使导火索继续燃烧。

尽管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都没有再提及外蒙，这个问题显然在斯大林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向毛泽东强调1945年条约的每一条都要保留，这当然包括了旧条约对外蒙独立的有关规定。

为了防止毛泽东以中国革命胜利为由提出对旧条约的修改，斯大林搬出了超级大国在雅尔塔的协定作为挡箭牌。

一时间，斯大林冷酷的权益算计，成为他和毛泽东会谈过程中的基调。

斯大林显然也不愿意把气氛搞得过分紧张，和缓下语气对明显不快的毛泽东说道：“我们决定继续维持这个条约的任何条款，是为了避免西方国家借此提出其他问题，诸如萨哈林和库页岛。但是，鉴于贵我两党的特殊友谊，可以寻求一种变通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的条约。比如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你们的建议，我们可以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

绕了半天圈子的毛泽东马上又回到了他最为关心的主题上，但走的仍然是曲线，他说：“斯大林同志，周恩来同志要来，你看合适不合适？”

斯大林的脑子转得也够快的，马上回答：“你让他来干什么？我没事情需要找他谈，如果他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的话，你就让他来吧。”

斯大林一句话，又把话题给扔了回来。

毛泽东没有料到斯大林会搬出英、美国家作为限定中苏关系的借口，这对他刺激太强烈了，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斯大林：“对不起，斯大林同志，在考虑中苏条约问题时，中共从来没有把英美等西方国

家的态度包括在内。我们的人民认为，在国民党政府垮台以后，它与苏联订立的条约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理由。”

斯大林承认中国人民的意愿应当得到尊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问题是，通过米高扬、刘少奇的党际外交，苏联领导同样认为中共不肯轻易放弃把蒙古人民共和国重新并入中国的计划。

在这方面，北京在1949年的外交步骤似乎证实了莫斯科的担忧。

这一年的10月3日，苏联成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第一个国家。在接下来的4天里，另外7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予以承认并提出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除了蒙古政府以外，其他国家都在发出建交邀请的当天收到了周恩来肯定的答复。唯有乔巴山是在难堪地等待了10天之后才接到中国政府答复的。在这个时期，北京同其他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必然都在莫斯科的严密注视之下，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尤其如此。北京对乔巴山的肯定的答复在莫斯科看来是一个好迹象，可是北京表现出来的犹豫也足以使莫斯科对北京的诚意表示怀疑。

斯大林并没有消极等待、观望北京的动态，而是未雨绸缪，采取步骤使乌兰巴托做好应对北京的准备。

1949年8—9月间，乔巴山赴莫斯科就医。他的另一个目的是向斯大林探询他对当时蒙古领导层中有关外蒙入盟苏联的争论的意见。

乔巴山在9月底会见了斯大林，发现斯大林关心的是中蒙而不是苏蒙关系。

斯大林告诉乔巴山，最近毛泽东和苏方交换了意见，表示赞同内、外蒙统一。

乔巴山表示，虽然中共尚未直接向蒙古提出这个问题，内、外蒙合并是应该的，只是统一的方式应当是内蒙古加入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

对此，斯大林讲了下面一番话：“这么说你是主张独立，而不仅是在中国国内保持自治权利的问题了？我也这样看。你们自己必须对这件事作出决定。但是也没有必要马上决定统一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现。你们需要有一个不会和中国产生争端的妙策。毛泽东和他的政府现在正忙于攻占广东和完全解放他们自己的国家。他

们还没有时间考虑国内的民族问题，在这方面他们也没有经验。但是，在占领广东之后，他们也许会愿意讨论这个问题。还有一点，你们也应注意。如果你们向毛泽东建议内蒙统一于外蒙，他多半会反对。他有自己的问题。蒋介石掌权时，把国家搞得七零八碎，甚至让外蒙古独立。毛泽东则不然，他要把被国民党肢解的国家统一起来。因此，毛泽东更难允许内蒙古统一于另一个国家。在十月革命以后，芬兰和波兰这样的民族从俄国分离，变成独立国家。这只有高度崇尚共产主义无疆界的列宁才能做到。你要明白，毛泽东绝对不是列宁，他才不会这样做。”

对乔巴山提出的外蒙加入苏联的问题，斯大林回答说：“蒙古共和国没有必要变成苏联的一部分。我们支持内、外蒙统一，希望它成为一个统一、独立的国家，既不在俄国，也不在中国的管辖之下。”

师哲回忆录与尤金大使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均几次谈到毛泽东第一次去莫斯科时受到了冷遇，弄得心情很不愉快。

其实真正的冷遇，正是在这次涉及有关中苏条约的谈话以后才开始的。

毛泽东对苏联和斯大林寄有强烈的希望，源自于在中国民众，尤其是社会精英阶层心中，无不深深铭刻着这样一件与中国休戚相关的大事。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加入协约国，因国力羸弱，只能派出华工担任战地后勤，西线去了15万，东线也去了5万。不久，“十月革命”爆发，俄国宣布退出东线战场，国内陷入内战，辽阔的西伯利亚和中国的东北地区成为了白俄军队的势力范围。美、英、日、法等7个协约国联合组成干涉军，从远东地区协助白俄武装，向苏联境内发起进攻，企图将刚刚诞生的全世界第一个红色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

当时中国的北洋政府也破天荒派兵参与，并和其他7个协约国组成八国联军，于1918年登陆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在百余年前被沙俄强占去的海参崴。由海军第1舰队代司令官林建章上校担任驻俄部队指挥官，先后派出3万多名在东线参战的华工，并伺机收复更多被沙皇俄国强占去的中国领土。在中国满是屈辱的百年近代史中，中国军人也曾骄傲地踏上过这块被老祖宗丢失多年的土地。

就在苏维埃与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红色政权命悬一线的时候，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俄国政府突然向全世界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宣言》。

中国史称“第一次对华宣言”。

该“宣言”郑重宣布：俄国政府放弃沙皇俄国时代在中国因侵略而获得的一切土地，放弃领事裁判权利等各种特权，并无条件地将帝俄在中国东北修建的中东铁路归还中国，希望在新的平等基础上建立两国邦交关系。

天上“咚”地掉下个大馅饼，砸得全中国人民头晕眼花！

北洋政府得知这一天大的喜讯，从高官到社会精英，普通民众，无不感动得涕泗横流，觉得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真是太伟大，太了不起了！

现在来看，这实际上是列宁使出的对东西方列强结成的统一战线极具破坏力的一个妙招，以此手段来拉拢与迷惑和自己山水相连，体量最大，其东北已经成为白俄军队后方基地的中国。利用刚刚推翻帝制不久的中国人民渴望民族独立的迫切愿望，将中国拉到自己的阵营之中，来破解列强和白俄对自己的疯狂扑杀。

在最近一两百年的历史中，沙皇俄国通过《瑛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以及一系列勘界条约，先后从中国强占去了15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听到以列宁为首的红色俄国宣布这些条约作废，把侵占的土地还给中国时，中国朝野各界立即为之感动，“宣言”受到了全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当时中国31个社会团体致电俄国苏维埃政府，对“宣言”表示赞美，并强烈要求中国政府与俄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俄国派出党政代表来到中国，广泛接触北京政府各界人物，宣传“宣言”精神。他们还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以及哈尔滨等地，联络开明人士、先进分子、革命志士，向他们宣传“十月革命”、共产主义及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中苏关系的改善。

1920年9月5日，以张斯麟中将为为首的中华民国军事外交政府使团抵达莫斯科后，受到了超规格热情接待。1920年9月27日，俄国外交人民委员部发表了《加拉罕第二次对华宣言》，这次宣言全称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政府的宣言》，第二次对华宣言与第一次对华宣言主要内容完全一致，即前沙俄政府与中国缔

结的一切条约无效，再一次强调放弃旧俄对中国领土的一切占领。

张斯麟还受到了列宁的单独接见。会见一开始，列宁就开宗明义，表达了愿意放弃前沙皇与中国缔结的全部条约，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本家武力侵占和夺取的一切归还给中国人民。

前后两次宣言和列宁的当面承诺都说到了同一件对中国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大事，那就是废除过去中俄之间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把从中国强占去的15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还给原来的主人。

不过，张斯麟也同时听明白了闪烁在这些条件字里行间的的一个意思，那就是中国的领土不能成为白俄反动武装的后方基地，绝不能让白俄反动武装利用中国的领土休养生息，壮大反对赤俄政权的力量，并把中国作为进攻赤俄政权的基地。

在这以后，列宁先后派出裴克斯、越飞、加拉罕与北洋政府就两国建交等问题进行磋商谈判。经过几轮的艰巨谈判，1924年5月31日，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此时的俄国已经改称苏联）、顾维钧代表中国北京政府，共同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两国宣布正式建交。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并规定：“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政府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

曾经和沈志华一起去莫斯科购买苏联档案的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员闻一先生说：“不管是第一次、第二次对华宣言，以及列宁的讲话里面，都从来没有具体提到过《瑛珲条约》，也没有提到过《北京条约》。而中国的土地被割占给沙俄，主要就是这两个条约造成的。当然，苏联人更没有谈到远东问题，比如被他们霸占去的江东64屯，乌苏里江以东、兴安岭以北这些历史遗留问题。话说白一点，列宁当时就是被西方列强的干涉军压得喘不过气来，通过外交上的一种姿态和手段，首先取得中国的支持与合作，以此来粉碎敌对势力的联盟，减轻他在远东承受的军事压力。而且列宁本身就具有大国沙文主义思想，他在苏维埃大会上就公开说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离我们很远，但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他绝对不会放弃符拉迪沃斯托克，要是把这座城市还给中国，他的太平洋舰队往哪里放？一直到最后，列宁也是口惠而实不至，根本就没有处理过什么中俄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更没有归还给中国一寸土地。”

苏联人为何出尔反尔？

主要原因是，到了1922年，中国军队早已退出的这支多国联军被苏联红军全面击溃，中国在苏联人眼中，已经不再具有战略价值。

今天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仍然保持着一尊列宁的全身铜像，其余的三尊铜像都在20世纪90年代被拆除了。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心目中，列宁似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辉，但是他的影响力，却没有在历史的起伏潮落间消失殆尽。

“符拉迪沃斯托克离我们很远，但这就是我们的城市！”

这是列宁在1922年11月20日召开的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发言时斩钉截铁地向全体党员说的一句话，如今仍然被镌刻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对面大厦的一面墙上。尽管当时的语境是针对苏联红军刚刚收复了被包括中国军队在内的八国联军短暂攻占过的这座城市，但许多年后人们发现，正是这句话，似乎为这块土地和整个远东地区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 5. 巨人之间的较量

在莫斯科市的中心位置，有一组极其宏伟的宝塔样的楼群。楼群四周筑有坚固的城墙，形成一座“大城之中的小城”。小城一面靠着莫斯科河桥，一面朝着壮丽的红场。小城的塔楼造型千姿百态，有的是圆形顶，有的是尖形顶，有的是棱形顶。最高的那座塔楼，是莫斯科市著名的自鸣钟，每隔一个小时，就会响起美妙的音乐，全市都能听见。这座由塔楼组成的小城，就是克里姆林宫。毛泽东下榻的国宾馆，也坐落在这一大片宫殿建筑群里。

12月21日，斯大林的寿辰在热热闹闹中过去了，各国领导人也都陆续打道回府了，只剩下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仍然待在克里姆林宫的国宾馆里不打算走。

本来，苏联方面精心为他安排了很多活动，参观集体农庄大型企业，看芭蕾舞看电影，去列宁格勒参观冬宫。可是毛泽东想谈的事儿没谈成，心里窝着一团火，哪儿也不去。

1月20日这天，毛泽东忍无可忍，对前来看望他的苏联外交部长

莫洛托夫声色俱厉地大发了一通脾气，说道：“我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到莫斯科只有三大任务，就是吃饭、睡觉、拉屎！”

发脾气也是一种充满政治智慧的外交手段，挨了骂的莫洛托夫当然会马上把情况报告给斯大林。

斯大林让莫洛托夫给毛泽东捎来口信：22日再接着谈。

20日晚上，毛泽东给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发了份电报，心情明显有所好转，说：“22日我就要和斯大林谈到实质性问题了，估计会有所突破。”

结果22日上午谈了整整半天，斯大林老是在日本问题、越南问题、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上绕来绕去，就是不提毛泽东最为关心的中苏条约问题。

于是，毛泽东回到国宾馆后马上对外宣布，他又病了，头疼得厉害。三名苏联医学专家马上奉命赶到国宾馆给毛泽东治病，可检查来检查去，专家也搞不清楚毛泽东的病根在哪里。

从22日到30日，整整8天里毛泽东没有出过国宾馆大门一步，外界很快就猜测到中苏之间闹不愉快了。舆论沸沸扬扬，特别是英国报纸，说毛泽东因为和斯大林发生了争执，已经被软禁了。因为这种手段是斯大林对付不听他招呼的东欧共产党国家领导人常用的手段——岂止软禁，关押、秘密处死也是屡见不鲜——如今用到毛泽东头上，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其实，毛泽东既不拂袖而去，又拒绝参加主人安排的一切活动，而且还犯头疼，弄得斯大林也很紧张，再三让莫洛托夫前去动员他参加个活动，公开露露面，报纸上一发消息一登照片，所有的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

可任凭莫洛托夫说得口干舌燥，毛泽东就是头疼，疼得来什么活动也不能参加，不能露面，连相也不能照。

当时的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在回忆录里说：“到30日这天我们内部开了个会，因为老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办法，就建议毛主席还是露个面。毛主席也不愿把事态弄得更糟糕，说：‘露面，你让我怎么露？’我说：‘你发表一个对记者的谈话，报纸一登，电台一播，西方记者制造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说明你没被软禁嘛。’毛主席采纳了我的意见，让我马上去安排接见记者的事。”

沈志华教授对笔者说：“迄今为止，中国或是俄国的档案馆里，

都没有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塔斯社记者的原始档案。这份对记者的谈话稿究竟是由谁起草的，也不知道。王稼祥的回忆录里也没有谈到这个事儿。”

只有毛泽东本人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讲话稿是斯大林起草好以后，由莫洛托夫转交给他，他照本宣科对塔斯社记者念的。回国后，毛泽东对他的同志们说：“1950年元旦这天傍晚，我收到了一份由斯大林签署的《毛泽东对塔斯社记者的谈话》稿，斯大林突然改变观点了。这个谈话稿是他亲笔起草的，他给我当秘书。”

斯大林同意，是因为他开始转弯了。

2月1日，塔斯社广播了毛泽东接见该社记者的谈话。《真理报》同日也全文刊登了。

第二天，斯大林就派莫洛托夫来找毛泽东。斯大林终于决定发表这样一个讲话，正是因为他已经决定对固执得出乎他想象的毛泽东作出让步。

为什么让步？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总统帮了毛泽东的大忙——当然，这绝非杜鲁门先生的本意。

1月26日，美、韩两国政府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如果金日成向南朝鲜发起进攻，依据这一条约，美国必然会出兵帮助南朝鲜。

而这一情况的变化，直接涉及斯大林对不久就要爆发的朝鲜战争的通盘考虑，美国人介入进来，他马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在这样的时刻，他绝对不可能和拥有一支能征善战、全世界最庞大陆军的中国彻底闹僵。

但是在斯大林眼里，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比这更重要的是自从他在柏林危机中被迫退让后，他明显地感觉到苏联还没有力量与美国在欧洲公开对抗。

正是由于在欧洲，包括在中亚受到美国的压力太大，他才会想到要另找途径来分散和削弱美国的力量。他过去在亚洲采取缓和政策，不惹麻烦，是因为他看不出有谁在亚洲能够帮助他，担心自己出现两面作战的危险。而中国革命出乎意料地取得了成功，如果能够答应毛泽东结盟的要求，新中国就能够帮助他在亚洲牵制美国的力量，以减轻他在欧洲和中亚的压力。这样一来，苏联的东方战线就有了安全保障，而且具有了在亚洲向美国挑战的力量。



他之所以此前主动让中共来承担指导和援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责任，此后又积极帮助中国恢复经济和建设工业，其原因正在于此。

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太大了，作为亚洲第一大国，它的胜利毫无疑问对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和不小的威胁。

其次，中国的榜样作用太诱人了。美国连中国这样一个极具战略价值，曾经给予大量援助，并被视为盟友的国家都不敢去干预，它又怎么会有胆量轻易地去干预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呢？

如果亚洲相当多数的国家都能像中国那样揭竿而起，美国还有余力来对付苏联吗？

中苏两国一旦正式结盟，那么，就会马上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的整个力量对比，斯大林在远东问题上就再也用不着保持一贯小心谨慎的低调态度。甚至连在行军途中，准备登上日本北海道的苏联红军，在麦克阿瑟的厉声恫吓下也不得不掉头返回，让斯大林丢尽了脸面。这样的奇耻大辱，令斯大林永生难忘！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会在远东由此从守势转入攻势，斯大林是不会让苏联来冒这种风险的。

但是，他相信可以通过中国并由中国出面去做一些让美国人头疼的事情，比如推动亚洲各国的革命，让中国出面去英美势力和他们的代言人控制的东南亚地区施加影响，这不就能非常有效地帮助苏联来牵制美国吗？

精明过人的斯大林，又怎么会让毛泽东空手而归，乃至心生疑忌，而不设法把他变成能够在关键时刻为自己助一臂之力的盟友呢？

斯大林的亚洲政策自1948年以来一直在逐渐地趋向激进，他从这一年开始，对自己过去支持国民党而冷落了共产党的做法进行自我批评和检讨，并逐步采取措施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力度，虽然这种支持碍于《雅尔塔协定》约束显得小心翼翼，害怕惹恼美、英两国，因而不敢公开张扬，甚至支持得有些偷偷摸摸，却已可以看出来斯大林对中共态度的明显转变。

斯大林在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的第一天，即1949年12月16日，对毛泽东解释为什么苏联不好与中国另订新约的理由时，对他的苦衷就已经讲得十分明白了。只是到1950年毛泽东访苏并与之签订中苏友好条约后，斯大林才彻底完成了方针性的转变，即，决定在整个亚洲推行攻势路线。

与此同时，斯大林对朝鲜战争由否定到肯定并成为主要的策划人的态度巨变，也正是这一方针转变的具体表现。

斯大林一旦把问题想通了，他的意见就会立即变成苏共中央的政策与方针。

1950年1月1日晚，斯大林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次日上午去拜访毛泽东，通知他：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已经决定与新中国另订新约了，让《雅尔塔协定》见鬼去吧！

苏联人摆上桌面的这个新的协定，基本上保留了1945年和蒋介石政权签订的旧条约的内容，除了答应等对日和约签订以后，把旅顺港归还中国，其他的一切照旧。

中国方面当然不会同意，而且针锋相对，抛开苏联人搞的协定，自己重新另搞了一个。规定，旅顺港待对日和约签订以后，或最迟于1952年归还中国。

中国方面加了一个时间，你不能老不和日本签约，就老赖着不还给我们，所以加了个时间上的限制。中长铁路和大连行政权立刻归还中国。

26日，中国把这个自己拟订的草案摆上桌面以后。苏联人马上表示反对，提出要对中方草案进行修改。

沈志华买回了经斯大林亲自修改后的文本，对中国方面的主张，斯大林几乎全部画上了红叉叉。打了一个又一个的问号和惊叹号——这足以表明斯大林对中国人想法的愤怒。

但奇怪的是，仅仅过了两天，苏联方面退回来的这个文本，几乎就和中国方面起草的差不多。仅仅就是把立即归还中长铁路和大连行政权，也一并推迟到待对日和约签订以后，或最迟于1952年归还给中国。

沈志华认为，现在尚无法看到26—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针对中国方面提出的草案是怎么讨论的档案，但是结果是非常清楚的，苏联人在两天之内再次作出了重大让步。

为什么会多云转晴？

沈志华的解释是：就我看到的档案来说，有两个原因，主要不是中国人，也不是苏联人，而是美国人在这里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毛泽东到了苏联以后非常轰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中国元首

就去了莫斯科，而且一待就两个月不回来，在那儿干吗呢？美国人就开始琢磨这个事，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一直摇摆不定，从内战打起来以后，美国人就在犹豫，到底支持不支持国民党政府，一派说应该支持，另一派反对支持，国民党政权太腐败了，你支持它干吗呀？讨论来，讨论去，最后他们确定了一个方针，等尘埃落定，看清楚情况以后，再决定到底支持谁。

到1949年12月，尘埃已经落定，国民党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了，国民政府被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而且毛泽东去莫斯科了。

这样一来，美国人就面临着一个选择，现在必须表态，到底是承认新的政府，还是继续和国民政府保持外交关系。

12月29号，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政策研讨会，不同意见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军方、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支持蒋介石，说内战过程中我们一退再退，一让再让，共产党打到哪儿我们就撤到哪儿，我们再撤就没地方撤了，现在就剩台湾了。我们如果把台湾给了中共，整个美国在远东的防线就会受到威胁。所以现在政府必须明确表示支持蒋介石，不能再给中国共产党可乘之机了。

但是国务院不同意，艾奇逊说，你们从军事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则必须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什么叫政治？首先要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中国共产党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苏联人；如果把精力、钱财都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而放弃主要敌人，我们在战略上就失策了。

所以艾奇逊说美国人应该采取的政策是亲近中共，分裂中苏，不能让中苏结成联盟，这样在大战略上我们就成功了。那么怎样才能亲近中共呢？这个不难，我们把蒋介石一脚踢开就行了，把台湾让给中共，他必定感激你。不是现在中共要解放台湾吗，你就让他来解放，我们不管。这样毛泽东就不会跟苏联结成同盟，在战略利益上，美国就赢了。

杜鲁门一听，说，对，还是艾奇逊这招高。

12月30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起草了文件，但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去了莫斯科，中美之间又没有信息渠道，怎么才能让中国共产党知道美国人的想法呢？原来美国政府有意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测政治风向，以备必要时与新中国的领导人“暗通款曲”，可毛泽东

写了篇《别了，司徒雷登》，说这位美国大使“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也将他给赶走了，这样一来，双方就再也没有沟通渠道了。

杜鲁门说台湾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美国对台湾没有任何野心，如果台湾海峡发生战争，那是中国的内战，跟美国一点关系都没有——意思就是，你中国共产党要打就尽管打，解放台湾尽管解放。

杜鲁门讲完了没听到什么反应，艾奇逊有点着急，不行，你传递的信息还不够强烈，16号他又发表公开讲演，那就长了。讲了半天讲的都是中美之间有传统的历史的友谊，美国对中国多么的友好，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美国也只是随大流，跟着走，进了北京还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紫禁城的警卫工作。要不是咱美国大兵帮你们中国人看着门，皇宫里那些宝物啊，早就被老毛子和英、法等国的匪徒们抢光了。

而且美国在中国也没有租借地，说全世界只有我们美国人对中国最好。中国同胞们想一想，你们的外蒙古是被谁逼着分离出去的？你们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被谁霸占去了？

虽然美国人的目的是想挑拨离间中苏关系，破坏中苏结盟，但所谈的这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又分明全都是事实，在全世界的华人和中国知识分子之中，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所以斯大林看完以后非常生气，立刻把毛泽东叫过来，说艾奇逊这个讲话你看没看？毛泽东说我还没来得及看，斯大林说我都翻译好了，你看看吧，美国人太坏了。我们要立刻发表声明，反驳他。

## 6. 谁是赢家

毛泽东后来没完全按斯大林说的办，斯大林说好了双方都用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来驳斥美国人的谣言。毛泽东心里的想法肯定和怒火冲天的斯大林不一致。这很正常，国家利益不同嘛。他也非常清楚，因为他在回国宾馆的路上问了莫洛托夫，他问刚才斯大林同志说

要以政府的名义正式发表声明是什么意思，莫洛托夫说，就是特地提醒中国方面，要用外交部的名义发表声明。可毛泽东愣是装作没听明白，回去就给胡乔木发了一封电报，指示后者以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名义发表声明。

师哲回忆说毛泽东没听明白斯大林的话，其实沈志华从莫斯科买回的解密档案证明得非常明白，斯大林还专门叮嘱毛泽东要用外交部的名义发声明，毛泽东呢？偏偏嘱咐胡乔木用新闻出版署署长的名义发，这就让斯大林非常生气，新闻那个东西，怎么能够代表政府呢？你毛泽东这么干，不是故意破坏我们之间达成的计划吗？

毛泽东用独特的方式表现出对苏联对华政策的不满，给斯大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苏联高层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不能让毛泽东空手而归，如果毛泽东空手而归，中苏同盟不能得以建立的话，偷着乐的，那就是美国人了。

所以，斯大林必须做出让步。

不过，要斯大林让步，得给他个台阶下，原来两边争得这么厉害，就这么同意了，斯大林的脸上也挂不住。

关键时刻，就显示出了周恩来的大智慧。

周恩来确实非常聪明，他代表中共对外蒙古问题作出了重大让步，才换来了斯大林的投桃报李。

28日，周恩来去见斯大林，说：“斯大林同志，我还要找你谈个问题。”

斯大林说：“谈什么都可以，你谈吧。”

周恩来说：“我想和你谈谈外蒙古问题。”

同样为周恩来当翻译的师哲晚年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斯大林一听，脸都白了，严肃地说：‘毛泽东已经答应中国共产党不再提外蒙古问题了，你怎么还给我提？’”

周恩来说：“不是，斯大林同志你想想，我们已经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外蒙古独立是1945年条约签订的结果，是让外蒙古进行公投，隔了一年才宣布独立。现在我们废除了1945年的条约，外蒙古独立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法律依据？”

斯大林一想真是这么回事，赶紧问：“那你们的意见是怎么办？”

周恩来说：“我们商量了一下，新政府发表一个声明，承认外蒙古独立。”

斯大林顿时放了心，说：“这样很好。”

周恩来接着说：“我现在拿来了我们已经起草好的声明，请你看看。”

斯大林看完，脑袋瓜子轰的一响，这才明白周恩来的用意何在。

声明说：“鉴于外蒙古已于1949年1月举行了全民公投，外蒙古独立是人民的意愿，所以我们承认其独立的现实。”声明还白纸黑字地写道：“中苏经过谈判，把原来中苏条约作为正本，以下两个文件作为附件同时发生效力。”

这两个附件，第一个是中国关于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港的协定；第二个是关于外蒙古的声明。

这样一来，中国方面的意思就非常明白了：你如果同意我们提出的协定条款，我们就承认已经成为事实的外蒙古独立；你要是不同意，那么对不起，我们就没有必要发表这个声明，马上打道回府。

中国方面把承认外蒙古独立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己方要求挂起钩来，以此促使斯大林作出重大让步。

会谈记录表明，苏联方面经研究后，于1月28日同意了中方提出的条件。

这就和过去学者们认为是中国方面吃了大亏，毛泽东受了委屈完全不一样了。

毛泽东本人后来也喜欢这么讲，给党内同志的印象就是他忍辱负重，才争取到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他受过斯大林一段时间的冷遇这不假，但是，他这一趟去莫斯科，完全达到甚至远远超过了出发前预期的目的，中苏谈判关键时刻的两次重大让步，都是斯大林作出的。

当然，中国方面也不得不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当时外蒙古的具体情况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你承认不承认它，都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既有蒋介石政权签约在先，又有外蒙古全民公投在后，再加上苏联人实际上固若金汤，深入骨髓般的严密控制，以新中国的那点微弱的力量 and 影响要想拿回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倘若不立足于现实，而靠理想色彩与狂热的民族主义激情办事，那就非把什么事情都搞砸了不可。

但是丢掉了外蒙古的蒋介石反而不干了。

即便已经沦落到困居海岛的地步，蒋介石仍然认为只有“中华民国”才是中国中央政府的正朔，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非是个昙花一现的政权，你斯大林跟毛泽东签的字不算数。既然你苏联人单方面撕毁了1945年和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双边合约，那么，该条约所涉及的一切内容，均已自行废止。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政府立即发表声明，宣布收回外蒙古主权。

但所谓收回主权，不过是派个人在地图上将外蒙古改回来，过过眼瘾罢了。

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蒋介石政权从那以后一直坚持，外蒙古仍属于中国的领土；而且倒打一耙，反污外蒙古丢在了中共政权手里。因为台湾出的“中华民国”的地图是秋海棠，而大陆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是公鸡。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谈判说到底就是一种博弈，既要据理力争也必须审时度势适度妥协，尤其是弱国与强国之间的谈判，只要能达到自己最主要的目的，那就不能不在其他方面作出牺牲。

当时贫弱的新中国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就是从强大的苏联手收回东北的主权。从中国的战略利益考虑，外蒙古与东北远不可同日而语。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毛泽东只好拿共同的意识形态当作“武器”用，甚至在莫斯科上演了一场装病的好戏，再由周恩来出面经过艰苦谈判，终于成功地迫使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同盟者，苏联向新中国转让了巨额财产，归还了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拥有的一切权利，失去了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新中国成功收回东北主权，无异于虎口拔牙。早在沙皇时期，俄国就有在亚洲扩张的野心，就曾染指中国的东北。斯大林的对华政策的两大战略考虑中，除了把外蒙古从中国的版图独立出去，形成广阔的安全地带以外，另一条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确保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而两者均已迫使蒋介石的旧中国，以条约的形式予以确认。

可以作个比较，至今为止，北方四岛（千岛群岛）问题成为了插在日本人心窝上的一把尖刀，日本收回无望，这更显得当初达到上述目标之不易。而承认外蒙古独立，也是中国政府在现实政治条件下，

不得不咽下的一枚苦果。

鱼和熊掌兼得岂不更好？但，只能面对现实选择！

中苏签订友好条约的消息见报后，由于有的地方宣传工作没有做到位，甚至出现了学生上街游行抗议的事件。

而事实恰恰相反，真正吃了大亏的不是毛泽东，而是斯大林。

斯大林一辈子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大的亏，条约一签订，苏联的太平洋舰队就必须退缩到海参崴。毛泽东丢下自己的军国大事不管，待在莫斯科和斯大林斗智斗勇，主要的目的就是坚持通过条约，合法地收回中长铁路、旅顺港和大连港，而这恰恰是苏联从俄国沙皇开始，就苦心经营的一个远东战略构想。沙皇如此，列宁如此，斯大林乃至以后的历任苏联领导人莫不如此。所以俄国人办的道盛银行出钱修建了中长铁路、南满铁路，租用了旅顺港，后来又开辟了大连港，可是到了1950年2月份，随着中苏条约一签订，这一切全都让毛泽东一口袋收了回去。与此同时，苏联驻扎在东北的30万大军和各种势力，也会完全彻底、干干净净地退出东北地区。

这件事，对苏联的战略损失，简直太大。

斯大林从1924年坐上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到他1953年去世，除了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和罗斯福、丘吉尔谈判时不得不作过一些妥协让步，就社会主义阵营而言，哪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敢不唯他马首是瞻？唯独中国来的这个毛泽东同志，太厉害了，弄得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1948年苏联和南斯拉夫爆发冲突的时候，无论斯大林怎么放下身段，邀请铁托去莫斯科见个面，谈一谈，铁托都不敢去，生怕斯大林给他设下鸿门宴，一去这辈子就极有可能“望穿秋水，不见贝尔格莱德的情影”。

可这毛泽东多厉害呀，来了就把莫斯科当自己家似的，一住近3月，每天只干“吃饭、睡觉、拉屎”3件大事。

一个国家元首，刚建国就扔下自己的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的首都一待近3月。此生阅人无数的斯大林，哪儿领教过这样的胆识和魄力？最终斯大林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了，毛泽东如愿以偿了。

斯大林之所以两次对中国作出了重大让步，自然是有原因的。当时的苏联就国际局势而言，他手里只捏着中国这一张牌可打，就是他



必须和中国结成牢固的同盟，才能确保苏联东线的安全。

而重要的是，中国是否能真正愿意成为他手中的一张牌，他并没有充分的把握。因为，科瓦廖夫于1949年12月24日向斯大林递交了一份名为《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报告》，明确认为中共中央内部存在着严重的亲美倾向。他们始终对英、美两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着幻想，为了不激怒英、美，刘少奇和李立三反对日本、印度等国工会参加亚澳国家工会会议。周恩来反对向英美势力较大的上海、天津两大城市派出苏联专家。这份报告的情况是高岗向科瓦廖夫反映的。

时间再往前移，1949年11月17日，李克农曾向罗申大使提到，美国有一个有意策划分化中苏关系，促使中共响应铁托集团的重大阴谋；而且美国正在策划攻击1945年的中苏条约是一个不平等的帝国主义条约。

凡此种种，不可能不对斯大林产生影响，他极不愿意看到中国亲近西方国家，并渴望中国成为苏联集团中最重要的一员。但鉴于桀骜不驯的铁托的背离，明显具有非同一般的雄才大略，可是又让他难以捉摸的毛泽东是东方铁托的可能性极大，斯大林不能不存有顾虑。对于中共要求帮助解放台湾他一再拒绝，唯恐毛泽东一旦完全统一中国后，会再无后顾之忧，也就不再有求于苏联人。

但是，现实又清楚地提醒他，苏联和中国结成的军事政治同盟，实际上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国形成的。对于苏联来说，这项条约具有最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保障了苏联7500公里的边界处于安全和友好状态，也保证苏联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拥有一个最为可靠和体量极其庞大的同盟者。

而现在，他认识到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他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自己就不能不在重大问题上对毛泽东作出一些让步<sup>①</sup>。

而毛泽东手里捏着3张牌可以打，他既可以选择和苏联结盟，也可以选择和美国结盟，还可以走中间道路。

当然，当时毛泽东本人怎么想的并不清楚，这只不过是历史学者们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作出的一种客观分析后得出的判断。

<sup>①</sup> 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谈判期间发生的故事，来自沈志华2011年12月20日在华东师大国际冷战史中心与笔者的谈话。并参阅了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和师哲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何明《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

所以强大的斯大林最终向倔犟的毛泽东作出让步，只能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做了一件事情，中国的学者们后来除沈志华以外，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研究，都很少涉及这个问题。

但，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这就是朝鲜战争。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反对，就毛泽东等少数人非出兵朝鲜不可？

其实，中国坚持出兵，主要就是为了挽救《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别人心里可能不知道，但毛泽东非常明白，他访苏是得罪了斯大林的，当然开始斯大林是得罪了他的。所以只有中国参战，才能挽回中苏关系，把中苏同盟重新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实践证明，后来也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的。

斯大林对毛泽东不得不做出重大让步的背后，其实就与他早就和金日成策划于密室中的朝鲜战争有着直接的关系。

因为，正当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与苏联人紧锣密鼓谈判中苏友好条约时，另一场事关中国的重大利益却又背着中国人的谈判，也正在同时进行之中。

2月4日，金日成在平壤与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会谈，最后金日成决定用9吨黄金、白银及有色金属矿石换取苏联军火与装备，并要求苏联人答应把1951年给他的贷款提前用于1950年。

2月9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回电，“苏联全部满足金日成同志的要求”。

从这以后，苏联便开始大规模向朝鲜提供武器装备。

1949年6月，斯大林又给了金日成雅克战斗机100架，T-34坦克87辆，装甲车57辆，大炮230门，枪10000多支。

斯大林从中苏条约基本定稿到3月中旬这段短短的时间里，就给了金日成相当于过去两年所给的军备。

唯一原因，就是斯大林已经决定发动朝鲜战争。

如此重大的事情，斯大林为何要瞒着正在莫斯科与自己会谈的毛泽东？

于情于理，这都说不过去呀。

原因正在毛泽东访苏前夕，和斯大林通的电报里。

毛泽东在电报里与斯大林交换了对朝鲜政策的意见，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认为北朝鲜此时不宜向南方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在去电中说，“朝鲜同志想通过武力解决南朝鲜问题，中国领导人曾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

斯大林回电说，“完全同意中国同志的意见，在朝鲜不应开始一场战争，不能用军事手段统一朝鲜”。

正因为如此，尽管斯大林已经把在朝鲜半岛发动一场战争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但对正在莫斯科做客的毛泽东，他却只字不提。

毛泽东离开莫斯科前，斯大林为了和他建立更加深厚的私人友谊，居然把他派到中国的特使科瓦廖夫呈送给他的秘密报告，以及高岗向他提供的中国共产党内高层的情况当面交给了毛泽东。

科瓦廖夫在接受冈察洛夫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件事情。有意思的是，他这份批评包括毛泽东本人以及中共高层的秘密报告，竟然是在陪同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途中，在专列上完成的。

他说：“陪同毛泽东出访莫斯科前夕，我已着手给斯大林写关于中共的详细报告，并在列车上写完了。我在报告中把毛泽东及其战友在内外政策基本问题的实际活动，与斯大林向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比较。我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评意见。1950年2月，即在毛泽东由莫斯科返回北京前不久，我获悉，斯大林把我的这份报告及其评论中共中央的密电交给了毛泽东。这不算什么，他还把一份高岗寄给他本人的情报亲自交给了毛泽东。很久以后，米高扬也证实了斯大林把这些文件交给毛泽东一事。1967年7月25日，米高扬同我交谈时，说：‘迄今为止，还未找到能对斯大林这一行为加以解释和辩护的正当理由。’斯大林的行为成了后来排挤高岗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一开始我就清楚，斯大林这一行为，实际上已经注定了高岗的悲惨命运。”

对于科瓦廖夫与高岗，赫鲁晓夫有着更为详细的回忆：

当时担任苏联政府驻华经济事务全权代表的是铁路专家科瓦廖夫，他于1944—1948年任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长），后任中国东北人民政府顾问和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顾问，在北京人称“两位领袖身边的顾问”。他从前在满洲工作过，日本人被驱逐后曾在那里修复铁路，后来当上了毛泽东的顾问。斯大林认为他是一位可信赖的人。不久此人便在他的密告信中报告说，发现对苏联的不良情绪，这种不满在刘少奇、周恩来及该国其他一些领导人身上表现

得尤为突出。

高岗早在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之前也给我们发来了类似的情报。高岗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驻满洲全权代表兼北京政府驻满洲的全权代表，就好像是那里的总督。他与我国代表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高岗只字不提毛泽东本人的立场如何，但他同样也不提毛泽东对那些明显表示对我们不满的人都采取了什么措施。高岗列举了许多事实以证明这种不满的存在。

这里我举出其中的一件。那天正在庆祝中国的一个什么节日，举行了阅兵式。当装备着我们的坦克的部队从广场上通过时，中国的军人气呼呼地说俄国人给他们的是旧坦克。是，这话没错。那些坦克不是新的，那时我们自己并没有那么多新坦克可以送给中国。苏联刚刚结束战争，正在恢复工业，坦克产量削减了。不这样做不行嘛。所以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抱怨我们的理由。坦克当然是旧的，但还完全具有战斗能力。但这种言论给不满意我们的情绪火上浇油，而且把一切都归罪于苏联。

斯大林希望博得毛泽东对我们的好感，在他访问期间显示自己对他友好相待，并且信任他。因此斯大林拿到我国驻满洲代表寄来的并附有他与高岗谈话记录的几份文件之后，干脆就把它转送给毛泽东了。我，还有我与之交换意见的几位其他政治局委员，都确信不疑地认为高岗向我们通报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出于何种目的，我不知道，但无论怎样他是站在对苏友好的立场上的。然而斯大林却把这些文件交了出去！

我们一时失去了一位显示他与我们亲近并用具体行动加以证实的人，高岗向我们通报了我国领导层的情况及其对苏联的态度。这一点非常可贵。斯大林非但不支持他，反而将他出卖。我以为斯大林之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以下几个理由。斯大林是一个不相信任何人的。他连自己都不相信。他认为，我们收到的那些秘密情报正是高岗所传递的这一事实，毛泽东迟早会知道。那样一来斯大林就会陷入微妙的处境：仿佛是他挑动人们反对北京政府。因此斯大林便借此机会表明他完全信赖毛泽东，并因而不愿意从一个反对中国领导的人那里获取情报。虽然高岗本人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们他对毛泽东的看法，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他的看法并不是什么秘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的几位在中国的人报告了某一个城市举

行青年联欢晚会的情况。参加晚会的人酒喝多了，青年人开始对我们说些含有敌意和挑衅的话：“把你们那个姓高的弄到你们那儿去吧，他是你们的人，不是我们的人。”这件事还是发生在他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时候。可见高岗早在那时就已经处在某种被孤立状态了，他违反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苏政策的行动，那边都知道了。这一情况也应当加以考虑。或许斯大林在出卖高岗的时候认为他反正已经被揭露了。这是我得出的结论。我并没有亲自从斯大林那里听到这种议论。但任何其他理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斯大林居然把上面提到的文件移交给了毛泽东。坦率地说，我们这些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对斯大林的做法感到愤慨。<sup>①</sup>

---

<sup>①</sup> 笔者注：摘引自《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中《毛泽东》和《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

## 第四章

# 金日成只做不说，李承晚只说不做

### 1. 斯大林逼着金日成去北京

毛泽东是1950年2月17日离开莫斯科的，他登上专列时还以为金日成要进攻南朝鲜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他和斯大林都不同意金日成打，这仗就绝对不可能打起来。

毛泽东前脚刚走，斯大林与金日成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电报往来，几番谈金日成赴苏联的具体行程。

4月8日早上，金日成乘专列秘密离开平壤，在莫斯科一待就是十几天。于4月10—25日期间，和斯大林举行了3次密谈，一次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办公室，其余两次是在斯大林乡间的孔策沃别墅。

这种极端机密的会谈没有留下任何官方档案，连苏联人自己也没有，因为斯大林不允许记录。

唯一的消息来自文日。

文日是金日成的翻译，随金日成密访了莫斯科。后来文日在大清洗时冒死逃到了苏联。

20世纪80年代，他写了一本回忆录，披露了许多高层内幕。

根据文日回忆，在这几次斯大林和金日成，以及陪同金日成访苏的外务相兼次帅朴宪永密谈的过程中，斯大林首先考虑的是：如果北

朝鲜发动战争，美国会不会干预？如果美国干预，金日成准备如何应对？

在1949年的时候，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如果美国干涉，打过“三八线”，金日成顶不住，苏联又不能袖手旁观，这就必然会在东北亚引起美国和苏联的正面冲突。那样一来，后果就太严重了，所以他就一直捂着金日成的脑袋，不准他乱动。

而现在，随着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讲话，国际形势已经有了重大变化。

其实把台湾和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军防御圈之外的内容，早在1949年3月麦克阿瑟在东京的一次讲话中就提到过，原本算不得什么秘密。重要的是苏联人相信那就是天大的事，不相信那就什么事也没有。

后来通过解密档案才知道，最终使斯大林相信的关键之点在于苏联人截获了麦克阿瑟给国防部的电报，而且破译了。

麦克阿瑟的态度是：如果朝鲜南北双方发生战争，美国根本用不着干预，只需守住日本海就行了。

这就是战后美国设定的远东防御线的来由。

看到这份情报，斯大林心里顿时有底了。

但他还是问金日成：“你有什么把握取得胜利？”

金日成大包大揽地说：“第一，我这次发动的是快速闪电战，美国人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第二，朴宪永同志在南朝鲜有20万劳动党党员，我们这边一开枪，南朝鲜那边马上就起义，4天之内，我保证解决战斗。美国人正忙着调兵遣将，我这里已经占领了汉城，他怎么可能干预？斯大林同志您放心，今年8月15日的朝鲜解放纪念日，我决定在汉城举行盛大阅兵式。”

关于这点，在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印证。

“1949年底，我从乌克兰返回莫斯科，金日成率团来访，拜见了斯大林并签订了协议，金日成曾言，最初的设想是通过南方内乱，靠人民的力量来推翻南方政权，然后再出兵统一朝鲜。”对于美国介入的问题，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说：“我们相信如果战争速战速决——当时也相信金日成能够做到——就能避免美国的介入。”

金日成话音一落，曾在汉城创建朝鲜劳动党并担任党魁的朴宪永马上说：“斯大林同志，人数多达20万的南劳党员已经准备好在北方



发出第一个信号时起义，南方人民一直盼望着土地改革和其他在北方已经实行的民主改革。”

斯大林当然不会相信金日成和朴宪永的保证，对什么人民盼望之类的套话更是不屑一顾。

深谙治国之道的斯大林饶有深意地对金日成和朴宪永讲了拉伯雷《巨人传》中羊群的故事。

他说：“人民和羊群一样，他们只知道埋着脑袋跟着头羊往前走，不论头羊走到哪里。即便前面是悬崖，他们也会无怨无悔地跟着自己的头羊跳下去。”

其实，朝鲜所处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加懂得在东亚地区采取如此重大的举措，是无论如何也必须得到毛泽东支持才有可能成功的。

于是，在斯大林对自己的意向已经表示赞同的情况下，为了彻底打消斯大林的顾虑，以取得对方在自己发动战争问题上的绝对支持，金日成便谎称中共完全支持他采取军事行动。

他对斯大林说：“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很明确，他委托金一转告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他们正是这样做，才取得了成功。他还在电报中对我说，用和平的方式是不能统一朝鲜的，统一朝鲜必须要用武力才行。”

金日成说的是1949年4月金一与毛泽东在双清别墅会谈的情况。

实际上，毛泽东给金一说得很清楚，他的前提是，一、朝鲜的统一必须等到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之后；二、只有李承晚首先发起进攻，金日成才可以反击。

金日成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却有意含糊其词，寻章摘句，只拣对自己有利的话来说。以此表明，毛泽东已经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表态，肯定会在他即将发动的战争中全力支持他。

斯大林为什么一面背着毛泽东与金日成策划统一朝鲜的战争，一面却又坚持金日成必须要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呢？

这是因为斯大林不能不顾及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刚刚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根据约定，签约双方任何一方进入战争状态，另一方都应以有效的援助。朝鲜战争虽然并不一定会直接导致苏联进入战争状态，但是，苏联作为朝鲜战争的主要策划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不能不



承担可能会出现重大风险。

何况，朝鲜战争的任何不测，都势必给只有一江之隔的中国带来巨大麻烦。斯大林当然不能自行其是，而把自己的同盟者完全晾在一边。

斯大林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向中国交代这件事，因为当时毛泽东被蒙在了鼓里，对即将发动的朝鲜战争一点儿也不知道。他知道毛泽东一旦得知金日成要抢在解放台湾之前开战，心里一定会很不愉快。但是，这事又无论如何不能不告诉毛泽东，中苏刚签了友好同盟条约，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瞒着毛泽东干？

想来想去，斯大林对金日成说：“你一定要尽快到中国去一趟，这件事，由你来亲自告诉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是个革命专家，东方的事情，他比我更清楚。再说，我们在‘三八线’的划定上和美国人有关协定，战争一旦打起来，苏联红军是绝对不可能出兵帮忙的，但是中国人不受这个制约，到时候真正能够帮助你们的，只有毛泽东同志。所以，你要多向他请教，先去听听他的意见。”

金日成虽然满心不悦，也只能“哼哼哈哈”地先答应下来再说。

接下来他们所谈的第三个问题，是苏联为朝鲜人民军提供武器装备。这个问题相当简单，并且在当年的4、5月份，朝鲜人民军就基本上完成了换装。

金日成口头答应去告诉毛泽东，心底却一万个不愿意。

其一，他认为只要有苏联老大哥的帮助就足以大功告成，哪儿还需要中国介入？

其二，从历史上讲，朝鲜人跟中国各民族建立的政权之间，既发生过数次战争，也曾长期成为中国的藩属国。直到甲午战争中国被日本打败，日本才取代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所以，朝鲜和中国在历史上存在许多疙疙瘩瘩的事情，在许多历史问题的认知上也存在着严重分歧甚至对立。他担心中国势力一旦进入朝鲜，会影响以后对这些问题的解决。

就因为这样的原因，回到平壤后，他就老拖着不去北京。

斯大林生气了，索性采取了一个逼金赴华的手段。

5月3日，他给毛泽东去了一封电报，说，“前不久金日成同志到莫斯科来了，我和他谈了一些问题。具体谈了些什么，金日成同志很快会到北京，当面向您汇报”。

12日，他又给什特科夫去了一封电报，说我不是让金日成到北京去吗，他怎么还没动静？

什特科夫回电说，我已经把你的意见转告金日成了，他说不用去北京，他用不着中国人的帮助。

斯大林再次给金日成发电报，催促他尽快去北京。

在莫斯科的再三催促下，金日成没办法再拖了。

5月13日，他和朴宪永登上了什特科夫安排的专机，飞到北京去见毛泽东。

专机一起飞，什特科夫立即电告莫斯科：

发自平壤

致维辛斯基：

5月12日，我应金日成请求与他和朴宪永会见。

金日成通知我，他们打算同毛泽东大体讨论下列问题：

1.通报他们以武力统一国家的意图和在莫斯科会谈此问题的结果。

2.就签订朝中贸易条约问题交换意见。他想建议在近期内签订贸易条约，而友好条约待全国统一后再签订。

.....

随后，金日成请我提建议，在帮助预定的作战行动方面，他应向毛泽东提出什么问题。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是让他更明确地说明，他缺少什么，中国人能给予他什么样的帮助。

这时金日成回答说，他不再向毛泽东要求援助了，因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他在那里得到了所需要的足够的援助。

5月13日，当地时间5时20分，金日成和朴宪永飞赴北京。

什特科夫

1950年5月12日<sup>①</sup>

金日成很不情愿地飞到北京，当天夜里就和毛泽东举行会谈。

<sup>①</sup>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之《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访华致维辛斯基电》。

一开口，就谈崩了。

金日成说，毛泽东同志，我最近去了一趟莫斯科，斯大林同志已经同意我们的作战计划了，我们马上就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毛泽东吃了一惊，说不对呀，我也刚从莫斯科回来，斯大林根本就没跟我说起有这回事儿啊？金日成说：我知道，我知道，我是在你离开莫斯科以后才去的，所以斯大林同志没有来得及和你谈到这件事。毛泽东脸色一沉，气愤地说：既然如此，那我们今天就没必要谈了，等先把情况弄清楚，再接着谈。

当天夜里11点30分，周恩来紧急赶往苏联大使馆，告诉罗申，金日成来了，刚才在会上说了什么什么话。

接着说道：“毛泽东同志让我来向你核实一下，你现在立即给斯大林同志发个电报，问他是否已经同意金日成同志向南朝鲜发起进攻？如果属实，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事前不向中国方面通通气？你马上发，我在这里坐等斯大林同志的回电。”

罗申马上把电报发到了莫斯科。

电报说：“今天，5月13日晚23时30分，周恩来到我处，并根据毛泽东委托转告以下事项：一、金日成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朴宪永今天5月13日来北京。二、今晚毛泽东同志会见了他们一行。在与毛泽东同志的交谈中，朝鲜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是，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本人讨论。关于上述情况，毛泽东同志想要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说明。”电报最后说：“中国同志请求迅速回电。”<sup>①</sup>

显然，鉴于金日成所说情况事关重大，而且斯大林不久前还明确表示反对主动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毛泽东心有疑惑，故而必须要求斯大林亲自给以明确证实。

14日晨，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转发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

苏联大使：  
转呈毛泽东

<sup>①</sup>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之《罗申关于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谈情况的电报》。

毛泽东同志：

在与朝鲜同志的会谈中，菲利波夫同志和他的朋友们提出，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民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

同时补充一点，这个问题最终必须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

会谈详情可由朝鲜同志向你转述。

菲利波夫

请将执行情况电告

维辛斯基（签名）

1950年5月14日<sup>①</sup>

斯大林“咚”的一脚，把球从莫斯科踢给了北京城里的毛泽东。而且在看似平和的话语之中，分明透着莫斯科的强硬态度。

面对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共同作出的决定，毛泽东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出发，不得不表示，同意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统一问题。

15号再次与金日成会谈时，毛泽东的态度就大变了。

他解释说：“金日成同志啊，不是我不支持你，我们走的不也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吗，你现在决定走的路，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统一现在还留着几根尾巴，台湾、新疆、西藏，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接着，毛泽东向金日成介绍了当时中国的军力部署：“我们4个野战军，一野准备进军新疆，二野准备进军西藏和西南剿匪，三野16个军在福建，厉兵秣马准备打台湾，四野作为全军的总预备队，部署在河南至广东一线。现在黄河以北，甚至长江以北地区，没有一支野战军部队。特别是东北，本来留了两个师，也都让你们拿走了。剩下个42军，早已开进北大荒，全军改行办农场，种庄稼去了。现在整个东北，只有几个担任地方警备任务的公安师。”

在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并不讳言原来打算解放台湾后，再帮助朝鲜解放南方；但现在既然斯大林已决定先解决朝鲜问题，他也没有意见。

<sup>①</sup>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之《斯大林关于同意朝鲜同志建议致毛泽东电》。

接着，金日成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进攻计划。

毛泽东一边听，一边提醒金日成说：“作战要有充分准备，兵贵神速，要包围主要城市，但不能为占领它而耽误时间。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不过他也担心美国会驱使日本军队直接干预，郑重地向金日成承诺：“如果日军介入，战争进程将延长。假如美军直接介入，由于苏联与美国有‘三八线’协议限制，不便出兵。但中国不受‘三八线’限制，我们可以出兵帮助你们。”

金日成认为日本介入可能性不大，美国出兵更不可能。

毛泽东说：“我们不是美帝的参谋长，做不了它的主，不过准备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3个军，如果美帝不干涉也没妨碍。如干涉，不过‘三八线’则罢，只要他敢过‘三八线’，我们就一定打过去，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现在既然你已经和斯大林同志商量好了，那你就先动手打，你要打得顺利，就用不着我们帮忙了；要是打得不顺，我们再接着帮你打。另外，你考虑一下，你还需不需要中国为你提供什么帮助？彼此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好战友，你们的事，我们会当成自己的事来办的。”

金日成胸有成竹地说：“谢谢毛泽东同志的好意，不过，我现在需要的一切，斯大林同志已经全给我了。”

在金日成这样的态度面前，毛泽东的尴尬是可以想象的。

在金日成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答应给予全部必要的援助，他此番来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泽东对发动战争的认可。

因此，会谈刚刚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在会谈的所有问题上，我与毛泽东同志都已经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那时候，金日成已经在“三八线”北侧部署了7个步兵师，另外还部署了150辆T-34坦克，大量重型火炮，180架高性能雅克战斗机。

他觉得对付李承晚缺乏重武器的军队，已经绰绰有余了。

第二天，金日成走了。

5月16日离开北京，到6月25日发动战争，在长达40天的时间里，金日成再也没有向中国方面通报过任何一点情况。

所以，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知不知道朝鲜战争会爆发？



知道。

支不支持？

支持。

但什么时候爆发？这场战争具体怎么打？中国一点也不知道。

这当然不是金日成的疏忽大意，而分明是有意对中国进行封锁。连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毛泽东还是从法国报纸上看到的，这让他十分生气。

所以，从朝鲜战争爆发后接下来的6月25、26、27日长达3天时间里，《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没有中国政府的官方态度，更见不到支持朝鲜政府行动的只言片语。只有新华社零零星星转发一点来自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息，顶多表示中国人对这个事儿，多少有一些关注罢了。

但是，由于美国人错误地把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发起的这场大规模的攻击行动，判断为共产党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总体进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美国政府的反应迅速而且强烈。

更令人惊讶的是美国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派遣第7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也就是说，“三八线”上炮声一响，杜鲁门首先把中国，而不是把正在向南朝鲜大举进攻的北朝鲜军队摆在了美国的对立面。

对此，勃然大怒的毛泽东立刻做出了激烈的回应！

现有的档案已经清楚表明，对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除了进行新闻报道以外，中国政府在最初几天并没有发表正式的宣言或者声明。而对于美国决定在台湾海峡采取武装行动，中国则毫不犹豫地提出了严正抗议。

新中国领导人的反应迅即而猛烈，27日毛泽东的讲话，28日周恩来的声明，29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随后的各民主党派排炮似的声明和全国各地大规模的人民群众的示威游行，全部都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在了美国在台湾海峡采取的军事行动上。直到7月中旬，全国的抗议活动都是把台湾问题摆在了朝鲜问题之前。

当毛泽东愤怒地指责美国撕毁了《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时，的确表明了他心中对美国的极度怨恨。

自国共内战开始以来，美国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中国内政不干

预的立场。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为了分离中苏，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过去4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打算动用其武装力量干涉台湾目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走一条导致其介入中国内部冲突的道路。美国同样不会给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出谋划策。”

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又表态把台湾划出美国的防御圈，甚至还居心叵测地说：“没人能保证它不受军事攻击。”

这样的表态，其实就是在主动向毛泽东暗送秋波，甚至怂恿北京去打台湾。以此告诉中国人，美国想同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修好。

同样，中共虽然宣布了“一边倒”的大政方针，并且已经与苏联结成了政治同盟，但并没有完全断绝与西方国家的联系，也没有存心针对美国，采取任何特殊的外交行动。即使仅从保持新政权的稳定，以及在国际环境中的主动地位出发，毛泽东也需要保留与美国人周旋的外交余地。

而现在，美国领导人信誓旦旦的公开讲话，转眼之间便不算数了。

尤其是美国在台湾海峡的蛮横霸道行动，毁灭了毛泽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夙愿，使解放台湾的计划功败垂成！

对于毛泽东来说，解放台湾是他前半生可以为中国做的一件大事；而美国对台湾的行动，在他看来就等同于对中国宣战。这不仅是因为第7舰队的入侵在军事上阻碍了解放台湾的战役，更严重的是恼羞成怒的美国人此刻突然抛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意味着从法律上剥夺了中国统一台湾的合法性！

毛泽东的确被激怒了，崇尚“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本性中的革命激情和战斗精神，再次被杜鲁门强烈地激发了出来。

诚然，正如西方学者在分析中国出兵的原因时指出的，“美国人低估了他们向鸭绿江挺进时中国感受到威胁的程度，但美国政府更应该想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仇恨和接受挑战的决心早在杜鲁门宣布对台新政策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

的确如此，从美军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的那一刻起，在毛泽东心中，与美国人的战争就已经打响了。



## 2. 黎明被炮声撕成碎片

1950年6月1日下午，杜鲁门在白宫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信心满满地宣称：“我相信今后5年之内不会有爆发战争的危机，现在的世界，比过去5年更加和平。”

杜鲁门所说的世界，想必应当包括远在8000里之外的朝鲜半岛。

但他错了，仅仅过了24天，那块狭长的半岛上，就突然响起了震天动地的枪炮声！

1950年2月14日，随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金日成认为武力统一全国的时机已经到来。于是，随着他一声令下，8万人民军迫不及待地一脚踢开了“三八线”上的路障，势如破竹地杀入了朝鲜南方。

在此之前，美国军事顾问团通过驻韩大使馆，将韩国国防部情报局提供的关于北朝鲜部队的加强，和南下危机的情况传到了东京麦克阿瑟元帅的美军司令部，再报到华盛顿。

麦帅司令部的情报部长切尔西·威罗比少将回忆，从1950年1月到6月，这种情报已经有417次之多，听得他的耳朵都快长出老茧了，金日成的军队除了频繁的小打小闹外，从未采取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所有这些报告都被冠以“不远的将来”，或“今年春夏之间”等定语来形容大战即将来临。

一个基本的常识是：当双方军事力量失衡时就容易引发战争。

对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金日成来说，只要获得斯大林的支持，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就已经畅通无阻，需要的只是确认和实施具体的作战计划罢了。

根据人民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长俞成哲（后逃往莫斯科）的回忆：“5月上旬苏联大量调换了在朝鲜人民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用作战参谋替换了负责军事训练的教官，并且为朝鲜军队制定了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

整个北朝鲜方面的进攻计划，现在都已经披露出来了。

仅仅只需1950年5月30日什特科夫大使发给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转呈斯大林的一封电报，我们便能够清楚地看到，苏联人在朝



鲜战争中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密码电报 绝密 禁止复印 特档

致维辛斯基（转呈上级）：

5月29日，根据金日成的请求，我与他进行了会晤。在会晤开始时金日成通报说，他在莫斯科期间要求的那些武器和弹药已经基本上运达了。武器已经被分运给重新组建的那些师，在6月1日前将全部发到士兵手中。接着金日成继续通报说，他已经到这些重新组建的师里去过，考察了他们的军事训练进程，并认为，到6月底这些师将具备战斗能力。

金日成说，根据他的委托，总参谋长已经结束了关于进攻的原则性决定的研究工作。总参谋长已经将这个决定的提纲报告给他和顾问拉祖瓦耶夫将军。他赞成采取的决定和选定的在进攻时主要打击的方向。他请求我与他、总参谋长和顾问拉祖瓦耶夫将军一起会面，共同审阅这个决定。我回避了这样共同的会晤，并借口说，我要到拉祖瓦耶夫将军那里了解一下这个决定。

金日成还指出，他们的步兵已经准备参加战斗行动。10个步兵师中有7个师已经准备好参加进攻行动。一个坦克旅和一个摩托化团也都准备就绪。

接着他指出，南方人完全没有掌握关于人民军状况及其战斗准备情况的资料。但是，他们目前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自己的部队，虽然南朝鲜的部队中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考虑到人民军已经做好了参加战斗行动的准备，他希望在6月底开始针对南方的军事行动。继续拖延军事行动的开始对北方人是没有好处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南方人将会发现他们的计划并采取措施加强自己的军队。第二，7月份将有暴风雨天气，到那时就不得不将进攻行动推迟到9月份，而这是非常不理想的。

接着金日成指出，根据总参谋长的报告，他需要16天的时间集结部队。这样一来，他们应该在6月8日至10日开始调集部队。

附注：

在就这些问题与金日成进行会谈之后，我召见了顾问拉祖瓦耶夫将军和波斯特尼科夫将军，了解他们对朝鲜军队准备工作的程度

和6月底开始战斗行动的可行性的看法。拉祖瓦耶夫将军和波斯特尼科夫将军认为，集结部队和与师、团指挥员详细研究作战行动需要很多时间，因此，7月份开始进攻行动是合适的。但是，考虑到7月份将有暴风雨天气，以及南方人将会发现北方人的战斗准备计划，并开始加强自己的队伍，他们更倾向于，人民军能够结束部队的准备工作，并于6月底开始军事行动。

我的意见：

由于金日成打算在6月底开始军事行动，并且在此之前部队的准备工作也可以完成，因此，我们可以同意这个期限。

我请求就所触及的问题尽快下达指示。

什特科夫

1950年3月30日<sup>①</sup>

在发起突然攻击之前，金日成向南方展现的却是一浪高过一浪，温情脉脉的和平攻势。

6月7日，平壤广播电台播报了即将召开南北和平统一代表大会的消息，北朝鲜向韩国抛出了橄榄枝，还提出用被北方逮捕的狂热鼓吹民族主义、推动朝鲜独立运动的曹晚植一家三口，交换被南方逮捕的南方劳动党领导人、指挥游击作战的负责人金三龙、李西河的方案。

可是，让金日成很没面子的是，他派到汉城去和李承晚的官员谈判的3名代表，居然集体向韩国方面提出了政治避难，堕落为“共和国最可恶的叛徒”，而且向韩国人揭发人民军的全面攻击即将开始。

但是，韩国人却认为这是金日成搞的“卑鄙的小伎俩”，把如此重要的情报当成了耳旁风。这是因为杜鲁门于6月10日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共产主义阵营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而发表了声明，称“美国不会孤立自己”“将建立自由世界同盟”。

也就是说，美国近期发出的信号是：包括北朝鲜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对任何自由世界阵营国家的攻击行为，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挑衅。因此一度认为被美国人抛弃而痛哭流涕的大韩民国从上到下全体欢呼雀跃，以为自己这下终于成为了美国的盟友，国家安全从此得到

<sup>①</sup>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之《什特科夫关于朝鲜进攻日期致维辛斯基转斯大林电》。

了有力的保障，因为有强大得天下无敌的美国人罩着，人人有了金刚不坏之身，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此刻与李承晚一样喜得老泪纵横的，还有台湾的蒋介石。

因为朝鲜战争改变了美国人既定的“弃台政策”，本已奄奄一息的蒋介石，就像被打了鸡血，突然之间起死回生，亢奋起来。

6月19日，在汉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顾问杜勒斯在南朝鲜国会议事厅发表演讲，称：“如果北朝鲜主动向‘三八线’以南发起进攻，美国将在物质和道义上援助韩国。”

小小的北朝鲜难道有胆量在进攻大韩民国后同美国人直接交战吗——除非金日成是个疯子！

不仅李承晚和他的总理兼国防部长申性模、参谋总长蔡秉德不相信，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韩国普通百姓，也都不敢相信金日成在这个时候会不顾死活地发动一场战争。

而北朝鲜这边即使派往汉城的谈判代表集体叛逃，可是关于政治犯的交换和南北举行和平谈判的呼声依然不断。

而且在美国总统顾问达莱斯访问汉城的6月17日至20日期间，平壤广播电台愈发将和平之声高唱入云。到了战争爆发的前三天，仍然在起劲地向李承晚摇晃橄榄枝。

金日成的自尊心非常强烈，最早的进攻计划是由朝鲜人民军作战部独立完成的，然后再由朝鲜人民军作战部部长俞成哲把计划送给苏军顾问团征求意见。

苏军顾问们一看，嗨，你们这哪儿是打仗？简直是胡来蛮干！什么步炮协同，工兵使用，后勤配置，全然不懂。拉祖瓦耶夫总顾问说，还是我们来吧，把朝鲜人的计划一把火烧了。所以，朝鲜最初的进攻计划完全是由苏联顾问团一手炮制，经莫斯科总参谋部审核通过的。

该计划的名称叫“反攻”，假想的仍然是遵照斯大林的思路：南朝鲜军队首先挑衅，北朝鲜人民军再发起反攻，然后直捣汉城、釜山，把李承晚的部队赶下太平洋，统一朝鲜全境。

善于大兵团作战的苏联人制订的进攻计划相当精密细致。6月25日凌晨4时，突然炮击40分钟，到4时40分炮火延伸后，坦克纵队立即快速冲过“三八线”，后面紧跟着或坐在苏制大卡车上或徒步行



军的步兵师，各自从什么地点穿插、突破，都有严格详细的规定和要求。

北朝鲜军队最初投入进攻的部队有7个师和3个独立分队，约8万人，主力自然是从林彪的四野归国的3个饱经战火锤炼，英勇善战的朝鲜师。

除此之外，还有总人数23000人的3个后备师，另有大约18000人的边境保安部队。

他们分成6个密集的纵队，沿着与“三八线”平行的边界向南方发起勇猛攻击，然后用最快的速度向前平推。

面对他们的是5个兵员不足的韩国师和1个团，只有38000人，而且这些人并不都在前线。

南朝鲜军队总共有8个兵员不足的战斗师，65000名官兵，而在指挥和后勤部门工作的就有33000人，由于没有人事前预料到这场进攻会突然爆发，许多南朝鲜官兵都离开营房度周末去了。

北朝鲜人数上占绝对优势，在战线上他们集中兵力，在一些关键作战地点其优势为5或6比1。北朝鲜人拥有的大炮是韩国人的3倍，并且几乎所有的大炮都比韩国人的大炮射程远。北朝鲜人可以站在反击炮火达不到的地方，随心所欲地轰击韩国人的阵地。

数量和炮火上的优势对于北朝鲜人来说并不是决定性因素，他们还拥有一种重要的打击力量，那就是苏联人提供给他们们的150辆T-34型坦克。

这个数字现在放在一场国家层面的大战役中肯定会显得荒唐可笑。但是由于被美国装备起来的南朝鲜人没有任何阻挡坦克的武器——既没有一辆自己的坦克，也没有穿甲炮弹、作战飞机和反坦克地雷，所以这些重达32吨，装有厚厚钢板，外形轮廓低矮，携带有85毫米高速火炮的庞然大物，便形成了一种无坚不摧、无所不能的突击力量。

除此之外，金日成还有180架攻击力不俗的雅克战斗机。

朝鲜半岛西端的礼成江上，工兵已经架好了浮桥，两岸的开丰、延安地面上，已经集中了大多数俄国T-34坦克和半数的北朝鲜军队。这里将发起对汉城的主攻，攻势将会沿着议政府（地名）走廊——一条自古以来入侵汉城的路线展开。

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是古都开城。

人民军各部队遵照苏联顾问的命令，于6月24日24时进入出发位置。

老天爷帮了金日成的忙，这天午夜时分，一场时断时续的瓢泼大雨掩盖了大部队移动时必然会发出的声响。人民军的苏式122毫米榴弹炮、76毫米大炮和自行火炮已经在“三八线”北侧部署到位，漫长的军事分界线上万籁俱寂。

可是在“三八线”以北五六公里以外的地方，却传来一种轻微而神秘的隆隆之声，那是150辆苏制T-34坦克和8万人的战斗部队小心翼翼地向前运动，进入最后的攻击指定位置。

人民军的7个师成功地完成了向“三八线”边界开进的隐秘调动，与之相随而来的还有一个装甲旅、一个独立步兵团、一个摩托化团，以及边界保安旅——一支由苏联军官训练和督察的内务安全部队的精锐之师。这支特殊军队的任务，是尽快地以霹雳手段，肃清占领地区政治上的敌对分子，保证随大军进入南方的各级党的组织，建立起有效的国家管理机构。

8万名用作首次突击的军队现在已全部进入阵地，在他们身后的好几个隐蔽地点，还集结着2万名精锐的预备队。

行动发起前，各部队均宣读了由金日成亲自签发的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

命令指出：“南朝鲜军队首先侵犯了‘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忍无可忍，决定转入反攻。”

朝鲜人民军官兵以高涨的热情听取了关于最高领袖下达的“反攻”命令，官兵们血气愤张，决心将首先挑起军事进攻的南朝鲜军队彻底歼灭。

南韩军这一天所做的两件事情，让他们看上去完全不像要主动挑起战火的样子。

第一，和中国军队的成分大同小异，这个传统上以农业立国的新兴国家，其国防军士兵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来自于农村。因为时逢夏收，家中普遍缺少劳动力，所以国防部下令各部队主官，给家在农村的士兵放半个月的农忙假，让他们回家去帮着亲人收割稻谷。这就让他们部署在“三八线”南侧的5个原本就兵员不足的步兵师，差不多每座兵营里都唱起了空城计。



第二，这天晚上，汉城的高级军官们迎来了他们无不盼望的一个重要日子，汉城国防军司令部下属的军官俱乐部在一个叫明洞的地方隆重开业。受到邀请前来参加庆贺的嘉宾有包括美国驻大韩民国大使约翰·穆乔为首的几十位外交官，和50多位韩国高级将领、美军顾问以及他们的夫人、女友在聚会，包括代理国家总理兼国防部长申性模将军和身体肥壮得像个日本相扑运动员的韩军参谋总长蔡秉德将军。有的在轻音乐的伴奏下跳舞，有的端着威士忌叼着美国香烟，不时发出阵阵欢声笑语，俱乐部里充满热烈和欢快的气氛。人人都在醉醺醺地跳舞、喝酒、开怀大笑，连刚刚经人介绍认识的人彼此看上去也都像久别重逢的亲密好友。所有人都在欢度一个灯红酒绿、寻欢作乐之夜，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考虑浴血沙场的事。

晚上10点，惊雷火闪，下起了雷阵雨，军官俱乐部的晚会结束。乐队开始收拾东西了，大门口挤满了接送的车辆，告别声此起彼伏，不一会安静了下来，俱乐部里的沙发上，还七歪八斜地躺着几个喝醉了的军官。

未能尽兴的美韩军官们大部分又打着伞，来到明洞的另一家酒吧，继续他们的狂欢之夜。

参谋总长蔡秉德也在其间。

直到凌晨两点，喝得酩酊大醉的蔡秉德才被副官罗最光中尉和警卫员送回家中睡觉。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极不寻常的周末之夜，在隔着对马海峡的日本，在即将到来的朝鲜战争中粉墨登场扮演主要角色的重要人物也都在聚会。

麦克阿瑟从心底憎恶社交场所，他更喜欢埋头于军务而往返于住所（美国大使馆）和司令部（第一生命保险大厦）之间，只有星期六会早点下班（晚上8点过后）。和夫人、孩子一起看场电影，是难得的每周家庭聚会，这个周末仍然是这样，参加聚会的还有儿子阿萨的家庭教师菲利斯·吉波斯夫人。

另一名后来成为朝鲜战场上要角的迪安少将，参加的是一场真正的晚会。

晚会在小仓市第24师的军官俱乐部里举行，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化妆舞会。迪安夫妇穿的是韩国地主的服饰。

迪安少将是1947年10月作为军政长官被派往韩国，大韩民国成

立后出任第7师师长并驻扎在日本札幌，后任第8军参谋长，去年10月改任第24师师长，与部队驻扎在小仓。

迪安少将在不久后的大田一战中成为金日成手中最高级别的“联合国军”俘虏，不知和他开战之前身穿被北朝鲜政府严厉镇压的地主服装，是否有一点联系？

战后被释放回国的迪安将军回忆说：“当时根本没想过会和韩国有什么联系，虽然身着朝鲜地主的服饰，但脑子里一点朝鲜的事情都没有去想，只记得那顶又高又硬的地主帽子，戴在头上很不舒服。”

其实，就在这个周末的晚上8时整，平壤广播电台播报了一条消息：“25日中午有重要新闻播放，请大家准时收听！”

韩国方面居然对北朝鲜军队的大规模行动一无所知，也没有人去认真回味，平壤广播电台播放的那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消息里，究竟深藏着什么样的含义。

预定的进攻时间一到，金日成气吞山河，令旗一挥，进攻口令“暴风”立即在“三八线”上频频响起。

随后，装甲部队与步兵迅速越过“三八线”，向着南方呼啸而来。

### 3. 愤怒的牛仔

北朝鲜的进攻部队分为两个军团，第1军团军团长金雄和第2军团军团长武亨。

原四野的部队确实名不虚传，一路前进，所向披靡。

方虎山的第6师更是一枝独秀，他的任务是在西线夺取“三八线”以南的瓮津半岛和以盛产高丽参闻名的古都开城，这里驻扎有韩国国防军的精锐部队——年轻英俊的白善焯将军指挥的第1师。同时，原来与南韩军对峙的两个边境警备旅也由方虎山统一指挥。

方虎山是朝鲜人民军中最出色的战术家之一，其变幻莫测的计谋、神出鬼没的机动、出其不意的攻击、坚强灵活的防御，都令他的敌人赞叹不已。

这一纯熟的战术思想和行动，都是在四野参加许多战斗后得出的



经验，在朝鲜战争中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获得如此之多的赞誉：日本军事评论家曾把他比作忍者传说中可以操纵雾的高手——山之幻梦、雾之刺客；中国军史中称其为虎将；美国人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他们用了许多词汇来描述和方虎山之间的一次又一次的较量，只要接触到朝鲜战争，没有人可以忘记幽灵之师、河东陷阱、流血之谷、血染岭、伤心岭……

方虎山打仗的狠和巧，在中国东北时便有所展现。

他的部下也是虎狼之师，其威力早在1946年就在东北的中共队伍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1946年春节，通化战俘营的日本战犯在国民党特务的挑动下发生暴乱。方虎山领导下的朝鲜义勇军3个大队立刻奉命前往镇压，两小时内平定局势，当场打死500余人，活捉3000人以上。

这3000多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鬼子兵，尝到了当初他们施加在中国人头上的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滋味。

等到开春河水解冻后，浑江里的鱼又肥又大。老百姓都不吃，说这鱼是吃日本人的肉长大的。

这就是著名的“通化平叛”。

由于瓮津半岛与韩国当时的本土没有陆地边境，补给困难，因此在韩国国防部制订的防御计划中，一旦人民军发动全面进攻，瓮津半岛就应该暂时放弃。所以在遭到方虎山麾下的第6师第14团和第3警备旅突然进攻后，南韩守军很快放弃了抵抗，在海军登陆舰的协助下主动撤离。

在开城一线，由于可以俯瞰全城的制高点松岳山在人民军手中，方虎山获得了居高临下的优势。

协同方虎山第6师作战的雅克战斗机起了很大的作用，方虎山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十几架雅克战斗机像大鸟一样在机场上空飞来窜去，用炸弹和机关枪对付守卫机场的南韩军，很快便击中了一个汽油库，并且击毁了一架刚刚着陆的美制C-54飞机。

应该说，凭方虎山手中的一个师和一个警备旅，即使正面进攻，白善焯的第1师也是顶不住的。

不过，这不是方虎山的思维方式，他一向认为，斗智不斗勇，出其不意，才会获得更大的成果。

进攻发起之前的两个小时，就在离开城几公里的地方，人民军的



铁道兵神不知鬼不觉地重新铺设他们在很久以前拆毁的一条铁路的路轨。步兵们开始登上一列加长的闷罐列车，准备对开城发动一次精心组织的，令人匪夷所思的奇袭。

后来的战斗过程如下：

开战命令下达大约15分钟后，方虎山麾下至少3000名全副武装的精锐士兵便突然出现在开城市中心的火车站，成功地对毫无防备的南韩军队来了一记“黑虎掏心”，打得韩国守军如鸟兽散。

在开城东北方宿舍里的美军顾问达利格上尉突然被“隆隆”的炮声惊醒，沉闷的很钝的声音和着雨水敲击玻璃的声音灌入耳朵，像是在打雷。

不一会儿，炮弹的呼啸声、步枪的射击声便开始刺激耳膜了。

达利格急忙喊醒睡在楼下的韩国勤务兵，可勤务兵吓得不敢上楼。达利格只得匆忙穿上衬衫，右手提着鞋，左手拿着上衣，跑下楼来，跳上了吉普车。

那一刻他听见枪炮声在松岳山方向响得十分激烈。

当吉普车冲进开城市区，在离火车站三四百米处时，达利格上尉猛地来了一个急刹车。

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车站里居然停着一列大约长30节车厢的火车，士兵正陆续下车向四面八方冲杀。

头上没有钢盔！

不是韩国兵！

有几个人民军士兵发现了美国军官的吉普车，用朝鲜话狂吼着向达利格上尉冲过来，并不断地向他射击。

达利格立即掉头驰向东南方，经板门店向临津江大桥逃去。

方虎山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大胆作战方案，使开城守军在遭到内外突然夹击的情况下溃不成军。

开城在上午9时30分被完全占领，逃出来的只有团长和两个保护他的连。

紧接着，第6师又趁热打铁，夺下了完好无损，颇具战略意义的临津江大桥。

3个小时后，好消息传到人民军前线总指挥部，南韩军慌乱溃逃，甚至连重要桥梁都来不及炸毁。武亭将军指挥的人民军第2军团



报告说所有团队都正在向前推进，毫不迟延，已在过去的3个小时中夺占了数处据点，向南推进了5至12公里。

什特科夫大使激动得有些失态，冲着踌躇满志的金日成大叫：“你的这些家伙们干得真棒，比我们苏联红军的摩托化部队还快！”

人民军的攻击完全出乎南韩军的意料。在瓮津、开城与汉城诸方向的守军虽然在突然袭击下几乎全都被打蒙了，但一旦回过神来，还是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而较有组织和效果的抵抗，则是在第一天12个小时以后才开始。

当人民军像“暴风”一样突破“三八线”时，防守春川的南韩军第6师7团团团长林富泽中校抢在第一时间把电话打到了参谋总长蔡秉德将军家里，称自己守卫的防线，遭到了人民军全面的炮击和进攻。

可偏偏蔡将军喝醉了酒，正在床上酣然大睡。

接电话的是同样刚刚睡下的副官罗最光，林团长要求直接向蔡秉德请示前线战况。

罗副官来到寝室门前，隔着门，就能听见声震屋瓦的鼾声。

蔡秉德两个小时刚刚结束晚会回家睡下。

罗副官告诉林富泽，现在是凌晨4点多钟，在这样的时候叫醒蔡总长，“你简直是在开玩笑！”

林富泽大骂罗副官，威胁再不马上去叫醒蔡总长，便要以“延误战机”罪把他告上军事法庭。吓得罗副官只好去叫醒蔡夫人白庆和，请她去唤醒蔡总长，转告林团长的报告。

蔡秉德从睡梦中被老婆唤醒，听了罗副官的转告，睡眼惺忪地“哼哼”两声，说那只不过是又一次普通的边境冲突罢了，便又合上了沉重的眼皮，扯起了鼾声。

这完全不能怪参谋总长“处变不惊，稳如泰山”，而实在是因为在这之前，“三八线”上的告急和冲突，以及北朝鲜入侵的报告，他听得太多太多，有时一天就有20起以上，已经有点像童话故事“狼来了”。

这次会不会又是一次“狼来了”呢？

直到两个小时以后，国防部总值班室的电话才彻底将蔡秉德的睡意打消。听取战情报告后，他马上用冷水淋头，驱散醉意后，命令全军立即进入紧急状态，火速召集作战、人事、军需局长开会。

当报警的电话铃声将安卧在东京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里的麦克阿瑟将军惊醒后，他拧开收音机，听到平壤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正以可以想见的那种咬牙切齿、怒发冲冠的神态向全世界宣布，在6月25日凌晨4时40分，南朝鲜傀儡政权的军队在整个“三八线”前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了卑鄙无耻的突然袭击。因此，“在此时刻，民主人民共和国的安全部队，正在对敌人发起凌厉的反击”。

麦克阿瑟的第一个反应是想抽一斗烟，可是，他还没有来得及点上火，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

他上前拿起话筒，听到的是他的参谋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平静的声音：“将军，我已接到6份关于‘三八线’发生了边界冲突的紧急报告。”

麦克阿瑟一时间呆住了——9年前的1941年12月8日凌晨3点40分，他同样是被紧急电话从睡梦中惊醒，并被告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地点是在菲律宾马尼拉的马尼拉大酒店。

就在麦克阿瑟心中泛起了一丝阴影时，阿尔蒙德问道：“有什么命令吗，将军？”

麦克阿瑟回答道：“谢谢你及时地告诉我这些情况，我马上到司令部来。”

穆乔向华盛顿的报告用词却完全不同。

美国大使向政府报告了金浦和汉城机场遭到猛烈的空袭，然后表明他的结论是：“北朝鲜军队从进攻的性质和发动的方式来看，已经构成了对大韩民国的全面进攻。”

不过，当麦克阿瑟稍后接到穆乔大使的电报后，也仍然满不在乎。

他在可以俯视天皇皇宫的号称东京第一大厦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嘴里叼着烟斗，对刚刚结束了对韩国，包括“三八线”的视察回到东京的杜勒斯说：“这大概只是一次武力侦察。如果华盛顿方面不阻挡我，对我来说，对付这点小事儿，不过是小菜一碟。”

但是，老谋深算的杜勒斯虽然对麦克阿瑟不无好感，但绝对不是他的粉丝，他不敢相信杰出的军事指挥能力与夸夸其谈同样名闻天下的将军当着他的面做出的承诺。

因为他刚刚沿着“三八线”从西向东地走了一遭，所见所闻，让他记忆犹新。据他了解到的最新情况，金日成的军队与李承晚的军队相比，可不太像是“小菜一碟”。

于是，他从麦克阿瑟的办公桌上拿过一张便笺，给华盛顿的迪安·艾奇逊国务卿，和分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写了一封短函，说：“袖手旁观大韩民国无端遭到武装攻击而垮台，将引发一连串灾难性的后果，甚至极有可能导致一场世界大战。”

上午9点50分，驻扎在日本九州小仓美军基地的第24师师长迪安少将在基地的教堂做礼拜。这时，他接到了传达室的通知，请他马上去一下。

迪安来到传达室，看见的是当天的值班军官。

“将军，汉城紧急报告！”

当值班军官向他报告人民军大举突破“三八线”的战况时，迪安惊出了一身冷汗。

但是，为了让心爱的妻子不那么害怕，他匆匆回到家里时，故意夸张地拥抱着妻子，给了她一个热烈的吻，然后微笑着说：“哦，亲爱的，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刚刚有人告诉我，好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一不小心爆发了！”

6月26日，金日成的军队发起进攻两天后，什特科夫有一个发给扎哈罗夫大将的战报，这个战报和苏军顾问团与总参谋部制订的进攻计划，简直是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致扎哈罗夫同志

谨此报告关于朝鲜人民军军事行动的准备与进程。

人民军在“三八线”地区的集中开始于6月12日，结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总参谋部的计划进行。各部队的调动组织严密，未发生意外。

敌军侦察大约已发现各部队的调动，但各部队的计划及行动开始时间均得以严格保密。

各师作战计划制订及地形侦察过程，均有苏联顾问参加。

战役全部准备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各部队均宣读了民族保卫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鲜军队侵犯“三八线”，挑起军事进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布了关于朝鲜人民军转入反攻的命令。

……

军事行动开始后头两天的情况表明了以下几点：

1. 敌人进行抵抗并在战斗中向南朝鲜领土纵深退却，未发现南朝鲜军队大批投降和被俘的情况。

2. 南朝鲜傀儡政权开始从纵深地区调出部队，企图阻止人民军推进。

3. 人民军发起进攻的第一天引起南方张惶失措。南朝鲜政权与美国大使亲自发表广播讲话，号召南朝鲜人民保持平静。南朝鲜军参谋部发布关于南朝鲜军取得胜利的虚假新闻。

什特科夫

1950年6月26日<sup>①</sup>

以上档案文献充分证明，苏联人直接参与了进攻南朝鲜军事行动的所有策划、准备和实施过程。只是为了避免引起美国的干预和遭到世界舆论的指责，斯大林采取了相当隐蔽的措施。

北朝鲜军队发起进攻两三个小时之后，已经接到太多噩耗的李承晚总统于26日凌晨3时急欲和盟军总司令通电话，可是麦克阿瑟的值班参谋要他晚些时候再打，因为“总司令正在熟睡之中”。

李承晚气愤地大吼起来：“美国公民正在韩国的土地上接连不断地死去，而你却让你的将军安心睡大觉！”

总统的奥地利籍夫人弗朗西斯科吓坏了，赶紧用手捂住话筒。

气得发抖的李承晚一把甩开夫人的手，对着话筒继续叫嚷：“我们人民正在被金日成的军队大批屠杀，你们居然不敢打扰一位美国将军的美梦！”

东京的值班参谋终于被韩国总统的这腔话打动了，这名中尉答应马上去叫醒总司令。

李承晚对麦克阿瑟毫不客气地指责道：“我们多次警告过你们，要是你的国家过去稍微多关心韩国一下，我们就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糟糕的地步。杜勒斯三天前亲口向我允诺美国绝不会抛弃韩国。可是，我最需要的时候，你们美国的军队在哪儿？将军阁下，目前为止，整个败仗都是因为你们美国人说话不算数造成的！现在，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向我们进攻，我已经听到了炮声，他们的坦克已经驰过了议政

<sup>①</sup>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之《什特科夫关于朝鲜战况致扎哈罗夫电》。



府，马上就要攻进汉城了！你是美国驻远东地区的最高军事统帅，拯救我多灾多难的大韩民国，是你不可推卸的责任！”

被李承晚劈头盖脸指责得已经有些紧张起来的麦克阿瑟立即答应马上送去10架野马式战斗机、36门105毫米口径的榴弹炮和35门150毫米口径的榴弹炮，以及许多专门用来对付坦克的火箭筒。

有了这样的结果，李承晚总算稍微放心了一些。

在打击骤然降临的最初阶段，韩国的政府官员和军队的表现实在太不专业。

上午10点钟，国防部突然得到一个消息，说是议政府以北十几公里的伊豆川，第7师向人民军发起了一次成功的反击，一举歼灭了1580名敌军，并摧毁了58辆坦克。司令部顿时一片欢腾，军官们奔走相告，人人喜形于色。

可是紧跟着传来的真实消息却是：按照捷报本应已被歼灭的人民军第3师的坦克群，已经冲进了议政府的大街上。

早上5点10分左右，一个自称“国防部朴上尉”的人找到了KBS（韩国广播局）值班播音员韦辰禄，要求他立即在电台上播放“北朝鲜军队已经越过‘三八线’，向大韩民国大举进攻”的消息。

韦辰禄拿到如此重大的新闻不敢播报，赶紧打电话请示广播局代局长闵鼎镐。闵鼎镐要求“朴上尉”拿出具有权威性的国防部详报来，否则不予播报，同时他赶紧来到国防部政训局，向局长李瑄根确认这个消息。

李告诉他：“是真的，开城已经失守了！”

听了李瑄根的话，闵鼎镐吓了一跳，赶忙命令广播局播出那条消息。但是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条消息在播出的时候被改成了“北朝鲜军队再次开始了进攻，但韩国军队正在英勇抗击之中，请大家万万不必紧张”。

语调措辞非常简短轻松，以至于不少已经背包提箱，扶老携幼开始出门逃难的汉城市民，随即放下下心来，又重新回到了家中。

然后，市民和军人开始安之若素地过星期天了。上映英国电影的首都剧院大门前挤满了观众，另有一万多人则涌往汉城体育场，观看第三届大学生足球赛决赛。电影开映没多久，首都剧院开始播报“军人立即归队”的通知。看电影的人中包括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李俊值少将和几名教官。

其中一位教官李元烨上尉晚年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回忆说：“电影放了一半的时候，听到了‘军人立即归队’这条命令，当时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反而觉得干扰了看电影的雅兴，心中有些不高兴，后来因为命令在不停地播着，才很不情愿地离开了电影院，回军校去了。”

下午，汉城体育场的第三届大学生足球赛决赛，高丽大学和东北大学带着1：1的平局进入了下半场的争夺。

突然，喇叭里开始反复播放“官兵立即归队”的通知。

几分钟后又宣布了“本场比赛中止，延期再赛，请大家退场”的通知，除此之外没有给出说明，观众们只得愤怒地离开了赛场。

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把电话打给了正在密苏里老家的农庄里度假的杜鲁门总统：“总统先生，有一个很糟糕的消息恐怕会影响你度假的雅兴：金日成像眼镜蛇一样发动了突然袭击，此刻已经越过了‘三八线’，正大举向南进攻。”

杜鲁门的反应不太像人们印象中的那位总是戴着博士帽，温文尔雅得像个大学教授似的美国总统，他用粗俗的语言破口大骂：“迪安，不管怎样，我们也要阻挡住金日成这个狗娘养的杂种！”

艾奇逊表示自己想的和总统完全一样，又说联合国安理会马上就要召开一次紧急会议。

杜鲁门要艾奇逊召集各部长和参谋长们，准备提出对策建议。

他对他的国务卿说：“我马上就赶回华盛顿。”

杜鲁门匆匆登上了飞往华盛顿的“总统一号”专机，两名随行人员仅仅晚到了几分钟，总统便将他们扔在了跑道上。

中国的毛泽东没有周末度假的概念。

这一天，在中南海处理完公务的毛泽东走出房间，在庭院里散步。

刚走几步，身后的卫士便告诉他，周恩来总理打来电话。

接完电话后，毛泽东陷入了沉思。

毛泽东和杜鲁门从电话里知道的是同一个消息：朝鲜战争爆发了。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天，正如斯大林早就预料到的，联合国安理会在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要求下召开，并顺利通过决议，认定北



朝鲜军队首先对大韩民国发起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要求金日成立即将军队撤回“三八线”以北。

奇怪的是，如此重要的会议，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雅各布·马立克竟然缺席了？

这天下午，电台广播中断正常节目，报告了北朝鲜军队入侵大韩民国的消息。许多美国听众想起了偷袭珍珠港那个星期天中断正常节目的情景，深信苏联在幕后支持了这次大规模的攻击行动。

根据6个月前的一次盖洛普民意调查，75%的美国人认为苏联人正在谋取“统治全世界的权力”。

美国总统就像一个被对手激怒的西部牛仔，杜鲁门随之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到广播电台对美国人民宣称：“如果允许共产党人以武力进犯大韩民国而不受到自由世界的反对，那么，就没有一个小国会 有勇气去抵抗强大的共产党邻国的威胁和侵略。如果允许这种行为不受到挑战，那么，这将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完全就像是曾经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同样的事件。”

美国时间6月25日23时55分，杜鲁门总统发表声明：

1. 命令麦克阿瑟以所有能够动用的武器弹药供应韩国军队；
2. 命令立即撤退美军顾问团家属，美国在远东的空军和海军部队予以掩护和支援；
3. 命令美国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中国大陆对台湾以及台湾对大陆的任何进攻。

杜鲁门发布的第3条命令对中国来说，不啻于躺着也中了枪。

## 4. 汉城在号啕

“三八线”上的炮声震动了东方，震惊了全世界。朝鲜半岛的炮火硝烟与血腥厮杀，引起了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的普遍关注。

6月26日，也就是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中午，北朝鲜全国各地的校园、工厂、机关、街道上，包括农村，所有人都被紧急集中起来。

炎夏季节里难得的短暂凉风吹拂着无数张男女老少严肃的脸膛，



全国各地的北朝鲜人都整齐列队到有高音大喇叭的空地上，等候收听最高领导人金日成的重要讲话。

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反复高唱着进行曲风格的爱国歌曲，直到被命令不要吭声。

然后，整个国家的人民全都在寂静之中，通过无处不在的高音大喇叭，怀着万分崇敬的心情，聆听他们无比崇拜的英雄发出的黄钟大吕般的声音。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今天凌晨，美帝国主义的无耻走狗李承晚傀儡政权，又一次向我们发起了丧心病狂的突然进攻！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正处在巨大危险的威胁中！我们被迫进行的这场反抗侵略者的战争，是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独立，为了民主和自由而进行的正义之战！”

年轻的统帅还宣称：“李承晚想要使全体朝鲜人民都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奴隶。”

他呼吁：“在南方的游击队打击敌人后方，破坏通讯，摧毁桥梁道路。南方的所有公民都要勇敢地起来推翻李承晚政权。工人要罢工，农民要拒绝向敌人提供食物，知识分子要从事政治宣传，鼓动人民群众，发动广泛的起义。”

金日成总结说：“历史告诉我们，决心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人民必定胜利，统一我们国家的神圣时刻已经到来。”

最后金日成吼出的是让全国军民在一瞬间呼出，并在三千里江山上空如惊雷般轰鸣不息的口号：“热爱祖国的人民，为了胜利——前进——！”

“三八线”附近的战争阴影很快扩散到汉城上空，南北双方都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6月25日，汉城街头雨过天晴。10时，街上突然出现军队的吉普车，宪兵通过车上的喇叭喊：“国军官兵立即归队！”

吉普车消失后，满载着士兵的卡车和牵引火炮从街上疾驶而过。

报纸的号外开始满街散发，“北朝鲜军队今日拂晓从‘三八线’开始南侵，我军立即与敌交战，正在将敌击溃中”。

印有人民军红色五角星标志的雅克飞机盘旋在汉城上空，撒下的传单上写着：“南朝鲜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向北方发起



进攻，北方军队将给予坚决反击！”

汉城电台广播词的新闻则是：“瓮津地区，摧毁共产军坦克7辆，缴获冲锋枪72支、步枪132支、机枪7挺、火炮5门，全歼敌人一个营……一个共产军团长率领他的部队一起向我军投诚！”

与此同时，平壤广播电台播出的却是这样的内容，“无赖叛逆李承晚命令李伪军侵略了北方，我英勇的人民军奋起自卫，并开始向南方反攻。李承晚匪帮将被逮捕、判刑、枪决”。

不过几乎没有市民能听到这条广播，大部分人是通过街头报栏的《京乡新闻》号外获悉此事的。号外登载着“北朝鲜傀儡部队于今日凌晨有预谋地开始从‘三八线’全面南侵，在我军有力反击下，敌人溃不成军”。

虽然得知了战争的消息，但是汉城市民中并没有出现恐慌，反而透出了一种莫名的兴奋。因为政府和部队都在宣称南朝鲜军事上的巨大优势，北朝鲜的南侵遭到了南朝鲜军队强有力的反击并被击溃。宣传员还在叫嚷着“中午饭到平壤吃，晚饭到新义州吃”的论调。市民对南朝鲜军队的能力深信不疑，许多人相信北朝鲜的进攻消息等于在预告南朝鲜军队的胜利。

但是，比广播和报纸上的消息更准确，更可靠，也更令人揪心的消息来自那些从前方下来的伤兵。伤兵们说不清楚战局的全貌，但都异口同声地说：“坦克！北方的坦克厉害！我们没有坦克！”

伤兵的说法导致了零星的猜疑，并没有引起汉城的惊慌。26日的早晨依然是个平静的开始，汉城市民还没有察觉到战争的紧迫感，不过生活的紧迫感已经降临到了每个汉城市民的头上。昨天还2300韩元一袋的大米（25公斤），一下子涨了两倍多。市民开始到银行排队取钱。

也是在这一天，汉城市民听见了大炮声，看见了从北边议政府方向逃来的大批难民。北朝鲜的雅克飞机飞临汉城，轰炸并扫射了总统府。

一位叫作金明景的南朝鲜飞行员做出了惊世骇俗的英雄之举，他驾驶教练机升空，在全城150万市民的注视下，用没有武装的机体和北朝鲜的飞机撞在一起，粉身碎骨。

可是，军方的公告上却写着：国军一部已从“三八线”向北推进了20公里，遭到沉重打击的共产军正在崩溃之中。

到底是南朝鲜军队离平壤不远了，还是北朝鲜军队离汉城不远了？汉城到处是不知所措的神情，这就平添了一种怪异的气氛。

真实的战况是，高浪浦方向，南朝鲜第13团在第一波次的交战中死伤就达90%，人民军坦克很快突破了南韩军阵地。临津江方向，南韩军第1师在白善焯师长和美军顾问罗德维尔中校的指挥下，在临津江南岸部署阵地，等待溃败下来的12团，然后重新组织抵抗。结果，12团溃败的士兵蜂拥而至，后面紧跟着的是人民军第1师的追兵。南韩军工兵飞快按下电钮，想炸掉临津江大桥，但电缆已经被切断，人民军方虎山将军的第6师战士犹如潮水般涌上来，占领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大桥，直捣汉城的门户——议政府。

入夜，炮声开始接近汉城，大多数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路上，难民的脚步声，车辆的行驶声不绝于耳，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收拾行李，准备天亮后向南边逃难。

然而比这些人更为急迫的李承晚总统在天亮前就已经离开汉城，登上了开往南部城市水原的专列。这位老态龙钟的总统认为，如果共产军俘虏了他，金日成一定会像传单上说的那样，将他公开枪决，那么他为之奋斗终生的“谋求朝鲜独立”的伟大事业必将化为泡影，所以他无论如何也必须为了人民而活下去。

27日早上6点，KBS广播的早新闻开始播音，播出了政府机关迁往水原的消息。广播给了汉城市民极大的冲击，街上到处是手提头顶行李的市民，夹杂着叫骂声、哭喊声，涌向车站。汉城南下的首趟列车是早上7点发车，挤满扒满了人的列车准时出发了。挤不上去的，动用了自行车、牛车，有的干脆步行，百姓混杂在溃败的军队中间往南逃散。

据记载，那一天从汉城逃离的难民有40万之众。很多没有挤上列车的人把站台挤得满满的，等待着下一班8点发出的列车。但事实上车站并没有准备下一趟班次。

在人们目送第一趟列车开出的时候，李承晚驰往大丘的专列已经过了大田进入金泉。这里如画的平静还与战争无缘，几小时前的炮声、紧迫感像是做了一场梦。

此刻的李承晚最担心的是“政治上的动乱可能在麦克阿瑟于战场上大张旗鼓地显示力量之前，就使战争以突如其来的速度和极不光彩的方式结束了”。

7月1日上午，老总统大发雷霆，把一腔怒火发泄到了被指定随他行动的美国大使馆参赞哈罗德·诺布尔头上，说他听信了穆乔大使和“伟大的上帝麦克阿瑟”的话，以及杜鲁门总统、杜勒斯国务卿顾问的种种许愿。美国人全都背弃了他。“现在用什么来阻止共产党的进攻呢？什么办法也没有！”李承晚一口气讲了一个小时。他说，人民军很快就会出现大田，出现在水原的街道上，他可不愿意再逃跑了。如果他死在水原，那就这样吧。再往南只会使他蒙受更大的耻辱。

李承晚的奥地利夫人也大发牢骚。她对诺布尔抱怨道：“我和我的丈夫宁愿毫不畏惧地面对敌人去死而留名千古，也决不苟且偷生。我们的行动会激励后来的朝鲜人奋起战斗，重新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诺布尔参赞听到这样的牢骚十分反感，毫不客气地斥责道：“李承晚没有权力随心所欲，他负有拯救他的人民和国家的责任。你应当好好规劝你的丈夫，最好继续担任领袖，而不要像一头困兽那样一死了之。”

在这位美国小官员的威胁劝告下，一国总统李承晚最终还是妥协了：他将继续向南退却，并尽可能地使自己处在人民军穿插、包围的范围之外。

7月2日，李承晚夫妇和诺布尔离开水原，向南逃去，他们的专列所经之处，一派混乱景象。平民和溃兵沿着路基向南逃去。他们在中午时分目睹了一场惨祸，战争的头几个星期里到处是这种纷乱悲惨的景象。

与此同时，被美军顾问团团长罗伯特将军称为“亚洲之雄”的南朝鲜国防军在战争爆发时的表现，与其说是让顾问团失望，不如说是让美国人震惊。滂沱大雨中的战场上，到处可见已经被打得不成建制的南韩军队在向南一路狂奔。

伦敦《每日快报》的西德尼·史密斯是首批抵达战地的记者之一，他对南朝鲜部队退却的场面作了生动的描述：“我看见一些卡车上的高级指挥官坐在士兵中间，戴着雪白的手套，一只手握着佩剑，另一只手擎着树枝做雨伞。离奇的现象到处可见：一些南朝鲜人在前线骑着军马逃跑，牲口被枪炮声吓得挣脱缰绳或者扬蹄跺脚；南朝鲜士兵用枪逼着老百姓脱下衣服，穿在自己身上遮住军服，以便混杂在

逃难的人流之中，军官则站在一边无动于衷。美军顾问团不得不在发给麦克阿瑟将军的电报中说：‘无论从军事形势上还是从心理上看，南朝鲜陆军已经完全垮了。’”

汉城市内更加混乱，在车站上等车的人们发现半天不来车，一起涌向车站办公室。市内流言横飞，有人说金浦机场被占，某要员被抓，甚至有人说李承晚已经被金日成派出的特种部队暗杀了，还有人说总统府也被占领了。收音机里仍在不停地播发“胜利在望”的消息，但是市民已察觉到汉城即将成为战场了。

他们一起涌向汉江人行桥，可越往南越堵塞，桥的入口有卫兵把守，有特别通行证和军队政府的车辆优先通过，桥畔满是逃难的人，他们顶着酷热等候过桥。

桥上正在通过两辆军用卡车，车中装着南朝鲜银行所保管的1.5吨金块、2.5吨银块。金银的转移是国家银行的行长具谔书和国防部第三局金一焕局长协调好的，装了384个木箱，从南朝鲜银行的地下金库转移出来，由15名荷枪实弹的士兵和两名银行职员组成护送队；他们在队长洪九杓上尉的率领下，汗流浹背地随车驰过了汉江。

27日中午，人民军突破了南朝鲜布防的“仓洞防线”。太阳刚刚下山，人民军便在夜色的掩护下，大规模渗透到了整个防线的后方，南朝鲜最后一道防线“弥阿里防线”也彻底崩溃了。

按照周密制订的汉城防御应急计划，汉城以北的每个重要桥梁和公路都应在危急时刻被炸毁。但是，在南朝鲜军队一泻千里的溃败中，计划上的任何一个字都没有被执行过，防御应急计划等同一张废纸。

但是，有一座大桥的炸毁计划却执行得很坚决，这就是汉城以南汉江上唯一的一座大桥——汉江大桥。这座大桥是汉城通往南方的唯一通道，是南朝鲜军队撤退和难民转移的生命线。为了阻断追赶而来的人民军，在大量难民和溃败的军队仍拥挤在桥上时，这座桥被军队毅然决然地炸掉了。

爆破时间是凌晨2点28分。

橘黄色的闪光照亮了雨夜的天空，“轰”——首先是人行桥，接着是铁桥，爆炸声重合在一起，天地都在发颤，江面泛起了震波。桥上约有四五十台车，随着桥断为两截都坠入了江中。桥上的难民发出阵阵惨叫，许多人也掉下了桥去。爆破中死亡及失踪的人无法统计，



有说500，有说800，有的说超过1000。爆破的回响声、碎片落水声和落水人的扑腾声混成一片，打破了汉江深夜的寂静。雨声听起来更响了，像是在应和北岸的混乱声，又像是应和江中的哭喊声。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弗兰克·吉布尼曾目睹了汉城的这个地狱般的夜晚。他在记录中说：“我和我的同事坐在一辆吉普车上，用了很长的时间才从被难民和车辆塞满的汉城街道上挣脱出来。然后在公路上和头上顶着包裹的难民艰难地往南走，最后我们的吉普车终于上了大桥。在大桥上，吉普车寸步难行，前边是一队由六轮卡车组成的车队。我下了车，想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走不动，但我发现桥面上被难民挤得水泄不通，没有我下脚的地方。我回到车上等候。猛然间，天空被一大片病态似的橘黄色火团照得通亮，前边不远的地方传来一声巨大的声响，我们的吉普车被气浪掀起有七英尺高。当时，我的眼镜被炸飞了，满脸都是血，什么也看不见。等我能看到周围的物体时，发现断裂的桥面上到处都是尸体。”

事实上，炸桥时桥上有几十辆汽车组成的长长车队和无以计数的难民混杂在一起；桥北侧的大道上，排成8列的车辆和炮车，军队和难民混杂在一起，挤得寸步难移。据事后查明，这次爆破，难民、军队、车辆和两节桥梁一起被炸飞，夺去上千人的生命，同时切断了南朝鲜军队主力的退路。

过早地炸毁汉江大桥，给南朝鲜军队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汉江大桥被炸时，南朝鲜军队的主力第2、第3、第5、第7师和首都师都在汉城的外围防线，还有相当的战斗能力。上午6时，美军顾问团乘渡船逃出汉城时，这些部队还在利用汉城周围的山丘进行防御。

但是，当他们知道汉城东门的防线已被突破及汉江大桥被炸毁的情况后，士气一下便垮掉了，他们扔下阵地，争先恐后地撤退到江岸，然后利用筏子和渡船，或者游泳逃过汉江。这些仓皇渡江的南朝鲜士兵丢弃了所有的装备，许多士兵甚至两手空空，只穿着一条裤衩就游过了宽阔的汉江，仿佛是在举行一场大规模的横渡汉江比赛。

后来的事实是，炸毁大桥后10个小时，北朝鲜人民军才进入汉城市区，12个小时后才到达汉江。如果炸桥时间推迟几个小时，南朝鲜的两个整师和大部分战略物资就可以过江了。

据史料统计，战争爆发时，南朝鲜军队加警察共有7万人左右，6月28日汉江大桥炸毁后，逃过汉江的南朝鲜军队只剩下两万多人了。

虽然后来南朝鲜军事法庭以“炸桥方式不当”为罪名，枪毙了负责炸毁汉江大桥的工兵处长尹相汝，但这次事件给南朝鲜军队心理上造成的阴影长时间难以消除，正如《美国陆军史》所言，“南朝鲜部队从此便以惊人的速度崩溃了”。

## 5. 麦克阿瑟突访台湾

人民军等到6月28日凌晨5点天光放亮才开始对汉城发动总攻击。

事实上，南韩军已经不存在任何有组织的抵抗了。

人民军以109坦克团为先头，从北面 and 东面攻入汉城市内，伴随着零零星星的枪声，分别占领了官厅、广播局、电报局、监狱、军队机关、议会大厦等主要地点。

城内早已大火熊熊，到处悬挂着有红色五角星的北方国旗。亲劳动党的市民们挥舞着共和国旗帜，欢呼金日成万岁。他们早已准备好了旗帜，就盼望这一天的到来。

此时的汉城虽然有近40万居民逃离，但仍有超过百万的市民无处可逃，留了下来。

留在汉城的市民大致有三种态度：一种是欢迎的，这些人狂热地挥舞小旗，跑前跑后地为人民军办事；另一种是静观的，这些人有的躲在各自的家里，有的逃避到山中；还有一种是潜伏的，即逃晚了的军人和警官等。

北朝鲜的坦克刚进入汉城，就直奔西大门监狱，释放了政治犯及一切囚犯，把他们树为人民英雄，当作捕获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

一支特殊的部队与北朝鲜军队同时入城，他们的任务就是逮捕亲美、亲日派及资本家、官吏等“反革命分子”，有一群穿便衣的人引导他们前进。

据说，有数以万计的人遭逮捕和杀害，刑场就在大街上。

人民军对汉城居民纪律严明，以公价购置物品，没有进行掠夺。



但是，所到之处总有进行清剿的枪声。人民军占领汉城后，用最快的时间清除了“反革命分子”，使它变成了一座红色的城市。政府成立了各种革命组织，举办大大小小的游行，参与者可以领到一些生活必需品。

上午11点30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在平壤正式宣布：“我强大的人民军已经解放了共和国首都汉城。”

党政军机关已经接到命令，着手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

人民军攻占汉城的当天晚上，杜鲁门与他的顾问们通宵开会。艾奇逊提议逐渐增加军事行动，发布一道“全力以赴的命令”要海空军向韩国军队“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援”，还发布特别命令：派第7舰队去防止北京对台湾的进攻。

杜鲁门走得更远，他说：“朝鲜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就像柏林危机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共产主义分子正在试探我们武力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迎击他们的威胁，又不要卷入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

他要国防部长约翰逊用保密电话通知麦克阿瑟，“亲自告诉他我的指令，他应当用他指挥的海空军力量去支援大韩民国，但绝不能越过‘三八线’”。

金日成没有夸口，朝鲜人民军气势如虹，摧枯拉朽，进展确实顺利，只经过短短3天说不上激烈的战斗，便于27号成功地拿下了汉城。两路大军乘破竹之势，鼓行向南，所过之地，或施行仁义，秋毫无犯；或烈焰冲天，刀途血道，采用软硬两手，征服南韩民心。

李承晚一天到晚牛哄哄地嚷着要往北打，可实际上他并没有得到美国主子的同意，更没有给他提供进攻性重武器——这从他在电话里对麦克阿瑟撒泼放横可以清楚看出——而他依靠的就是那一帮狂热好战、腐败不堪的朝籍日军官兵。除此以外，并没有作更多的准备。对金日成的人民军的战斗力神奇提升，他更是严重估计不足。

人民军进入汉城后，金日成高兴地交给什特科夫一份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计划，试图证明李承晚早就有对北朝鲜动武之心。

什特科夫当即把这个计划报告给斯大林，但是，他在后面补充了一句，说：“我不太相信这份进攻计划的真实性。”

显而易见，李承晚对北朝鲜也有一些设想，只不过还没有能力付



诸实践。在北朝鲜人动手之前，他们也曾多次开会讨论，一旦战争爆发应当如何应对，既制订了防御性的计划，也制订了进攻性的计划。

稍具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其实这样的作战计划，叫作应急预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什么时候都应当有，而且还远远不止一套。没有敌人还非得弄出个假想敌来，认认真真的对付不可，何况当时的北朝鲜军队陈兵“三八线”上，随时都可能向南边发起进攻。

可没承想人民军强大得出人意料，南韩军太不经打，炮声一响，便兵败如山倒。这些纯粹属于纸上谈兵的文件，全都完好无损地落到了金日成手中。

6月30日凌晨1时，五角大楼收到了麦克阿瑟发出的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

麦克阿瑟描述了南朝鲜军队的溃败，并称其为“完全丧失了反击的能力。坚持目前战线的唯一希望，是在朝鲜作战区域投入美国的地面部队。没有地面部队，单凭海空军恐怕难以奏效”。他建议立即派遣一支2000人的战斗部队。随后，他希望“从日本抽调至少两个师的兵力，供初期的反攻使用”。

五角大楼对此等重要问题难以作出决定。

杜鲁门也在反复考虑。

直到7月1日上午，他打电话给国防部长约翰逊和陆军部长佩斯，要求他们“考虑一下抽调两个师给麦克阿瑟，并考虑接受中国国民党政府提供的3个师的可行性”。

杜鲁门认为蒋介石政府仍然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所以蒋的部队加入“联合国军”是名正言顺的，其理由是：“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荷兰政府都派舰只、飞机参战和地面部队参战，我们大概也应该使用中国的地面部队。”

1日上午9时30分，杜鲁门召开“战争委员会”就此征求意见。国务卿艾奇逊明确反对蒋介石的军队卷入。

他指出，“接受蒋介石的军队就有把中国共产党人引进朝鲜或者台湾的危险”。此外，蒋介石如果派军队到朝鲜，势必会削弱保卫台湾的力量。共产党人就会乘虚而入，“迫使美国在朝鲜干预的同时，决定是否再干预台湾”。

美国三军参谋长们也明确表示“避免蒋介石卷入”。他们认为蒋



介石的部队装备与南朝鲜军队相差无几，而南朝鲜人已经证明无法与北朝鲜的装甲部队抗衡。此外，使用蒋介石的部队还必须动用运输工具，倒不如用这些工具更有效地把美军和补给运入朝鲜。

经过反复讨论后，杜鲁门终于接受了艾奇逊和三军参谋长们的意见，拒绝蒋介石提供32000名军人开赴朝鲜的建议。但是对派遣两个美国师的问题却没有什么分歧。

为此，杜鲁门宣布，他将授予麦克阿瑟全权，由这位远东军总司令支配他所统辖的地面部队，派驻朝鲜的美国师的数量不限。

杜鲁门还同意谢尔曼海军上将的建议，由海军对北朝鲜东西海岸进行封锁。

即便如此麦克阿瑟仍不满意，他执意要打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他决心要制止所谓“共产主义的侵略扩张”。他要求华盛顿源源不断地增派飞机、军舰和部队，他急迫地要得到这一切。他在电报中写道：“按部就班——让这一概念见鬼去吧！抓住太平洋中的每一条舢板，赶快把大量物资运到远东来！”

华盛顿仍然不敢轻易决定“立即全面地介入朝鲜战争”。许多决策人认为朝鲜很可能是苏联“声东击西的一枚棋子”，旨在把美军吸引过去，从而减少美国在欧洲和别的地区已经不多的力量。

事实上，华盛顿大多数人的眼睛都紧盯着欧洲。他们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首先应当是欧洲，其次才是太平洋地区。

由于这些原因，华盛顿避而不答复麦克阿瑟一些“要价较高的要求”，对此，这位远东军总司令十分愤怒。

“巴丹和澳大利亚的悲剧又要重演了。”麦克阿瑟在致华盛顿的信中危言耸听地写道，“我们可以设想世界是一个有四个区的大都市，在这个都市中，第一区最重要，第四区则最不重要。是否能够因为城市官员们把消防设备留给第一区，就允许第四区的一场火灾不加控制地蔓延呢？到了你把设备运到第四区时，你可能发现火势已经无法控制了！”麦克阿瑟最后严厉地强调：“美国如果不能赢得朝鲜战争，在别的地方也无法取胜。”

麦克阿瑟不仅主张在朝鲜大打一场，而且还力主动用台湾蒋介石的军队参加朝鲜战争。

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刚愎自用、我行我素的麦克阿瑟决定飞往台湾，同蒋介石就“纯军事问题进行磋商”。

这是一次引人注目的访问。麦克阿瑟带去了一个由16名“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官员组成的军事代表团，他们分乘两架飞机，麦克阿瑟乘坐的是斯托利驾驶的“巴丹”号。

恶劣的天气使在台北的降落推迟了一个半小时，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俩率领文武百官在候机室耐心而兴奋地等待着。

当飞机终于降落后，麦克阿瑟的手同蒋介石的手第一次握在了一起，他说：“你好，大元帅。感谢你到这里来迎接我。”

这次对台湾的访问轰动了全世界。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白宫发言人宣称：“杜鲁门和艾奇逊事先都未被告知这次访问。”

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说：“他们大为吃惊地从8月1日的新闻报道中看到麦克阿瑟将军到了台湾，吻了蒋夫人的手，并同她的丈夫举行了会谈。在蒋的助手们的推动下，关于这次访问的新闻报道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麦克阿瑟改变了‘中立化’政策，并向蒋作出了进行军事援助的一切秘密保证。”

艾奇逊还写道：“大元帅在台湾得意洋洋地宣称，由于我们再次同老战友密切合作，胜利就得到了保证。”

杜鲁门也写道：“这一切意味着——相当多的一些报纸也这样认为——麦克阿瑟摒弃了我的使台湾中立化的政策，而他却热衷于一项更冒险的政策。”

然而，麦克阿瑟根本不管华盛顿的感受和反应，紧跟着又点燃了另一颗定时炸弹的导火线。

“全国参加对外作战老兵大会”将在芝加哥举行，麦克阿瑟接到要他在大会上讲话的邀请，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然而，他通过在日本的官方陆军通讯设施发去了一封在大会上宣读的信，对十分敏感的台湾问题“大发议论”。

他写道：“台湾落在这样一个敌对国家的手中，就好比成了一艘位置理想、可以实施进攻战略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支援舰，与此同时，还可以挫败冲绳和菲律宾友军的防御或反攻作战行动……那些鼓吹太平洋绥靖政策和失败主义的人提出的乏味的论点是，如果我们保卫台湾，我们就会疏远中国大陆。没有比这再荒谬绝伦的了。说这些话的人不了解东方。他们不理解东方人的心理状态是尊重和服从富有进取心的、坚定而有活力的领导，而最反对那些胆小怕事和优柔寡断的领导人。同时，这些人还低估了东方人的智力水平。”



这封信原准备在8月28日发表，但在8月26日就透露给了新闻界。

麦克阿瑟的信一见报，杜鲁门和艾奇逊感到既吃惊，又震怒。

为此，杜鲁门召见了他的主要顾问，商量对策。

艾奇逊写道：“当我们鱼贯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总统紧抿着发白的嘴唇，没有像平常那样和大家打招呼。”

杜鲁门则写道：“我曾认真考虑过解除麦克阿瑟将军作为我们远东战区军事指挥官的职务，由布莱德雷将军接替。我将让麦克阿瑟继续对日本的占领，把朝鲜和台湾从他手中解脱出来。但经过仔细斟酌后，我决定不走这一步。”

杜鲁门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尽快让全世界知道，麦克阿瑟致“全国参加对外作战老兵大会”的信，并不是官方政策。

美国的决策者们最终得出结论，当务之急是命令麦克阿瑟正式收回那一次“公开发言”。

8月26日，华盛顿向麦克阿瑟发去非同寻常的命令：“美国总统指示你撤回致‘全国参加对外作战老兵大会’的信件，因为信中关于台湾的一些提法与美国的政策和在联合国的立场是相对立的。”

麦克阿瑟的回应令人惊愕，他向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提出抗议，说以这种方式撤回发言是一严重错误，“何况信中表达的观点纯粹是我个人的观点”。

华盛顿没有让步。

麦克阿瑟再狂妄，他也深知小指头拗不过大腿的道理。

这一次，他没有一条道走到黑，被迫收回了那封信。

## 6. 斯大林同意了朝鲜武力统一计划

6月28日，朝鲜人民军的坦克纵队开进了汉城。

同一天，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建议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通过了“必须用紧急的军事措施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决议。

耐人寻味的是，苏联代表仍旧不出席，从而再次放弃了行使否决权的机会，造成历史上第一次由世界性组织投票决定“以武制暴”。

美国获得了“联合国授权下的一次警察行动”的合法地位，以美军为主导成立了“联合国军”，从这一天起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由美国人操控的“联合国军”，也因此成为了“正义之师”。

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决议是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顺利通过的，可是，到了8月份，苏联代表又回到了安理会——斯大林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2007年，俄国学者披露了一份直接涉及这个问题的重要档案，引起了全世界历史学者的普遍重视。

绝密 不可复制

布拉格，苏联大使：

请口头向哥特瓦尔德转达下面的内容。如果他需要书面材料，可以给他一份。对苏联6月27日退出安理会和它退出后所发生的事，我们同哥特瓦尔德同志有些不同看法。

我们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团结一致；第二，强调美国的政策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安理会中的多数再做些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

我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

我们退出安理会后，美国陷进了对朝鲜的军事干涉，败坏了自己在军事和道义上的威望。现在没有哪个正直的人还会怀疑，美国在朝鲜扮演了施暴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军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扬的那样强大。此外，很明显，美国的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假设美国政府还继续被牵制在远东，并使中国加入解放朝鲜和争取本国独立的斗争，那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首先，美国像其他国家一样，也不是拥有大批武装力量的中国的手。美国会在这场斗争中无力自拔。其次，美国在这里被缠住后，就不能在短时间着手进行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不定期拖延，这就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阵营争取了时间。更不要说美国和中国的斗争会在亚洲和整个远东地区引发革命



了。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观点来看，这一切是不是对我们有利呢？当然是。

可见，苏联是否参加安理会，已经不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的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没有理由说“民主阵营没必要离开安理会”这样的话。离开还是不离开是由具体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再次离开安理会，也可以再回去，这都取决于国际局势。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现在又回到了安理会。为的是继续揭露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防止它打着安理会的旗号掩盖自己的侵略行径。现在，在美国已经卷入朝鲜战争之际，在安理会中最容易实现这一目的。我认为，这很明白，不需要再作解释了。

菲利波夫

1950年8月27日

公布这份档案的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提出了他对这份电报的解释，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斯大林已经预计到美国必然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而且并不想阻止美国这样做，目的就是有意为美国人创造武装干涉朝鲜的条件，以便使美国陷入朝鲜战争而不能自拔，从而削弱它在远东地区的实力，破坏其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同时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二，斯大林已经预计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北朝鲜军队应付美国的干涉”。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绝不会容许美国控制朝鲜，更不能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东北边境地区。因此，毛泽东必然会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

但是，沈志华教授认为列多夫斯基的观点没有说服力。

如果按照列多夫斯基的说法，这份电报表明斯大林事先就已经预计到美国必然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的话，那么允许朝鲜采取军事行动，就是苏联为美国设好的一处陷阱，美国的干涉是苏联求之不得的。

但事实与此正好相反，沈志华掌握的苏联解密档案已充分证明，避免美国对朝鲜的武装干涉一直是斯大林关注的焦点。正是由于考虑到美国干涉的可能性，朝鲜分裂之初，苏联才一直拒绝支持金日成请求军事统一朝鲜半岛的主张。

1949年3月5日，斯大林曾在与金日成的会见中明确表示：“我

国人民已疲于战争，他们需要休养生息，因此对于进行新的战争的主张，他们是不会支持的。”

9月2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朝鲜问题时作出决定：“认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入侵南方是不合理的。”

1950年1月30日，斯大林与毛泽东在第三次会谈中确定了签订中苏新约的基本原则之后，斯大林的态度才突然起了变化，在发给平壤什特科夫的电报中，叫他转告金日成，“在这件事情上，我准备帮助他”。

随后金日成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后者最终同意了朝鲜领导人以武力统一半岛的请求。

此后，苏联还帮助朝鲜制订了作战计划，希望通过占领汉城和南方的起义，来保证朝鲜的军事行动速战速决，不给美国进行直接武装干涉的机会。金日成动手后，斯大林又去电催促，“南朝鲜解放得越快，联合国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

由此可见，俄国学者关于“斯大林事先就已经预计到美国必然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的立论，是缺乏事实支撑的。

众所周知，1950年1月13日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为了支持新中国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斗争，此举和朝鲜半岛的形势并无直接关系。

与此同时，斯大林决定改变立场，支持朝鲜武力统一，但他并没有把这一决定告诉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同意了朝鲜武力统一的计划，也没有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在金日成访华的当天即通过罗申表达出对斯大林的做法非常不满，5月14日，维辛斯基转发了斯大林致毛泽东的电报，说：“这个问题（在朝鲜发动战争）最终应该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毛泽东对斯大林同意金日成采取武力统一行动表现出的诧异，足以证明斯大林事先并没有征求过毛的意见，而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答复表明，他对中国是否愿意向朝鲜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也并无把握。

朝鲜战争爆发之初，对于美国大规模介入朝鲜内战，中国政府给予了严厉谴责，军事部署也作了一些调整，但抗美援朝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对于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来说，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出兵朝



鲜的。10月初，当美军不顾中国的再三警告，大举越过“三八线”后，出兵朝鲜的问题真正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的时候，党内对出兵问题产生了巨大的分歧，毛泽东几乎是孤掌难鸣。即使在作出出兵决定后，周恩来一行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谈时，中方首先还是表示不出兵为好。

中国最终决定出兵，除了自身的安全因素外，来自苏联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俄国学者根据前述电报认为，斯大林事先已经估计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北朝鲜军队应付美国的干涉”，显然更加缺乏事实依据。

根据时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的回忆，在安理会召开讨论朝鲜形势会议的前一天，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从纽约打电报给斯大林，请示“苏联代表是否应该参加为讨论美国提交给安理会的一封信而召开的会议”。

当晚，斯大林打电话给葛罗米柯，问他“在目前情况下应该下达什么指示？”

葛罗米柯回答说：“外交部已起草了一项指示，正在送您审批。这项指示的实质是：第一，坚决驳回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指控，并且同样坚决地控告美国参与发动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第二，一旦有人建议要安理会通过旨在反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或者反对他和苏联的决议，马立克就应该立刻使用否决权，阻止通过这类决议。”

很明显，苏联外交部根本就没有考虑苏联要不要返回安理会的问题，而直接考虑的是如何在安理会采取反击行动的问题。

斯大林听了葛罗米柯的汇报，出乎意料地对他说，“我认为，苏联代表不应该参加安理会会议”。

葛罗米柯对斯大林的决定感到不解，他提醒说：“如果我们的代表不出席会议，安理会就可能通过任何决议，甚至打着联合国部队的旗号，从其他国家派遣军队到南朝鲜去。”

葛罗米柯回忆说，“这一理由并没有给斯大林留下特别的印象。我感到，他不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然后，斯大林实际上口授了一项指示。40分钟后，这项指示就发给了我国驻安理会的代表”。“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我提醒过斯大林的事情发生了，安理会通



过了华盛顿强加给它的决议。被派往南朝鲜的各个国家的武装部队都被贴上了‘联合国军’的标签。当然在这个事件中斯大林明显地感情用事，没有很好地权衡自己的行动。这似乎不符合他的思维方式，但事实正是如此”。<sup>①</sup>

然而“感情用事”四个字并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斯大林作为一个精于韬略的大国政治家和外交家，绝不会在这么重大的问题上“感情用事”。

那么，应该如何分析这一出人意料的决定呢？

沈志华根据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前后后，斯大林所起的一言九鼎的作用，分析推断此举当属斯大林有意为之，其目的就是让中国和朝鲜在朝鲜的土地上和美国人死打烂拼，以削弱美国的力量，他自己则坐山观虎斗。如果让马立克回去参会，不行使否决权必遭朝、中以及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不满，对其巩固社会主义阵营及其领导地位相当不利。若行使否决权，又会暴露自己与这场战争有直接牵连，在全世界面前有失形象。所以，经过再三权衡后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起来。

三个月后发生的事情，便足以证明沈志华的推断不无道理。

1950年11月30日，也就是中国志愿军在朝鲜两战两捷后，安理会以9票通过决议，要求已经进入朝鲜作战并接连取得胜利的中国撤军，并保证中国的利益：联合国席位问题和台湾问题受到保护。

苏联立即使用否决权否决了该项提案。

且不论中国是否会接受该项提案，斯大林使用否决权明明白白地意味着他根本不希望，也不允许中国退出朝鲜战争。

更重要的是，斯大林在事关中国重大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居然就没有考虑到，是否也应该征求一下他的盟友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sup>①</sup> 引自安·葛罗米柯回忆录《永志不忘》，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

## 第五章

# 金日成对毛泽东的三次预警 充耳不闻

### 1. 来不及举行的庆功会

面对美国操控的联合国做出的强烈反应，斯大林一方面派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发表公开声明，称苏联“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奉行传统的不干涉原则”。而他本人则于7月1日致电什特科夫大使，要求转告金日成，“不要被美国人的介入吓坏了，必须坚决地继续进攻”“南朝鲜解放得越快，联合国武装干涉的机会就越少”“7月10日前完全满足朝鲜人关于供应弹药和其他军需品的申请”。

6月28日朝鲜人民军攻下汉城以后，金日成给斯大林发去一份电报，兴高采烈地宣称：“汉城已在我的手中，我们准备两天以后召开庆功大会。我已经把总部设在汉城，希望你能允许苏联顾问团总部也从速跟进至汉城。”

当时的苏军顾问与北朝鲜人民军的关系非常紧密，人民军总共有7个陆军正规师，从连长以上，一对一配有苏军顾问，一直配到了总参谋部、作战部。在战争爆发之前，“三八线”以北的一切军事行动，事无巨细，均由苏军顾问操纵。

但斯大林同时又下有一道死命令，任何情况下苏军顾问也不能越

过“三八线”。所以人民军一打到“三八线”，所有苏军顾问立刻止步不前，全部留在了北边。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

苏联档案中的几份金日成和斯大林之间的往来电报特别有意思。金日成备战期间，斯大林给了他3000辆大卡车。汽车有了，可是朝鲜哪有这样多的司机啊？金日成赶紧给斯大林发了个电报，要求斯大林再给他派3000名司机过来，否则这汽车没办法动弹。斯大林回电说，这不行，你们可以马上派人过来，由我们负责教，用突击训练的方法，几天就可以把他们教会。

还有6月2号的一份电报，斯大林送给金日成的一艘军舰开到了元山港，舰上的苏联海军官兵接到的命令是把军舰开到元山港后，马上搭乘其他运送作战物资的军舰返回。金日成急了，你们这一走，给我扔下一艘军舰有什么用啊，我们的人根本就摆弄不了。马上发电报要求斯大林把苏联海军官兵随军舰一同留下。斯大林回电说这绝对不可能，我一个海军官兵都不能给你留下，你派人到苏联来学习，我包教，还免费。

战争爆发前5天，什特科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要求苏联提供进攻和登陆需用舰只，以及能够驾驶舰只的10名苏联顾问。斯大林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

以上事实足以证明，斯大林对苏联人不能越过“三八线”这一条，是卡得相当严的。

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接到欣喜若狂的金日成在汉城发给他的电报后很不高兴，马上回电提醒说，金日成同志，拿下汉城并不表明战争已经结束，南朝鲜的军队都往南边跑了，你并没有消灭他们多少有生力量。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快组织部队，向南追击，不要开什么庆功会了。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认为苏联顾问团有必要迁往汉城。

金日成如梦初醒，马上给斯大林发去一份感激涕零的电报：

亲爱的约·维·斯大林同志：

我们深深地为您的关怀而万分感动。

敬爱的导师，我们感谢您的谆谆教导。在朝鲜人民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得到您的巨大支持。

我们在抗击企图奴役朝鲜的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我们时刻感

受到您慈父般的关怀和帮助。

祝您健康长寿！

忠实于您的金日成（受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托）

1950年8月31日于平壤<sup>①</sup>

随即，金日成下令：“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最猛烈的攻势，把敌人赶下大海！”

由武亭和金雄两员大将军指挥的两路进攻大军，分别沿着东西海岸线，南下狂追。

没想追击的过程中又出事了，苏军顾问此时不是已经全部留在了“三八线”以北吗，突然没有了平时事必躬亲的顾问，人民军的指挥系统顿时被抽掉了主心骨。再加上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造成联络系统中断，两个野战军团都乱成了一锅粥，军长找不到师长，师长找不到团长，团长找不到营长连长。弄得武亭和金雄两位军团长手忙脚乱，指挥失灵，8万大军，顿时成了一盘散沙。

心高气傲的金日成这下抓瞎了，赶紧又给斯大林发了一封求援电报，先说了一大通朝鲜人民军作战如何如何英勇，然后再承认自己的军队眼下还缺乏驾驭现代战争的手段和艺术，所以目前出现的严峻问题是：没有苏军顾问，部队已经无法继续前进，请求斯大林命令留在“三八线”以北的苏军顾问，全部火速归建。

什特科夫向莫斯科转发了这份电报。

斯大林阅后怒火冲天地回电把什特科夫痛骂一通，你要搞清楚，你是我的大使，而不是金日成的大使。这样的电报你也同意给我发来，不是故意让我为难吗？

骂归骂，不过，金日成的人民军眼下已经处于全面混乱的状况之下，斯大林毕竟还是同意让一批军事顾问越过“三八线”，回到自己指挥的部队中去。

但临时又作了一项规定：这批重回部队指挥作战的顾问的军装，全部得扒掉，一律改穿便衣。从脱下军装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经是《真理报》和塔斯社的驻外记者。假如被俘虏或者被打死，一概与苏联政府无关，只能算作在战地采访时因公殉职。

<sup>①</sup>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之《1950年8月31日金日成致斯大林的电文》。

斯大林随即又给什特科夫下达一份电令：“你个人要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他们成为俘虏。我们不想留下任何证据，被别人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这件事是金日成自己干的，与苏联政府无关。”

就因为苏联的军事顾问问题，朝鲜人民军的进攻停止了整整3天。也正是因为这宝贵的3天时间，让不断从日本赶来的美国大兵，在朝鲜半岛的最南端建立起一块块立足之地。

已经瘫痪的朝鲜人民军有了苏军顾问的帮助，又重新焕发出了活力。但是，他们的对手也很快强大了起来。6月28日，人民军开进汉城，6月30日，按照杜鲁门出动地面部队的命令，麦克阿瑟首先将迪安将军的第24师投入到朝鲜前线，从大田登上了朝鲜半岛。然后，第1骑兵师和第2步兵师随后跟进陆续在釜山登陆。一支规模愈来愈大的美国地面部队，很快在朝鲜半岛展开。

这些部队统一由一个新的指挥机构，即驻韩美军第8集团军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第8集团军一直是驻日陆军的主要力量，现在这支部队又奉命担负起在朝鲜作战的重任。

1948年以来即担任该集团军的指挥官沃尔顿·沃克中将，将离开生活舒适的东京，进入朝鲜半岛指挥作战。

沃克素有美国陆军最优秀将军之一的盛名，他体态壮实，活像他得克萨斯老家的一名农场主，谈吐带有浓重的得克萨斯乡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担任坦克军官，以凶猛强悍出名，乔治·巴顿将军常亲昵地称他为“我那最棒的杂种”，后来将他提拔为自己的参谋长。

麦克阿瑟原以为只要美国地面部队一旦出现在朝鲜战场，金日成的人民军就会失魂落魄，战局就会以美国人的胜利而告终。所以他在6月29日给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曾信心十足地说：“只要给我两个师，我就能够保住韩国。”

美军第24师先遣支队的指挥官史密斯上校也曾扬言：“北朝鲜军队一见到我们，就会狼狈逃窜。”

结果，他们都错了。



## 2. 美国将军进了战俘营

最先登陆朝鲜半岛的美军第24步兵师34团遭到了灭顶之灾！

该团L连队上士罗布森回忆起自己所经历过的那段历史时，迄今仍心有余悸。

晚年他回忆说：“我们撤退到釜山的时候，疲惫不堪，大概是美军历史上最狼狈的部队了。一路上，就是不停地被金日成的部队追啊赶啊，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光顾着逃命了。还有就是酷热。一路上，我们不管什么水都敢喝。稻田里的水混着人畜的粪便，我们照喝不误。得痢疾是当然的，我一路上上吐下泻，都拉出血来了。进入釜山防御圈后，我们的部队在一个苹果园稍事休息。大伙儿都怀抱枪支，倒头就睡。我枕着钢盔，头一歪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中午了。我们每人分到几份干粮，外加6听啤酒。我狼吞虎咽吃下干粮，但啤酒不是冰镇的，我们都喝不下。大伙儿都一声不吭，呆若木鸡。我想，大家此时都在想，这样的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尽头啊？环顾四周，我的军中老友大都不见了。我们算是领教了北朝鲜军队的厉害啊，他们人多，装备也很好。”

7月19日，人民军在大田包围了美军第24师34团。

次日，人民军各部密切协同，对大田发起总攻，霎时枪弹横飞，硝烟弥漫，战斗十分激烈。美军34团渐渐顶不住了，不顾一切向东南突围，但逃路已被切断。美25师和骑1师派出的增援部队也被阻击。到中午12时，人民军攻占了大田，美24师34团全军覆没，连师长迪安少将也做了人民军的俘虏。

威廉·迪安少将曾荣获美国国会颁发的最高梅花勋章，被美国总统杜鲁门称为“所向无敌的王牌将军”。

杜鲁门总统掩盖真相，欺骗舆论，说大田之战是“美国陆军史上光荣的一仗”。

麦克阿瑟也说：“这是一场卓越的阻击战，打得巧妙勇敢。”

7月19日晚，大田周围——“联合国军”的主要防御地段——如此捉摸不定，以致迪安将军后来也在回忆录里承认说：“我甚至说不准大田西北的阵地是否还在我们手里，那时，指挥官们几乎没有作出什么重大决定。”他还说，在那混乱不堪的日子里，一名经验丰富的

中士就可以取代他指挥战斗。

当枪声越来越远的时候，已经预料到大事不妙的迪安带着几名参谋和警卫离开了他的指挥所，悄悄溜进一座被遗弃的屋子里，倒地就睡。“鼻子吸进了在朝鲜谁也躲不掉的稻田腐土、泥墙、粪肥和污物散发的气味”，现在又夹带着弹壳散发出来的无烟火药的辛辣气味。

黎明前，附近一阵轻武器射击声把他们惊醒，北朝鲜的坦克顺着街道突进了大田城内。对于南韩军士兵和不知所措、疲惫不堪、满城乱窜的美国兵来说，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不足一个月前，这些美国大兵还兴高采烈地待在占领军宿舍里，与日本女友消遣作乐，痛饮啤酒，仆人们把他们的靴子擦得精光锃亮。

由于部队之间联络中断，步兵第34团指挥系统失灵，军官们不知道其他部队的位置；无人指挥少得可怜的反坦克炮还击在城里游动的北朝鲜坦克。联络时断时续，完全被北朝鲜人所左右，在一次极为可怕的战斗中，北朝鲜坦克“隆隆”地冲进了一个院落，打死了那里的150名战士中的大部分，并且毁坏了大部分装备。

顷刻间，大田成为一片火海！

迪安那一刻心情异常沉重，他和他的部队坚守了20天，已经疲惫不堪，代价惨重。

他在关于朝鲜战争的回忆录中写道：“任何陆军军官经常得有一副铁石心肠。其中一项工作就是把士兵派到你认为他们可能无法生还的地方去。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可当时你不得不用士兵的生命换取片刻喘息之机，这实在是一件冷酷无情的差事。”

早晨6时30分，迪安发现自己处于“无用武之地”。第34团指挥部与属下两个营之间的联络中断；也不知道它侧翼的位置，以及整个战局进展如何。

迪安使战斗在单兵之间的原始水平上进行。他无力左右整个战斗，但是“或许我们还能对付几辆坦克”，他带领一名助手和一名朝鲜翻译，前去寻找坦克。

甚至连这种微不足道的任务也失败了。

迪安强行拉来一辆载有一门75毫米无后坐力炮的卡车，指挥它向停在一个路口的两辆坦克射击。但四五发炮弹都打飞了。

临近中午，迪安临时拼凑起来的反坦克炮队只剩下一发炮弹。炮

手们惊慌失措，在100米的距离上也未命中目标。坦克掉转头，在距离迪安他们20米处“隆隆”驶过。

迪安将军怒不可遏，他站立在大街上，用他仅有的一支零点45口径的手枪向坦克射击。

他没有想一想，手枪是打不坏坦克的。

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说：“这纯粹是当时气恼之极所致。”

迪安的吉普车穿过短兵相接的厮杀着的士兵急驶，“它歪歪斜斜地绕过不能动弹的卡车，猛烈的火力网，这简直是地狱，它要把我们烧焦，尽管我们开得飞快”。

司机拐弯不及，机枪、步枪子弹像雨点似的从两旁的建筑物上泼下来，拐弯谈何容易？他们奋力往前，希望能夺路逃命。

迪安吩咐吉普车和警卫车的司机们继续朝南开。他们又中了埋伏，人人纷纷跳下车，跌跌撞撞地跳入路边的沟渠隐蔽起来。

他们终于安然无恙，并商量南去的道路。最后决定涉水过锦江，越过河对岸陡峭的山脊，一路向南。

他们遗弃了吉普车，背着一位伤员，踏着松软的沙质土步行。

黑夜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尽量悄悄地行进，以免惊动北朝鲜人。

重伤员开始说胡话了，他把所有的水喝得一干二净，还嚷着口渴。

一次中途休息时，迪安觉得他听到附近的山脊一侧有流水声。他朝那个方向摸去，但是山坡很陡，他不由自主地滑下去，怎么也收不住脚。他纵身前扑，终于摔倒。后来不知什么时候，迪安醒来，浑身疼痛。他的肩胛骨摔断，头被划开一道口子。“一年前，我的腹部做过手术，现在剧痛难忍。”同行的人们也不知去向。

迪安失去了知觉，醒来时看见一支北朝鲜巡逻队从他几码远的地方经过。他没被发现。黎明时分，他试图向南走。他遇见了掉队的斯坦利·泰伯中尉，他俩结伴，走了一天、两天、四天……迪安伤痛加剧，已失去了时间概念。最后躲进一个南朝鲜人家里。迪安掏出100万韩元（合110美元），要这家人带路去大丘。可他们却找来了一支北朝鲜巡逻队。

迪安和泰伯闻声夺门而逃，隐藏在一块稻田里。

迪安卧在稻田的泥土里，用胳膊匍匐爬进一条水渠。然后翻过水渠，爬进另一块稻田。



泰伯没有紧随，做了俘虏。

在以后的35天里，迪安徘徊在南朝鲜的山野之中，有时向老百姓讨点吃的，更多的是遭到拒绝，并且报告给北朝鲜人。有好几次，他靠攀爬峭岩才得以逃脱。

8月25日，迪安的厄运终于临头了。两个男人自告奋勇带他越过战线，可是他们把他交给了北朝鲜人。

迪安当了3年囚犯。

美军第24师虽然在大田遭到了惨败，但是却成功地为援兵登陆朝鲜半岛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随后而来的步兵第7师和骑兵第1师取而代之地站在了战斗的最前线。

对于迪安将军被俘，美国官方讳莫如深。后来迫于舆论，才授意美联社于7月25日报道，迪安将军“迷途失踪”。

几天后，在迪安家属的一再追问下，美联社又报道迪安“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率部突围时，临危不惧，以身殉职”。

为此，华盛顿当局还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滑稽戏。迪安将军明明做了俘虏，却说他“光荣战死”。

五角大楼并于1951年2月16日为迪安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授“牺牲者”荣誉勋章，降半旗致哀。

不想同年8月下旬，香港《大公报》记者朱启平赴鸭绿江南岸的朝鲜碧潼中国志愿军战俘营采访，竟然在营房中见到了迪安！

迪安被俘后，一度恐惧不安，生怕遭到残害，后来又抱幻想，认为“联合国军”很快就会征服北朝鲜，解救自己。但事与愿违，“联合国军”在中朝军队的打击下，始终徘徊在“三八线”附近。而在战俘营，迪安又受到特殊照顾，他也就随遇而安，听天由命了。

朱启平结束采访时，迪安提出请求，希望将自己尚活在人世的消息通知在美国的妻子。

1951年12月，开城谈判开始。朱启平的采访通讯见报，他还发表了迪安在战俘营的几张近照，并通过一家电台的国际频道，播放了几段现场采访录音。

这样一来，就弄得杜鲁门十分尴尬了，他只得通过新闻发言人，发表了“尚需调查个中原委”的声明。这一调查，便拖延了近两年时间。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生效，双方开始遣返战俘。



中朝方面的遣返委员会代表于8月6日在开城设便宴，公开为迪安这位美国将军送行。

席间，迪安百感交集，喝得酩酊大醉。

迪安刚回到“三八线”的另一侧，即接受纽约出版商鲍斯·卡特的请求，与其单独会见。卡特当场预付5万美金，约其撰写一部题名为《在朝鲜被俘历险记》的书稿。

迪安回国后，闭门谢客，如约完成了撰稿任务。

其间，他还写过一封信给金日成和彭德怀，“以一个普通军人的身份，表达了远离战场的特殊感情”。

迪安将军最后的命运在东方民族的思维中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他生在日本，只有剖腹自杀，向天皇谢罪一条路。然而，迪安被释放回国仍回军队服役，令东方人惊诧莫名的是，后来他还由少将晋升为中将！

迪安将军在“某种不可抗拒的情况下”成为战俘的痛苦经历使他永生难忘。

### 3. 斯大林趁火打劫

斯大林此时除了指导金日成如何把这场战争打下去，还着手做的另一件重要事情，就是督促中国尽快出兵。

在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上，斯大林与金日成一样，都有一个逐渐转变认识的过程。最初，他俩高度一致，都不同意中国出兵。金日成不同意是因为历史深层对中国的抗拒与排斥，而斯大林不同意的道理非常简单，从1945年随着苏联红军第25集团军越过苏朝国界，他们就开始在北朝鲜苦心经营，已经将北朝鲜完全建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如果让中国大军进入朝鲜，金日成以后听谁的？

战争是6月25日开打的，3天后，金日成这才想起还没来得及知会毛泽东一声，于是就派人去北京跑一趟。毛泽东一见金日成派来的特使顿时火冒三丈，对他说你不用来了，我已经从法国报纸上看到你们已经打起来了。

生气归生气，但是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还是必须关注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美国的参战——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谁都没有想到，美国会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就投入了这场战争。

25日凌晨“三八线”上炮声一响，美国东部时间26日杜鲁门主持会议就决定出兵干涉，2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组成“联合国军”开赴朝鲜半岛，28日美国飞机就开始往一路南下的朝鲜人民军头上狂扔炸弹。东西海岸海面上的几百艘军舰也开炮轰击金日成的人民军。同日，由日本出发的美陆军24师的先遣支队最先在大田登陆，紧跟着更多的美军渡过日本海，登上了釜山。

美军一参战，斯大林和毛泽东同时就想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金日成能不能顶住？

中苏两国紧跟着都采取了一些动作，苏联向中国建议，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事物资。

7月2日，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

两天后，中央军委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大使讲述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帮助人民军作战的具体设想。

而此刻心里最先犯嘀咕的就是金日成本人，美军飞机当头一炸，美国军舰沿着东西海岸一轰，人民军一下就被炸蒙了，打乱了。

金日成这下着急了，当初毛泽东主动提出帮助他时，他拒绝了，而且把话说得太满，自己放不下脸面向毛泽东求援，就找什特科夫帮忙，托斯大林出面，请中国出兵。

他的理由很充分，“既然美国人已经出兵帮李承晚打，那么天经地义，中国人也应该出兵帮我打”。

什特科夫向莫斯科发了电报，却迟迟得不到斯大林的回电。

这让金日成意识到，斯大林内心和自己一样，也是不愿意让中国人进入朝鲜的。

斯大林撂下平壤心急如焚的金日成不管，却于7月2号指示北京城里的罗申大使去见周恩来，转告“斯大林同志对美国出兵朝鲜的问题非常关注，希望中国同志做好准备，如果需要的话，能够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

周恩来说：“没有问题，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现在已经有4个



军开赴东北，部署在鸭绿江南岸，随时可以过江。”

其实这时中国军队并没有准备好，中央也还没作决定让部队开往东北，在鸭绿江北岸集结。因为成立东北边防军是在5天之后，即7月7号的会议上决定下来的。在这之后，13兵团才开始向东北开拔集结哩。

周恩来紧接着说：“我们有个条件，如果中国出动陆军，希望苏联能够出动空军，协助我们作战。”

此等军国大事，罗申哪儿敢做主，马上驱车赶回大使馆，向莫斯科拍电报，汇报他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向斯大林讨主意。

7月5号，斯大林亲自给周恩来回电。

北京

苏联大使

请转告周恩来：

1. 我们同意中国同志在接纳人民中国进入联合国问题上让印度居间调停的意见。

2. 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

菲利波夫

1950年7月5日

这个电报非常重要，以前这个电报没有披露的时候，中国学者和俄国学者争论非常大。中国人说斯大林“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俄国人则说“根本没有你们说的那回事儿，斯大林从来就没有承诺过出动苏联空军掩护中国志愿军作战，所以完全不存在什么‘出尔反尔’的问题”。这份电报一出，俄国学者就无话可说了，因为该份电报明确表明斯大林向周恩来承诺为中国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此事铁板钉钉，只是他没有具体讲什么时候出动，出动到什么地方，出动多少。

这时候，美军的干预仍然未能抵挡住气势如虹的人民军的凶猛进攻，战线很快推进到了洛东江一带，接着再往下打，便进入了胶着状态。这是因为人民军的战线越拉越长，美军飞机与舰炮轰炸也越来越

厉害，人民军的后勤出现了严重问题。

而“联合国军”则越来越多地投入到狭小的洛东江以东战场上，不仅兵力大增，且因作战区域狭小，火力也相对集中，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应有尽有。双方力量此消彼长，你灭不掉我，我也打不过去，就在洛东江一带与釜山外围，没日没夜，杀声震天，大战三百个回合。

其实早在7月初，毛泽东就已经连续给金日成传递过3次信息，明确指出：你现在的重点问题是在后方，你已经把战线拉得太长，如果美国人在你的后方一登陆，把后路一切断，你就完了。不过，你别紧张，现在我可以出兵帮助你。志愿军替你守着后方和东西海岸，你在前面打，突破洛东江，拿下釜山，这仗就结束了。

而且，毛泽东的想法是志愿军全部换上朝鲜人民军服装，各级指挥员都取了朝鲜名字，朴什么、金什么、崔什么的。

可是，那时候人民军打得很顺，金日成委婉地谢绝了毛泽东的好意，他内心深处担心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所以他认为最好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祖国的统一。

毛泽东也把中国愿意出兵的意见告诉了斯大林，但斯大林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中国人在苏联人的势力范围里插上一脚，对毛泽东的意见不置可否。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中国政府“该出兵时未出兵”这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同时也让麦克阿瑟产生了“中国人绝不可能在金日成大败时出兵”的严重误判。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个问题让中外历史学家们皓首穷经也寻不着真正的原因何在。

7月7日，英国首先向苏联提议，希望苏联向北朝鲜施加影响，促使人民军退回“三八线”，以利和平解决这场战争。

斯大林毫不犹豫地电告毛泽东和金日成：“我们认为英国人的这项要求是无理的和不能被接受的。”

7月8日，斯大林指示罗申：“请转告毛泽东，金日成正在抱怨中国在朝鲜没有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联系并迅速解决问题。”

第二天深夜，中国外交官即奉命紧急进入朝鲜。

7月13日，斯大林电告罗申转告毛泽东：“我们不清楚您是否已

决定部署9个中国师在朝鲜边境。如果您已作出决定，我们准备给您派去一个喷气式歼击机师——124架飞机，用于掩护你们的部队。”并称：“这个师及已在上海的另外几个苏联空军师的全部装备，待中国飞行员掌握技术后，都将全部移交给中国方面。”

此言确实吊起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高级将领们的胃口，使他们以为快速解决朝鲜问题后，就可以获得这些飞机及其他先进装备，用以解决台湾问题。

在此之前，一大批苏联飞机已经进驻到了上海和徐州一带。

这是1950年2月6日，国民党飞机突然对上海进行的一场大轰炸而催生出来的结果。

待在台湾岛上的蒋介石不让毛泽东消停，三天两头派飞机对东南沿海城市广州、福州、杭州、南京、徐州，特别是上海的军事和经济目标进行狂轰滥炸，从1949年10月到1950年2月，就空袭了26次。

可以这么说，虽然整个中国大陆的地面被共产党占领了，但天空却依然还是国民党的，它的空军可以旁若无人地在大陆的天空进进出出，想炸哪儿就丢几个炸弹下去。最远能飞到四川成都、重庆上空撒传单，时不时还往你重要的地方空投几个特务下来搞破坏。

1950年2月6日这天对上海的空袭最为严重。国民党空军出动B-25轰炸机和P-51、P-38战斗机共17架，轰炸和扫射上海，造成军人和老百姓死伤1400多人，炸毁民房2000多间。空袭的重点目标是杨树浦发电厂（发电量17万千瓦）。这次轰炸导致上海生产停顿，而且使全国物价上涨的风更厉害了，本来就瘫痪了的经济受到了更大的冲击。

苏联驻上海的总领事弗拉基米罗夫向莫斯科通报了这次轰炸所造成的后果：“17架重型歼击机在同一时间对上海市的所有电站进行了打击，轰炸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以前曾属于美国人的一个功率最强的发电站，已经完全瘫痪。还有其他的发电站也部分地受到损坏。所有的工厂都停产了，电车停运，供水也中断了，公共部门及其附属企业也都中断了自己的工作。尽管投入了全部现有力量来修复美国人的这个发电站，也要经过10天之后，而且才能恢复20%的功率。持续的修复工作还遭到电站的美国主人的强烈反对，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电站的修复工作。”

根据一系列资料，弗拉基米罗夫总领事指出，“目前上海的居民，尤其是在政府和党的范围内，人们的情绪非常沮丧。所有的人担心再度出现新的轰炸。已经作出决定，将工业企业基地转移到内地”。

接着，莫斯科又通过其他渠道接到报告，蒋介石对1950年2月6日空袭上海的结果十分满意，欢欣鼓舞地召集了高级将领会议，要求扩大轰炸，并批准将轰炸行动扩展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青岛、广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为实施这个行动，国民党正在加紧修复舟山群岛上的重要机场。

轰炸的具体时间，是在2月6日中午12点25分，当时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兼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陈毅正在外白渡桥边上的上海大厦（刚由百老汇大厦改名）12层参加华东局统战部的一个会议。防空警报响起的一刹那，陈毅猛一抬头，透过玻璃窗，看见了让他这个经过无数次枪林弹雨考验的将军都毕生难忘的一幕：近20架巨型轰炸机呼啸着沿黄浦江掠来，直奔杨树浦发电厂方向而去，紧接着，几声炸弹爆炸的巨响震得会议室里的玻璃都嗡嗡作响，一瞬间屋顶的电灯全部熄灭。

陈毅心里一惊，马上意识到，发电厂被炸了！

这一天，位于上海杨树浦、闸北地区的上海发电厂、自来水公司等多个重要工厂，遭到敌机密雨般的轮番轰炸。而且轰炸极为精准，敌机这一天投下了60多枚重磅炸弹，竟然有10枚在上海发电厂厂区内爆炸。

轰炸后第二天，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常务副市长心情沉重地来到发电量最大受损也最严重的杨树浦发电厂，视察被炸情况，慰问受灾群众，指示电厂争取在48小时内部分恢复发电。

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军管会连夜开会，向中央汇报情况，研究防空和善后措施。大家痛苦地感到，目前我们没有防空能力，无法遏制空袭，只能采取被动的防御措施，尽量减少空袭造成的损害。

“二六大轰炸”造成上海的电力设施损坏高达80%，给市区的工商业和人民生活造成了空前的灾难。市区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绝大多数街区没有电力供应，高层建筑的电梯因停电而悬在空中长达三四天时间，造成被困市民大多昏厥。许多商店关门停业，市场萧条。自来水供应困难，市民的马桶、厕所都无水冲洗。国民党潜伏的特务则乘机大肆散布谣言，蛊惑人心，郊区也发现少数武装特务搞暗

杀抢劫。

仅仅在一天之后，即1950年2月7日的《解放日报》头版上，赫然登出了这样的通栏大标题《美制匪机再滥炸本市，人民损失重大，迫切要求复仇》。

面对国民党的轰炸，新中国仅有的一点空军力量根本无能为力。当时中共只有接收、缴获和起义的国民党军队飞机113架可以升空，其中还包括运输机、通讯机和教练机，就作战能力来说，仅仅保卫一个北京就已经勉为其难。

所以，陈毅马上打电报给在毛泽东出访苏联期间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说让国民党的飞机这么猖狂，怎么得了，必须马上请求苏联空军帮忙。刘少奇立即致电莫斯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让他俩出面请求斯大林给予紧急援助。

毛泽东和周恩来马上向苏联方面提出援助。

斯大林一口答应苏方派空军提供保护，但却来了个趁火打劫，立即加码，提出增加补充条款的问题。

葛罗米柯拿出苏联人拟定的《补充条款》，规定在苏联的远东和中亚地区以及中国的东北和新疆，“不能给予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不准许第三国的资本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所参加之工业的、财政的、商业的及其他的企业、机关、会社与团体的活动”，“在中国东北和新疆，不得有第三国势力存在”。

根据这一协定，苏联事实上独家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特殊的势力范围”，也就是沙皇俄国当年企图并吞到自己利益范围的那些地方。这样一来，即便中苏结成了同盟，中国实际上也只能处于“小伙伴”的地位。

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求得斯大林赶紧派空军保卫处于惊恐之中的大上海，毛泽东被迫作出让步。

周恩来仔细一些，考虑到在东北的朝鲜人可不是个小数目，问了一句：“朝鲜人算不算？”

葛罗米柯回答：“朝鲜人没事，我们主要是指美国人。另外，你们尽快把日本人全部赶走。”

斯大林也信守承诺，1950年3月13日，派巴季茨基中将率领混合航空兵集团进驻华东的上海、徐州等地机场，协助中国进行空防。这支防空部队包括两个驱逐机团、一个混合航空兵团、一个探照灯团和



一个雷达营，共有战机120架、雷达12部、探照灯72部。从3月20日到5月11日，以徐州机场为基地的苏联米格-15战斗机4次起飞迎击国民党空军，共击落6架轰炸机，一举解除了对上海的空袭威胁，还不断飞越海峡，对台湾进行轰炸，吓得台湾上上下下忙着“深挖洞”，以躲避来自大陆飞机的报复。

1950年6月19日，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前6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先后进驻徐州、上海机场，并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进行换装带飞训练。

紧接着爆发的朝鲜战争加重了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防空的任务，苏联空军第二批部队别洛夫师在1950年8月进驻中国东北担任防空任务，后来采用同样办法，将这支部队的装备作价移交给中国空军，计有米格-15喷气机122架，教练、通信机16架，总共138架飞机。

同年10至12月，又有13个苏联航空兵师，其中9个米格-15、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师，1个拉-9歼击机师，2个伊尔-10强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分别到达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协助担负上述地区的防空任务，并负责训练中国的空军部队。

这些苏联空军部队是到1951年7月的时候开始陆续回国的，中国空军当时有偿接收了其中12个师的装备。苏联空军在中国上空的出现，可以说是有力地保证了新政权的政治稳定和国防安全。

由于缺乏经验，中苏在这次军事合作中也出现过失误。1950年10月，中国空军从南京起飞的一架图-2轻型轰炸机进行训练飞行，因事先忘记向苏方通报，结果被苏军雷达发现，误认为是台湾过来的飞机，把它给击落了。

10月，巴季茨基部队奉调回国，其武器装备作价移交中国，计有米格-15喷气式飞机38架，拉-11活塞飞机39架，图-2活塞轰炸机9架，伊尔-10活塞强击机25架，教练机8架，共119架。

从10月19日——也就是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那一天起，中国空军接管了上海的防空任务。



## 4. 怎一个乱字了得

人民军攻占汉城后，一方面汉城市区里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红色台风刮得天翻地覆，路断人稀；另一方面韩国军民逃离汉城的狂潮加速了美军直接参战的速度。

麦克阿瑟更是迫不及待地飞到朝鲜，亲自视察正打得炮火纷飞的战场。

麦克阿瑟身居美军远东战区总司令兼“联合国军”总司令的高位，但骨子里无疑是一个身经百战，无所畏惧的美国大兵。正当朝鲜半岛的外国人，包括美国的官员眷属都争先恐后地往日本撤退的时候，他却来了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顾危险，要亲自飞到战场上去看一看金日成这个嘴上没毛的娃娃弄出的“动静”。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得知汉城失守的麦克阿瑟的反应简直就像一个血气方刚的美国西部牛仔，28日早上，他即下令驻日美国空军出动B-26机群，轰炸北朝鲜军队。

这还远远不够，他决定亲自飞到朝鲜半岛，去实地看一看情形。

麦克阿瑟叫来他的专机“巴丹”号机长斯托利中校，告诉他明天早上飞往水原。

斯托利接到命令后分析了气象预报，然后向麦克阿瑟汇报：“天气情况不好，明天东京有强风雨，云层很低，不利于飞行。”

麦克阿瑟收敛了脸上的微笑，一字一板地说：“孩子，明天我必须出现在水原。”

6月29日黎明时分，东京羽田机场乌云密集，雨水淅沥，麦克阿瑟的助手们决定让飞机延迟起飞。

麦帅一眼看出了幕僚们的“小把戏”，简短干脆地说：“我们马上走。”于是，4架“野马”式战斗机为“巴丹”号护航，从东京羽田机场迎着满天雨云一掠而起，轰鸣着飞越日本海，向着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飞去。

正当他们快接近水原时，无线电报告说，汉城以南20英里的水原机场遭到北朝鲜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巴丹”号刚刚降低高度，一架北朝鲜的“雅克”螺旋桨驱逐战斗机俯冲下来，企图从美国4架护航战斗机中穿过，向没有武装的

“巴丹”号扫射。

副官吓得大叫：“危险！”

生死关头，每个人都被吓坏了，不少人俯下了身子。

当然，除了麦克阿瑟。只见他从皮背心的内侧口袋掏出玉米芯烟斗，点上火，然后冲向窗口，看着外面的天空，镇定自若地说：“孩子们，不要紧张，我们的战斗机正在接近它，会把它揍下去的！”

飞行技术精湛的斯托利做了一个规避动作，“雅克”机还来不及开火，就被护航机打中了，并立即在空中爆炸。

麦帅回到自己的位置坐下，抽起了大烟斗。

合众社的记者欧内斯特·霍布赖特愤愤地对随机而来的同行们说：“这个老东西的表演欲太强了，我可不想让他拿我做垫背去充当英雄。”

霍布赖特虽然嘴上说着显失尊重的话，却仍然经受不住麦克阿瑟做出的好莱坞大明星特写镜头般的诱惑，他拿起相机，拍了一张麦帅打燃火，若无其事地抽他的大烟斗的精彩照片。

穿过早几分钟前被轰炸和扫射着火的两架运输机上升起的浓浓油烟，他们成功地在水原机场着陆了。

待“巴丹”号在跑道上停稳，麦克阿瑟走下飞机，告诉他的空军司令乔治·斯特拉特迈耶中将说：“如果你们不能轰炸‘三八线’以北的目标，北朝鲜人将具有明显的优势。”

“有攻击‘三八线’以北的授权吗？”美国远东空军司令问。

“没有。”站在麦克阿瑟旁边的高级助手考特尼·惠特尼回答。

可是，没有攻击“三八线”以北授权的麦克阿瑟抽了两口烟后，却果断地命令斯特拉特迈耶：“立刻摧毁北朝鲜的机场，不要声张。”然后回头对惠特尼说：“现在，你在这些命令中找出若干条能够在军事法庭上保护我的东西。”

15分钟后，他们乘车来到邱奇将军的指挥所。

韩国军队的胖子参谋总长蔡秉德在这里指挥作战，已经3天3夜没合眼了。麦克阿瑟向他询问作战计划时，对情况根本不了解的蔡秉德结结巴巴地说不清楚，最后居然猛挥手臂喊起了口号：“我要召集100万韩国人，打退狗娘养的共产军的进攻！”

麦克阿瑟不耐烦地扬扬烟斗，目光严厉地瞪着他，吐出一句其尖刻度足以排名世界第一的话：“坦率地讲，本人认为从纽约调几百个



警察来，也比你指挥的全部韩国军队管用。”

“尊敬的将军阁下，我绝对不是说大话！”受到当众羞辱的南韩军统帅脸上像被泼了一碗狗血，英勇无畏地大声吼道，“大韩民国还有200万壮丁，政府可以马上下令进行总动员！我将率领他们攻占平壤！”

话还没说完，麦克阿瑟已经扔下他，迈开大步边走边说：“我们到前线去视察一下！”

麦克阿瑟一行乘着一辆美国轿车和几辆吉普车向汉江出发了。

迎面而来的成群精疲力竭的溃兵减慢了车队前进的速度。

南韩军队全面败退，溃不成军。

当车队来到永登浦市郊的一片丘陵地带时，麦克阿瑟用烟斗柄指着一个小山坡，向他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说：“尼德，我们到山顶上看一看。”

车队蜿蜒爬上灰色的小山，所有人都从车里下来，随着麦克阿瑟登上了并不太高的山丘顶上。

这是一幕具有浓烈戏剧色彩的景象，山丘距汉江岸边约400米，离汉城约1800米。

此时的汉城市区已经笼罩在浓烟烈火之中。记者和摄影师围在麦克阿瑟周围，从各个角度拍摄他亲临战火纷飞的战场视察和指挥作战的英勇身姿。具有丰富经验的麦帅也很懂得如何看似不经意地予以天衣无缝般的配合，让记者们觉得他们关注的对象物超所值，不虚此行。

随行的惠特尼将军对当时的场面作了如下的描述：“天空中回荡着跳弹的尖啸声，到处散发着恶臭，呈现着劫后战场的一片凄凉。所有的道路上挤满了一群群备受折磨、满身尘土的难民。这种场面足以使麦克阿瑟确信，南朝鲜的防卫潜力已经耗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金日成的坦克纵队从汉城沿少数几条完好的公路，直扑半岛南端的釜山。那时，整个朝鲜半岛都将是共产党的了。”

麦克阿瑟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被击败的溃散军队形成一股可怕的逆流。南韩军队完全是在狼狈溃逃。”他认为：“韩国靠自己的力量难以挽回局势。”不过，他当时还不能许愿向南朝鲜提供全面支持。

但是，据他后来写道，就在视察途中，他已经酝酿成熟扭转战局的基本战略。一步一步把预备队投入到缺口中，作为鼓舞南朝鲜士气的权宜之计；在尽量靠南的防御地区建立坚强的立足点；增加美军力量的投入，直至达到势均力敌或者超过敌人的水平；最后，实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太平洋战争中极为成功的两栖作战，在远离战场的东西海岸线，选择某一个恰当的港口作为登陆地点。

此时从汉城方向射来的炮弹从头顶呼啸而过，零星地落在一行人后面很远的地方。

许多人本能地卧倒在地。

然而麦克阿瑟却盯着远处被人民军攻占了的汉城，毫不在意炮弹的爆炸。连刚刚低声咒骂过他的霍布赖特，也不得不为他的临危不惧所感动。这不是虚张声势，装模作样，而是一名久经炮火考验的老兵历练出来的一种难得的定力。

麦克阿瑟就那么手持大烟斗，笔直地挺立在山坡顶上，神情镇定。其他人敬畏麦克阿瑟这种足以鼓舞人心的英武形象，卧倒的军官爬了起来，站着的军官则努力使自己的身姿更加威武一些。而且在每次炮弹爆炸时，他们也都努力像他们的统帅一样，不再退缩。

当然，此刻最忙碌的就是记者了。他们拍下了亲临战地的麦克阿瑟足够多的照片，毫无疑问，这些照片第二天便会出现在全世界主要报刊的头版头条。

麦克阿瑟在山丘上向汉城及左右方向观察了长达40分钟左右，才返回水原。在返回水原途中，头上飞来几架雅克战斗机。一行人将车开进树林，下车找地方躲避，只有麦克阿瑟一个人静静地坐在福特汽车里抽他的大烟斗。

回到水原，麦克阿瑟向李承晚提出建议，希望他能立即更换韩国国防军的参谋总长。

在韩国总统面前，这位美国老兵的话就是圣旨。

第二天上午9点，国防部秘书长申东雨把一个有李承晚署名的总统专用信封送到了蔡秉德手中。

胖子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份解职命令——韩军参谋总长的饭碗被打碎了！

在水原农业学院美军临时指挥部里，麦克阿瑟和李承晚私下里谈了一个多小时之久。麦克阿瑟答应给予一切可能的援助，并建议李总



统和自己同乘一架“山毛榉”飞机飞回大田。

总统夫妇接受了他的邀请。

他们登上这架飞机，还没来得及系好安全带，飞机就开始滑跑起来。不过，飞机在跑道上跑了才一小会儿，却猛然一个急转弯，停了下来。

一个机务员打开门，仓皇喊道：“快跳下去！把自己隐蔽起来！”

麦克阿瑟这次再不敢表演“淡定爷”了，赶紧和李承晚从飞机上下来，看见一架雅克战斗机发出恐怖的尖啸声，正一头朝他们的飞机俯冲下来。

飞行员紧紧抓住李承晚的奥地利夫人的手，跑到附近的一块水面上漂浮着人粪，臭烘烘的稻田里趴下。麦克阿瑟和李承晚、穆乔大使则几乎同时扑倒在泥泞的地面上。

过了一会儿，飞行员从稻田里站起身，大声说：“你们最好待在原地别动，我去看看飞机怎么样了。”

两个上了70岁的大人物和一个比他们年轻的美国人再加一个奥地利女人全都站了起来。

一个个满身泥污，却都在咧着嘴傻乎乎地笑。

15分钟后，麦克阿瑟的专机“巴丹”号起飞了。

受了过度惊吓的李承晚则改变了主意，谢绝和麦克阿瑟结伴同行，带上夫人，换乘汽车去了大田。

当飞出北朝鲜飞机的航程之外时，机上的所有人员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着陆前，已经写完军事形势报告的麦克阿瑟坦率地对《纽约先驱论坛报》著名女记者玛格丽特·希金斯等几名记者说：“如果美国打算拯救朝鲜，就必须动用地面部队。只要给我两个师，我就能守住朝鲜。我回到东京后，将把立即向朝鲜派出几个美国师的建议呈送给杜鲁门总统。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接受我的建议。”

就在视察期间，麦克阿瑟发给华盛顿的电报终于等来了他想要的回复，“同意你的作战计划”。

已经逃到水原的李承晚终于满心惊喜地盼到了他的友军络绎不绝地登上朝鲜半岛。

围绕朝鲜半岛的大规模拉锯战，就此徐徐拉开了序幕。

6月28日，美国空军首先投入战斗，一下就把人民军的后勤补给线炸瘫了。

同日，两个师的美军地面部队也陆续从日本紧急赶来，从东西两侧海岸登上了朝鲜半岛，以“联合国军”的名义首次介入战斗，却仍然不能阻挡住人民军凶猛的进攻。

麦克阿瑟眼中的朝鲜战场，怎一个乱字了得！

7月3日这天是个疯狂的日子：

一列挂着9节弹药车厢的南韩军列车，停靠在水原以南大约40公里的小城平泽。在“联合国军”的旗号下参战后，首次执行战斗任务的澳大利亚皇家空军4架战斗机的飞行员，无比兴奋地发现了这列停驰的列车。这些飞机不知道他们的方位，又未得到地面引导，澳大利亚人以为发现了一个人民军的“绝好目标”，以紧密的编队，6次呼啸着飞过车站，向列车发射火箭并用机枪扫射。列车连同车站，以及半个镇子的老百姓化为灰烬，弹药的爆炸持续了整整一夜。

就在这一天，水原附近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几架飞机轰炸扫射了南韩军的一支纵队。飞行员训练有素，技艺精湛，炸得来既准又狠。

南韩军怒不可遏，当即用步枪机枪对空射击，使一架中弹的飞机迫降在原野上，当他们冲到飞机跟前时，发现他们俘虏的竟然是一位尴尬万状的美军飞行员。

与此同时，4架美军的喷气式飞机还向水原发动了攻击，并沿公路向南进攻，致使水原的火车站起火燃烧，摧毁了一些房屋，并使平民受伤。他们向公路上的韩国卡车扫射，烧毁了30辆卡车，打死了200名南韩军士兵。

原驻扎在水原的一位美国军事顾问在写给他朋友的信中说：“这些驾驶飞机的家伙可真出足了风头！他们攻击了友军的弹药堆集处、水原机场跑道、列车、机动纵队和南韩军的陆军司令部。”

由于这些事件，此时负责指挥“联合国军”地面作战的邱奇将军向远东空军发出了强烈抗议。他要求必须把空军的行动控制在汉江大桥或汉江以北地区。

黄昏时分，空中观察员报告：那天在路上发现的200台车辆中，有100辆被摧毁或起火燃烧。

同一天，沃克还查看了设在尚州的第25师指挥部，并在那里与师



长威廉·恩少将交换意见，随后，又跟师部参谋人员交谈。

正是在这里，沃克将军下达了他在朝鲜战争期间最著名的命令。这道命令几个小时后，便在美国成了重大新闻，而且使第8集团军战线上的每一位将士无不感到震惊。

沃克将军的命令是：

“我们进行的是一场争取时间的战争，不能再后退、后撤或调整阵地以及可以想象出来的任何措施。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各部队必须反击，使北朝鲜人陷入混乱失衡状态。不能再有敦刻尔克的翻版，也不能有巴丹的翻版；退守釜山会使那里成为历史上最大的屠场之一。我们必须战斗到底。被北朝鲜人俘虏比战死更糟糕，我们将同生死共患难。如果我们当中必须有人去死，我们将一起血染疆场。谁丢失阵地，谁就将对数千名同伴的罹难负责。我要求你们把这一命令传达到全体美军官兵。我希望人人都明白，我们要守住这条战线！我们必胜！”

美国人是擅长打这种战争的：在战争中，他们将空中力量、大炮及各种重型火力方面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国人总是在武器弹药上不惜代价，以换取较小的人员伤亡，这也是一贯出了名的。

到8月底，洛东江前线的美军和北朝鲜军队形成了一种僵持不下的危险局面：就像两名精疲力尽的拳击手一样，虽勉力坚持，相互殴打，但都在急切地盼望这一轮结束的锣声快些敲响。

沃克再次下达了只有6个字的死命令：“不坚守，毋宁死”，终于守住了釜山一带最后的环形阵地。

### 5. 不是疯子，就是天才

美国的参战立即改变了朝鲜半岛上的战场态势，空中和海上立即被美军彻底控制，虽然在地面上人民军仍占有优势，但后勤补给被美国空军炸得来一塌糊涂，破坏得相当厉害。三面环海的半岛地形，也让强大的美国海军有了用武之地，军舰上的远程大炮，给作战和行军中的人民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前线不时出现弹尽粮绝的情况，战争



从8月20日由北攻南守，转为相持、交织的僵局状态。

这时候，麦克阿瑟突发异想，策划了仁川登陆。

战后美国军事专家评论说，在仁川登陆，成功率微乎其微，大概只有五千分之一，敢于干这件事的只有两种人，不是疯子，就是天才。

事实上，麦克阿瑟本身就是世界闻名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涌现出的传奇将领，一位早就享誉世界的军事天才。

奇袭仁川，只不过又给他身上增添了一道神圣的光环而已。

叼着玉米芯做的大烟斗，戴着墨镜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几乎在刚会走路的时候就学会了骑马打枪，13岁时，他就进入了得克萨斯州军校，在那时他就显露出打仗所需要的才华。19岁时，他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了著名的西点军校。38岁时，他出任美军中鼎鼎大名的“彩虹师”师长，成为美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准将。39岁时，他出任西点军校校长，后来被誉为“西点之父”。50岁时，他成为美军历史上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

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创立了两个纪录，第一是他刷新了西点军校学生平均分数98.14分的纪录；另一个是打破了西点军校学生同一时间段约会7个女友的纪录，他同时与8个貌美如花的姑娘幽会。

麦克阿瑟在其几十年征战生涯中，从来就是一位饱受争议的将领，他受到的赞誉和非议，都远远地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美国将军。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耀眼夺目的美军将星中，他既不像艾森豪威尔那样平易近人，也不像巴顿那样热情豪放，更不像马歇尔那样公正无私，他是一个个性极其复杂而色彩纷呈的人。

崇拜他的人认为，他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人；批评他的人认为，他是个自高自大，刚愎自用，说的远比做的好听，徒有虚名的五星上将。

麦克阿瑟说得最好听、最有号召力的话就是：“我出来了，但是我将回去！”

麦克阿瑟出口成章，妙语连珠，一生说话无数，为什么这样一句朴实无华的话，会是最好听、最有号召力的呢？

这就要从他的军事生涯中所遭受的最大一次败仗说起。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当时麦克阿瑟正在菲律宾担任美军总司令，他率领美军在那里顽强地抗击日本军队的猛烈进攻，但是仍然抵御不住。麦克阿瑟拒绝了罗斯福总统让他撤离菲律宾



的建议，他找出父亲留给他的科尔特45型手枪，准备在关键时刻自杀，决心与菲律宾共存亡。

抵抗到1942年2月，菲律宾形势更加危急。为了避免麦克阿瑟这样的高级将领成为日本人的俘虏，2月8日，罗斯福总统以国家名义再次命令麦克阿瑟，让他必须带着妻子儿子立即撤离菲律宾。

22至23日，罗斯福和马歇尔连续给麦克阿瑟发电，让他尽快撤离，并答应麦克阿瑟撤到澳大利亚之后，组建新的战区，让他担任总司令，立即着手组织反攻。

接到总统和陆军参谋长的电报后，麦克阿瑟流泪了，他对妻子说：“我生在陆军，长在陆军，一生习惯于服从命令，可是这个命令，真是难以服从啊！”

最后他请求总统，允许他在必要的时候撤离，罗斯福总算同意了。

1942年3月11日深夜，麦克阿瑟在陆军部的再三催促下，把部队交给副手乔纳森·温赖特将军，携带妻子和儿子，登上了PT-41型鱼雷快艇，撤离了战火纷飞的菲律宾，去澳大利亚接管太平洋西南战区的指挥权。

4月9日，温赖特将军率领麦克阿瑟留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作战的75000名美菲军官兵，向日军投降；

5月6日，在菲律宾哥黎希律岛作战的15000名美军投降，日军占领了菲律宾全境。

菲律宾失守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美国军界又是如何评说的呢？

1941年7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前4个月，美国在菲律宾成立了远东美军司令部，由麦克阿瑟出任总司令，驻守这个群岛国家。

1941年12月8日凌晨，麦克阿瑟收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后，立即做好战斗准备。他估计日本很可能会从空中下手，命令战斗机起飞，以免在地面挨打。美军机群在吕宋岛上空转了几圈，没有见到日本飞机的影子，纷纷返航着陆，准备稍稍休息加油之后，再度升空出击。

如果战争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三分靠士气，七分靠运气的话，那么此时的麦克阿瑟，运气也实在是冬瓜做帽子——霉到了顶。

麦克阿瑟确实猜中了，当天凌晨，日本出动了500多架飞机，准备轰炸吕宋岛，但因巴士海峡浓雾弥漫，能见度极差，便又折返了基地。鬼使神差，当日本飞机再次升空飞临吕宋岛上空的时候，美军机

群刚刚降落，炸弹纷纷卸下。美军200多架飞机，这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三分之二以上被炸毁，仅仅20分钟的空袭，日本人就已经取得了美军空中绝对优势。

麦克阿瑟并没有手忙脚乱，他命令31000名美菲正规军死守马尼拉，另外十万之众的杂牌军守卫漫长的海岸线。

精明干练的麦克阿瑟满以为自己的决策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不管这个决策在战略上有多么明智，它却意味着日军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在任何地方登陆，然后围攻马尼拉。

菲律宾群岛处于日本南下的必经要道上，日本一心要掠夺南亚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它首先就要攻占菲律宾。菲律宾群岛的面积与英国相当，但需要守卫的海岸线，却比美国的海岸线还长。

而且，当时的菲律宾非常贫穷，要想建立一支训练有素、数量足够的部队，政府根本无力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鉴于这些原因，美国军界普遍认为，要想守住菲律宾，根本就办不到。

所以，当战争爆发时，只能是美菲军队先设法牵制敌人的行动，然后再撤退到多山的巴丹半岛等地坚守，等待增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这个道理早已被世人认同。

那么，心高气傲的麦克阿瑟面对失败，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菲律宾战役是麦克阿瑟从军以来遭到的首次失败，而且败得那么惨。所以他后来非常悲伤地讲道：“我没有想到美军历史上最庞大的一次缴械投降，会发生在我的手里。”

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奇耻大辱，尽管他到澳大利亚之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因为毕竟他在菲律宾已经顽强抵抗了日军那么长的时间。

可是，麦克阿瑟在史诗般的欢迎他的人们面前，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他发表讲话时说道：“我的总统命令我冲破日本人的防线，从菲律宾撤离到澳大利亚，目的是组织对日本人的反攻，主要目标是重新解放菲律宾。现在我出来了，但是，我将会回去！”

战时美军新闻局认为“我出来了，但是，我将会回去”这句话太精彩了！因为当时美军是连连败退，处于最黑暗的时候，战时新闻局马上决定利用麦克阿瑟这句话做秀，鼓舞美国的民心士气，提振抗击敌人的信心，建议麦克阿瑟将这句话稍微改动一下，把“我将会回去”改成“我们将会回去”。

可是麦克阿瑟坚决不同意，他几乎是咆哮着斩钉截铁地回应：“不，不是我们，而是我——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回去！”

其高傲的个性，跃然纸上！

这就是桀骜不驯的麦克阿瑟，他一旦认准的事情，便会坚持到底，决不回头，谁说也没用，包括总统和上帝。

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当时的麦克阿瑟正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由于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经济一片萧条，罗斯福总统建议，1934年财政年度大幅削减陆军预算9000万美元。麦克阿瑟得知后，十分震惊，他要求面见总统，但遭到拒绝。

麦克阿瑟威胁说：“除非我得到通知能与总统谈话，否则我将在2点钟提交辞去参谋长职务的报告，并在3点钟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详细解释辞职原因。”

罗斯福最终答应会见麦克阿瑟，两人一见面，就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总统毫不让步。

麦克阿瑟愤怒地说：“当我们在下次战争中遭到失败时，一名美国士兵躺在血泊中，肚子被敌人的刺刀戳穿，喉咙被敌人的皮靴踩着，他发出了最后的诅咒。我希望被诅咒的是他的总统——就是你，尊敬的罗斯福先生，而不是我这个陆军参谋长。”

罗斯福顿时脸色铁青，喝道：“你不该这样对你的总统说话！”

“总统先生，抱歉，我会为我的无礼承担责任，我的辞职报告将很快送到你的手中。”说罢，麦克阿瑟起身向罗斯福潇洒地敬了一个军礼，转身大步而去。

但是当他走到大门口时，身后响起了声音：“别傻了，麦克阿瑟，美国人民需要你，你必须和你的预算报告一起留下来。”总统不得不将万丈怒火强压心中，做出了妥协。

就这样，由于麦克阿瑟的竭力争取，当年，美国国会批准陆军经费2.84亿美元，不但没有大幅削减，反而比上一年有所增加，陆军兵力也因此得到加强。

而这一次，在关键时刻拯救了美国陆军的麦克阿瑟并没有凯旋，而是被日本军队赶出了菲律宾。他此时的倔强，又能证明什么呢？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是死亡和悲伤，而死亡与悲伤一旦注入人类的血液，往往发酵成力量和不屈。

有时，人们经历了失败，换来的是刻骨铭心的感悟，和坚定不移的决心。麦克阿瑟拒绝修改他的誓言，与其说是这位名将倔强高傲的个性使然，不如说是这位名将责任心的驱动。一位名将之所以有无穷的个人魅力，就在于他敢于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胜利的和失败的一切承担责任！

在此后的太平洋战争中，麦克阿瑟也始终把自己的誓言作为激励自己一切行为的座右铭。从巴布新几内亚，到印度尼西亚，从印度尼西亚到菲律宾，为了“我将会回去”这个使命，他在整个西南太平洋和日军英勇奋战，甚至不惜和自己的同僚、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上将争夺主要进攻方向上，拍桌子翻脸。

1944年7月，罗斯福总统到珍珠港海军基地，召开军事会议，以确定今后美军对日作战的方向和目标。

对于麦克阿瑟来说，这是他两年来与海军将领进行斗争的高潮。

担任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官的尼米兹上将坚持认为，美军的主攻任务，应该由海军直接指挥，并绕过菲律宾，首先夺取台湾岛，然后直捣日本本土。

尼米兹讲完后，轮到麦克阿瑟发表意见了。

他在会前并不知道这次会议的议题，所以只能做即席发言。

他说：“菲律宾必须成为美军进攻的主要目标，因为这样可以切断日本本土的能源和原料的供应，尤其是石油的供应。如果我们美国故意绕过菲律宾，抛下我们的十几万俘虏，我们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侨民，以及菲律宾人民不管，让他们继续留在日军手里受折磨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会在广大人民中造成极为不利的影晌。另外，我们一旦这样做，就等于印证了日本宣传机构的宣传，说我们放弃了菲律宾，不愿为菲律宾人民的解放而流血。”

最终，麦克阿瑟以他雄辩的口才，说服了美国最高决策层。

罗斯福总统同意，对日军发动反攻，而且第一个目标，就是尼米兹打算绕过的菲律宾。

麦克阿瑟也就成为了太平洋战场上对敌决战的头号主角。

正是这种军人特有的大无畏精神和过人胆识，使麦克阿瑟能够勇往直前。

“我将会回去”这句话，此时早已远远地超出了麦克阿瑟个人的感情恩怨，成为在所有太平洋战区作战的美军、英军，以及被日军占



领的所有国家包括中国的军队和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一个坚定的信念。

1944年10月20日，麦克阿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这一天，他乘坐“纳尔维什”号旗舰，指挥28万大军在莱特岛登陆。

当时美军第1骑兵师占领了滩头阵地后，海岸上的战斗还远没有结束，麦克阿瑟就迫不及待地要下舰登上菲律宾的国土。

不料，他刚走到舷梯前时，又转身往回走。

副官赶紧问他：“将军，你要干什么？”

麦克阿瑟说：“这样可不行，我应当换一套崭新的军装。”

麦克阿瑟换上了一套崭新的卡其布新军装，戴着太阳镜、五星上将军帽，昂着头在大批随从的簇拥下，“哗哗”蹚着海水登上了莱特岛，也为全世界留下了一张经典的照片。

刚刚登上海滩，一场暴雨猝然而至，副官赶紧把伞撑开。

麦克阿瑟瞪了一眼太不懂事、居然动手破坏自己光辉形象的副官，厉声吩咐：“把伞拿开，我就在暴雨中发表讲话。”

这是老天爷特意为麦克阿瑟布置的一个最好的舞台。

枪炮声中，暴雨狂风声中，麦克阿瑟语气深沉，眼角流淌着雨水和泪水，这使他的演讲显得尤其铿锵有力，尤其撼人心魄。

第一句便是他已经在心里憋了两年多的那句话：

“菲律宾人民，我——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回来了！”

紧接着，他号召全军官兵为神圣的战死者，为子孙后代，继续战斗，夺取正义的胜利。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麦克阿瑟成为了一代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使他达到了军人荣耀的顶峰。他为最终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为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因此而获得了理所当然的最高荣誉。

1942年10月，他获得了盼望已久的国会荣誉勋章，1945年8月被任命为他梦寐以求的远东地区盟军最高统帅。

## 6. 震慑日本

1945年8月30日14时5分，杜鲁门总统授权麦克阿瑟，命令他以远东地区盟军最高司令的身份，飞抵日本厚木机场，主持日本的投降仪式，并且负责以后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重建工作。

麦克阿瑟立即致电杜鲁门：“我对你如此慷慨地给予我的信任深表感谢！”

麦克阿瑟高兴啊，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整整打了4年，如今终于在他手里画上了句号！

他决定举办一个盛大的、有纪念意义的仪式，让全世界人民都清清楚楚地看到，骄傲的日本人，是怎样低下他们那不可一世的头颅的。

他对幕僚们讲：“我绝不会像艾森豪威尔将军那样，居然在一个阴暗的房间里让德国人像小偷一样的投降——不，我决不！”

在日本投降仪式上，麦克阿瑟飞扬跋扈、唯我独尊的性格再一次显露无遗。

杜鲁门让麦克阿瑟主持投降仪式，美国海军不高兴了。凭什么啊？整个太平洋战争期间，更多的战役都是我海军打的，日本强大的联合舰队也是毁在我们手里的，现在好不容易打赢了，你却让一个陆军将领登上舞台，走到聚光灯下，来接受全世界的欢呼，享受这枚胜利的果实，这不给全世界人民一个印象，整个太平洋战争你麦克阿瑟是战胜日本人的最高统帅吗？

于是海军郑重其事地向杜鲁门总统呈交了一份报告，提出两条建议，一，即便投降仪式由陆军军官主持，仪式也应当在海军军舰上举行；二，如果麦克阿瑟代表盟军签字投降，那么，海军就应当代表美国政府签字。

杜鲁门为了平衡海陆两军的关系，接受了这两条建议，并且由他亲自确定在海军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投降仪式。

为什么那么多军舰杜鲁门偏偏要选“密苏里”号？

原来，美国总统同样也有一点平凡人自私的荣誉感——因为密苏里州是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号战列舰正是以杜鲁门的家乡命名的。



“密苏里”号当时的舰长是哈尔西将军，天大的殊荣从天而降，他高兴得发狂，马上派专机飞回美国安纳利斯海军学校，把保存在博物馆里的1853年美国佩里准将率领美国军舰第一次闯入日本岛时插上的那面已经成为珍贵文物的国旗接来，让它高高飘扬在“密苏里”号的舰艙上。

举行授降仪式那一天，“密苏里”号上同时升起了两面国旗。

8月28日，第一批美军占领横须贺，29日，哈尔西的第3舰队驶进东京湾。

麦克阿瑟8月30日下午2点19分乘坐C-54运输机，在军乐声中降落在厚木机场，下榻于东京新大饭店。

英国、苏联、中国、法国、澳大利亚、印度、荷兰、新西兰等盟国的授降代表也相继飞抵日本。

9月1日，尼米兹冒着倾盆大雨来到新大饭店会晤麦克阿瑟。

两位五星上将原本谈得非常融洽，可是麦克阿瑟突然又别出心裁地提出一个要求，对尼米兹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在军舰上升起过我的将旗，我想在授降的‘密苏里’号上，把我的将旗升上去。”

尼米兹淡然回他：“那不是我应当考虑的问题，交给我的副官替你办吧。”

尼米兹的副官拉马尔中校一听就皱紧了眉头，他为什么感到为难呢？那是因为一艘军舰上只有一根旗杆是用来挂将旗的，按照海军条例，太平洋战区所有军舰的旗杆上，只能挂他们的战区最高司令官尼米兹上将的将旗。

回来后拉马尔中校就请示尼米兹，麦克阿瑟的将旗该怎么挂？

尼米兹也有意思，说：“我不管，这是副官的事情。我想你们至少应当具备解决这一难题的智慧和能力。”

拉马尔就和其他副官商量了一下，总算想出了一个办法。准备到时候把麦克阿瑟的红色陆军将旗，和尼米兹的蓝色海军将旗并排升到主桅杆上。

拉马尔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两面五星上将的将旗一起升到同一根主桅杆上，这是美国海军史上的第一次。我想，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麦克阿瑟是一个骄傲的人，又是一个矛盾的人，尼克松总统如此评价他：“麦克阿瑟是一个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自相矛盾的传奇式人



物，他既是一位审慎的、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又是一位好摆架子和自负的战士；既是一位权利主义者，又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他还是一位天赋的极有鼓动力的演说家，像丘吉尔那样工于辞令，使成千上万的听众备受激励，并使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为之折服。”

作为在太平洋战争见证了美军失败与胜利的标志性人物，麦克阿瑟在日本授降的那一刻，又将如何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显示和张扬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魅力呢？

1945年9月2日是个礼拜天，阴霾密布，天色灰蒙。

上午7点钟，全世界赶来的记者——包括日本记者——都齐聚在“密苏里”号战列舰上。

记者们登上军舰，除了看到舰艏那一面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美国国旗，舰上还飘扬着另一面美国国旗。这面国旗同样非同一般，它就是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遭到袭击，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天飘扬在华盛顿国会大厦上空的那一面国旗——麦克阿瑟特地派飞机把它接来，因为它是美国遭到重创和获得最后胜利的见证者。

当日本代表们在投降书上签完字后，麦克阿瑟独特的个性终于表现在了全世界记者的眼中。

他一把掏出5支钢笔来签字，而且签字之前特意把两位骨瘦如柴的将军请到了他的身后，一位是英国陆军中将亚瑟·帕西瓦尔，他当时负责防守新加坡，后来抵抗不住，率领英军向山下奉文投降了。另一位则是美国乔纳森·温赖特将军，他承受了原本应当由麦克阿瑟承受的侮辱。麦克阿瑟奉命撤往澳大利亚时，把一副烂摊子扔给了他的这位副手，温赖特后来弹尽粮绝，也投降了。成为日军战俘后，他俩均被送往中国的沈阳战俘营关押，受尽了侮辱与折磨，直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才被麦克阿瑟专门派出的特遣小分队，乘飞机前去沈阳战俘营救出。

8月30日，麦克阿瑟把两位被日本人摧残得骨瘦如柴的老将军接到了东京，当他们在新大饭店里重逢时，麦克阿瑟与温赖特这位从地狱来到天堂的将军抱成一团，失声痛哭。

许多美军官兵震愕不已，他们从未想到，他们无比敬畏、极具威严的总司令，竟然也会像一个悲痛的孩子一样号啕痛哭，泪水涟涟……

麦克阿瑟拿起第一支笔，写了“DOUG”（道格），然后回身把这支笔赠送给温赖特将军；又拿起第二支笔写下“LAS”（拉斯），然后把这支笔赠送给帕西瓦尔将军；他用第三支笔写完他的姓“MACARTHUR”（麦克阿瑟）后，把这支笔交给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派来的代表。最后两支笔签署他的官衔。他把第四支笔赠送给他的母校——西点军校。第五支笔是一支红色袖珍笔，这支笔他珍藏了下来，回国后他送给了他心爱的第二任妻子费尔克洛斯·麦克阿瑟。

当麦克阿瑟宣布“仪式完毕”的话音刚落，天空便传来了庞大机群的轰鸣声。从关岛和塞班岛起飞的1000架轰炸机分秒不差地在这个时刻飞临“密苏里”号上空。

几乎在同时，从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1000架舰载机也威武地出现在东京湾上空，这2000架飞机以密集的队形遮天蔽日，呼啸着掠过“密苏里”号战列舰，每个人都看到身边的人忽明忽暗，那是因为连太阳也被机群遮蔽了。

麦克阿瑟安排如此庞大的机群在东京湾上空盘旋一圈，然后飞向远方云雾缭绕的富士山雪峰，就是要让每一个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对美国的巨大战力感同身受……

曾经长期以为自己武功高强，而骄狂得不可一世的大和民族，在这一阵麦克阿瑟有意制造出来的巨大的轰鸣声中战栗不已，魂飞魄散！

现在，这位刚刚过了古稀之年的天才将军，他的目光紧紧地盯住了北朝鲜的仁川港。

在朝鲜战场上，面对着眼下金日成的人民军，以及此后毛泽东麾下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他还能把军人的荣耀，挥洒得如此这般的淋漓尽致吗？

## 7. 毛泽东的“神机妙算”

釜山保卫战一直打到9月中旬，敌我双方隔着洛东江，在整条防线上的各个地段不时展开恶斗。

就在釜山唾手可得，韩国军队和美第8集团军即将被赶下日本海的紧要关头，更多的美国大兵源源不断地涌上了朝鲜半岛！

结果到了9月15号，美军在仁川一登陆，朝鲜战局果然被毛泽东不幸言中，人民军一败涂地。

危急关头，9月17号，周恩来紧急召见前来北京上任不久的朝鲜大使李周渊，谈过朝鲜当前严峻局势后，说：“如果朝鲜需要中国政府替你们做点什么，现在还来得及。”

同时，北京致电莫斯科，建议中国军队立即进入朝鲜，帮助人民军守住“三八线”，因为“三八线”以北，人民军已经没有部队了。

但是，斯大林还是不同意。

在此期间，他忙着做了两件事，一是接连发电给什特科夫，要他说服金日成，立即把集结在洛东江一带进攻釜山的所有部队调回“三八线”以北；二是以自己当年的战斗经历为榜样，给金日成打气。

他在电报里是这样说的：“金日成同志，不要因为在与外国干涉者的斗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在这样的战争中是没有连续胜利的。俄国在内战时期，尤其是对德作战时期就未曾有过连续的胜利。”

他还鼓舞金日成说，“朝鲜人民最大的胜利就是，朝鲜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国家，成为亚洲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解放运动的旗帜。一切被压迫人民的军队现在都将向朝鲜人民军学习给予美帝及其他帝国主义者以坚决打击的艺术。此外，金日成同志不要忘记，现在朝鲜并不是孤立的，他拥有现在和将来都将援助他的朋友。俄国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装干涉时期的处境，比现在朝鲜同志的处境，要困难得多”。<sup>①</sup>

他还教导年轻的金日成：“革命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只要你能坚持下去，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对于中国主动提出出兵援朝的事，斯大林一字不提。

斯大林那里没指望了，身处绝境的金日成这才于19号召开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紧急会议，讨论的议题只有一个：要不要请中国出兵援助？所有参会者都表示对中国出兵求之不得，巴不得中国军队马上就

<sup>①</sup>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之《斯大林关于对朝鲜人民军作战的建议致什特科夫电》。



出现在朝鲜战场上，替他们挡住“联合国军”的穷追猛打。

从内心讲，即便到了这样的时候，金日成还是想去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搬救兵，而且救兵最好不是中国军队。

可仗打到这个份上，当初又在斯大林面前把自己的军队吹嘘得神勇无敌，战无不胜，现在牛皮“砰”的一下破了，他都没脸去见斯大林，只好派文日前去苏联驻平壤大使馆，打听打听苏联方面有什么想法再说。

文日到了苏联大使馆，对什特科夫说：“朝鲜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了，你们说话比我们管用，能不能请中国出兵帮帮我们？”

什特科夫问：“你这是金日成的意见，还是政治局通过的决议？”

文日想了想，不敢说是金日成叫他来的，说：“都不是，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

什特科夫心里明镜似的，说：“既然是个人意见，那就算了。”

话虽这样说，实际上文日一离开，什特科夫还是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斯大林。

斯大林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从美军在仁川登陆的第二天，莫斯科就紧张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美国陆战队开始推进到汉江南岸，美国飞机完全控制了朝鲜的制空权之后，斯大林终于沉不住气了。他一面下令国防部长紧急制订一项出动苏联空军去保卫平壤的计划，一面致电金日成，强调美国人在仁川的登陆具有重大意义，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1和第2军团与北朝鲜后方的联系。为确保整个战线的稳固，不使美国人的阴谋得逞，有必要迅速从南方撤出4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非常关注美军在仁川的登陆。对于美军可能会利用朝鲜半岛的地理特点，从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作战这一点，毛泽东等人早就有所担心。

但是，由于金日成一直反感中国方面介入朝鲜半岛的事务，因此毛泽东几乎没有可能就这个问题与金日成交换意见。

不仅如此，尽管在斯大林的催促下，中国方面得以向平壤派出了自己的大使，但在金日成的有意封锁下，仍然得不到准确、详细的战况情报。

因此，美军在仁川登陆3天后，周恩来不得不约见苏联大使，要

求苏联政府能够迅速提供有关朝鲜战局的更加准确的和及时的情报，并且提出建议：“朝鲜人民军应当集中全部预备队，消灭仁川登陆之敌。如果缺少这样的部队，务必从南方将主力部队撤下来。”

实际上，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出中国非出兵不可了。

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军委已经决定要力争向朝鲜派出军事先遣小组，以便勘察地形，做好出兵作战的准备。

毛泽东同时通知东北局负责人高岗：“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

对此，斯大林也看得同样清楚。为了避免中朝之间发生误会，他专门复电北京，为金日成辩解说，未能及时向中国方面提供军事情报，是因为金日成与前线司令部的联系有困难，包括他本人得到的有关情报，也多是来自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而不是金日成。

他表示，人民军是一支很年轻的部队，指挥系统很不完善，干部也很不得力，要指望人民军在后方的少数预备队抗击仁川登陆的美军是不现实的，他同意必须从前线撤出主力部队来建立巩固的防线。

考虑到人民军主力正在对釜山发动新一轮攻势，苏联驻平壤的大使和军事顾问显然寄希望于金日成能够用全力把美国人赶下海去。

而更重要的是，即使北朝鲜这时能够很快从南部前线撤下来几个师，要想马上组织起对付具有海空优势的美军的有效防线，在时间上也是难以做到的。

更何况，据苏联军事顾问报告，人民军从上到下部队指挥组织得很差，有线通信被敌机轰炸破坏，无线通信既缺少熟练的报务员，也无法保障燃料的供应，通讯常常中断，斯大林又不允许苏联顾问随军行动。因此，后方对整个前线的情况也只有断断续续的报告，指挥都很困难。

9月25日，即美军实施登陆作战第10天，汉城即告陷落。“联合国军”占领了尚州、安东，并已向清州方向发展。而人民军围攻釜山的作战也因腹背受敌而告失利，釜山方向的“联合国军”已开始大举北进，其狂轰滥炸更是使人民军处于只有被动挨打而无法招架的境地；集中在南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已经被打散，面临被围歼的严重危险。

苏联顾问这时向斯大林报告说：“人民军部队主要由于敌人空军而遭到巨大损失，损失了几乎所有坦克和许多大炮，正在进行困难的



阻击战，部队缺少弹药和燃料，几乎没有补充。”

形势异常严峻。

带着斯大林的撤退命令刚刚到达朝鲜不久的苏联武装部队副总参谋长，化名马特维耶夫的苏共特别代表团团长明确认为：必须立即向中国人请求帮助，至少应当马上请中国朋友派遣1500名以上的司机到朝鲜来，以帮助运送武器弹药和军队。

但是，由于金日成不同意向中国求援，始终寄希望于苏联的直接帮助——也就是出动苏联红军，因而朝鲜方面迟迟没有向中国提出请求。

从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中可以看到，至少有3次毛泽东就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登陆，袭击人民军后方一事郑重地提醒过金日成。既有直接给金日成的电报，又有通过驻朝大使倪志亮和大使馆参赞柴成文，以及经由苏联方面转达的意见。

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总参谋部对朝鲜战局的分析和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海军陆战队在此登陆。”

说得够清楚、够准确了吧？

能够把美军下一步的作战意图判断分毫不差，就算麦克阿瑟的参谋长是一位潜伏的中共特别党员，送回的情报，也莫过如此吧。

毛泽东在8月底和9月初两次接见金日成派来的特使李相朝，与之讨论战争形势，指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只想击退敌人，夺占领土。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仁川—汉城和南浦—平壤这样的主要枢纽地区，极有可能遭到敌人袭击，你们应考虑到将来退却和重新部署兵力的问题。”

刘少奇也给踌躇满志的金日成泼了一盆冷水，托李相朝特使带话回去：“不要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应当让人民做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金日成一概置若罔闻。

究其原因，第一，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当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战争已经转入胶着状态时，金日成满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马上就会打破僵局。”

当柴成文问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

第二，朝鲜领导层普遍存在着速胜思想和冒险主义倾向。

柴成文向北京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的预判是美国不会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动员和以强制手段征召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继后的全民武装，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

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

“不，请转告周恩来同志，”金日成的回答既生硬，又坚决，“我从未考虑过退却。”

在当时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及时出动，无论是在后方防御美军登陆，还是在釜山前线协助进攻，都会明显地影响战局发展。

然而，由于中朝双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战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没有其他摆不上台面的原因——如金日成对中国出兵心存顾忌——朝鲜方面也同样不会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

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主持的中国总参谋部频繁发出“美军极有可能会在仁川登陆”的这一带有“神机妙算”色彩的预警，中国和苏联的档案均可相互印证其真实性。

英国历史学家菲力普·肖特所著《毛泽东传》里这样写道：“两星期后，毛泽东的担心加深了。周恩来的一位军事参谋相信，美军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就要在朝鲜半岛狭窄腰杆上的北纬38度线南侧的仁川采取行动，那一条线是南北两部分的通常划分线。毛泽东抬眼看了一下地图，这位年轻参谋所作的战情分析也让他信服了。他命令解放军调动50万部队部署在东北边境一带，并开始计划一场为时一年的战争。与此同时，他向金日成发出一项紧急警告。他说，从战略上讲，美国确实是一只纸老虎；但从战术上讲，美国又是一只真老虎，而且要吃人的，朝鲜人应该重新集结准备打退一次登陆袭击。从



战术的观点看问题，有时撤退比进攻更好。你的敌人是很难对付的。不要忘记，你正在同帝国主义的首领作战，所以必须做好最坏情况的准备。”

英国人提到的“周恩来的军事参谋”，就是曾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时任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雷英夫。

时年29岁的雷英夫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中写道：

8月23日夜晩，我从居仁堂总参作战室回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后，把大家研究的结果向总理作了汇报，没想到总理异乎寻常地注意小参谋们的意见，认为这是朝鲜战局带关键性的问题，值得重视。他马上拿起电话向毛主席作了简要的汇报，毛主席也非常重视这一情况，要总理立刻带我到他那里去，当面详细谈一谈。于是我带着朝鲜战场情况标图和有关资料，随总理乘车到了菊香书屋。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我第一次晋见毛主席，也是我第一次向毛主席汇报重大的军事情况。

总理把我这几年到华东前线下放锻炼的情况向主席作了介绍，并简要地说了我们关于朝鲜战局的意见，然后就让我详细汇报。我打开地图先讲了朝鲜战场上双方的作战态势，接着讲了有关的情报资料和我们对这些情报资料研究的初步结论，即前面说的6条根据。

我说现在看来，敌人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如果仁川登陆成功，便会切断人民军的战略补给线，洛东江和仁川的敌人就会在战略上形成南北夹击和包围人民军主力的态势。这样，朝鲜战场的局势，就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最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觉得朝鲜战局表面上很好，实际上很险。

毛主席边听边点头，说：“这些判断有道理，很重要。”

最后，毛主席着重指出，美军在仁川登陆确实是个值得密切注意的大战略问题。

我们汇报的情况和作出的美军有极大可能在仁川登陆的判断，引起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高度重视。为了防止万一，毛主席和周总理决定马上采取3个措施：

(1) 检查督促东北边防军各项战备工作的情况，严令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动作战。并强调说



明：只要把这件事办好了，我们就主动了。

(2) 将敌人可能在仁川等地登陆和朝鲜人民军应该有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如主动后撤，仁川应摆点部队，做点工事等，告诉朝鲜和苏联方面，供他们参考。

(3) 总参谋部和外交部，要随时密切注视朝鲜战场情况的变化。

俄国学者巴让诺夫引用1950年7月2日罗申给莫斯科的电报说，周恩来在与苏联大使的会谈中转达了毛泽东对北朝鲜人的建议：“鉴于美国军队可能在仁川地区登陆，应在仁川一带建立一条坚强的防线。”

中国人再次把话说得太清楚不过！

另外，柴成文回忆说：“我也打过电话给金日成，明确提醒美军有可能在人民军后方仁川或者是元山登陆。”

可是，金日成对中国方面的多次提醒，一概装耳朵聋。

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从骨子里从来就不信任中国人。

仁川的海水特别浅，而且礁石密布，只有等到涨大潮时军舰才能靠近海岸，而且每次涨大潮的时间顶多只有两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内倘若登陆受阻，潮水一退，所有军舰都得被搁在浅滩上，成为人民军炮兵的活靶子。所以美国国防部从上到下，尤其是海军将领们，没有一个人同意麦克阿瑟的作战方案。

天才与普通人的区别，恰恰就表现在这样的时刻。麦克阿瑟心无旁骛，固执得无法理喻，他就认准了仁川这地儿，其他的登陆点根本不予考虑。

9月6日，他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说：“毫无疑问，本作战方案具备可行性，我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极高。我坚信夺取主动权唯一的希望，必依本案肇致。并借此引出机会，予敌人决定性的一击。”

麦克阿瑟和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之间的争论是现代最有趣的例子之一：同样一种形势，在一个军事家眼里是大胜的良机，而在其他军事家看来却是莫大的危险。由于麦克阿瑟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这场争辩的结果使麦克阿瑟头上军事天才的光环更加灿烂夺目，但却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黯然失色。

于是便有了这样一种观点，麦克阿瑟事事正确，同时后来当他实施军事上最为冒险的行动时，这种观点也束缚住了联席会议参谋长们



的手脚，以致不敢责备这位远东地区的美军最高司令官。

许多人难以相信在麦克阿瑟身上依附着一个军事善恶两面人的特征。

在美国人的文化意识中，英雄是无懈可击的。

然而，这位构想并坚定地实施了仁川登陆的将军，仅仅在几星期后便不顾公开的警告，眼睁睁地跨进了彭德怀为他设下的伏击圈。

这便显出麦克阿瑟是一位凡人。他和任何普通人一样，既有灵光乍现的时候，也会犯寻常人可能犯的错误。

然而，正是作为一个人而不是神，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才显得机遇与风险并存。他透过仁川恶劣的地理条件，把这些困难看作是以奇制胜的保证。除此之外，作为一位70岁高龄的老兵，他那充沛的精力和毅力也令人敬佩，他不但说服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他的行动，还使他们提供了他认为发动进攻所需要的兵力。

得到必需的部队决非易事，因为当时美国军方领导机构毫无准备，许多军方和政界领导人坚信，对美国的威胁不是来自突出于亚洲的一个半岛，而是来自欧洲，那里有数百万全副武装的俄国兵和两万辆坦克，只待克里姆林宫一声令下，便会倾巢而出。

麦克阿瑟资格太老，权力太大，脾气太倔，谁也拗不过他。最后，麦克阿瑟集中了7万精兵强将，在9月15日夜里展开了登陆行动。

但是，老谋深算的麦克阿瑟绝对不会在仁川孤注一掷。根据战后资料的披露，他在积极谋划仁川登陆作战的同时，也让他的参谋班子制订了一份从朝鲜撤往日本的详尽计划，并且让美国海军已经做好大规模的准备。

相比而言，在这一点上，金日成准备不足，显得太稚嫩。

金日成成为了一鼓作气把美国人和南韩军赶下大海，把北朝鲜15至46岁的男人通通征召入伍，不当正规军，便做预备队，或者是全副武装的民兵，来了个“全民皆兵”。整个国家的物资也倾囊而出，尽可能地集中于6月25日发起的这一次战役。战争一旦失利，后果便不堪设想。

美军仁川登陆在国际上的影响尤为巨大，军事价值上同样举足轻重。但是具体到仁川登陆的作战过程，几乎可以说麦克阿瑟是兵不血刃就达到了战略目的。

因为，麦克阿瑟集中了7万名精兵强将，而根据情报，防守在仁川港附近的北朝鲜兵力不到两个营，顶多也就1000人，火力仅仅是不超过10门火炮和一些机枪。

7万人对1000人，这能叫打仗么？

朝鲜迄今为止仍然在使用的中学历史教材里关于仁川登陆，是这样教育自己学生的：

1950年9月中旬，仁川登陆作战时，美帝国主义倾巢出动了在太平洋地区的陆海空部队，地中海舰队和追随美国的15个国家的军队也都被拖入了大规模的作战计划。我们的人民军勇士们仅靠4门大炮和一个中队的力量，对抗了70000多兵力和300艘军舰以及1000架飞机，苦守月尾岛3天，保证了人民军队战略性撤退，保存了反攻的力量。

一个中队就是一个连，顶多200来人，要对付数百倍于己的美军海陆空的进攻，也真是难为朝鲜人民军勇士了。

## 第六章

# 没嘴的档案会说话

### 1. 虚心使人聪明，骄傲使人犯傻

朝鲜已经打得地覆天翻，毛泽东却毫不知情。斯大林和金日成不谋而合，均对他封锁了开战消息和情报。

金日成在信心十足、踌躇满志的时候，显然不希望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而斯大林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对于这位新盟友有两点顾忌：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会抽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开始对中国封锁消息，继而又要中国同意参加战争。经过这样周密的安排，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据一位在金日成对“延安派”搞大清洗时逃到北京来的朝鲜高层人士回忆，在战争爆发之前，所有苏联援助朝鲜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目的显然就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备战情况。以至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金日成才派人到北京通报情况。对此，毛泽东十分愤怒地对师哲说：“金日成真不像话，他们是我们的近邻，战争爆发也不和我们商量，现在才来打招呼。”

抱怨归抱怨，不过，毛泽东这时候其实就已经在考虑出兵了。

7月7号，就是朝鲜内战爆发后的第13天，毛泽东指示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保卫国防的会议。7月13日，中央军委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这是一个极其重要，在日后看来极有远见的部署。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东北边防军，抽调了四野的主力第13兵团的38、39、40军，和留在东北的第42军，一共4个军，进驻中朝边界。

之所以选中第13兵团，重要的原因是几个月前，第13兵团作为国防机动部队，部署在中国腹部，可以随时调动到中原地区。这支原第四野战军的主力兵团中，官兵以东北人居多，能够适应寒冷地区作战，且对东北地区的地形很熟悉，作战勇敢。

第13兵团领导班子的配备也颇费心思，经中央军委反复研究，决定“临阵换将”，任命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改任第13兵团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同时还将最精锐的炮兵第1、第2、第8，以及4个高炮团、3个汽车团、2个工兵团等，与第13兵团一起，共约25.5万大军，在中朝边境布防，以防不测。

由于军情紧急，时年40岁的邓华只能与即将分娩的妻子李玉芝匆匆告别。

登车之际，邓华对妻子说：“瓦罐难免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上亡，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颇有几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况味。

8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9月6日，曾泽生的第50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志愿军司令部电台队长杨雨田回忆说：“为了掩盖部队调动这样一个动向，就把这个15兵团的番号仍然留在广州，不动，只由邓华司令带领我们原班子的人马入朝。因为我们离香港很近，香港搞情报的人很多，也很厉害，部队稍有变化，人家就知道了，何况是这么大规模的调动。”

相比编入东北边防军的兄弟部队，第42军的动作更早一些。

6月29号中午，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派秘书给第42军军长吴瑞林送来亲笔信，信上只有一句话，“吴瑞林同志：即来军区面谈。高岗”。

见面后，高岗对吴瑞林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第42军7



至10天之内，集结于通化、梅河口一线，整装待命。”

在新中国的国防部署中，最靠近朝鲜的东北，当时还处于战略大后方的地位。东北军区成建制的部队，只有6个警备师和部分地方部队。仅有的一个军级建制，还是从第四野战军中北调到黑龙江大兴安岭，执行中央屯垦任务的第42军。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于永波那时候还是第42军某团一位宣传干事。他随部队最早入朝，并参加了第一至第四次战役。

晚年他回忆说：“42军实际上变成我军第一支生产建设兵团了，部队到了齐齐哈尔北安一带，立即动员官兵搞大生产，意思就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枪都集中保管，官兵手里使上了锄头、镰刀，整天都到地里去搞生产，大家想的都是秋后怎么样能向国家多交点粮食。眼看庄稼长势非常好，这个时候，要求突然又变了。42军很快就开始动员收兵归营，地也不种了，木也不伐了，枪也重新回到手中。简短的动员后，部队马上坐火车开到通化柳河。我们师部住三原浦，我们团住小通沟。在那地方整天就忙着集训备战，做战前动员。战士们可高兴了，为什么呢？大米、白面，用东北话叫作可劲造，猪肉天天都有，还管够。”

从7月份组织东北边防军，毛泽东就发出指示，“8月5日完成集结，作好出动准备”。

后来被迫推迟的原因是，苏式装备正陆续运来，作为第一批入朝作战的部队一时来不及完成换装——当时中国方面的想法是全部志愿军都换穿朝鲜军服，秘密出兵帮助金日成。

但是，金日成却采取了拒绝的态度。

中国请求派军事参谋小组到朝鲜绘制地图、了解战况，也同样被他拒之于国门之外。

金日成这一推，就推到了9月中旬美军仁川登陆之前，高岗亲自赶到13兵团召开干部动员大会，让准备入朝作战的首批部队5个军，全部换上了朝鲜人民军军装。指挥员也都有了个朝鲜名字。

中国方面万事俱备，但金日成就是咬紧钢牙不松口，仍然不同意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甚至连中国方面希望他能够提供一批朝鲜地图这样的事，他也置之不理。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不得不用日本人绘制的老地图。结果由于年代太久，地形和地名的改变，图上的东西和地面上的东西很多已经对不上号，给志愿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

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首先试图攻克的重大目标就是汉城。“联合国军”直插汉城，切断了人民军的后方补给，使人民军陷入了美军的大包围圈中，配合空中的狂轰滥炸，迫使人民军已经不能及时集结和突围，不得不从包围釜山的洛东江战线紧急向北撤退。

麦克阿瑟希望在9月25日以前夺取汉城，那天正好是战争爆发3个月之后。阿尔蒙德提到，麦克阿瑟非常希望在那一天发表一份夺回汉城的公报，因此要求陆战队要严格遵守他定下的时间表完成各自的任务。

但是，美军在汉城南郊却遇到了朝鲜人民军的勇猛抵抗，大约有1万名装备精良的生力军从北部急速赶来，依托地形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准备和“联合国军”决一死战。西海岸人民军防御部队和一些汉城市民，被组织起来在汉城市区和城郊进行了防御。市民们必须自带工具，替人民军修筑防御工事。当局还把武器发给他们，要求其参加汉城保卫战。北朝鲜的工矿企业和广大农村，也纷纷举行群众集会和发出慰问信，支援和鼓励“汉城保卫者们展开顽强的斗争，以争取更多地歼灭敌人”。

9月21日，“联合国军”的进攻遭遇到顽强的抵抗，开始出动飞机疯狂轰炸汉城。他们向市区投掷了大量的凝固汽油弹，把汉城不少地方变成了一片火海。所有通往城外的道路上全都奔涌着逃难的人群。23日，美军终于攻入汉城市区，与守军逐街逐屋地进行巷战。

墨尔本《先驱报》特派记者沃尔于9月24日从金浦机场经杏州去汉城，乘水陆两用履带车渡过汉江，跋涉2.5英里，然后乘吉普车进入汉城市内。他看到途中的道路上堆满了残砖碎瓦，约有5厘米厚，尘土在车后像拉开了烟幕一样，随风飞扬，连一米的距离也看不见。激烈的巷战过后，电线耷拉下来，被破坏的车辆到处都有。有一些房屋笼罩在烈火浓烟之中，难民捶胸顿足，大声哭叫，情景非常悲惨，就连他这样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也从未见过这样的惨状。

“联合国军”突入汉城后，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巷战，让沃尔这样的随军记者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没有直接受到战火伤害的南朝鲜人或许是对战争司空见惯的缘故吧，他们居然对发生在眼前的这场激烈的战斗表现得漠不关心——当然，炸弹落到他们的房屋或头上时又另当别论——所以在巷战最激烈的时候，汉城的人口并没有明显的减



少，孩子们也若无其事。“联合国军”到来时，向他们招手和挥旗，有的还能喊出两个生硬的英语单词：“哈罗，口香糖！”

进入巷战的第二天，道路上不少行人被打死了。沃尔到市内去看了德寿宫，或许因为这里是制高点，有军事上的特殊作用，这一带巷战造成的破坏相比其他地方要严重得多。他还在途中看见3名北朝鲜女兵，手中握着“波波沙”冲锋枪倒在大街上。他听到不远处什么地方，枪声还在响个不停，那就表明巷战仍在进行，人民军士兵还在进行着顽强的抵抗。

麦克阿瑟大概是过分地陶醉于自己在仁川登陆战的神机妙算和辉煌战果上了，竟然没有及早制订一个乘胜拿下全局的后续计划。明摆着他此时最应当做的是从仁川一直打到东海岸，一举切断南下人民军的退路。这部分军队是金日成的全部本钱，此时已经溃不成军，一旦被全歼，“联合国军”再向北打就不会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了。

可偏偏麦克阿瑟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犯了傻。他丝毫也没有在陆地上向东直插的打算，反而让刚在仁川登陆的第10军重新登上军舰，沿着朝鲜半岛绕了大半个圈，赶到东海岸的元山港登陆。让从釜山一路打来，本已疲惫不堪的第8集团军向平壤方向攻击前进。

这就等于是放开中路，让人民军余部有机会逃到北方，得以重新集结。

10月10日，当运载第10军的庞大舰队还在元山港外等着麦克阿瑟派来帮忙的日本人扫除水雷时，一支南韩军队已经沿着东海岸，徒步进入了元山港，使麦克阿瑟的这一番煞费苦心的调兵遣将，完全成了无用功。美国记者讥讽他“导演了一场‘联合国军’在海上举行的武装大游行”。

大人物一招不慎，会耽误历史进程，甚至动辄以几万、几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

总结麦克阿瑟的这段经历，可以套用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言：虚心使人聪明，骄傲使人犯傻。



## 2. 我把贵国的首都送还给你

9月25日傍晚，这是麦克阿瑟要求夺回汉城的最后期限。

此时，残阳夕照下的这座朝鲜半岛上最大的都市，已经变成了一大片残垣断壁。人民军的顽强抵抗，让麦克阿瑟拟定的时间表不得不往后推迟了两天。

9月27日，美军攻克汉城；3天后，整个“三八线”以南地区全部被“联合国军”收复。

28日，星期四，麦克阿瑟的专机“巴丹”号与李承晚夫妇和议员以及美国大使穆乔等外交代表乘坐的C-54运输机于上午8点从釜山机场起飞，上午10点在金浦机场降落。

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率领一大群陆海空军将领前来迎接。

然后，麦克阿瑟乘坐一辆雪弗兰轿车向汉城进发。在他的座驾后面，跟着4辆参谋人员的汽车和40辆满载记者和其他中低级军官的吉普车。浩浩荡荡的车队出了机场，卷起一路灰尘，驰过美军工兵用舟桥接通的汉江大桥，从麻浦地区经西大门，进入了汉城市区。

从汉江大桥到国会议事堂沿途由史密斯将军的海军陆战队第1师士兵警戒。麦克阿瑟和李承晚沿着这条大道前往国会议事堂，将在那里举行麦克阿瑟将汉城交还给李承晚的还都仪式。

沿路陆战队士兵就位后，市民们摇着太极旗聚集到了大道两侧，哭着喊着欢迎他们的总统和美国大救星回来。

坐在车上的李承晚总统哭了，夹道欢迎他们的市民都面带饥色和疲惫，都很消瘦，四周一片过火的痕迹。他们的家都被烧毁了，是李承晚和他手下的官员将军们让老百姓遭受了如此的境遇，是他们没有让老百姓躲过这一场战祸，人们对国家的罪人竟然如此欢迎，总统和高级官员们看到这样的情景，全都泪流满面……

映入李承晚泪光迷蒙的眼帘中的汉城街景是那样的凄凉：道路两侧的房屋很多都被炸毁了，地上处处可见像烧焦的死蛇一样的电线。坦克、大炮的残骸、人民军士兵和市民的尸体随着道路的延伸不断出现。人民军设置阵地用的沙袋虽已搬走，漏下的沙子和烟灰仍在疾风中飞扬。接近市中心满眼都是烧残的大楼，挂着的电线像垂柳在风中飘拂。过去繁华热闹的市区到处是被烟火熏黑了的砖石框架，临街一



面有着巨大白色罗马柱的国会议事堂几乎所有的墙上都弹痕累累，可以想象双方的争夺是何等激烈。

尽管成队的步兵和陆战队员用了好几个小时，才把数百名战死者的尸体拖出这座有着高大罗马柱的庞大建筑，但还是能嗅到从破碎的窗户里散发出来的死尸的气味。

这时候，参谋长阿尔蒙德凑到麦克阿瑟身边，称史密斯师长刚才打来电话，说他的陆战队员们进入汉城时遭到了百余名人民军的袭击。虽然陆战队很快消灭了敌人，但是现在看来，市内应该还残留有人民军的零星武装人员。

阿尔蒙德还向麦克阿瑟转告史密斯的提醒：“史密斯说，一会儿军乐队的演奏，不是明显告诉敌人，我们的重要人物，此时此刻聚集在什么地方吗？”

麦克阿瑟感谢史密斯的提醒，挥挥大烟斗对阿尔蒙德说：“马上把军乐队撤下去，还都大典的仪式上也不要什么主持人，我自己来客串主持人好了。”

用作举行还都大典场所的国会议事堂有一部分被炸弹炸崩塌了，形状残缺，到处龇牙咧嘴。内部也被炮弹和火焰熏黑了，地上满是玻璃碎片，中央圆顶的破口里投下一束光柱，将大厅里照耀得亮堂堂的。

大厅里排好了椅子，韩国政要、外交使团、第8集团军和第10军的指挥官们分别就座，台上以沃克为首的陆海空军军官整齐地站立着。大厅内虽有一些私语声但还是显得比较安静，可以听见东大门方向的机枪声，和国会议事堂边上的德昌宫里木头在烈火中的烧裂声。

正午，中央大厅屋顶的破洞被风吹得发出了悲鸣般的声音，麦克阿瑟和李承晚夫妇出现在主席台上，还都大典正式开始。

麦克阿瑟站在讲坛前，没有开场白，满面肃然地说道：“在慈悲的神的保佑下，象征着人类最大希望的‘联合国军’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解放了韩国古老的首都。尊敬的总统阁下，我对我能够亲手将贵国的首都送还给您和您的政府，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犹如华彩乐段般动人的演讲结束后，显然动了感情的麦帅请大家起来，一起向上帝祈祷。

紧接着，客串主持人的麦帅请李承晚讲话。

74岁，特意穿上了民族服装的大韩民国总统走到了讲坛边，和70岁的麦克阿瑟紧紧拥抱在一起，久久不能分开。

所有参加大典的人都流着眼泪，疯狂鼓掌。

李承晚站起身来，向着台下鞠了一躬，当他抬起头来时，人们看到他老泪纵横。平时才华横溢，口若悬河的总统，此刻却激动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表现我和大韩民国人民……对英勇的美国军队和麦克阿瑟将军的感激之情……”

刚说到这里，天井圆顶破口处残留的玻璃被风吹落下来，而且还在陆陆续续地往下掉。

“从约100英尺高处掉下那么大的玻璃碎片，士兵们戴着钢盔当然不怕，我们这些文职人员可没东西护着脑袋，用力鼓掌的话，掌声说不定会引起更多的碎片掉下来呢。”在场的随军记者哈罗德·诺布尔在他的战地报道中这样写道。

李承晚向麦克阿瑟颁发了韩国的最高勋章“太极武功勋章”，因为勋章来不及准备，所以先以证书代替，勋章容后再补。

典礼结束后，麦克阿瑟到陆战1师的临时驻地里和士兵们一起吃过午饭，于下午1点35分乘“巴丹”号飞离金浦机场，4点返抵东京厚木机场。

李承晚送走麦克阿瑟后，乘敞篷汽车在市内绕行了一圈，接受市民的欢迎，然后返回已经离开了3个月的景武台总统官邸。

随即，麦克阿瑟发布了敦促北朝鲜军总司令投降的声明。

北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阁下：

你的军队已经全面失败，战斗能力已完全丧失。我作为“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敦促你的部队放下武器，停止敌对行为。我希望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和财产损失，期望你抓紧时机，早作决定。

“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的胸中充满了自信。

同时，事先准备好的250万份韩语促降声明被装上多架飞机，撒往“三八线”以北地区，以及平壤等北朝鲜城市和基地。

人民军退去的“三八线”以南的各个城市乡村、房屋基本上都被烧毁了，尸体到处都是。泗州监狱里发现了300具被烧焦的尸体，大田机场挖出了约500具双手反绑被射杀的南韩军士兵的遗体以及数千

具市民的遗体。安义、咸阳、全州、公州、原州等地都挖出了数百人的遗体，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

同样血腥的报复性屠杀立即大规模开始施行，李承晚的反共敢死队进入汉城后，以“附逆者”的罪名大肆逮捕并杀害了600多名汉城的电车工人。凡是在人民军占领期间以行动和语言支持过劳动党和人民军的群众，一律被抓了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到枪杀。军警把人头砍下来摆满村镇大街，孕妇和儿童也不能幸免。杀人规模和残忍程度与人民军对反革命分子毫不留情的镇压不分伯仲。

东京《朝日新闻》报道：“首尔郊外的高阳市。登上主干道旁的小山丘，可以看到像井一样敞口的黑暗深坑。1995年，这里发现了153人的遗骨。朝鲜战争开始数日后，这一带成为北朝鲜的控制区，可不到3个月又被韩国抢回。因为‘帮助了敌人’，农民们被右翼团体和警察强行带走，在深坑前被一个个枪杀了。死者当中也有少年少女。因遗属们的要求，国家的独立机构‘真相·和解委员会’（旨在查明真相达成和解的既往事件处理委员会）经过调查，2007年承认那是‘韩国警察实施的非法集体枪杀事件’，提出了国家应正式谢罪的建议。”

前美陆战1师老兵马丁·罗斯在回忆录《突出重围——陆战1师长津湖之战》里也写到了屠杀：

威廉·贝茨少校从坦克连过来，他看见一长队身穿白衣的平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步履蹒跚地走过火车站。当他发现一些士兵在驱赶他们时，他警觉地坐起身来。在队伍的尾部有一组人拿着铁锹。贝茨找来一个翻译便追赶过去，当他赶上时，步枪手们已经站成一排，那些拿铁锹的人将人群聚集到一个土堆后面。“很明显，他们的计划是等枪手们准备完毕，”贝茨说，“就将这些犯人赶到开阔地上，让他们成为活靶子。”

“在沙滩上，我注意到随军牧师愤怒地走来走去，两手一会儿抱在胸前，一会儿又垂下来。我问他出了什么事情，他手指向一座小山包，‘那里将发生恐怖的事情。’他说。他告诉我当地的青年团将同情共产党的家庭都抓起来了，‘等他们的坟墓挖好了，就会被枪毙的’。”

贝茨少校找到青年团的头领，命令他立即停下来。面对美国人

的干涉，青年团的头领很愤怒。他向翻译叫喊道，这些人都是共产党，死得其所。“也许这是真的，”贝茨说，“但是没有审判就大肆屠杀肯定是不公平的，而且这里大约有15名儿童，有的还不到10岁。”虽然站成一排的枪手严重抗议，贝茨还是将这些犯人带到车站，将他们交给一名南韩军官，让他们坐上离开汉城的最后一列火车。陆战队的老兵推测这些犯人一到元山，就会被枪毙。

刚刚抵达汉城的英国第29旅旅长汤姆·布罗迪准将曾亲自干涉过一起南朝鲜军警进行的大规模屠杀，现场就在距他指挥部几百码处。但是当他听到枪声时为时已晚，在他能够制止这次大屠杀以前，23名男女犯人已经被枪决，幸存者被带回汉城监狱。

一群愤怒的英联邦记者——他们对战争报道早已感到厌烦——随着这些犯人而去。他们要求被允许进入监狱。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雷内·卡特福斯是其中之一。他在发回伦敦的报道中写道：“长长的一队犯人歪歪扭扭地穿过里面的院子，他们一听到监狱看守尖厉的吼叫，便停下来跪在雪地里。我立刻感觉到，真正令人心悲的是他们看上去像小丑，瘦得只剩皮包骨了。根根头发奇形怪状地直立着，脸色发绿，就像台球桌面的颜色，鼻子冻得通红，他们跪在地上，不停地咳嗽、颤抖。”

在首都汉城，李承晚的敢死队部署在各个地方。数以千计的政治犯，其中大部分仅因敢于质问李承晚残酷无情的专制统治而遭逮捕，并被警方处决。

一次，占据汉城北部的英国军队惊讶地看到一辆货车满载着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男女犯人由令人憎恶的国家宪兵队押解着，飞快驶去。犯人们的双手用电线捆绑在背后。

一位愤怒的英国军官说：“他们让这群可怜的犯人跪在深沟里，用自动步枪从脑后向他们射击。”

汉城处处充满血腥的味道。许多老百姓并不知意识形态为何物，为了生存，他们在人民军占领时期不得不与其合作，参加各种组织，如今却因为这样的“罪名”，成为了被肆意屠杀的对象。不久，人民军再次进入汉城，同样被屠杀的命运，又轮到了支持和帮助过大韩民国政权的市民头上。

就在李承晚在汉城大肆屠杀“亲共分子”的同时，美军凭借自己



的优势装备和兵力，继续向北进攻，追击已经全面溃散的人民军。

### 3. 被忽悠的中国情报官

直到进入1950年7月，毛泽东还没有最后确定把自己的攻击力量放在台湾和朝鲜两个方向中的哪一边。

但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他认定这两个方向的挑战或者威胁都是来自美国，他已经下定决心要和处处与中国作对的美国人打一仗。并且按照他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贯战略思想，他必须尽快在南北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

随着美军卷入朝鲜战争，毛泽东的注意力也立即由南方转向了北方。8月11日中央军委最后决定将解放台湾的战役推迟到1951年以后，到了9月底，毛泽东甚至亲自指示：取消在国庆节庆祝活动中使用许诺限期解放台湾的口号。

所以，尽管毛泽东不愿意看到在中国北方邻国发生一场可能导致美国干涉亚洲事务的战争，并且一再向金日成强调只有在中国完成统一事业后，才能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但是当1950年5月得知斯大林和金日成已经就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统一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时，作为“东亚地区革命事业的最高负责人”，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在解放台湾之前先解决朝鲜的统一问题，并且表示愿意给朝鲜以各种援助。

而现在朝鲜“革命”真的遇到大麻烦了，毛泽东自然要考虑如何履行自己的诺言和义务。特别是在莫斯科表明要中国介入战争的意向后，毛泽东就没有退缩的理由了。

美国人卷入战争后，斯大林立即想到应该让中国人到战场上去和美军缠斗。毛泽东未必没有想到斯大林是要中国为苏联火中取栗，但莫斯科施加的压力从社会主义阵营分工，与国际主义精神的角度而言，显然无可指责，这进一步促使毛泽东在南北两个战场选择的问题上迅速做出决断。从7月7号东北边防军的组建，到8月5号毛泽东发出关于边防军“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的指示，均充分表明此时的中国，已经有了出兵朝鲜的打算和准备。

如果仅从“保家卫国”的角度考虑问题，那么当时北朝鲜在军事对峙中尚无败迹，中国只需屯兵于鸭绿江北岸，以备不测就可以了。而此时就考虑到出兵朝鲜的问题，明显包含有主动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国际主义责任和义务的因素。

显然，一旦朝鲜政权的存亡受到威胁，而中国袖手旁观，那么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以及中共作为马列主义政党的形象，必然会受到极大损伤。

毛泽东在8月4日政治局会议上对此所做的解释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开始站在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岗位上考虑问题。

7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奉命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向罗申大使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从敌后进行偷袭的作战方案，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

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回电表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

斯大林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尚在武汉协和医院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成文以政务参赞的名义，火速前往朝鲜。

柴成文，原名柴军武，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遂平县。1936年考入北平大学商学院俄文班，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回遂平组织平津流亡同学抗日促进会。同年入西南联大，后到延安，入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1年任第18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参谋、情报股长起，至1949年任西南军区情报处处长，柴成文成为战争熔炉锻造出来的一名资深老情报官。

全国刚刚解放，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又将这位老情报官转型成为一名外交官。

1950年6月25日，也就是金日成的8万大军越过“三八线”，向南大举进攻的当天，柴成文奉命离开西南军区所在地重庆，急赴北京报到。可见他的任务，与这场猝然爆发的战争的关系有多么紧密！

6月30日，杜鲁门下令美军介入朝鲜战争。

同一天深夜，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柴成文，同时在座的



还有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以及军委情报部副部长刘志坚。

这次紧急召见，改变了柴成文的航向，他的人生经历也因此变得风生水起，更具传奇色彩。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立即宣布参战，派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且公开表示要大力援助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战争，从而完成在亚洲下一步军事行动的部署。

这样一来，金日成在朝鲜半岛上挑起的战火，就与台湾、越南，以及整个远东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周恩来告诉柴成文，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央考虑，要准确地掌握战场动态，就必须尽快派自己的军事观察员前往平壤，说：“聂老总建议派你去，伯承同志也觉得合适，你自己有什么意见？”

原本已经接到通知，将前往柏林大使馆工作的柴成文，万万没有想到会被突然改派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去。

但，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解放军军官，这不是自己可以考虑的问题，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总理，我服从组织决定。”

周恩来对他说：“美国把侵略矛头指向了我们，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准备。现在需要有人与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络。但倪志亮同志还在武汉养病，所以，派你带几个懂军事的干部先到平壤去。”略作停顿，周恩来又说：“总参的意见是你们以军事观察组的名义去朝鲜。我考虑还是以使馆人员的身份去更好。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其他人员由刘志坚同志负责挑选，章汉夫同志帮助他们做必要的业务准备，争取尽早出发。”

经过紧急筹备，几天就完成了赴朝的准备工作的。

除柴成文外，最后确定一同去朝鲜的还有参赞倪蔚庭、薛宗华，一秘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纲、刘向文，另有4名电台工作人员。柴成文任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

1950年7月8日清晨，周恩来再次接见了当晚即将出发的柴成文工作小组一行，对他们的工作任务作了具体指示。

周恩来说：“你这次作为高级武官兼政务参赞去，就待在金日成身边，发生了什么事，第一时间向中央报告。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大使馆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多方面了解战争情况，并及时向中央报告战场情况的



变化。”

柴成文小组7月10日早晨到达平壤。金日成当天就接见了他们，然后把他们安排到劳动党中央高级招待所住下，每天好吃好喝地伺候着，并指定时任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的徐辉（“延安派”），每天向柴成文介绍战场情况。他还专门指示有关部门在柴成文的房间里安装了一部专线电话。

金日成对他说：“你拿起这机子，我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了，有什么事，你直接对我说。”

不仅如此，金日成还吩咐朝军总参谋部指派专人，每天晚上给柴成文小组送来最新战报。

享受金日成直接安排下的这种“特殊优待”，让柴成文很是意外。因为，他知道当时的中朝关系并不十分协调，有时甚至是很紧张的。据苏联外交官员回忆，“在战争前夕，中国驻平壤代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方机构的关系就十分紧张，有时甚至要苏联大使什特科夫充当协调人”。

正因为如此，柴成文离开北京时，还带了一封周恩来给金日成的亲笔信。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在信中郑重其事地向金日成特别强调“此人是可靠的”。

8月12日，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身体尚未痊愈，即抱病赶到平壤上任。9月2日，柴成文接国内电召尽快回北京汇报工作。在和倪志亮大使、武官朱光、参赞薛宗华等人一起商议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柴成文根据情报分析，提出敌人有很大可能将在仁川等地登陆的判断。经过讨论，其他人也同意他的这个看法。9月4日，倪大使和柴成文又和金日成见了一面，了解了一些前方最新的情况，并向金日成当面提出了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登陆的判断。

9月6日白天，柴成文动手整理所有了解到的朝鲜战场有关情况，写汇报提纲。还没弄完，中南海西花厅的紧急电话来了，命令他立即回国汇报情况。

柴成文片刻不停，马上动身，于7日凌晨飞抵北京。

8日下午，柴成文即向代总长聂荣臻作汇报。

其时，朝鲜人民军正与美韩军在洛东江以南、以东地区打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战局已处于胶着状态。美军在全力阻止人民军进攻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人民军后方交通线的空中封锁与破坏，并不断侦



察与轰炸沿海港口。

在谈到对战局发展趋势的判断时，柴成文特别指出：“情报显示，美军已把在釜山防御圈内作战的海军陆战队调回日本，正在积极编组新的陆战师。这表明美军已在努力进行反攻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反攻就会开始，而且非常可能会在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以此拉开反攻的帷幕。”

聂老总打断柴成文的汇报，问：“你们估计，敌人如果登陆，最可能的登陆地点是哪里？”

柴成文回答：“我们认为登陆地点很可能在仁川。自古以来，仁川都被称为是汉城的西大门，无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讲，都至关重要。只要拿下仁川，敌人就能直捣汉城，既可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后方运输线，又可与洛东江防御圈内的被围部队相互呼应，对人民军主力造成前后夹击之势。据了解，最近一个时期，敌人小股部队在仁川沿海的月尾岛、德积岛等处活动频繁，似乎是在为这一战略构想创造条件。”

几个小时的汇报过程里，柴成文侃侃而谈，聂荣臻则不时地提出问题。待柴成文汇报完，聂荣臻将汇报提纲拿过去，说要马上呈报给毛主席看。

柴成文赶紧说：“我这个提纲是匆忙手写的，很潦草，原本打算弄完后再抄写一遍的，北京催得急，只好拿着草稿就飞回来了，既然毛主席要看，最好让我抄一遍再上报？”

聂荣臻说：“不要再耽搁了，能看清楚就行。”

当天下午，这份提纲便出现在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看完后当即批示：“请恩来约柴成文具体一谈。”

当日深夜，柴成文便被召进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朝鲜战况。

柴成文认为，现在人民军已呈强弩之末，难以再前进，又没有制空权、制海权，长期耗下去，将十分不利。

周恩来问：“万一情况有个突然变化，如果需要我们出兵入朝作战，你看会遇到什么困难？”

由此可见，这时中央最高领导层已经预见到北朝鲜将会面临持久作战，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已经为时不远了。

时隔一日，柴成文又专门向林彪汇报，林彪听完后向柴成文提的问题是：“如果战局逆转，我们不出兵，让他们上山打游击，你看行

不行？”

柴成文回答：“朝鲜地域狭窄，回旋余地不大，打游击恐怕很困难。不过，在靠近鸭绿江北部山区，倒是可以坚持的。把后勤和医院放到东北，打不赢就往我们的地盘上跑嘛。”

果然不出柴成文所料，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带来的朝鲜半岛的变天，与他事前的分析判断，大致无二，也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密切关注。

9月20日，周恩来再次召见柴成文，一同受到召见的还有第13兵团司令部侦察处处长崔醒农，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第39军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何凌登，第40军118师参谋长汤敬仲。他们和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5人系由东北边防军临时组成的“入朝先遣小组”，通报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并征得金日成同意，与柴成文一同赴朝工作。

周总理宣布“入朝先遣小组”的任务是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场准备，之后说：“在中央就出兵朝鲜问题未作决定之前，不宜用其他名义，你们对外均称大使馆武官，由柴成文同志安排一切。”

9月27日，柴成文一行乘专机飞到沈阳，再分乘5辆吉普车赶到平壤，金日成给5名中国“武官”批准签发了委任状，要求朝鲜有关党政军机关沿途给予协助。

这时，“联合国军”已经夺回了汉城，战况急转直下，先遣小组原定去汉城，现在只好改变路线。

据柴成文回忆，先遣小组在朝鲜前后活动了两周时间。由于情况紧急，平壤已经处于大撤退前夕的混乱之中。

10月1日晚上，金日成紧急召见倪志亮大使与柴成文代办。

在首相官邸，金日成明确向他们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尽快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倪志亮的电报迅速发回国内。

以后，柴成文两次陪同金日成到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并多次参加金日成首相与彭德怀司令员商谈军情要务的会晤；彭德怀与金日成商议重大事宜的电报，也由柴成文亲自转报。在板门店谈判期间，柴成文又成为了中朝谈判代表团的秘书长，参加了其激烈程度绝不亚于炮火纷飞、白刃相搏的战场的谈判工作。

半个多世纪以后，柴成文回忆说：“我刚到平壤的时候，还很高



兴，金日成给我的待遇不低嘛。拿起电话就是金日成的声音，而且他中国话讲得和中国人一样溜，我们通话都是用中国话，根本用不着翻译。后来日子稍长我一想，老这样可不行，别人是一国首相，我这么个小武官，怎么能天天给他打电话呀？可这专门给我安的专线电话，除了金日成，其他任何人也打不通。其他的高级干部，也全都不敢和我搭话。我一日三餐都是在劳动党中央大院的食堂里吃饭，经常见到他们。而朝鲜劳动党中有一大批高级干部抗日战争时期都是在延安生活过的，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相崔庸健、副相武亭等人，都是这批‘延安派’，他们和我在延安时期就已经是很熟很熟的老朋友了，武亭那时还是唯一一个进入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外国人。可是，除了同样是‘延安派’的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他后来当过一段时间的总政治局局长——遵照金日成的指示，每天来给我送战情通报。其他人即便我每天和他们在食堂里见面，却很少有人敢和我搭话，见了我柴成文犹似路人；我主动上前招呼，他们也不回应，扭头就走，一副避之不及的样子，好像我是个麻风病人。后来，徐辉悄悄告诉我，让我不要怪大家，金日成有指示，不准和我接触交谈。”

再说每天送到房间里来的战报。当时柴成文挺高兴，有现成的情报，自己的工作就轻松多了。

后来才明白，金日成每天派人送给他的战报，都是第二天的广播稿。

比方说，7月9日他接到一份战报，马上发给了国内。第二天，这份战报便作为来自朝鲜战场的最新消息，被中国的报纸、电台告诉了全中国人民。

可是柴成文却在10号这天无意中看到该战报竟然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了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机关报《劳动新闻》上。

同样的情况还有，他7月19日发往北京的情报，又一字不差地出现在第二天的《劳动新闻》上。

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成文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

尽管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曾在中国工作过很长时间，此时因工作关系常常到使馆吃可口的中国饭菜，但显然是受到纪律的严格约

束，他也从不谈及内部的军事情况。

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掌握战场动态的参谋团，也遭到谢绝。

不久柴成文回国述职，中央军委开会的时候，聂荣臻操着一口川腔把他训斥了一顿：“柴成文，你搞些啥子鬼名堂？总理派你过去搞情报，你咋个天天抄人家的报纸？我们都看了报，你送回来的东西，报纸上全都登得有嘛。”

柴成文一脸委屈地申辩：“金日成每天送我的就是这个，给我装的电话只通金日成一个人，朝鲜同志又全都不敢和我说话，他就是安心把我弄成个聋子哑巴嘛！”

#### 4. 金日成的求援信

金日成在发动战争之前和他打得顺风顺水的时候，千方百计对中国封锁消息，只有一个解释：不愿让中国军队介入他发动的这场他认为手到擒来的战争。

但是，仁川登陆以后，战局立即发生了重大变化。27日，沿着京（汉城）釜（山）公路突进的美韩军与从仁川登陆的美军会师，人民军的退路被全线封锁。已经挺进到南方的人民军腹背受敌，顿时阵脚大乱，无法招架美韩军队的反击，纷纷扭头北撤，沿途又遭到美国空军的肆意屠杀，很少有部队能成建制撤回“三八线”以北。人民军全部被打残了，打垮了，打得没形了。落入美军包围圈里的人民军残部各自为战，顽强突围，许多队伍化整为零，官兵们逃进深山，化为就地坚持的游击队。

当然，投降的也多如过江之鲫，他们主要是从南朝鲜抓来的壮丁，一听枪响，便风起云涌，争相缴械，甚至反戈一击。

人民军虽然没有被“联合国军”全部围歼，但遭受的损失仍然是巨大的和致命的。根据战后资料统计，突入到南方的8万人民军真正撤回“三八线”以北的只有2万多人。在损失的兵员中，1万多人伤亡，2万多人被俘，成为游击队员的有2万人以上。



而且，人民军的重装备几乎全部丢失。

金日成在离鸭绿江不远的江界建立的战时首都向全军发布严厉命令：“我们一些军官，被出现的新情况吓得惊慌失措，擅自丢弃武器，放弃阵地。现在，我们已经无处可退！一步也不能再退！”他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号召：“今天，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用鲜血保卫三千里江山的每一寸土地！”

9月27日，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军事代表马特维耶夫给莫斯科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汇报了朝鲜的严重局势：“人民军损失惨重，装备弹药严重供应不足，燃料缺乏，运输差不多已完全瘫痪。兵员与弹药补充的组织工作很差。部队指挥系统从上到下，一团糟糕。”

这一次，是斯大林相信战争再也不能打下去了。

27日，就在麦克阿瑟和李承晚在汉城举行“还都大典”的前一天，他召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斯大林严厉批评朝鲜人民军各级指挥机关在指挥和战术方面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并强调苏联军事顾问必须对这些错误负直接责任，特别是拖延了撤退时间。

鉴于战争已经无法进行下去，会议决定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责成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立即寻找机会与美国政府的代表接触，寻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同时要苏联军事顾问全力组织北朝鲜人民军的撤退工作。

斯大林致电金日成，要他在4天之内将部队撤往“三八线”以北地区，恢复到战前状态。同时还给什特科夫大使和拉祖瓦耶夫总顾问下了一道死命令：绝对不能让一个在朝鲜的苏联顾问成为美国人的俘虏。

可以看出，这个时候斯大林还试图从外交上找到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进而缓解这一局势的办法，中国出兵仍然不在他的考虑之中。他虽然也同意马特维耶夫的提议，但也还只是局限在同意向金日成建议，请中国朋友火速派遣1500名司机到朝鲜来救急。

显然，在斯大林遥控、苏联军事顾问指导下的这场战争遭遇如此惨败，甚至使斯大林对建议金日成向毛泽东求援一事都颇觉脸上无光。故而特别告诫拉祖瓦耶夫：切记让金日成“不要提莫斯科”。

28日，被打得落花流水、损兵折将的金日成实在没招了，连夜把劳动党政治局委员们通知来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对战局的办法。

会正开着哩，又接到前线急报，说韩国军队作为“联合国军”的

前锋，已经大模大样地越过“三八线”，正气势汹汹向平壤杀来。

在国家政权存亡续绝的生死关头，政治局委员们都急白了脸嚷嚷：仗都打到这个份上了，还坐下来议什么请求中国人帮忙有必要无必要呀，赶紧向毛泽东同志写求援信吧，再耽误就来不及啦！

政治局委员们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求毛泽东尽快出兵参战，除此以外的任何手段，都已无法挽救朝鲜危局。

金日成的考虑则是既要毛泽东派救兵，还得要面子。

所以，会议最终认定，由于大部分人民军主力未能撤回来，在汉城陷落后，人民军已无法阻止具有巨大优势的美国军队占据南部朝鲜；而美军一旦取得战场上的优势，就势必会越过“三八线”，剩余的人民军是不可能进行有效抵抗的。因此政治局一致认为，必须向苏联要求直接的军事援助。如果苏联不便出兵，至少也要促使曾经许诺过帮助朝鲜的中国，直接出兵援助。

向中国方面提出这种请求是令人沮丧的，因此，在起草了求援信之后，金日成于29日晚还向什特科夫询问美国人是否真的会越过“三八线”。他表示，他还是想依靠本国的力量统一国家，但他不清楚美军会不会越过“三八线”。因为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那么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无法组织起新的部队，即便仓促组织起来，也不可能有效地抗击美国这样的强大敌人。而且整个党政军机关和残存的部队，全部都得退到中国东北，才有可能生存下去。

苏联大使表示，对此，他不能提供任何肯定的意见。

金日成在2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很有意思。他说：“同志们说得都很好，我们是应该请中国人出兵帮助我们。但是，斯大林同志给了我们一切，给了那么多的钱，那么好的武器装备，我们把仗打成这个样子，现在请中国人出兵帮着我们打，斯大林同志会怎么想？”

到了这样的地步，悲痛欲绝的金日成才最终下定请毛泽东出兵救命的决心。

求援电稿拟好后，金日成请出席会议的什特科夫先看看。

苏联大使汲取了前一次被斯大林骂得来狗血淋头的教训，多了个心眼，急忙摆着手对金日成说：“别给我看，千万别给我看，直接发给斯大林同志就行了。”

紧接着，什特科夫将与金日成的谈话内容以及由金日成与朴宪永



联合署名的求援电报连夜发往了莫斯科。

微妙的是，这封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救援的信，却在地理上绕了一个大大的圈。金日成的求援信既不发给毛泽东，也不发给周恩来，而是交给什特科夫，请苏联大使发给莫斯科。而斯大林早在金日成发动这场战争之前，就曾当面向他明确表示过，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苏联人也是绝对不可能卷入进去和美国人正面厮杀的。

更令人费解的是，明明是恳求中国政府出兵保国救命，朝鲜政府一、二把手联名发出的这封信从头至尾，却几乎看不到中国两个字；至于笃定会在中国政府出兵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毛泽东，居然吝啬得连姓名也忘记提一下。

莫斯科苏联外交部

致葛罗米柯同志：

转呈我收到的金日成和朴宪永给斯大林同志的信（译自朝文）。

此信是朴宪永同志亲自交给我的。

什特科夫

附件：

1950年9月29日金日成、朴宪永给斯大林的信。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最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

我们以朝鲜劳动党的名义，向您，朝鲜人民的解放者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致以最深切的谢意，感谢您经常对正在为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我国人民所给予的支持和援助。

我们在这封信中想简要地向您通报目前我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解放战争前线的局势。

在美军发动仁川登陆战役前，战场形势不能说对我们不利。

那时敌人接连失败，一直被赶到南朝鲜最南端的一块不大的地区，我们很有可能取得决战的胜利。这种局势大大动摇了美国军队的威望。

这时美国为了挽回自己的威望，为了实现无论如何要夺取朝鲜作为自己军事战略基地的这个蓄谋已久的计划，它动员了太平洋的



几乎全部陆海空军，于今年9月15日实施登陆战役，在仁川地区登陆了大量军队和武器装备。敌人占领仁川后，正在汉城内进行巷战。

形势十分危急。

人民军各部队正英勇地抗击着向前推进的登陆之敌。然而，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您报告，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

敌人各种型号的近千架飞机，在未遇我方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完全夺取了制空权，对我前线和后方实行昼夜不间断的空袭。在前线，敌机械化部队在数百架飞机的掩护下，无障碍地进行机动作战，造成我方人员和物资的巨大损失。同时，敌机肆无忌惮地轰炸铁路、公路，摧毁电报电话线路、通信设施和其他目标，破坏我军给养供应，瓦解我军的作战意志，使我们无法适时展开反击作战。我们在整个战线都面临着这样的困难。

敌军在切断了我军各部队之间的所有联系之后，已使仁川登陆的和突破我南部防线的这两支部队会合，从而使汉城的失陷已不可避免。

在这种情况下，在朝鲜南部作战的人民军各部队已被敌人从北面加以分割，散处于南部的人民军目前无法补充弹药、给养和干粮。此外，一些部队已失去联系，有些已被敌人包围。

显然，敌人只要一攻占整个汉城，就将向北朝鲜继续进攻。因此，我们认为，如果今后还将继续存在上述对我们不利的条件，那么美国的侵略最终将获胜。

为了保证军队能得到一切必需品和不断向前线运送给养，我们首先必须拥有相应的空中力量。然而，我们没有受过训练的干部。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们有信心克服面临的困难，决不让朝鲜沦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军事基地。为了人民的独立、民主和幸福，我们将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因此，我们果断地采取坚决的措施：组建和训练一些新的师；把在南朝鲜动员来的十余万人的军队部署在更有利的作战地区；武装全民，准备打持久战。

尽管如此，如果敌人不给我们时间来实现我们预定的措施，而且还利用我们极端严重的局面来加速对北朝鲜的进攻战役，那么我们将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阻挡敌人。

因而，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我们不能不请求您给



予特别的援助。换句话说，当敌军跨过“三八线”以北的时刻，我们非常需要苏联方面的直接军事援助。

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军事援助。

我们的上述建议妥否，请您给予指示。

顺致敬意！

朝鲜劳动党中央金日成朴宪永

1950年9月29日<sup>①</sup>

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骨子里其实就是一个意思：斯大林同志，我们已经顶不住了，请你赶快出面发句话，让毛泽东同志赶紧派兵来救救我们吧！

尴尬、犹豫、痛苦、绝望，金日成经过再三煎熬，最终仍然不得不向毛泽东求援。而且求助的对象并不单单是中国，而是“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难道他那颗硕大的脑瓜子就真没想过，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东德、阿尔巴尼亚、古巴这样的小国家，真要出一个师、一个团、一个营，在这节骨眼上能救得了朝鲜？这大头还不得落在咱们中国人肩上！

可想而知，即使北朝鲜到了奄奄一息、命悬一线的地步，金日成仍旧在和毛泽东玩虚招。

金日成当然知道共产国际曾经在西班牙内战时组织过一支国际纵队，支援反对佛朗哥政权而遭到政府军围攻的共产党支持的武装。他退而求其次，假如苏联不愿出兵参战，那就把这样一幕，搬到他统治的国家重新上演。

10月1日凌晨2点50分，斯大林接到金日成与朴宪永的电报后，立即给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回电。

平壤

致什特科夫、马特维耶夫同志：

你们9月3日和10月1日的电报收到了。从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

<sup>①</sup>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之《什特科夫关于转呈金日成给斯大林的求援信致葛罗米柯电》。

金日成同志和其他朝鲜领导同志向你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而你们却对这些问题避而不答。我认为你们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朝鲜同志自然要征询建议和寻求帮助，而什特科夫同志却故不作答，从而使朝鲜领导人更加动摇不定。派马特维耶夫同志去朝鲜，不是要他汇报那些我们不派他去也能知道的关于朝鲜事件的情况，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向莫斯科提出他对于朝鲜军事形势的详尽的分析，而且他也未能根据形势提出任何建议，从而使我们难以在朝鲜问题上做出决断。

马特维耶夫同志对朝鲜领导人的帮助不大，因为朝鲜领导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在“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的共和国进行防御的计划，没有从南朝鲜撤出军队的计划。

请你们今后在朝鲜的活动中考虑这些指示。

请立即拜访金日成和朴宪永并转告他们：

第一，敌人是否会越过“三八线”北进。对于这个问题应当从最坏处着想，即敌人将力图占领北朝鲜，因此必须毫不迟延地动员一切力量，不让敌人越过“三八线”，同时也要做好同敌人在“三八线”以北战斗的准备。

不能对朝鲜共和国在组织防御方面的力量和潜力估计不足。在朝鲜北方，有巨大的动员潜力和资源。在目前的困难形势下，无论如何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一靠加强现有的部队，二靠新编部队，完成组建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的任务。所有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全部由我们提供。

我认为，所谓北朝鲜不能在“三八线”和“三八线”以北进行抵抗的说法是错误的。朝鲜政府有力量，只是需要把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并利用一切潜力进行防御。应全力加快新编部队和兵团的组建，这些部队的武器装备已经在运往朝鲜的路上。同时必须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把部队从南方撤出，这样做的考虑是，在南方没有连成一片的战线，因而部队完全有可能撤到北方。这件事要抓紧去做，因为美国人肯定会在近期想方设法阻止这些部队北撤。

第二，在南方，在敌人后方，必须转而进行游击活动。为此目的除了可以利用由当地居民组成的游击队，还可以利用留在南方、没有可能撤到北方的部队。游击队员的任务是——破坏交通线，破坏通讯机构和线路，袭击敌人官兵，并采取其他积极的行动，从而

搞乱和惊扰敌人的后方。

第三，目前的形势要求有坚强的领导，并根据组织顽强防御的新任务对领导班子进行改组。为此必须首先消除领导人中间的动摇情绪，严格和明确地确定领导同志的职责，每个人都有明确的任务并对某些国防问题承担责任。应当立即采取无情的措施消灭反动势力和维护自己后方的秩序。为了对付敌人空投的破坏分子，应当成立由可靠的人组成的地方歼敌自卫队。政府在其驻地必须拥有一支由可靠的和忠于政府的人组成的强大的突击队。必须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在主要港口和敌人登陆部队有可能登陆的地方布雷；在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四，至于金日成同志给冯西同志的信中提出的关于派武装力量援助的问题，我们认为最能接受的援助形式是派志愿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得先同中国同志们进行协商。你们将于近日收到对金日成同志来信的答复。

冯西<sup>①</sup>

1950年10月1日<sup>②</sup>

随即，斯大林又以个人名义直接电告金日成：“金日成同志，你和你领导下的人民为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与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国际反动势力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精神可嘉，令人敬佩，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战斗。但是，鉴于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我们与美国人关于国际事务的约定，苏联是不能直接派军队进入朝鲜作战的。我们认为，组织国际支援部队是个好办法，最好是中国人去，因为他们不受任何国际法的约束。所以，你不要着急，这件事由我和毛泽东同志直接商量。”

斯大林电报里说的中国人“不受任何国际法的约束”的意思，在这里是指那时的中国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当然也无义务执行联合国的任何决议。

同一天，斯大林也给北京发来电报。

<sup>①</sup> 冯西是斯大林使用的另一化名。

<sup>②</sup>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之《斯大林关于对朝鲜局势的处理意见致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电》。

北京

苏联大使：

请立即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

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

莫斯科在9月16日就已提醒过朝鲜同志，美国人在仁川登陆的意义非同小可，其目的在于切断北朝鲜第1和第2方面军与北部后方的联系。莫斯科曾提醒他们应迅速从南方至少撤出4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然后逐步将大部分的南方部队撤到北方，并以此保住“三八线”。但第1和第2方面军司令部未能执行金日成关于将部队撤往北方的命令，从而使美国人得以切断部队并把他们包围起来。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进行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没有设防的。

我考虑，根据眼下的形势，如果您认为能为朝鲜人提供援军，哪怕五六个师也好，应即刻向“三八线”开进，从而使朝鲜同志能够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部队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

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

等候您的答复。

此致

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1日<sup>①</sup>

斯大林的电报发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的领袖们正神采奕奕，站在高悬着大红宫灯的天安门城楼上，手扶汉白玉栏杆，俯视着巨大广场上汹涌澎湃，纵情欢呼的人海。

国庆之夜，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大片升腾而起的焰火把夜空点缀得多姿多彩，明亮的探照灯光柱，在空中欢快地跳跃。广场上，欢声笑语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sup>①</sup>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之《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问题致罗申电》。



焦灼的苏联大使罗申送来斯大林的电报后，毛泽东进到城楼上的休息室，将电报匆匆浏览了一遍。

毛泽东直到天安门庆祝仪式结束，乘车返回中南海才得到报告，就在他接到斯大林的电报的几乎同一时刻，东京广播电台正在播送麦克阿瑟总司令向朝鲜人民军最高统帅金日成发出的“投降敦促书”。

从9月28日开始，大批南朝鲜军队已经陆续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此时已经在战场上占尽上风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得意洋洋地对他的将领们说：“这条线只是地图上的，实际上，它根本就不存在。”

10月2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建议：立即在朝鲜停火，并撤出所有外国军队。

无人理睬。

接到斯大林电报的当天夜里，毛泽东和接到电话后火速赶到丰泽园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林彪一起紧急商量对策。

毛泽东首先态度明确地表示：“这件事要管。”

周、朱、刘三人的态度一开始都很谨慎。刘少奇、朱德和林彪表示反对，周恩来也很犹豫。毛泽东见意见难以统一，于是提议次日拿到政治局书记处会议上再作决定。

现在，战争已经发展到最危急的关头，援救朝鲜的责任，终于落到了对亚洲革命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的毛泽东身上。

当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成功，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北进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时候，现实的环境和条件已经双双发生了急剧变化，一切因素都迫使毛泽东必须迅速做出参与战争的最后决策。

2日凌晨，毛泽东紧急电告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三、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决定中国是否出兵的高层会议尚未召开，但是，中国的战争准备机器已经轰然发动——实际上，毛泽东早就把美军是否越过“三八线”，作为判断这场战争是否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标准了。

9月25日晚，北京。印度大使贾瓦拉姆·潘尼迦与通常都是愉快、友好、坦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兼华北军区司令员聂

荣臻将军共进晚餐。

晚饭后他们聊天式地谈起朝鲜正在进行的战争。聂荣臻平静地透露说中国人不打算袖手旁观，坐视美国人打到他们的东北边境。

他对潘尼迦说得非常明确：“中国政府对美军突破‘三八线’，绝不会置之不理。”

将军平静轻松的语气，给被这个消息所震惊、迷惑的潘尼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我们很清楚自己的处境，”聂荣臻继续说道，“但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美国的侵略行径。美国人可以用飞机轰炸我们，可以摧毁我们的工业，但是我们能够在陆地上打败他们。”

潘尼迦提醒说，这样的破坏将会使中国倒退半个世纪，甚至中国的内陆地区的大城市也可能遭到大规模的轰炸。

“我们已经考虑了一切问题，他们甚至会向我们扔原子弹。但那又怎么样呢？他们也许会杀死我们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但一个国家不付出重大牺牲是不能捍卫独立的。”显然他对原子弹的威力早有考虑，然后又说，“中国经济毕竟主要以农业为主。原子弹在中国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呢？是的，我们的经济发展将会倒退。或许，我们只有静候这种情况发生了。”

9月27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便从英国方面收到了关于聂荣臻与潘尼迦的谈话内容，但是却不以为然，因为英国人在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上加了“旁注”，他们认为潘尼迦是个“反复无常、很不可靠的报告者，并且在过去有过亲共和反美倾向”。

9月30日，周恩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的酒会上发表讲话，公开谴责了“这种美帝国主义疯狂的暴力侵略行径”，并公开宣称，“美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危险的敌人”。

为了表示出心中的愤怒，平素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怒形于色，几乎每一句话都透出了最大的音量，并且一次又一次，用力挥动着未曾受过伤的左手——看上去就像在用刀劈什么东西一样——声色俱厉地说：“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美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居肆意侵略，而置之不理！”

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周恩来在定稿时特意加上的，其目的显然是要引起美国政府对可能参与朝鲜战争的重视。但此时麦克阿瑟

正在顺利地向“三八线”进军，白宫和五角大楼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进中国的警告。同样，莫斯科也没有注意到周恩来的弦外之音。

除了公开的声明外，周恩来还通过其他渠道向美国传递了中国政府的声音。当得知“联合国军”可能已经越过“三八线”后，于是，10月2日到3日间午夜刚过不久，潘尼迦大使被召到了周恩来的府邸。中国人知道告诉了印度人，就等于告诉了美国人，因为，那时的新中国与美国之间，已经断绝了一切沟通渠道。

周恩来向潘尼迦郑重地表达了中国政府在朝鲜战争中所持的严正立场：“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在约见潘尼迦前，周恩来曾特别嘱咐自己的翻译浦寿昌，在“要管”的翻译上要加重分量，这两个字的意义非比寻常。

潘尼迦立即向本国的政府汇报，并在第二天通知了英国的外交代表。

10月3日上午，周恩来的警告通过英国渠道迅速传到了华盛顿。

遗憾的是，美国当局由于受到英国人的误导，仍然认为潘尼迦是同情共产党的人，是“带有政治色彩的传声筒”，没能掂量清楚这些话的真正分量。

潘尼迦再次转达的警告，仍然没有受到美国人应有的重视。

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里评论说，“潘尼迦曾时不时地为中国共产党人效力”。

正因为如此，杜鲁门反而怀疑周恩来的警告可能是一种宣传策略，或者是企图阻止联合国大会通过干预北朝鲜的决议，因为此时决议正在辩论之中。

对于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出的这些声明和信息，美国单方面认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政治恫吓和外交勒索”，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不过是“说说而已”。新中国不敢直接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美国军队较量，不会插手朝鲜问题。

美国政论家詹姆士·雷士顿在描写华盛顿对印度政府转达的周恩来警告的反应时笨拙地调侃道：“尽管共和党确信，中共总是按照克里姆林宫的吩咐行事，可是叫毛泽东自杀，他总还是要犹豫一番的。”

事实证明，美国当局的判断大谬。



中华民族乃礼仪之邦，中国人民先礼后兵，言之有预，对美国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警告再三，先告诉你，别欺人太甚；再告诉你，别过那道生死线；最后甚至明白摊牌，你要越过“三八线”我们就不能不管。然而那个年头的头号强国听不懂或不愿听懂这个“言之有预”，根本就没有把尚在襁褓中的新中国放在眼里，仍然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的国家”来认识这个古老土地上的新生国家，认定了欺侮了你也是白欺侮。这个时候，除了掂枪挟炮起而反抗侵略，还能拿什么东西与他们平等对话、平等交流？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之所以在中国人民中具有毫不含糊、毋庸置疑的号召力，正是因为中国人民从并不久远的历史教训中就能很方便地比较鉴别：这直奔家门而来的客人，究竟是好心，还是歹意！

寇能往，我亦能往！军事基地遍布全球的世界头号强国都可以声称“安全”受到威胁，因而远涉重洋肆意践踏他国的土地，那么被这把侵略凶焰烧到了鸭绿江边的中国，在得到邻国之请后伸出援手扫清家门，又有什么可以值得非议的呢？

一年后，尼赫鲁的妹妹潘迪特夫人曾对周恩来说：“自从你们起而抵抗以后，现在美国政府中甚至最反动的，也都承认他们做错了。”

美国军史家斯蒂芬·豪沃斯在《美国海军史》中如此写道：“可以理解，中国军队是不能容忍敌对的部队靠近鸭绿江（中国和北朝鲜的边界）的，正如美国不会容忍在它和墨西哥边界的格兰德河上出现敌对的军队一样。”

客观地说，由于双方缺乏必要的了解，中美之间这种战前的信息沟通在表达的渠道和方式上，确实容易出现信息表达不完整、理解不到位的问题；但美国当局对新中国的成见和蔑视，却大大削弱了这种沟通试图达到的效果。

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法利2014年10月29日在《国家利益》双月刊上发表反思文章《致命教训：中美两国上一次走向战争》，称：“上一次的中美战争没有可称赞之处。这场即将被双方忘却的战争经验，应该成为中美两国决策者的深刻教训。朝鲜战争绝非意外，误判和沟通不力，使这场战争超越了必要的界限。”

美国根据潘尼迦的信息所采取的唯一直接行动是，经总统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给麦克阿瑟发了一份通知。通知说，万一“在朝鲜的



任何地方发现中共公开或秘密部署的主力部队”，只要“有获胜的机会”，他仍可以继续行动；但是，除非得到华盛顿的授权，否则不得对中国境内的目标采取行动。

美国作者贝文·亚历山大在他的著作中写道：“现在回顾起来，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间接交流中产生的误解令人悲哀。红色中国领导人无疑感到，他们完全是以负责而正式的态度和美国打交道，因为双方都没有在对方首都派驻外交代表。印度是一个主要的中立国，并且大家公认，通过它与英国的密切联系，可以直接和美国官方的高层取得联系。周恩来之所以选中潘尼迦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朝鲜问题来说，印度试图保持不介入态度并由此受到双方的尊重。然而，华盛顿之所以注意潘尼迦却是由于他的亲共名声，而不是由于他是一个主要中立国的大使这一官方职位，正是这一点，才使他的影响尽失。”<sup>①</sup>

10月2日，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出兵问题。周恩来首先改变态度，赞同毛泽东的出兵主张。朱德和刘少奇仍然持保守态度，将帅们则是一片反对之声。

事后毛泽东曾说，在出兵朝鲜的问题上，中央同意的人只有一个半。一个指他自己，半个指周恩来。

特别是军队将帅，异口同声表示同美军作战没有胜算。

“这个仗打不得，美国一个团的各种火炮超过了我们一个军；美军一个团的汽车比我们一个军的汽车还多得多，我们和美军的差距太大，没有取胜的把握。在敌我装备悬殊的情况下入朝作战，极有可能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不赞成出兵，最好不出兵。如果一定要出，那就采取‘出而不战’的方针，屯兵于朝鲜北部山区，看一看形势发展，能不打就不打，我认为这是上策。”

说这话的，是林彪。

师哲在回忆录里说，“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员都反对出兵”。

<sup>①</sup> 引自（美）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 5. 两份自相矛盾的电报

反对出兵者的意见概括起来如下：国内战争创伤急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无制空权和制海权，官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恐美症；经过长期战争，干部战士渴望和平，厌战情绪相当普遍等等。

这次会议同样没有记录，仅能从参加会议的一些老同志的回忆录里看到一些面貌。

比如聂荣臻就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到，当时党内的不同意见倾向于“现在出兵不行，也打不赢，而且容易把战火引到中国来”。

毛泽东有些着急了，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我们不能再议而不决。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德怀最合适了。”随即指示周恩来，“你明天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再做些准备工作，4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于10月2日提笔拟了一封给斯大林的回电。毛泽东先是向斯大林埋怨金日成做事莽撞，当初不听自己的劝告，开战之前也不向中国通报一声，现在惹了大麻烦，才不得不来找我们帮忙。但事已至此，还必须得帮他一把。

毛泽东继续写道：“斯大林同志，如果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第一批3个军，于10月15日以前过江；第二批3个军随后跟进。”接下来又说，但是中国缺乏武器装备，尤其是重武器，希望马上得到支援。“只要初期防御能够顶住，等到苏联武器到达，将我军装备起来，就能够歼灭美国侵略军”，等等，在后面拉了一份长长的单子，请斯大林马上解决。<sup>①</sup>

根据这份电稿，全世界的学者都一致认定：中国在1950年国庆节的第二天决定出兵参战。

<sup>①</sup> 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然而真实的情形并非如此，远没有这么简单。

1995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次关于朝鲜战争的学术讨论会上，俄国学者公布了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收藏的另一封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日期相同，都是1950年10月2日，但两封电报的内容却截然相反。

1995年12月25日，美国主流媒体《华盛顿邮报》报道了毛泽东同日发给斯大林内容“顶牛”的两封电报这件事。

沈志华去莫斯科买回的苏联解密档案中，却只有一份毛泽东发给斯大林的电稿。

这两封同日出自毛泽东之手的电报，态度却完全相反，一时间在国际史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按理，中国发给苏联的电报，在苏联应该存有档案。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录的那份电报在俄国档案馆里遍寻不着；而俄国公布的“不出兵”的档案，在中国也消失了踪影。

旅美华人历史学者陈兼赶紧给沈志华打电话，并把《华盛顿邮报》传真给他，让他查一查究竟是怎么回事。

沈志华立即找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金冲及，因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就是金先生主编的。

沈志华告诉金冲及，俄国怀疑中国伪造档案。

金冲及听后也觉得这件事情的性质相当严重，马上发动文献研究室的众多专家一起动手，第二天就把电报原件找出来了。

没错，肯定是毛泽东的手迹，时间也是用汉字写的“十月二日”。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两封电报都是在10月2日同一天写的，毛泽东不可能给斯大林发两封自相矛盾的电报啊！

为了揭开这个谜底，金冲及和沈志华又查了10月2日毛泽东的其他电报，发现还有两封电报，但那上面都有中办主任杨尚昆的签字，标明几点几分发出。唯独有关朝鲜战争这封电报，什么签发的痕迹也没有。按照相关规定，中办主任没签字，那就表明这封电报肯定没有发出去。

金冲及和沈志华经过反复分析、研判，最后对实际情况做出这样的推断：毛泽东10月2日凌晨写好这封电报，但等到书记处开会时，中共绝大多数领导人不同意出兵，毛泽东只好把已经起草好的这封

“决定出兵”的电报压了下来。但秘书事后却把这份决定出兵的电稿当作档案收存起来。几十年后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时，很自然地就把它作为文献收了进去。

那么，俄国档案馆的那封“不出兵”的电报又是怎么回事呢？

后来沈志华找到俄文原件一查，那封电报并不是毛泽东写的，而是他当天与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谈话，说明中国出兵存在种种困难，需要苏联帮助等等。由罗申记录下来后，经毛泽东修订，再由罗申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给斯大林的，所以中国找不到这封电报。

实事求是地说，新中国的军队将帅们一听说要和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拉开架势大打一战，真还是有所忌惮的。这是面对现实，知己知彼的大问题，和什么二愣子性质的怕不怕死，毫无关系。

关于10月2日书记处扩大会议争论的情况，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实际情况如何，只有将来中国有关档案公布后才能搞清楚。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会议的争论肯定十分激烈。在毛泽东已经答应斯大林和金日成出兵之请的情况下，仍然发表出几乎是一面倒的众多反对意见，说明在书记处扩大会议上不赞成出兵，或者至少是暂时不出兵的倾向是主要的。

在一片激烈的反对声中，毛泽东只好抱怨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危急，我们站在旁边看，不管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得停发已经拟好的出兵电报，把这个问题交到4日至5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作研究，最后作出决定。

这样一来，起草好的决定出兵的电报自然不便发出了。

可是，斯大林那边还急等着他的回电哩，所以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见罗申大使，把书记处扩大会议的精神，简单向他作了通报，告诉他：中国暂不决定出兵，留待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再定。然后，请罗申以毛泽东的名义，给斯大林发出了表示中国暂不出兵的第二封电稿。

致菲利波夫：

呈上毛泽东对您第4581号电报的答复如下：

1950年10月1日来电收悉。我们原先曾打算，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时，调动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

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们现在认为，这一举动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同美军作战无胜利把握），敌人会迫使我们退却。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这将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可能被拖进战争中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极其严重了。

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必须谨慎行事。当然，我们不派兵援助，这对于正处在如此困难境地的朝鲜同志来说，是十分不利的，我们自己也于心不忍；但如果我们出动几个师，随后又被敌人驱赶回来，并由此引起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将被全部打乱，国内许多的人将会对我们不满（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尚未医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还是克制一下，暂不出兵，同时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与敌作战的时机上会比较有利。由于暂时的失利，朝鲜应该换一种斗争方式，进行游击战。我们将召开党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负责同志都将出席。对此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想同您商量一下。

如果您同意，我们准备立刻让周恩来和林彪同志飞到您的休养地，同您讨论这件事，并报告中国和朝鲜的形势。

盼复

毛泽东

1950年10月2日

1. 在我看来，毛泽东的答复证明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朝鲜问题的最初立场。这个答复与以前毛泽东在同尤金·科托夫和孔诺夫，以及刘少奇在同我的谈话（我已及时报告过）中表示的立场是矛盾的。他们在这些谈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和解放军决心帮助朝鲜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涨，如果需要，他们有能力打败美军，因为美军要比日军弱。

2. 中国政府无疑能向朝鲜派遣五六个甚至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自然，这些中国军队需要装备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我们暂时不清楚中方改变立场的原因。

可以设想，目前对此产生影响的可能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

朝鲜局势恶化，英美集团阴谋通过尼赫鲁呼吁中国人采取克制的态度，以免陷入灾难。

罗申

1950年10月3日<sup>①</sup>

在接到罗申转致的毛泽东10月2日电报后，斯大林于10月5日回电毛泽东：

北京

苏联大使转交毛泽东：

您的复函已收到。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个师志愿军的问题，是因为我清楚地了解中国领导同志曾多次声明，如果敌人越过“三八线”，就准备派几个军去援助朝鲜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国同志之所以准备派兵去朝鲜，是为了防止朝鲜变为美国和未来军国主义日本反对中国的军事基地，这与中国是利害攸关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鲜派兵问题，而且至少而不是最多派五六个师，是出于以下几点对国际形势的考虑：

1. 如朝鲜战事表明的那样，美国目前还没有为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做好准备；

2. 日本因其军国主义势力尚未复元，没有能力给美国以军事援助；

3. 有鉴于此，美国将被迫在朝鲜问题上向有苏联盟国为其后盾的中国做出让步，将不得不接受就朝鲜问题进行调停的条件，这些条件将有利于朝鲜而使敌人无法将朝鲜变为它的军事基地；

4. 基于以上同样的原因，美国最后不仅将被迫放弃台湾，而且还将拒绝与日本反动派单独缔结和约，放弃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活动及使日本成为他们在远东的跳板的企图。

由此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只是消极地等待，而不是进行一场认真的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显示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国就得不到这些让步。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美国人将会把持台湾，把它当作基地。美国这样做，不是为了

<sup>①</sup>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之《罗申转呈毛泽东关于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致斯大林电》。

已没有取胜希望的蒋介石，而是为了他自己或者是为了未来的军国主义日本。

当然，我也考虑过，美国尽管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仍可能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战，这样一来，自然中国将被拖入战争，苏联也将同时被拖入战争，因为它同中国签有互助条约。对此应该害怕吗？我认为不应该，因为我们联合起来将比美国 and 英国更有力量，德国现在不能给美国任何帮助，而欧洲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不成为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么让它现在就打，而不要过几年以后，到那时日本军国主义将复活起来并成为美国的盟国，而在李承晚控制整个朝鲜的情况下，美国和日本将会在大陆有一个现成的桥头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个师时所依据的对国际形势及前景的考虑。

在您的答复中谈到了关于中国国内的状况，这对于我来说是新的情况。您肯定地说，在由于朝鲜事件而出现新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国内将会出现极大的不满情绪，因为国内非常渴望和平。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中国联合政府组成部分的资产阶级党派，在出现战争的情况下，将利用国内的不满情绪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当然，您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国国内的形势。而是否能够克服中国国内局势的这些困难，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同志来决定。

至于周恩来和林彪同志前来我处事宜，我将非常高兴欢迎他们并与他们交谈。

敬礼

菲利波夫

1950年10月5日<sup>①</sup>

“中国不仅得不到所有这些让步，甚至连台湾也得不到”，斯大林抓住中国人极为关心的“台湾问题”，明明白白地对毛泽东施压。

而在毛泽东心中，新中国成立后，恐怕再也没有比解放台湾更重要的事了……老谋深算的斯大林，的确很有心计。

孙子有言：“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

<sup>①</sup>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



察也。”

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就是一次生死存亡的危机考验。出兵援朝，是毛泽东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艰难决策，以至于他整整一个星期都无心刮胡子。

胡乔木回忆当时情景说：“他不作声，一个礼拜不刮胡子，留那么长，想通以后开个会，大家意见统一了，毛主席就刮胡子了。”<sup>①</sup>

作为答复斯大林10月5日的电报，毛泽东整整想了两天后，才于7日通过罗申大使，给斯大林发出了一封复电：

致菲利波夫：

答复您的第4676号电报。

10月6日北京时间22时30分，我拜会了毛泽东，并向他转交了您的答复。

毛泽东在听完我的话之后，说：

1. 他完全同意您对国际形势及其今后可能发展的前景所做的评价。
2. 他对于您在答复中谈到中国和苏联共同进行反对美国人的斗争，感到非常高兴。他强调指出，如果谈到打仗，那么，毫无疑问，现在就应该打。同时他还说，类似的想法他刚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说了。

3. 涉及派中国军队到朝鲜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最适宜的不是派出五六个师，而是最起码要派出9个。但是，这些师的技术装备非常差，他们只有108门大炮，一辆坦克也没有。

与此同时，毛泽东援引了从朝鲜朋友处得到的资料说，美国的一个军（3个师）就有大约1500门各种口径的大炮，还有坦克。

毛泽东认为，要摧毁美国一个军的部队，中国人应该拥有比其多4倍的兵力和2倍的技术装备。

毛泽东还强调指出，由于拥有后备力量，关于步兵的问题他们很容易解决，而这些部队的技术装备，他们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还说，目前他们还不具备培训好的炮兵、坦克兵和其他技术兵的专业人员。

关于中国军队到达朝鲜的时间问题，毛泽东指出，他们准备在

<sup>①</sup> 引自欧阳璐《中国出兵援朝决策始末》，发表于《文史参考》2010年第2期。



最近几天出动自己的部队，但是，他认为急于出动是不合适的，应该给美国人机会，使其将自己的部队向北方集结，分散驻扎，这样中国人便能顺利地将他们分割歼灭。

4. 毛泽东极其关注有关空军的问题。他指出，根据朝鲜朋友通报的情况，美国人在朝鲜地区拥有大约1000架飞机，中国人暂时还没有自己的空军部队。在毛泽东看来，必须要有空军部队，这是因为：

(1) 为了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

(2) 为了前线地区的作战行动。

(3) 为了掩护中国重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

毛泽东认为，美国人首先将利用空中打击来摧毁中国的工业中心、破坏经济生活、毁坏交通干线。毛泽东说，这种局面有可能会引起国内，首先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人民政府的不满情绪，并将人民政府置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毛泽东声明说，中国政府本身没有能力从空中对部队和工业中心进行掩护，因此，必须有苏联提供的技术装备。

5. 毛泽东还提请注意，朝鲜境内的交通线路已经被破坏，这使得部队的物资供给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他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所能依靠的，只有苏联方面提供的运输工具。

6. 毛泽东说，中国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空军所必需的武器和弹药。1951年度的整个财政预算是22亿美元，其中只有2亿美元可用于为部队购买武器。

7. 鉴于上述所说的内容，毛泽东认为，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向您汇报有关情况以及中国朋友的全部打算。周恩来和林彪10月8日即可动身。他们可以乘飞机从北京出发抵达伊尔库茨克。我们必须派专机到伊尔库茨克迎接他们。

毛泽东希望，师哲和费德林与周恩来一同前往。

会谈时在场的有：周恩来、伍修权和费德林。谈话持续了1小时45分钟。

请您下达指示。

罗申

1950年10月7日13时50分<sup>①</sup>

<sup>①</sup>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之《罗申关于毛泽东对出兵的态度问题致斯大林电》。

也就在10月7号这一天，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军跨过了“三八线”。

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沃克中将向东京报告，“向平壤的进攻已经开始”。

第二天，兴奋不已的麦克阿瑟再一次向金日成发出了投降通牒。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就在斯大林收到毛泽东10月2日“拒绝参战”的电报后，苏联方面还做了另一个动作。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什特科夫提出的迅速撤回苏联专家和苏联机构人员的问题。并由葛罗米柯电告什特科夫，“同意您关于取得朝鲜政府的同意后，将一部分苏联专家以及苏联驻朝机构工作人员调回的建议”。

由此看来，斯大林在给毛泽东发出“威胁加要挟”电报的同时，他也明白金日成此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必须立即布置撤出苏联驻朝军事顾问和苏联公民的事宜。

放弃朝鲜，已成定局。

正当斯大林对毛泽东在中国出兵问题上表现得一忽儿热，一忽儿冷，已经完全绝望，开始着手安排驻朝人员撤退时，1950年10月13日，“戏剧性”的一幕突然出现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向莫斯科发出了《关于毛泽东决定出兵等问题》的电报。

致菲利波夫同志：

作为对我的第2406号电的补充，毛泽东还谈道：

我们的领导同志认为，如果美国人打到中国的边境，那么朝鲜就是我们的一块心病，而且东北将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下。

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

毛泽东指出，现在派中国部队去朝鲜是有利的。中国人有义务派出部队。

暂时先派出由9个师组成的第一梯队，虽然装备差，但他们能够打李承晚的军队。在此期间，中国同志将抓紧准备第二梯队。

毛泽东说，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



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能迟于两个月。

毛泽东同志接着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目前无法为提供的装备付现款。他们希望以贷款方式得到这些装备。

这样，就不会动用1951年的预算，他们也容易向民主党派解释此事。

最后，毛泽东说，中共中央领导同志认为，中国人应该在朝鲜同志进行艰苦斗争时帮助他们，为此，周恩来必须与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讨论这个问题。

新的指示已送周恩来。

罗申

1950年10月13日<sup>①</sup>

“1950年10月13日”——确凿无误，这是中国政府正式决定出兵朝鲜参战的日子！

经金冲及同意，沈志华在1996年1月赴香港参加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时，专门就毛泽东在10月2日一天之内发出两封内容截然相反的电报这一重大问题，提交了一篇论文，讲述了他调查的结果。

沈志华在论文中推断，中国和俄国档案中的这两封电报都确实存在，而且都是毛泽东手拟的，只是前一封电报没有发出，所以在俄国档案馆中找不到这份文件。电报没有发出的原因，只能有一个解释：因为在10月2日书记处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的出兵主张，未能获得绝大多数中共领导人的支持。

这篇论文很快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了，沈志华的推断也被国际学术界所接受。

后来，负责整理和公布中国档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在其出版的著作中，也十分肯定地说：“这份电报没有发出。”

毛泽东这个“亚洲革命负责人”很不好当。那时候，一穷二白的中国为了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已经把原本压在苏联人身上的越南这副沉重的担子，移到了自己的肩膀上。

还在1949年12月12日，刘少奇就以军委名义电令林彪、叶剑

<sup>①</sup> 引自沈志华挂在网上的《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解密文件》。

英、陈赓等，严控中越边界，调查与胡志明联络的道路等情况。“越南如派人到广西请求帮助时，在武器弹药及医药方面，你们能否给他们若干帮助？望告。”

此后，便开始了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多年一贯制的援越抗法、援越抗美援朝行动。

12月24日，毛泽东在莫斯科致电刘少奇等，“关于援越武器、弹药、医药物资问题，同意先给一部，然后逐步增加，使越共善于掌握这些物品”，“将来派去军事干部宜任副职或参谋人员或充顾问，似不宜任正职”。

实际上，1945年9月22日胡志明就要求斯大林承认他刚建立的越南共和国，但那时斯大林担心引起美国和西方的猜疑，未予理会。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30日，苏联才与越南建交。随后胡志明秘密来到了莫斯科，再次要求斯大林援助。斯大林毫不犹豫地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让中国负责援越。

毛泽东把这当成了斯大林对自己是否有担当的考验，立即斩钉截铁地承诺：“不同法国建交也要援越！”

刘少奇对黄文欢说：“法国会延缓承认中国，但我们不怕。”

毛泽东说：“谁叫我们先胜利呢？胜利者就要帮助人家，这就是国际主义精神！”

在此之前的1950年1月18日，中国第一个承认了越南，此时包括苏联在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还没有承认它。

3月13日，毛泽东指示已率工作组在越南考察的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对军火帮助，交通运输组织的建立”“建立主力部队及党与政权问题等提出考察意见”。

4月，中国政府开始向胡志明的卫国军（后改为人民军）输送装备和物资，并把新兵逐批接到中国，为其换装及军事训练，使之成为正规军队。

7月，陈赓、韦国清率领军事顾问团到越南，指挥越军打仗。中国还建议越南把军队开进老挝和柬埔寨，和那里的革命力量连成一片。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告知越共中央“帮助老挝解放，甚为重要”。

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左肩已经压上了越南这副沉重的担子，倘若右肩再压上一副朝鲜的重担，谁都会担心中国人民的承受力。

毛泽东的视野与想法却与他的同志们大不相同，他眼中看到的不



仅仅是一个中国的得与失，而是把亚洲革命运动——后来又扩展至世界革命运动——视为自己无法推卸的神圣职责。

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无不熟悉的最高指示“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便来源于毛泽东经常强调并极为推崇的“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精神”。

早在1949年4月3日，毛泽东召集几个民主党派领导人，就北约成立发表声明，公开宣布要同苏联阵营携手并进，推翻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与永久和平！

同年11月16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亚澳工会大会上宣布：“越南、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的解放战争中的战士们是完全正确的，武装斗争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这就是指导中国人民取得胜利所实行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革命的工人阶级及被压迫人民如果避免采取上述的道路，而采取其他轻便的道路以求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压迫、建立人民民主国家，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那是错误的。”<sup>①</sup>

11月23日，毛泽东又在北京各界人士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宣称：“中国工人阶级除开在国内要担负恢复经济、提高生产的繁重的领导责任之外，在国际上还要担负援助世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亚洲、澳洲、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繁重的责任。胜利了的中国工人阶级，对于这样一种国际责任，是不能也不应该推脱的，我们应该给那些需要援助的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的国家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以精神的和物质的各种援助。这是一项光荣的责任。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具有充分的国际主义精神，愉快地，诚恳地来担负起这种责任。”<sup>②</sup>

更何况，这次兵发朝鲜参战的情况与援助印度支那战争完全不同。在越南只是同日益衰落的法国作战，在朝鲜却要面对世界第一超级强国美国；对于越南的援助只是提供武器装备和派遣军事顾问，对朝鲜却必须派出大规模的正规部队，和美军刀对刀、枪对枪、面对面地进行厮杀，甚至完全有可能升级为一场全面的战争。

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和武器装备，能够公开与美国作战吗？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吗？绝大多数中国领导人的忧虑，完全是的道理的。

① 引自信力健《建国后我们是如何一边倒的？》，发表于《同舟共进》2003年第8期。

② 引自王先金编著《毛泽东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

不仅军方领导人不主张出兵，连周恩来开始也很谨慎。

乔冠华说：“周恩来曾极力主张避免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但毛泽东主席坚持采取更加强硬的路线。从一开始毛主席就倾向在朝鲜进行干预，周总理放弃了己见，同意了毛主席的主张。”<sup>①</sup>

高岗最初也是反对派，中央决定出兵后，变成了支持派，而且对整个战争期间的后勤工作贡献甚巨。

关于林彪反对出兵的说法流传最广，过去的官方说法和社会传言是“毛泽东原先决定让林彪去朝鲜指挥志愿军，可他害怕，托词有病，硬是不肯去”。

林彪反对毛泽东的出兵主张并非是因为害怕，而是他认为以中国的国力，尚无与美国直接对抗的能力。

但是，当毛泽东最终作出出兵的决定后，与刘少奇、高岗等所有反对者一样，林彪也随即转变态度，尽最大努力支持毛泽东。

关于毛泽东力排众议，决定出兵抗美援朝这件事，许多年后，基辛格在他的著作里是这样评说的：“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不在朝鲜阻挡美国，他或许将会在中国领土上和美国交战；最起码，他没有得到理由去做出相反的结论。”<sup>②</sup>

① 引自乔松都著，《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② 引自（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

## 第七章

# 谁敢横刀立马

### 1. 朝鲜二号人物的倒台

10月1日，金日成收到斯大林苏联拒绝出兵，转而请毛泽东援助的电报就傻眼了，马上带着朴宪永赶去中国大使馆找倪志亮和柴成文商量。紧跟着便与朴宪永联名，不得不放下身段，用极为谦恭的语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援信：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

您对于为自己祖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的朝鲜人民深切的关心，百方援助，我们谨代表朝鲜劳动党，衷心的感谢！

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朝鲜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况是，在美国侵略军登陆仁川以前，形势对我们非常有利，敌人在连遭重创的情况下，被人民军压迫至朝鲜南端狭小的地区里，我们极有可能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美帝的军事威信已经极度地降低了。于是美帝为挽回其威信，为实现其将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之目的，立即调动了驻太平洋方面陆海空军的差不多全部兵力，遂于9月16日以优势兵力，在仁川登陆后攻占了京城，目前战况急转直下，已经非常严重，人民军虽然对于登陆之敌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对于前



线的人民军，已经造成了很不利的态势。

战争爆发以来，敌人利用约千架的各种飞机，每天不分昼夜任意地轰炸我们的前方与后方，在对敌空军毫无抵抗力的人民军面前，敌人则充分发挥其空军威力。各条战线上的敌人在其空军掩护下，出动大量机械化部队，我们在兵力与物资方面遭受的损失非常严重，后方的交通运输通信及其他设施也大量被破坏，我们的机动力量，则更加减弱了。

敌人登陆部队与南部战线的部队已经连接一起，切断了我们的进攻部队，结果使我们攻入南方的人民军处于被敌切断分割的严峻状态，得不到武器弹药，失掉联系，甚至于有一部分部队已被敌人分割包围。我们估计敌人可能继续向“三八线”以北地区进攻，如果不能急速改善我们的各种不利条件，敌人的企图很可能会实现。要保障我们的运输、供给以及部队之机动力，则必须具备必要的空军，但是我们又没有准备好的飞机师。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一定要决心克服一切的困难，不让敌人把朝鲜殖民地化与军事基地化！我们一定要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为争取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民主而斗争到底！

我们正在集中全力编训新的师团，南部的十余万部队已向作战有利地区转移集结，准备长期作战。

目前敌人趁着我们严重的危急，不予我们时间，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我们向您提出以上意见，盼望即予指教！

敬祝健康！

金日成 朴宪永

1950年10月1日于平壤

白纸黑字，金日成和朴宪永的要求很清楚，中国军队进入朝鲜作战的前提是，“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也就是说，麦克阿瑟只要不越过“三八线”，就用不着中国出兵。

为了节省翻译时间，信是金日成直接用中文写的，现在这封信仍然在北京城里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公开向观众展出。

但是，中国方面在最初决定公开展出这封信之前，把朴宪永的名字“处理”掉了。

为什么要拿掉朴宪永的名字呢？

因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二号人物，后来没过几年变成了头号人物金日成眼中最凶恶的敌人，给处死了。

你让一个死刑犯的名字和伟大领袖紧紧挨在一起，实在不妥嘛。

1955年12月19日，新华社转发了一条前一天朝鲜中央通讯社播发的重要消息：“朝鲜最高裁判所特别法庭依法判处美国间谍、叛国犯朴宪永死刑。”

起诉书指出：

1951年9月，朴宪永同李承烨、裴哲、李康国、安永达、白亨福等一起秘密集会，讨论了策应敌人的军事攻势、进行颠覆党和政府的武装暴动计划，并且组成了武装暴动指挥部。他们企图以开城为中心的京畿道作为反革命的根据地。1952年9月，这些叛国匪徒在朴宪永家中秘密集会，策划组织反动政党和以朴宪永为“首相”的隶属于美国、保障资本家和地主利益的“新政府”，企图在以武装暴动颠覆党和政府后上台。特别法庭宣布确认朴宪永以反对朝鲜的自主独立、颠覆共和国为目的，背叛祖国，服务于美帝国主义的间谍行为，以及反革命破坏和宣传煽动行为，庇护和保障李承烨等实现武装暴动的阴谋。

特别法庭根据共和国的法律和朴宪永的罪行，判处朴宪永死刑，并且没收全部财产。

事实上，朴宪永是当之无愧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的元老级人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地位和影响均在金日成之上。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应当是金日成坐着苏联人的军舰返回北朝鲜，在苏军占领的北方咸镜道成立朝鲜共产党北方局时，金日成仍不得不公开表示服从汉城共产党中央和朴宪永的领导。

当然，这一“臣服”关系仅仅是停留在名义上，因为北方局在苏联占领军控制区，金日成又是斯大林挑选出来的人，得到了苏联占领军的全力支持，所有行动都是独立的，汉城的朴宪永不仅没有能力领导平壤的金日成，后来连他自己的生存都成了大问题。他领导的汉城共产党遭到了美国占领军和南朝鲜军警的残酷打压，包括他在内的主要领导人均遭到通缉。被捕者一批批被送上刑场枪决，迫使朴宪永、李承烨等共产党领袖，于1946年不得不逃往北方。

随后，南北双方各自建国，半岛进入了战火纷飞的时代。

朝鲜的历史资料表明，撤到北方的朴宪永并不甘心把党内大权让给金日成，居然天真地打算以党中央的名义来领导金日成的北方局，而金日成绝对不是善茬，两人很快在党内形成了对峙局面。

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位于平壤的劳动党中央党校正在举行毕业典礼。朴宪永和金日成两大巨头都坐在主席台上。

此前两年，朝鲜半岛共产主义运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朝鲜光复后，一度形成了朴宪永领导的南方共产党和金日成领导、由朝鲜共产党北方局改组而成的北方共产党，随后两党相继改名劳动党，进而在苏联人的撮合下，合并成一个劳动党。

不少原来的南方共产党党员跟着朴宪永一同北上，他们在这次毕业典礼上和北方党员一起庆祝。

突然，有一名中午聚餐时喝高了的南劳党员当着朴宪永和金日成的面，起身高呼：“朴宪永万岁！”

一个醉鬼的酒话，却让朴宪永立即陷入了尴尬与被动。

不少金日成的追随者当即跳出来，怒火万丈地指责朴宪永搞宗派主义。南北两派党员之间的关系，一时弄得剑拔弩张，势同水火。

在苏联人的调解下，最终朴宪永不得不接受寄人篱下的现实，出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并担任朝鲜副首相兼外相和3名次帅之一，开战之前又兼任了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成为仅次于金日成的党政军“二把手”。

在第一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中，除朴宪永外，还有朴文圭、李承烨、许成泽、李炳南、金元凤、白南云6名“南劳派”干部出任部长级高官，在政坛上形成了排在“游击队派”和“延安派”之后，与“莫斯科派”不相上下的一股强劲势力。

不过，就在人民军越过“三八线”之前数月，南劳党留在汉城从事地下工作的组织以及活动在南方的反政府游击队被李承晚政权纷纷击溃，其成员被大肆逮捕屠杀，这就使得朴宪永备受打击，在党内的地位一落千丈。

因为战争爆发前，朴宪永也确曾当着斯大林的面夸下海口，称人民军进入汉城之日，就是他领导下的20万南劳党党员起兵响应之时。



人民军于1950年6月25日发起突然袭击后，仅仅花了3天时间，就攻占了汉城。随后势如破竹，一度占领了半岛90%的土地。不过，朴宪永承诺的20万南劳党员“群起响应”的场面，却从来也不曾出现过。等来的却是3个月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的登陆。

随后，人民军一败涂地，“一把手”和“二把手”为战争失利承担责任问题，陷入了公开的争执。

朝鲜高层人士都知道这样一件事。

1950年10月中旬，在朝鲜北部靠近鸭绿江江界的一栋屋子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和他的副首相兼外相、次帅，以及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朴宪永对坐小酌。

由于人民军大败的噩耗不断传来，屋子里的气氛很是紧张。

金日成首先指着朴宪永的额头指责道：“你领导的游击队员都躲到哪里去了？你不是说他们会率领老百姓起义吗？你告诉我，他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不久前，朴宪永作为金日成的特使前往中国沈阳，通过高岗，恳求毛泽东派遣军队援助朝鲜。他从来没有机会执掌战争指挥权，为给人民军争取援助，他频繁地东奔西走于莫斯科和北京，已经筋疲力尽。而且他认为，作为人民军的最高统帅，金日成理所当然地应该为战局失利承担责任，而不是埋怨其他任何同志。

于是，不堪羞辱的朴宪永并不尖锐地指出：“在多次战役中，你下的命令并不是最佳选择。”

对于这样的回答，金日成是极其愤怒的，所以，朴宪永的死是必然无疑的，只不过是时间上的早迟而已。

2004年，朴宪永的女儿、莫斯科舞蹈学院教授朴·维安娜接受韩国《东亚日报》采访时说：“将一生献给共产主义运动的父母在朝鲜和苏联被肃清的事实，不仅是我们的家族悲剧，也是祖国历史的一大悲剧。希望父亲得到正确历史评价的日期能够早日到来。”<sup>①</sup>

<sup>①</sup> 笔者注：关于朴宪永的资料来自韩国新历史合作社出版的《我们的历史：朝鲜泪与梦》，修奎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

## 2. 彭德怀给儿女们留下遗产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50年10月4、5日两天在中南海召开扩大会议。

4日下午4时许，一架银灰色的里-2型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从西安赶来的彭德怀坐进了前来迎接的小轿车，飞快地向着北京城区驶去。

汽车通过具有中国古建筑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进入新华门。中南海内，一片寂静。汽车行驶在湖畔，穿过高大的古柏林荫，停在颐年堂门前。

彭德怀下了车，快步走进会场，周恩来首先迎出来与他握手：“彭老总，来不及等你，会议下午3点就开始了。”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进来，都起身和他握手。

毛泽东说：“彭老总，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已开始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你也准备谈谈看法。”

彭德怀坐下不一会儿，眉头便皱紧了。

他注意到今天这个会，气氛很不寻常。

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晚年回忆说：“彭老总到了会场，坐在高岗旁边，就压着嗓子问高岗，说怎么大家还开会，抗美援朝这事不是已经定了，还讨论什么？高岗说有不同的意见。彭老总光听，没有发言。这次会上，多数人员不同意出兵，因为什么呢？共产党刚刚胜利，百废待兴，新解放地区土改工作没有完成，国民党一些溃兵和土匪勾结起来，在新的解放区活动很猖獗，所以他们不主张出兵。再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出兵所针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在武器装备上非常悬殊。”

彭德怀听到的都是反对出兵的意见。

与会者情绪低沉，很多人埋着头抽烟，弄得满屋子烟雾腾腾。

林彪坐直了身子，慢条斯理地陈述自己的意见：“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有把握的。但美军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空海军优势，有原子弹，还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雄厚的工业基础。朝鲜只有几百万人口，而中国近5亿人口，打烂一个5亿人口的国家，去拯救一

个几百万人口的朝鲜，再怎么算，也是不划算的。主席啊，苏联那么强大，他们为什么不出兵？老大哥建国几十年了，我们才建国几个月，需要休养生息啊。我的意见是，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打这一仗。”<sup>①</sup>

雷英夫晚年回忆：

本来1950年8、9月间，毛主席、党中央曾考虑让林彪去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统帅，因为志愿军主力四野原是林彪的老部下，志愿军将来的后方东北，又是解放战争时期四野的老根据地，各方面情况林彪都比较熟悉。在元帅中他年纪最轻，当时只有44岁，是以能打仗，花样多而著称的名将，在党内军内都有很高的威望。毛主席说他打仗的特点是又狠又刁。在众人的心目中，他去当志愿军的统帅是最合适的。但他却一再以有病为借口，坚决不去打仗，并要求到苏联去治病。党中央、毛主席只好改派彭德怀去当统帅。<sup>②</sup>

当天彭德怀一句话也没说，会议结束以后，中办主任杨尚昆安排他住在北京饭店6楼，还向他吹了毛泽东已内定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风。

晚上，邓小平去北京饭店看望彭德怀，把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对彭讲了，然后通知他：“老彭啊，明天上午开会前，主席要单独见一见你，想先听听你的意见。你好好考虑一下，到底能不能出兵？”

这一夜，彭德怀根本就没合眼，时而在床上翻过来翻过去，时而又起来独坐苦思，原本已经戒掉很久的烟瘾，这一夜也死灰复燃了。

半夜，无法入睡的彭德怀推开落地窗，来到阳台上，仰头望望星空又俯看长安大街，繁星和灯火连成一片，十分迷人。

他扶栏沉思，战争已迫在眉睫，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

作为一名已经打了二十几年仗的老军人，多么希望永远不再拿起刚放下不久的枪。“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毛泽东颇为动情的一腔话，在他脑海里久久回荡。

<sup>①</sup> 笔者注：关于出兵问题产生分歧的资料来自欧阳璐《中国出兵援朝决策始末》，发表于《文史参考》2010年第2期。

<sup>②</sup> 引自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发表于《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5日上午9时，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到北京饭店接彭德怀去中南海谈话。

走进丰泽园，他俩看到毛泽东身穿驼绒睡衣，在宽敞的书房里吸着烟，一边散步，一边思考问题。

彭德怀在沙发上刚一落座，毛泽东就说：“昨天会上，你彭老总一言未发，这可不大像你的风格哟。”

彭德怀说：“这次来北京，我虽然猜到可能是什么事，可没想到参不参战的分歧会有那么大，想多听一听。”

毛泽东说：“昨天傍晚，林彪、高岗还在我这里谈了很久，仍然劝我不要出兵，说弄不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倒和斯大林同志的担心一样。”毛泽东抬起头来，把目光落到彭德怀脸上，说：“老彭，会上的意见你都听到了，正如大家强调的，我们确实存在许多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出兵的有利条件呢？我现在就要你一句话。你说，中国到底能不能出兵？”

彭德怀清楚毛泽东长期养成的习惯是夜里工作，临天亮上床睡觉，上午本应是他睡觉的时间。而今天，毛泽东能破例在睡觉的时间召见自己，就说明毛泽东和他一样，也是一夜没有合眼。

彭德怀用不着再想，简明扼要地说出了一夜深思熟虑后的意见：“苏联完全撒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的确很让人痛心。”

这样的态度，分明就是不赞同出兵了。

毛泽东有一些失望，但接着又问：“如果我们出动陆军，苏联出动空军，苏联的援助再多一些、快一些，我们的装备改善得好一些，这场仗，是不是能打？”

彭德怀反复考虑后说：“这不是没有可能，问题在于苏联的这种援助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空军能够掩护到什么样的程度，只要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我们也是可以和美军较量一下的。”

毛泽东猛地在沙发扶手上重重一拍：“老彭哪老彭，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紧接着，毛泽东情绪高昂地说：“反对出兵的同志们说得没错，我们急需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敌不住6个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以北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你到



会上给他们讲去！”

彭德怀：“行。我讲。”

毛泽东再问：“你看由谁挂帅出征？”

彭德怀：“请主席定夺。”

毛泽东开门见山：“你老彭如何？”

彭德怀：“没啥好说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

当天下午，彭德怀就在政治局会议上慷慨激昂地讲出了那番有名的豪言壮语：“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否则，等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将来的问题会更复杂。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摆在我们家门口，它想发动侵略，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建设。就算我们打败了，顶多也就是解放战争推迟了几年。中国有的是山，咱们上山再接着打。”

有了彭德怀如此坚定的表态，出兵朝鲜也就有了主帅，会上再也没有人提反对意见了。

毛泽东也趁热打铁说：“这几天，同志讲了很多不能出兵的理由，但是不能忘了，朝鲜人民和朝鲜党的同志在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是为中国革命的事业流过血、出过力的。现在他们的民族处在危机时刻，有一千条道理，一万条道理，驳不倒我们的一条道理，这就是我国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唇亡齿寒，不论就国际主义来说，还是就爱国主义来说，我们都不能见死不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个光荣传统和美德，即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我们应该发扬它。”

当然，他也不能对美军的武器装备比解放军好得多这一现实状况视而不见。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说道：“至于说美国有原子弹，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它打它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我坚决相信，我们的手榴弹，最后一定可以打败美国的原子弹！总之一句话，当今世界，任何人想随意欺压、宰割别人，都是不允许的！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即使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



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样一来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允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我们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依毛泽东看来，根本用不着对历史作太久远的回顾，日本军国主义霸占朝鲜而后染指中国，从而使中朝两国先后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惨痛教训，对两国人民就足具史鉴之效——“唇亡齿寒，户破堂危”，何过于此？而唯其如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两国爱国志士就携手并肩，互相支援，相濡以沫，共挽民族危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在短短4年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且继续以磅礴之势续百年来首次在真正意义上完成民族统一之大业，这自然而然地鼓舞了年轻气盛、血气方刚的金日成完成祖国统一的决心和意志。而支持朝鲜人民正义斗争，对于正进行同样事业的中国人民来说，毫无疑问，也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国际主义义务。

至此，毛泽东一锤定音。接着，毛泽东决定成立志愿军，并提议由彭德怀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立即做好参战准备。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十分肯定地对彭德怀说：“我给你10天准备时间，出兵时间初步定在10月15日。”

10月6日，周恩来在居仁堂主持中央军委会议，传达党中央关于出兵朝鲜的决定，并研究部署志愿军出动的各项准备工作。

随后，周恩来、林彪被毛泽东派到苏联要军援，去了莫斯科。

彭德怀挂帅出征朝鲜决定后，他忙着处理的第一件事是私事。

回到家中，他把10个孩子召到跟前，交给每人一个存折——一碗水端平，存折上分别存着100块钱——郑重地对他们说：“伯伯要率兵出国打仗去了，如果回不来，这就算是我给你们的遗产。”

彭德怀与妻子浦安修没有儿女，一直视这10个孩子如同己出，他们中既有当年与他一起出生入死，早在太行山上做了革命英烈的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白，也有毛泽东诗“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里的黄公略的女儿黄岁新，其余8个便是他两个同系革命英烈的亲弟弟彭金华和彭荣华的子女。这10个孩子，自小就由彭德怀夫妇抚



养长大，被彭德怀视如己出。

彭德怀到沈阳召开13兵团会议，会后几员熟悉的将领找到他说：林彪不愿出兵，高岗也不愿出兵，你在西北，对全局情况又不太了解，为什么要赞成出兵呢？

2号、4号的会议上绝大多数人反对出兵，但是为何到了5号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意见就统一了呢？

应当说这种统一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于毛泽东的认识和看法。参加会议的那些个政治人物和将帅，无一不是历经过几十年战争风云磨砺的精英人杰，谁能没有自己的主见？主席那番掷地有声、气贯长虹的“它有它的原子弹，我有我的手榴弹，它打它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对他们这样的人物来说，是不具备实际意义的。更何况面对的又是中国出兵，直接去和世界头号强国正面交战这么重要的事，怎么可能会在两三天时间里就改变了主意，全都愿意去和美国人决一死战？

朝鲜战争后期担任过志愿军司令员的杨得志将军晚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实话实说：

“打这个仗，中国有一点被迫。因为这个情况不打已经不行了嘛。那时候上面的意见不完全一致。有个话对外不好讲的呀，毛主席那时候又是党中央主席，又是中央军委主席，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军委主席，他有最大的权力，所有意见，最后都要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的嘛。所以啊，毛主席一主张，这个仗啊，就非打不可喽。”<sup>①</sup>

### 3. 岸英之死

当美军在仁川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一场大胜，将倾巢而出，孤注一掷的人民军逼到绝路之际，刚刚才满周岁的新中国发出的声音，让华盛顿，尤其是能够左右美国国策的麦克阿瑟大不以为然。

<sup>①</sup> 引自201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12集文献纪录片《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

此时的白宫和五角大楼以及仁川登陆这场大胜的导演麦帅都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麦帅正在催促“联合国军”紧跟在南韩军队后面越过“三八线”，向着平壤一路高歌突进。

参谋长联席会议针对周恩来总理和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警告，竟然如此轻狂地电告麦克阿瑟：“在你今后采取行动的过程中，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解释和声明，一切服从作战需要。”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助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这样的句子，就足以明白无误地表明，毛泽东已经是站在“亚洲革命领导人”的政治高度上，来考虑朝鲜战争的利与弊了。

同日，毛泽东发布了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率第13兵团及所属4个军和边防炮兵司令部及所属3个炮兵师，待命出动。后勤供应事宜，统由高岗调度。

同日，毛泽东还给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发去了一份电报。

倪志亮同志、金日成同志：

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决定派遣志愿军到朝鲜境内，帮助你们反对侵略者。

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毛泽东

1950年10月8日

当倪志亮把这份电报送到金日成手中时，金日成看完后立即打开一瓶葡萄酒，与倪志亮干杯庆祝。

而在两天前，数千里之外的毛泽东，也在家里设宴请客。

客人只有一位——彭德怀。

主人除了毛泽东，还有毛岸英。

毛泽东破例地陪客人喝了一点小酒，同时也给彭德怀提了一个不情之请，说：“老彭啊，你把岸英带到朝鲜去，让他锻炼锻炼。”

彭德怀一听毛泽东为了让儿子上战场“锻炼锻炼”，“开后门”

居然开到他这尚来不及上任的志愿军总司令面前来了，不由得既感动，又吃惊。

他当然知道这事非同小可，赶紧推辞：“主席，战争无情，子弹不长眼，我老彭都这把年纪了，死不足惜，可岸英还年轻，不能让他到朝鲜去。我这是出国去打仗，万一有个好歹，我咋担当得起？”

毛泽东说：“你怕什么呀，我信任你，了解你。你这个人战神，是一员福将，你打了这么多年仗，从来没有受过伤，我都不如你哦。你老彭身经百战，毫发未损，我毛润之搞秋收起义，国民党追着我打，撤退时脚还崴伤了，我把岸英交给你，一百个放心。”

自幼在彭德怀身边长大的亲侄女、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女将军的彭钢（彭梅魁）说：“毛主席这话跟彭德怀讲过，后来跟其他同志也讲过，毛主席虽然一辈子推崇唯物主义，但有时也认为人要信一点天意才行，他认为彭老总就是天生的一员福将。”

彭德怀想了个主意，说：“这样吧，既然岸英一定要当志愿军，我就把他放在北京，作为我们志愿军办事处的负责人。”

毛泽东摆着手，大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岸英既然参加志愿军，就一定要到前线去打仗，留在北京算怎么回事？”

彭德怀一看实在推不掉，只好表态说：“主席，我向你保证，有我老彭在，就有岸英在！”

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刘思齐）老人虽然年过八旬，但身体健旺，思维清晰。谈起岸英赴朝前的细节，她显得很平静。

她说：“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要去朝鲜。岸英只是说，他这次去的地方很远，很不方便，接不到信，不要着急。其实，岸英从长沙回去时朝鲜战争就爆发了。我一个学生，好像这个事很遥远，附近一个国家打仗，我们会受到什么影响根本不知道，也没想过。他要出差，到哪里去我也不能问。当时，他交代了四件事。第一，将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都要完成自己的学业，不要急着工作。我当时就想，我会遇到什么情况呢，你还会不要我吗？新中国成立后，主席说过，我的文化知识不够用，让我从头学起。岸英劝慰我说，让我不要着急，努力学习。他交代的第二件事，每周六，都要我去看看爸爸，不要他不在，我就不去了。第三件事，要帮助岸青。说他在生活方面自理差，江青没有精力照顾他，让我对妈妈（指张文秋）说，帮助照顾岸青。第四件事，让我对江青小心，说接触她时要多个心眼，他就得罪过

她。我感觉，岸英心里还留有一些话，没有告诉我。

“岸英对我的这次谈话，我觉得不一般。晚上11点，我把他送到医院大门口<sup>①</sup>，他走走又回来，走走又回来。他骑自行车之前，给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我当时也不理解，夫妻之间怎么还要鞠躬？这么客气？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只是觉得怪怪的，事后我才觉得他说的四件事啊，其实就是遗嘱。岸英要让我知道，万一不幸该怎么办。开慧妈妈牺牲后，党送岸英去苏联学习。在苏联，他有几个无话不谈的朋友，如蔡和森的儿子蔡博，李富春的女儿李特特，刘少奇的儿子刘允冰，还有黄健、李多力。岸英临走前告诉蔡博：这次估计回不来了。这是岸英赴朝前在沈阳和蔡博说的，岸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思想准备。联系他对蔡博说的话，我更觉得岸英临走对我说的话实质上就是遗嘱。有人说：主席送岸英去朝鲜的目的是培养太子，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岸英非常清楚上战场，就意味着牺牲。”

彭德怀没有想到自己当面向毛泽东做出的“有我老彭在，就有岸英在”的承诺把话说得太满，结果他在，岸英却不在。

毛泽东眼里的战神、福将，最终还是奈何不了美军的轰炸机，在彭德怀身边工作的毛岸英没来得及躲进防空洞，就不幸被美国人扔下的凝固汽油弹烧焦了。

看着眨眼之间被烧得焦黑的岸英遗体，彭德怀和当时在场的洪学智、邓华、解方、杜平，以及司令部知道毛翻译真实身份的人员全都被惊呆了，吓傻了，没人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担任过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赵南起将军当时是志愿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虽然和毛岸英朝夕相处只有短短的一个月零五天，但因两人年龄相近，经常在一起聊天，彼此十分投缘。

60多个年头过去了，赵南起对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依然记忆犹新。晚年，他对中央电视台记者回忆说：“上午10点钟左右，敌人的飞机来了4架，扔了几十颗凝固汽油弹，一时间啊，彭老总的两间房和作战处的三间房一下全烧没了，整个地皮全成了一片火海。”

美军空袭之后，赵南起感到情况不妙，他第一时间钻出防空洞，赶到山脚下的志司驻地。

<sup>①</sup> 刘思齐当时患急性阑尾炎，在301医院做手术后正处于疗养期间。



“我看岸英同志穿的衣服全都烧没了，人也烧得来认不出模样了。最后呢，他带的有两件东西，一个是戴的手表，一个带的是手枪，手枪是他从苏联回来的时候，斯大林送给他的。手表呢？是他的岳母送给他的，这两样东西还在。就靠这两样东西，才把岸英辨认出来。这时管理处长带了十几个人赶来，用白布把岸英和同时遇难的高瑞欣的遗体包起来，然后简单地找一些木板，钉了两具棺材。”

赵南起和战友们一道将毛岸英和高瑞欣安葬在附近一座小山坡上，他们当时没有立即向彭德怀报告情况。因为正是战事紧张之际，大家担心影响彭老总的情绪。

但是彭德怀还是很快得知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

赵南起说：“彭老总当然很悲痛，那时候天已经黑了，天黑了，敌人的飞机就不出来了。彭老总带领司令部全体成员，到岸英墓前哀悼，哀悼岸英不是3分钟几分钟啊，是很长很长的时间啊！彭老总和我们在岸英的墓前低着头，谁也不说话。哀悼完后，彭老总说了两句话，第一句话说：‘毛岸英同志是向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志愿军的战士，是一个好苗子。’第二句话是：‘岸英同志牺牲了，我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啊？’看得出来，他老人家太悲痛了。我们在场的人，全都哭了。后来，彭老总在岸英的墓前坐了很久，最后站起来一声长叹：‘唉，怎么偏偏炸到他啊？’”

假如有可能用自己的死去换毛岸英的活，彭德怀一定毫不犹豫。

彭钢将军对登门采访的滕叙究回忆说：“毛岸英牺牲了，必须马上向毛主席报告啊，这个报丧的电报怎么措辞？太难了。连大伯也没有勇气直接向毛主席报告这个噩耗，而是把电报发给了当时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总理。总理一看，同样紧张得不行，岸英牺牲了，天塌地陷的大事啊，怎么办？总理也不敢向毛主席报告。结果，这封电报拖了38天，总理再有智慧，也没法再拖下去了，这才鼓足勇气，告诉了毛主席。”

文献纪录片中，当毛泽东得知岸英牺牲的消息后，有这样一段解说词和这样一组镜头：

（解说）工作人员替毛主席点上火后，他深深地吸了几口烟，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和岸英的牺牲，都是光荣的。岸英

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

（解说）在毛岸英的安葬选择上，毛泽东再一次体现出了一位伟大领袖的博大胸襟。

（镜头）赵南起说：“对安葬在哪儿，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把岸英的遗体送回国内安葬，一种意见是就地安葬。最后请示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说，青山处处有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志愿军牺牲了那么多人，都是中华儿女，都安葬在了异国他乡，岸英也应该和他们安葬在一起嘛。”

（解说）彭德怀后来评价说：“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毛岸英做到了。毛岸英是坚决请求到朝鲜抗美援朝的。”

（解说）从入朝参战到牺牲，只有短短的37天，年仅28岁的毛岸英没有获得任何荣誉称号和奖章。但是，他和成千上万把生命留在朝鲜三千里江山的志愿军战士一样，在这场保家卫国的战斗中永垂青史！

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将军在这部文献纪录片中讲述：“得知我大伯牺牲，我爷爷手颤抖得厉害，想抽烟，掏不出来；拿起火柴，点不着火……”

岸英之死，成为毛泽东永远挥之不去的痛。

人生最悲痛之事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寻常百姓如此，一代伟人毛泽东亦然。

毛泽东的爱子之情是显而易见的，闻听噩耗后，悲痛无可名状。他反复念叨着北周诗人庾信的《枯树赋》：“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1946年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毛泽东对他进行了全方面的培养，让他搞过土改，做过宣传，当过秘书，后来又担任工厂的党总支副书记。朝鲜战争爆发后，他大胆支持毛岸英参加志愿军，并非不懂战争的残酷，他自己就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正是源于自己是这个国家的最高领袖，应当给那时候普遍具有恐美心态的官兵们，带一个好头。

再说了，毛岸英只是担任彭德怀的俄文秘书，和彭德怀待在一起，并不需要他提刀舞枪上阵，与美国大兵捉对厮杀。



彭德怀也的确尽可能地照顾了毛岸英，据当时彭德怀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回忆说：“彭老总对我们办公室的人员很体贴，特别是对岸英同志更为关心。”

但彭德怀最终有负毛泽东的当面嘱托，待在志愿军总部这一全军相对安全之地的毛岸英，竟然在他眼皮底下牺牲了！

这最后的不幸，可以说是彭德怀能力和经验以外的大意外了。

笔者以为，毛岸英之死虽不至“文革”中彭德怀专案组的污蔑——“彭德怀有意害死毛岸英”。但不可否认的是，对毛岸英之死，彭老总也的确难辞其咎。

对于志愿军总部的防空问题，毛泽东曾多次告诫彭德怀等人务必注意。在毛岸英牺牲的头一天，毛泽东还致电彭德怀，谆谆告诫注意防空，“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甚至明确提到“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

彭德怀看罢毛泽东的电报后，只要稍微谨慎一点，“胜似闲庭信步”一般带着毛岸英往司令部旁边的防空洞里一钻，便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可彭德怀却没把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提醒、劝诫当回事。甚至连敌机快飞到他头上时，他还和敌机较上了劲，坚决不进防空洞！大家现在都知道，急得一旁的洪学智莫法，只好对他采取“强制措施”，亲自动手将他架进防空洞。

须知，彭德怀是统领百万大军的战地最高统帅，而不是一名火线上的敢死队长，他怎么可以放弃重大责任，敌机临头而不躲避呢？防空洞就在旁边几步之遥的地方啊！

当悲剧发生后，我想最痛悔不已的，当莫过于彭德怀吧？

毛岸英是在1950年11月25日早上牺牲的，那我们就顺着档案文献往前捋一捋，笔者所下的结论，便一清二楚了。

我们先看看，毛泽东是怎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彭德怀注意安全的。

1950年10月21日，也就是彭德怀入朝的第二天，毛泽东于凌晨4时致电彭德怀，提醒说：“敌人测向颇准，请加注意”，“熙川或其他适当地点应速筑可靠的防空洞，保障你们司令部的安全”。

10月27日，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你们指挥所应移至安全地点，现在的位置不好。”

10月28日，他继续叮嘱彭德怀：“你们指挥所应速建坚固的防



空洞，立即修建，万勿疏忽。”

11月24日，也就是毛岸英牺牲的前一天，毛泽东在获知苏联方面提供的情报后，还于深夜专门给彭德怀发了这样一份电报：

彭、邓、朴、洪，并告高、贺：

一、你们本日7时的作战部署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照此执行。

二、请你们充分注意敌人降落伞部队在我后方降落，应控制必要武装力量及汽车在你们及后勤部手里，准备随时扑灭这些空降敌人。敌人已有一组谍报人员在云山以东地区降落，并称正向鸭绿江边移动，请注意扑灭。

三、请你们充分注意领导机关的安全，千万不可大意。

四、此次战役中敌人可能使用汽油弹，请你们研究对策。

五、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毛泽东

11月24日22时半<sup>①</sup>

遗憾的是，彭德怀果真“大意”了，毛泽东频频发出的这些指令，均未引起彭德怀的重视。

这当然不是怕不怕死的问题，而是彭德怀所处的地位与职责，必须应当更谨慎一些。

就在毛岸英牺牲的前一天晚上——11月24日，麦克阿瑟发动大规模进攻。这天晚上，彭老总与司令部其他首长讨论战况，非常紧张。毛岸英和办公室其他人员一样，忙到大半夜才休息。当天是参谋龚杰在办公室值班，大家都休息后，龚杰和杨凤安留在彭老总办公室。毛岸英与一周前刚到朝鲜的参谋高瑞欣两人在志愿军政治部的防空洞里休息。

当时是洪学智负责司令部，也负责彭德怀的人身安全。

前一天晚上，洪学智看了毛泽东发来的提醒志司注意美军空中袭击的电报后，来到彭老总办公室，请彭老总到半山腰上一个防空洞去办公。

<sup>①</sup> 以上电文内容均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但彭德怀脾气倔犟，坚决不走，还大声嚷嚷：“你们别管我，我不走！”

杨凤安回忆说：“洪副司令员见劝说无用，也不顾彭老总正在大发脾气，强行将他架出门，往旁边不远处的防空洞走去。一边走，洪副司令员还一边大喊：‘杨凤安，快把彭老总的办公用品（毛笔、墨盒、电报稿纸）拿来！警卫员把彭老总的铺盖卷起来，和行军床一起送到防空洞里去！’等彭老总进去时，看到邓华副司令员、解方参谋长、杜平主任都已经在里面等着他了……”

如果不是洪学智对彭德怀采取“果断措施”，固执的彭老总，是不是早已和毛岸英一样以身殉国了呢？

须知，“彭老总的两间房，和作战处的三间房一下全烧没了，整个地皮全成了一片火海”（赵南起的回忆）。

而毛岸英呢？那时正叫上高瑞欣，从政治部的防空洞里出来，到司令部作战室里煮鸡蛋吃。

杨凤安回忆说：“岸英煮的鸡蛋是朴一禹送给彭老总的。岸英牺牲的前一天，也就是11月24号下午，朴一禹带了一个小筐过来。朴一禹是金日成驻志愿军总部的朝方代表，同时我们的毛主席正式任命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党委副书记。是他专门派人到朝鲜的山沟沟里，在还没有被美军炸掉的零散的老百姓家里去寻找鸡蛋，好不容易弄来一筐子宝贝疙瘩。他拿鸡蛋来送给彭老总，彭老总满脑子想的是第二次战役怎么打，说拿这个来干吗，送走，送走，送给伤员们。朴一禹说彭老总日夜操劳，给你补养补养身体。彭老总说什么补养身体，我身体很好。朴一禹又补充说，马上就要打第二次战役了，我代表金日成首相来看你，预祝第二次战役胜利。这么一讲，彭老总不好拒绝了，就说放那儿吧。把鸡蛋放到作战室的大桌子脚底下。在现场的毛岸英，自然也看见了。”<sup>①</sup>

彭德怀对防空的忽视，恐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国内战争中偏处西北次要战场，长时间与蒋介石的偏师弱旅作战，造成自身的防空经验不足；其次则是对美军现代化装备的巨大杀伤力，缺乏必要的了解。

所以，就有了接下来发生的故事。

1951年2月21日，彭德怀回到国内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当面检

<sup>①</sup> 引自201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12集文献纪录片《不能忘却的伟大胜利》。

讨说：“我对你和恩来几次督促志司注意防空的指示不重视，致岸英和高参谋不幸牺牲，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彭德怀的内疚是真诚的，但已经无济于事。

毛泽东是领袖，领袖也是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说毛泽东对不拿他的再三提醒、告诫，甚至命令当回事儿的战区最高统帅没有一点想法，恐怕也不符合人之常情。

许多年后，居然连毛岸英的烈士身份，都出了问题。

刘松林回忆说，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她回到中南海收拾东西才发现，竟然没有毛岸英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当她去有关部门补办时，所有的人都不相信：“这不可能！谁不发也不能不发给你呀！”

查来查去，毛岸英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当年确实忘了发，毛泽东心中装的是国家大事，也没顾着问。

补发《革命烈士证明书》那天，刘松林尴尬万分，因为按照毛岸英当年的职务，一并补发给了她324元抚恤金。

在朝鲜死于美军飞机轰炸的第50军副军长蔡正国的儿子蔡小东领到补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时，也随同补发了610元的抚恤金。当工作人员把抚恤金递到手上的时候，蔡小东傻眼了，他说我不是为这抚恤金来的啊！经过再三劝慰，蔡小东才把抚恤金领了回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那抚恤金就像一块巨石压在他心头，久久不能释然，直到小东把抚恤金加倍捐献给父亲陵墓所在的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时，忧郁愁苦的心情，才豁然舒展开来。

回忆起这段往事，刘松林的心情与蔡小东完全一样：“我当时很不好意思，真怕他们以为我要求他们补发岸英的《革命烈士证明书》，是想要这笔抚恤金……”

对于英烈们来说，无论是300元，或是600元，或者是普通战士的两大袋小米或者麦子，这样的真实故事在今天看来，几百块钱和两大袋小米、麦子的抚恤金肯定都太菲薄！太菲薄了！

然而，它却昭示了前辈的昨天，正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率领全国人民粗茶淡饭、节衣缩食、戮力同心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才奠定了今天共和国改革开放得以腾飞的和平环境！



## 4. 出而不战

位于黑海东岸的索契是苏联著名的避暑胜地，海滨除了有良好的天然浴场外，还有过去的沙皇行宫、新建的高级宾馆和大大小小的疗养院。

这里的青山碧水，蓝天白云，还有悦耳的涛声、拂面的海风，总是给人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因此，索契成为了苏联国家领导人常来休息度假的最佳选择，其地位大抵相当于中国的北戴河。

在中国无人不知的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就长期居住在索契疗养。他的成名作、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在这里写成的。

1950年10月10日，周恩来与正在莫斯科养病的林彪赶到克里米亚半岛上的索契，和斯大林举行会谈。

没想到，毛泽东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在与斯大林会谈的时候，周恩来和林彪先表明中国以不出兵为宜的态度，继而又表示，中国也可以出兵，但是我们的出兵是有条件的。第一，我们的装备不行，全套装备，苏联要负责提供；第二，我们出陆军，苏联出空军。

斯大林对第一个问题表态很痛快：“武器装备没有问题，你们要多少，我们给多少，要什么，我们给什么。”

第二个问题却出了麻烦，斯大林突然变卦说：“空军我们暂时还没有准备好。这样吧，你们先把部队开上去打，我们抓紧准备，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以内，等我们的空军准备好了，马上就开上去。”

周恩来何等聪明，苏联出空军，中国出陆军，这是罗申早在7月份就主动提出的两国参战方式，现在已经进入10月份，已经过了3个月的时间，苏联空军怎么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周恩来马上语气强硬地表示：“如果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那么，中国军队也只能等到苏联空军能够参战时，再过鸭绿江。”

斯大林激动地大叫起来：“那么，你们的决定就是现在不想派军队去朝鲜了？如果你们不立即出兵援助，社会主义的朝鲜很快就会崩溃的！”

林彪说：“斯大林同志，中国政府同意出兵是有前提的，那就是

你们必须提供空中掩护，如果彻底丧失了制空权，我们的士兵就等同于遭到美国空军的大规模屠杀。”

面对周恩来和林彪的强硬态度，斯大林也不好再固执己见，沉默了好一阵，才开口说：“如果中国同志决定暂时不能参战，以后再参战也就失去了意义。那么我的意见是，马上通知金日成，把残余部队和所有国家机关带过鸭绿江，在沈阳建立一个流亡政府。”

林彪一听这话更急了，赶紧说：“斯大林同志，你让金日成就留在他们的山上打游击好了，千万别到我们东北来。”

最后，斯大林与周恩来给毛泽东发出了一封联名电报：“鉴于中国军队没有足够的武器装备，而苏联空军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能做好准备，决定中国军队暂不出动，朝鲜残余部队撤退到中国境内休整、组编。”

大国交往，斯大林为何会出尔反尔，自毁承诺，如此不顾自己的形象？原因说出来简直令我等后人哭笑不得，原来美国人的一架轰炸机误炸了哈巴罗夫斯克附近一个苏联军用机场。美国人吓坏了，生怕触怒苏联，引起世界大战，连忙道歉，表示要送肇事飞行员到军事法庭受审，并保证赔偿苏联一切损失。

过了几天，苏联人没啥动静。

又过了几天，苏联方面仍然没有任何反应。

美国人这下更害怕了，认为苏联正在进行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眼前不过是大战爆发之前才会出现的那种异样的平静。

殊不知斯大林被美国的“悍然轰炸”吓得更厉害，把这当成了美国人的公开挑衅。斯大林认为：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与美国开战，于是才有了“苏联空军还没有准备好”等向中国方面搪塞的托词。

因莫斯科与北京时差5个小时，斯大林与周恩来的联名电报到北京时是12日子夜。毛泽东得知苏联已确定暂不出动空军的消息后，紧急发出两封电报，指示东北的彭德怀、高岗以及华东的饶漱石、陈毅：“10月9日命令暂不执行”，“13兵团各部仍旧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华东方面的“宋时轮兵团亦仍在原地整训”。

同时，请高岗和彭德怀紧急赴京商谈。

聂荣臻担心电报辗转延误时间，又于当晚7时许匆忙赶到军委作战部值班室，直接用电话找到正在丹东察看大军过江渡口的彭德怀，



告诉他“情况有变，速回北京面谈”。

10月13日中午，彭德怀和高岗同机抵达北京。

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对出兵和不出兵的利害关系，再次展开讨论。

据闻，彭德怀一听斯大林出尔反尔，立即炸了，说没有空军，无异于让中国军人去白白送死，他决不能干这样的傻事，这志愿军司令，他不干了，谁有能耐谁干去！

彭德怀一嚷嚷，众多原本就反对出兵的同志，也都趁机再次表达出自己反对出兵的真实想法。

这次紧急会议仍然没有记录。历史学家们只能根据一些老同志的访谈和回忆录透露出一星半点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和推断。

虽然不知道会议过程和内容，不过，结果却是清楚的。毛泽东仍然不改初衷，最终决定：“没有苏联空军，志愿军仍然决定赴朝参战！”

毛泽东用以说服政治局委员的道理既生动，又形象：仗打败了没关系，这事儿我做主了。这就像兄弟俩，弟弟被人打了，哥哥连门都不敢出，以后谁还认你这兄弟啊；哥哥出了手，被人打了一顿，也算尽了当哥哥的责任，哥儿俩今后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好。

20年后的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来访的金日成时，回忆了这段曲折、艰难的决策过程。

毛泽东告诉金日成，“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用双手比画着，“嗯！最后还是决定了。你不帮助，怎么办啊？（在国际事务上）不仅你们没有发言权，我们也没有发言权了啊！过去我曾经同跟着你们军队到过南朝鲜的中国新闻记者谈过话。我问他：究竟美国的炮火和空军杀伤力哪个大？据他说，主要杀伤力还不是空军，而是陆军。我说这样就好办了，因为我们没有空军哪，有的只是陆军啊。再有呢，那无非是进去了又被美国人赶了出来。那我总进去跟你打过一回嘛。被你们赶出来回到鸭绿江以西，那以后你美国人占领了鸭绿江以东，他总是不放心的，我们总还可以进去嘛，以后我们两家合起来组织游击队，再可以钻进去占领鸭绿江以东嘛。你如果按兵不动，以后就没有理由了嘛！”

毛泽东还说：“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

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来不是总理去了么？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说：“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说：“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斯大林不干。”

周恩来说：“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说：“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都去！”<sup>①</sup>

而且，对付斯大林的突然变卦，毛泽东也有应对的办法。你斯大林不是说两个月到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吗？那好，我就来它个“出而不战”。志愿军在鸭绿江西边也是待着，那就先过江，到东边朝鲜一侧的大山沟里猫着，能不和美军接触最好，实在避不了，非动手不可，那就尽量先挑南韩军打。如此拖他两三个月，等到苏联空军到了，咱哥俩再一齐动手，由北向南打。

除了“出而不战”这个妙招，毛泽东坚持出兵，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出尔反尔，悍然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个提法对毛泽东的刺激太大。

他后来在会上多次说道：“美国人说话不算话，你杜鲁门1月5号发表声明，说解放台湾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美国人干涉，怎么到了6月份，‘三八线’上炮声一响，台湾地位就未定了？”

美军打到鸭绿江以后到底要干什么，毛泽东心里没底。所以他通过周恩来、聂荣臻之口向全世界，也是向美国人宣布：“只要不过‘三八线’，甚至只要美国人不过‘三八线’，中国就不会出兵。”

可美国人不信，总认为中国人是在搞讹诈。

特别是麦克阿瑟，认为中国人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出兵，毛泽东真要出兵，在8月份仁川登陆前出兵不更好吗？中国那时候出兵的话，千军万马往朝鲜东西海岸一布开，我们登陆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毛泽东在最该出兵的时候不出兵，在最不该出兵的时候出兵，他不成傻子了吗？所以15日在威克岛他对杜鲁门说：“毛泽东要出兵他早就出了，现在出兵对他的士兵来说，那就不是一场战争，而是屠杀。”

<sup>①</sup> 引自欧阳璐《中国出兵援朝决策始末》，发表于《文史参考》2010年第2期。



毛泽东说服彭德怀和其他与会者，虽然苏联空军在战争开始阶段不能进入朝鲜，但斯大林已经答应对中国领土实行空中保护，并且慷慨承诺向中国提供大量军事装备。

斯大林在为中国提供军火方面，倒还真是不吝啬。中国出兵朝鲜本身，就是对苏联实现其远东战略目标和利益的无私援助和具体支持，斯大林对这一点倒是看得非常明白。

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苏联都有义务保证，对正在战场上殊死搏斗的中国军队提供援助和支持。

斯大林也的确这样做了。

从武器装备上来说，那时候的中国要单独应对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是不可能的。仅供应足够的弹药这一项任务，中国本身就根本无法完成。如1951年第一季度，朝鲜战场上所需弹药约14100吨，而国内军工生产能力即便加班加点，也只能完成1500吨，而当时全世界唯一可能供应武器弹药给中国的国家只有苏联。斯大林基本上满足了军队在战场上的要求，特别是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前，几乎是有求必应。

1950年11月7号，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志愿军部队直接参加朝鲜军事行动的有12个军，计36个师，但仅有6个步枪和机枪弹药基数<sup>①</sup>。今后随着军事行动的发展，我们在保障军队弹药方面势必出现很大困难。如果军工生产方面不出现变化，那么，改换装备工作可能要等到1951年下半年方能开始。为克服目前困难，我请求您研究一下关于在1951年1月和2月这一时期给36个师供应步兵武器装备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的具体要求是：

苏式步枪14万支，步枪子弹5800万发；

苏式自动枪26000支，自动枪子弹8000万发；

苏式轻机枪7000挺，轻机枪子弹3700万发；

<sup>①</sup> 笔者注：弹药基数是弹药供应的一种计算单位，而基数量是对单项装备规定的一个基数的物资数量或重量。其标准由军队最高领导机关根据国家工业生产水平、部队携行能力、武器的战术技术性能和一般的消耗规律统一规定。例如规定半自动步枪的一个弹药基数量为200发枪弹，一支冲锋枪300发枪弹，一门82迫击炮120发炮弹，一辆解放牌汽车一个油料基数为161公斤，100人份的战救药材一个基数量为9公斤等。规定弹药基数可以给指挥和保障带来很大方便。它既便于上级下达命令、指示和其他行文，又便于各级军械部门计算弹药数量和向上级、首长报告弹药保障程度。使用弹药基数，既能使庞杂的数字简单化和规范化，又利于计算、供应、记忆和保密。



苏式重机枪2000挺，重机枪子弹2000万发；  
飞行员用手枪1000支，飞行员用手枪子弹10万发；  
TNT炸药1000吨。

对于这36个师的步兵轻武器，11月9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说1951年1至2月可如数运到中国。

斯大林没有食言，这批武器的到货数量与中方要求的完全一致。

利用这批武器，在朝鲜的志愿军陆续有34个师更换了装备，另外2个师的武器，作为补充消耗和分配给军校、军区用作训练。

朝鲜战场的战斗打响后不久，毛泽东要求苏联提供鱼雷快艇、装甲舰、猎潜艇、岸炮等海军武器装备，并拟派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飞赴莫斯科进行商谈。

斯大林第二天便回电表示同意。

11月17日，周恩来致电斯大林：“新的战役即将开始”，而“鸭绿江铁路桥每天都在遭受敌机轰炸”，为解前方作战燃眉之急，需要立即从驻扎在旅顺的苏军部队中抽调500辆汽车。

斯大林当天便答复：“为了尽快将汽车移交给您——我是说给您新车，已指示我军司令部不是从旅顺，不是从旧车中调拨，而是在满洲里交付新车。11月20日移交中方代表140辆，11月25至26日移交255辆，剩余车辆将于今年12月5日前尽快发出。在满洲里站还将另外交付1000辆汽车。”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为中国正在组建中的一个空军集团军派遣15名军事顾问的要求，斯大林也立即予以满足。

为了加强志愿军的空军作战能力，斯大林还主动提出无偿向中国提供大量新式飞机。他在1951年5月22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满洲和北朝鲜边境上的空战终于使我们确信，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如有优秀飞行员使用，完全可以对付美国和英国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尤其是轰炸机。你们从苏联得到的歼击航空兵师目前已有10个，其中6个为米格-9歼击机师，4个为米格-15歼击机师。为使中国歼击航空兵师能够成为更加富有战斗力的歼击航空兵，应用米格-15歼击机取代米格-9歼击机，为此，需要从苏联给你们运去372架米格-15飞机。我们由于飞机不够，一直未能做到这一点，但现



在已能做到这一点。我们打算将这372架米格-15飞机无偿提供给你们，仅支付从苏联到中国的运费即可，运费可从军事贷款中扣除。至于你们现有的米格-9飞机，可以留下来供你们大规模训练喷气式飞机飞行员之用，还可用以同轰炸机和不太现代化的战斗机作战。你们的已学会米格-9的飞行员可以很容易地掌握米格-15飞机，在我们苏联为此仅需10天以内的时间。我们已拟定了将372架飞机运往中国的计划：第一批为72架，6月20日以前运抵；其余各批也将陆续运抵，保证你们到8月初以前能得到全部372架飞机。

朝鲜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实现了全面改装，50年代前期中国共有106个陆军师，其中56个师是完全按苏军编制装备的（其中无偿赠送给朝鲜人民军3个师，另一个师拆散给各军事院校作训练用），这56个师的编制配备与苏军完全一样，即每个师（14963人）有3个步兵团、1个炮兵团、1个坦克自行火炮团、1个独立高炮营、1个独立57反坦克炮营。

此外，还有6个坦克师和独立坦克团、5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师、2个火箭炮师、14个榴弹炮师、2个反坦克炮师、33个高射炮团、4个探照灯团、9个雷达团和独立雷达营、28个工兵团、10个铁道兵师，以及通信兵和防化兵部队。到1955年初，中国共组建了28个空军师、5个独立飞行团，共有飞机3000余架，均是苏联赠送和售予的。

另外50个师，则是用国产的仿苏武器换装升级的。

尽管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并不全都是最新式的和最先进的，有一部分甚至是二战时苏联与美国租借物资中的剩余装备。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毕竟都是现代化武器，而苏联是当时唯一能够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国家。<sup>①</sup>

关于装甲兵装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为建立和培训中国的坦克装甲兵部队，根据中苏协议，苏军派遣10个坦克自行火炮团于1950年11月来华，由中国组织10个团的机构对口接收装备和接受训练，其装备有T-34中型坦克300辆，ИC-2重型坦克6辆，ИCУ-122自行火炮40辆。

<sup>①</sup> 引自王亚志（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和彭德怀的参谋，后调国防科委工作）回忆，沈志华、李丹慧夫妇整理的《20世纪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若干问题之一》，发表于《国际政治研究》2004年第1期。

中国用上述装备组建了3个坦克师（每个师2个团，再配以摩托步兵团、炮兵团）、3个独立坦克团以及基地训练团。

关于高炮部队，战争期间，中国利用苏联提供的37毫米高射炮编组了101个独立高射炮营，其中有53个营先后入朝作战，另40个营则编入国内各大城市防空高射炮师、团，4个营编入坦克师，4个营编入海军基地。

此外，还组建了5个野战高炮师和1个城防高炮师（用苏联85毫米高射炮装备了24个营，用76.2毫米高射炮装备了14个营）。

炮兵方面，中国军队在50年代还用苏联武器装备了火箭炮师2个（9个团）、榴弹炮兵师14个、反坦克炮兵师2个、高射炮团33个、探照灯团4个、雷达团1个、独立雷达营8个。

工兵方面，用苏联的工程器材、舟桥装备了28个工兵团，其中入朝作战13个团。铁道兵方面，入朝的铁道兵10个师，加上铁路员工共15万人，其工程器材基本上购自苏联。

通信器材和防化器材也是向苏联购进的，用于全军各通信分队和防化分队。

苏联的军事援助对于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的一系列战果，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苏联的巨大帮助，就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如此短暂时间里的“脱胎换骨”，大步跃升于世界军事强国之列的可能。

也可以说，这是数十万中华儿女用生命为祖国换来的一个巨大成果！

10月13号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作出必须立即出兵援朝的决定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高岗详细研究了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方案。会议结束，毛泽东即给周恩来去电，通报了具体的作战部署和方案，并说明志愿军出动的日期为17日。

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和林彪赶快去见斯大林，请苏联方面答应两件事：

第一，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我们现在没钱，等到打完仗再结算，就算向苏联政府贷款；

第二，让苏联保证两个月到两个半月之内出动空军参战。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出动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保护中



国的几个大城市，我们也不惧怕美军的空袭。

周恩来和林彪这时结束了和斯大林的会谈，已经从索契回到了莫斯科。他俩当夜紧急约见莫洛托夫，要他立即向斯大林转告毛泽东来电的内容。

10月14日，莫洛托夫代表苏联政府承诺，军火款列入贷款没有问题，打完仗后再结算。还说斯大林同志得知毛泽东决定出兵很感动，特别指示，我们只按照出厂价半价结算。以及到时将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飞机，掩护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

周恩来随即又致电在索契疗养的斯大林，进一步提出苏联除战斗机外，可否出动轰炸机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出动空军入朝作战外，可否加派空军驻扎在中国近海各大城市，以及除提供武器装备外，可否在汽车、重要工兵器材方面也给予信用贷款订货的条件等等。

这时，斯大林又一次改变了主意，他让莫洛托夫通知周恩来，苏联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保护中国的后方基地，不能配合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

这下把周恩来和林彪气坏了：都是社会主义革命大家庭的成员，我们到前面去和美帝国主义打，你们连鸭绿江也不敢过，这叫参的哪门子战？

莫洛托夫就喋喋不休地给他俩讲起了苏联面临的巨大国际压力，此时心急如火的周恩来哪有时间听他卖劝世文，留下林彪在莫斯科治病，自己马上飞回了北京。

苏联决定不派空军入朝作战，也就意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根本无法得到空中支援，这不能不使中国重新考虑出兵问题。

于是，毛泽东在17日下午5时再次急电彭德怀和高岗改变计划。原定先头部队17日出动，现改为“准备于19日出动”，并且说明18日“当再有正式命令”。电报还要彭、高二人再次乘飞机回京商谈。

毛泽东于18日又一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研究出兵朝鲜问题。会上，刚从莫斯科赶回来的周恩来介绍了几天来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人会谈的情况，彭德怀介绍了志愿军出国前的准备情况。

毛泽东最终一锤定音，说：“现在敌人已经攻入平壤，再过几天，敌人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管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

会后，毛泽东于晚9时给邓华等志愿军领导去电，命令部队按预

定计划，自10月19日晚渡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这是一个青睐胜利者的时代！中国一旦闯进选边的世界，朝鲜战争一定奇幻迷离，波诡云谲。新中国的掌舵人遥看中华百年战事，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派彭大将军率领几十万身经百战的将士前赴后继，披坚执锐，拔寨攻城，叱咤风云……

## 5. 张作霖同志

就在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期间，斯大林接到了金日成的求援电报，说敌人已经快把平壤包围了，苏联军队再不开进朝鲜，他也快成俘虏了。

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接到海军情报部送来的一份情报，说发现美军一支庞大的特混舰队正在离元山港不远的日本海上活动，看样子极有可能抄北朝鲜人的后路，在元山再来一次登陆。<sup>①</sup>

斯大林马上发了个电报给金日成，向他通报了 this 情报，并让金日成立即率领劳动党和政府两套班子干部，以及被打残了的部队尽快撤往中国东北，在沈阳建立流亡政府，然后在东北重新训练干部，整训军队，等到条件成熟时再打回朝鲜去。整个撤退行动，由什特科夫大使帮着金日成完成。

什特科夫传达后，惊慌失措的金日成痛苦地表示照办。

斯大林关于撤退的电报刚发走，苏联驻华大使罗申的电报到了，说：毛泽东同意出兵了！

斯大林大喜过望，马上追发了个电报给金日成，说上个电报作废，毛泽东已经同意出兵，你只要再坚持几天，中国大军就能赶到了。

而此时金日成接到斯大林让他撤往东北的电令后，已经和什特科夫着手实施撤退行动。毛泽东决定出兵，金日成遂打消了到东北沈阳建立流亡政府的计划，改把鸭绿江南岸朝鲜一侧的江界，作为

<sup>①</sup> 这支眼下漂在海上的部队正是稍后与宋时轮将军的第9兵团在长津湖展开大战的美军陆战1师。



战时首都。

不过，按照斯大林的建议与朝鲜和中国方面的协议，中国政府仍然允许金日成将被打残的部队送往东北进行整编和训练。人民军第67、68、69三个师及特种部队35000人，集中在湾沟地区；第32、75师及特种部队35000人，集中在和龙地区；计划1950年11月5日前，在延吉地区再集中3个师及特种部队35000人。

此外，朝鲜人民军步兵学校和政治学校撤到了通化地区，坦克训练团撤到了汪清地区，航空学校撤到了延吉地区。为领导这十几万官兵的训练工作，北朝鲜政府专门成立了以民族保卫相崔庸健为首的指挥部，和3个军级指挥所。

毛泽东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仍然坚决主张派兵赴朝作战，除了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安全利益的担心外，很可能还有对中国主权完整受到威胁的更深层忧虑。

如果朝鲜按照苏联的计划在东北建立流亡政府，允许金日成与其残余部队撤到东北休整，那么，假如因此而将战火引至中国境内，斯大林便极有可能根据中苏同盟条约，名正言顺地派几十万苏联远东军进入东北，帮助中国作战。

再者，毛泽东不会忘记1945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对日作战出兵东北，从而迫使蒋介石政府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城下之盟。

更不会忘记，新中国领导人在东北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了艰苦谈判，才迫使斯大林接受了限期归还长春铁路和旅顺、大连的协定。

这不奇怪，虽然彼此都肩并肩手挽手地簇拥在同一面鲜红的旗帜下，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但朝鲜人仍然害怕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而中国人也不能不担心苏联红军的坦克、战车，再次轰隆隆地碾压东北的黑土地。

美国政府内部的讨论和分歧情况，北京当时是无法得知的，因此与麦克阿瑟咄咄逼人的战争叫嚣和蒋介石的蠢蠢欲动相比，杜鲁门和艾奇逊二人的声明和保证，就显得毫无价值，甚至是别有用心。

周恩来后来说：“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过了之后，再搞中国。我们看穿了骗局，所以在9月30日发表声明：对美帝侵略朝鲜，我们不能置之不理。”

中国领导人认定美国继攻占北朝鲜之后，必然要把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东北作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这才下决心与美国一战。

另一方面，尽管中国加入了社会主义阵营，中苏也签订了同盟条约，但毛泽东清楚斯大林对他并不信任。斯大林过去一直认为他是民族主义者，怀疑他毛泽东带领新中国会和苏联离心离德，走上铁托式的道路。如果中国此时不出兵援助朝鲜，无疑将证明斯大林对他的看法和怀疑是正确的，中国就笃定会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处于被孤立的境地。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本人是颇有感触的。

他在1956年9月同南斯拉夫代表团谈话时说：“当时，有人说世界上有两个铁托，一个在南斯拉夫，一个在中国。直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打击了美帝以后，才摘掉了这顶帽子。”

1958年7月毛泽东又对苏联大使尤金说，“斯大林一直怀疑中国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到朝鲜战争时他才改变了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再者，很有可能，“东北王”高岗与莫斯科的特殊关系，也是毛泽东在考虑东北命运时的重大原因。

高岗与斯大林保持着极不寻常的亲密关系，他喜欢穿苏式服装，言谈举止，生活方式也都刻意模仿苏联老大哥，他也因此成为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最为欣赏的中国人。甚至在高岗自杀以后，赫鲁晓夫还多次在苏共内部讲“高岗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最让毛泽东耿耿于怀的是，1949年7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在发言中谈到，台湾统一是中共目前面临的重大任务，并且希望能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

随后，情绪十分激动的高岗也发了言。

他首先表示赞同刘少奇的讲话，继而表示，他想提出他个人的一项建议。他的建议竟然是希望苏联宣布东三省为苏联的第17个加盟共和国（当时苏联共有16个加盟共和国）。按照高岗的意见，东三省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后，可以保障东三省免遭美国人的侵犯，并把东三省建设成为继续彻底歼灭蒋介石集团的更加可靠的基地。

此外，高岗还建议在青岛驻扎苏联舰队，建议苏军在远东加强驻军力量。

高岗发表完意见后，与会者报以热烈掌声。

可是，刘少奇则已是脸色铁青，怒不可遏。

最让人难以捉摸的是斯大林当时的表现，他的脸色同样很难看。就在他的同志们发出的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斯大林突然站起身来，向



坐在第一排的高岗神情严肃地叫了一声：“张作霖同志。”

这种称呼使全体与会者大为震惊，掌声戛然而止。

因为大家都知道张作霖是中国东北的土匪，后来靠日本人的大力支持，成了东北的独裁者，当他企图不按日本人的意旨办事时，日本人便毫不留情地把他干掉了。

会议结束后，高岗和刘少奇同坐一辆汽车前往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刘少奇指责高岗的发言如同公开叛党卖国。

高岗不服，认为自己只不过是站在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的立场上说话，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理应彻底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分疆界，亲如一家，他反倒振振有词地和刘少奇激烈争吵起来。

到达宾馆后，刘少奇马上向毛泽东发电报，报告了高岗的行为，要求毛泽东立即将其召回。<sup>①</sup>

作为刘少奇副手访苏的高岗能在联共（布）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近乎于卖主求荣的建议，对毛泽东的刺激可想而知。

而斯大林非同寻常的表演，更让他不能不作更深一步的思考。

因此，一旦让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而苏联再次出兵东北，那么其结果必然是：无论战争胜败如何，中国都无法保证东北的主权不受损害。对东北主权构成威胁的不仅仅是美国人，同时也要提防着在东北问题上从来没有消停过的苏联人。

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上善之策，只能是把战争阻止在国门之外。不久后响彻全中国的一句口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便贴切地反映出毛泽东对出兵问题的全部考虑。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谁都清楚，按实力，中国根本不是美国的对手，西南遍地匪焰，政权不稳，国家满目疮痍，百废待兴。1950年6月30日，即美国决定全面介入朝鲜战争的当天，中国颁布了《土地改革法》，同一天，中共中央下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军委、政务院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土改、复员、剿匪、稳定物价、恢复生产、解放台湾，哪一件火烧眉毛的大事都不容许中国与美国立即开战。可是美国人在台湾海峡耀武扬威，公然威胁不准中国人解放台湾，这就逼得同样豪气过人从不服输的毛泽东，拿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狠劲儿，非要和美国佬摆开架势，大战一场不可！

<sup>①</sup> 此细节参阅逢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之《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随后，毛泽东签发命令，19日晚上7点半，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下辖的第38、39、40、42军共25万人马，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地跨过了鸭绿江。

但是，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却在跨过鸭绿江前夕，丝毫也没有“雄赳赳气昂昂”的心态。

在丹东镇江山招待所吃饭时，他对一大群高级将领们吐露心曲，说：“咱们的名字叫志愿军，跟你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其实我也不志愿，是毛主席派我来的。要不是美国军队压到了鸭绿江边，欺人太甚，我也不会去和美国人打仗。现在他打到了咱们家门口，我志愿挂帅出征，你们志愿不志愿率兵作战？”

多数中国将军们表示和彭老总的想法一样，打了这么多年仗，谁不想和老婆娃娃待在一起，过过安稳日子啊？反正，在这样高级的场合，没人说自己“志愿”的。

只有彭德怀的湖南平江小老乡、39军军长吴信泉冷不丁冒出一嗓子：“现在是不志愿也得志愿。我在军部的动员大会上就说了：怕他个尿啊，美国鬼子也不是三头六臂，咱就豁出这条命，把这纸老虎打个稀巴烂！”<sup>①</sup>

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来访的金日成时，曾谈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个口号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说：“动员了以后，他们作了一个调查，说有百分之二十的战士、干部是积极的、愿意打的，有百分之二十是不愿意打的。”

周恩来插话：“那是在开始的时候。”

毛泽东说：“除了这百分之四十，还有百分之六十是打可以，不打也可以，随大流。我说这就可以了嘛，因为有百分之六十可以随大流，可以赞成打，再加上百分之二十愿打的，这不是百分之八十吗？就可以打了嘛。我们又把国际主义跟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也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你们朝鲜人，不为我们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

金日成表示赞同：“是的。当时提出这个口号很好，很正确。”

<sup>①</sup> 笔者注：以上细节参阅吴信泉《三十九军在朝鲜：1950—1953》，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毛泽东说：“你不去支持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样，战士就理解了嘛。”<sup>①</sup>

高级将领如此，基层官兵的情况更加不容乐观。当时中国人民经历了14年抗战，紧接着又是4年多内战，好不容易才把蒋介石撵到台湾岛上去了，庞大的人民解放军加上同样庞大的国民党起义、投诚、被俘官兵，立即成为新中国不堪重负的包袱。

当时多数部队都已担负了生产建设任务。官兵都渴望能够“喘口气儿”，普遍作战意识淡化，战备松弛，忽视训练，车辆及各种装备损坏严重，两成至三成以上的武器和火炮锈蚀损坏，甚至麻雀已在炮筒里筑巢。

况且不少官兵对与美国作战也普遍存在着恐惧心理，比如害怕原子弹，对美军的飞机、坦克感到束手无策，认为“鸭绿江是鬼门关，过去了就回不来”，认为“美国鬼子不会打到中国来”，“何必多管闲事，不要惹火烧身”，等等，都能表明当时出兵入朝作战的难度。

在部队接到向北开赴的命令时，用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的话说：“官兵们有一个转弯子的过程。在朝鲜战争爆发5天后，也就是6月30日，中国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场具有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展开了。二是为减轻国家的经济困难，加强建设力量，中央复员工作会按照预定计划下达了由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签署的《关于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开始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复员工作。计划至1950年10月，复员150万人，全军员额降至400万左右。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随即在解放军中开展复员工作，各级政治部门为此花费了极大的耐心 and 精力，才使部队的复员工作开展起来。现在，复员工作由于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必须立即停止。”

而终止复员，就意味着每一个刚刚放下武器的官兵，都极有可能再次投入战争。

时任炮兵第1师连指导员、《志愿军战歌》的词作者麻扶摇回忆说：“作为一个战士，他知道这和平来之不易，一旦和平要遭到破坏，他完全可以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保卫和平的战斗中去。但是我们这样的政工干部必须得想办法，帮助他思想上转过这个弯来呀，他转不

<sup>①</sup> 引自欧阳璐《中国出兵援朝决策始末》，发表于《文史参考》2010年第2期。

过这个弯，士气就振奋不起来。第一个弯子，从战斗队转为生产队，我们好不容易才帮助战士刚转过来，现在又一个命令，从生产队马上又转为战斗队，这个弯子转起来，就太困难，太困难了。”

驻扎在河南的第38军和39军当时的中心任务也是搞大生产，这支亦兵亦农的部队把作战武器收藏起来，在成片荒凉的土地上播下种子。如今，官兵们脚下的大地已经长出了一望无际的好庄稼。就在这时，部队突然接到了北上鸭绿江畔的命令，命令中还写明，“将房子、庄稼、生产工具等一切与作战无关的生活设施，向地方政府完整地移交”。

麻扶摇接受记者采访时颇为动感情地说：“我作为指导员，根本不知道和我的战士们开到什么地方去。临走的时候，跟老乡告个别，战士们回过头去，依依不舍地看看我们用汗水浇灌的黑土地，绿油油的大豆田，许多人眼睛湿了。”

但人民解放军最大的特点就是绝对遵从“党指挥枪”的原则，不论想法怎样，困难多大，一旦毛主席和党中央下定决心和美国人打，命令一下，个人的一切立即抛到九霄云外，义无反顾，人人请战，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秘密入朝的第13兵团第38、第39、第40、第42四个军，冒着绵绵细雨，分别从中朝边境的丹东、长甸河口和集安渡口陆续跨过鸭绿江，总兵力达25.5万人。

为了更好地隐蔽接敌，志愿军入朝部队除掉了衣服上的所有中文标志，有的则直接换上了朝鲜人民军的服装。没有军旗壮军威，没有军歌振士气，队伍怀揣着坚定的信仰悄然前行。从迈出国门的那一刻起，他们的命运就与一场即将发生在异国他乡的残酷战争迎面相撞。

志愿军出国之前，战士们编了一个顺口溜，“美帝好比一把火，烧了朝鲜烧中国；中国邻居快救火，救朝鲜就是救中国”。

在志愿军过江的当日，毛泽东就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向中央各大区发电，特别强调出兵之事，“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

10月25、26日，志愿军第50、第66军也紧随先遣部队入朝参战。几十万大军，仅用一周时间，就悄无声息地跨过了鸭绿江。

军容整洁的中国志愿军浩浩荡荡往南走，军装破烂肮脏的朝鲜人民军则往北涌来，双方交臂而过时，不少人民军见着中国军人就



问有没有飞机，志愿军说没有。有没有大炮，没有；有没有坦克，也没有。

朝鲜人听了非常失望，说了一句：“呀登拉哨！”

后来中国人才懂得这是一句朝鲜话，意思是“够呛”。

## 第八章

# 出手就是当头炮

### 1. 彭德怀一骑绝尘

1950年10月19号下午，中午才飞抵丹东的彭德怀和高岗，在镇江山招待所主持了一个军以上干部作战会，向即将随他奔赴战场的将军们传达在北京研究的作战方案。

散会后，彭德怀和邓华、韩先楚、解方、杜平等13兵团的负责人站在庭院上说话，金日成的特使朴一禹再次赶过江来，第一句话就问：“司令员同志，你们出兵的日期定下来没有？”

彭说：“就在今天晚上。”随即又问：“金首相现在什么地方？”

朴一禹答：“美国人的情报很灵，金首相需要不断地变换位置，我也说不准他现在在什么位置。”

彭德怀着急说：“几十万人马上就要过江，我必须尽快见到他，我们马上走，现在就走。”

出发前，彭德怀对邓华和洪学智交代：“敌人北犯甚急，平壤是保不住的了。马上给我备车，我先行一步，抢在渡江部队之前和金首相面商。你们几位随40军行动，不能出半点纰漏。”然后对围成一圈的13兵团将领们说：“从今晚起，部队利用夜色掩护，秘密渡江。现在，所谓的‘联合国军’气焰骄狂得很，他们兵分两路，



中间隔着狼林山脉和赴战岭山脉，相互无法联系，无法协同作战，我们就要抓住敌人的轻敌麻痹，出其不意，给充当前锋的南朝鲜军队一个迎头痛击！”

紧接着，朴一禹向彭德怀转达金日成的意思，希望彭德怀把志愿军指挥部与金日成的指挥所合在一起，由金日成统一指挥。

彭德怀听后气不打一处来，你姓金的还指挥？你把你自己的家当指挥成了这副惨不忍睹的样子，也不看看自己还剩下几个兵？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几十万精兵强将正浩浩荡荡开过来，以后还会源源不断，凭啥交给你这败军之将指挥？崽卖爷田不心疼！这事用不着向北京请示，他一口便拒绝了。

傍晚，丹东地区冷风夹杂着细雨，鸭绿江上笼罩着灰色的水雾。

彭德怀在江畔与前来送行的高岗和邓华等志愿军领导人匆匆握手告别后，一个转身上上了吉普车。

“走吧！”

杨凤安回忆说：“彭老总和我，两个警卫员坐一个吉普车，又带了一部电台，报务员和译电员一共7个人，由崔伦处长带着，坐一辆大卡车跟在后面。就这样在部队前头，率先进入了朝鲜，连翻译、医生也没带，说话也不懂。”

志愿军出征国门之际，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彭德怀——一个统率几十万荷枪实弹、如狼似虎大军的统帅，竟然把自己的队伍扔在身后，命令他们按照作战部署，向着异国战场紧急开拔，自己却率领着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辆电台车，一骑绝尘，身先士卒地冲在了全体志愿军将士的最前面——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古代征伐打仗的宏大场面，千军万马摆开阵势，“咚咚咚咚”的战鼓声中，主将单人匹马，上前与对方主将单挑。

此刻情景，也恰如毛泽东赠彭德怀诗中所写：“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邓华得知彭德怀将成为他们统帅的时候，对副司令员韩先楚和洪学智半开玩笑地说：“老哥，咱们得小心侍候着！打仗时要是稍微出点纰漏，彭老总就会大发脾气。谁要把他惹火了，还要临阵斩马谲呢！抗战时，连刘伯承、陈赓没把关家垵打下来，都挨过他的训斥，吼出了‘杀头不分大小’的话，你们可得小心自己的脑袋！”

韩先楚和洪学智过鸭绿江没几天，果然领教了彭德怀的雷霆之

怒。志愿军入朝第一仗，38军军长梁兴初因未能及时赶到指定地点熙川扎紧口袋，让已经落入彭德怀精心布下的包围圈中的“联合国军”逃出生天，被彭德怀当着众多高级将领的面，拍桌子打板凳，骂得来狗血淋头。

“娘卖×，你梁大牙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的娘！”

统率5万虎狼之师的梁兴初脸上挂不住，低声迸出一句：“有事说事，不要骂娘嘛……”

声音虽低，在落针可闻的会场却人人都听清了。

梁兴初这一顶嘴，彭德怀“啪”地一掌猛击桌面，一对虎眼落在梁兴初脸上，气得呼呼直喘气。

性格温和的邓华一看不妙，赶紧解围说：“38军还是我们的主力嘛，来日方长，这一仗没打好，下一仗打出个样子来，还是会挽回影响的……”

“什么主力？”彭德怀愈发愤怒，忽地站起，双手叉腰，冲着梁兴初兜头盖脑便是一通痛骂，“都说你梁大牙是员虎将，我看是鼠将，老鼠的鼠！毛主席三令五申，要我们打好出国第一仗，你38军一再拖延攻击时间，不但没有歼灭熙川之敌，还延误了向军隅里、新安州猛插的时间，这是延误军机！骂你娘算是客气！老子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谲的本事，还是有的！”

此话一出，整个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噤若寒蝉。

梁兴初低着头，不再吭声。

骂完梁兴初的彭德怀随即宣布了新的作战计划，即史称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

部署完具体作战任务的彭德怀以威严的目光扫视着众将领说：“这次哪个军要再打不好，军长就不要干了，番号也撤销。谁打得好，我彭德怀按功嘉奖。”

会散了，矿洞里的人都走光了，只有梁兴初还孤零零地坐在原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墙上的作战地图发呆。

邓华叫他去吃饭，他不理，还气呼呼说：“打了败仗，饿死算屎，哪还有资格吃饭？”临走，他狠狠撂下一句话：“38军不是纸糊的，我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

知耻而后勇，彭老总一顿臭骂，激起了梁兴初一腔血性，在紧接着展开的第二次战役中，38军113师大白天冒充溃退的南韩军，在冰



天雪地中14小时急行军70多公里，一路艰辛，终于赶在了全机械化的美军前面，成功穿插三所里与龙源里，一举切断了美第8集团军南撤的退路。紧接着激战两昼夜，不顾敌人疯狂突围，他们打退美军多次进攻，牢牢堵住了口子，使敌南北两部美韩军相距不到一公里，却始终无法会师。

此役，单单是他一个38军便歼敌11000余人，缴获坦克14辆、大炮200门、汽车300辆。着着实实、痛痛快快地打了个翻身仗，被兴奋不已的彭德怀誉为“万岁军”。

在彭德怀轻车简行，一路向南去寻找金日成时，狭窄的道路上塞满了向北撤退的北朝鲜党政军机关人员、军队和难民，车辆和人畜形成巨大的洪流，彭德怀的吉普车如同逆水而上的一叶小舟。

在走走停停的过程中，载着电台的大卡车掉队了，这意味着这位志愿军司令员彻底地和自己的部队失去了联系，成了个孤家寡人。

彭德怀当时不知道，他和3名随行人员已经深入到了敌人的后面！就在他们向南走去的时候，南韩军的一支部队与他们擦肩而过，穿插到了他们的身后。现在，这支部队已经快要到达鸭绿江边了。

从军事角度看，这位中国志愿军的最高统帅，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敌人的包围之中，然而神奇的是，他自己又从包围圈里走了出来。

一位彭德怀的部下很久以后对此依旧心有余悸，他说，在那3天中总部和彭老总失去了联系，我们焦急万分。在战场情况如此混乱的情况下，如果发生不测，彭老总面临的只能有两种选择：被俘，或者死亡。

两个小时之后，匆匆从金日成住所赶来的柴成文见到了彭德怀。看到眼前一身粗呢黄军装的老首长面颊消瘦，一头短而硬的花白头发，却有一种天生的英雄豪气，柴成文真是既感动，又敬佩。

对于柴成文来讲，在这样的时刻和这样的环境中见到彭德怀，可以说是百感交集。1941年，彭德怀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工作的时候，柴成文曾在其身边做情报股长。令柴成文难忘的是1942年5月25日，在日本军队的扫荡战中，彭德怀身陷重围，是柴成文带着一个警卫排掩护彭德怀突围脱险。在那次战斗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为国捐躯。

彭德怀急切地向柴成文询问人民军的防线在哪里，金日成的指挥部在哪里，柴成文一一作答，并介绍了目前的战局情况。



他们谈了整整一个通宵，天微明时，才匆匆吃了大米粥、饼干加朝鲜泡菜，从农舍里出来，前去大榆洞和金日成见面。

到了大榆洞，穿过一条田埂向金日成的驻地走去时，彭德怀突然问柴成文带没带剪刀之类的东西。

柴成文感到很奇怪，不知道他要这些东西干什么。待彭德怀把自己的左手袖口亮出来，柴成文才恍然大悟——彭德怀的粗黄呢旧军装袖口已经磨破，长短不齐的线头露出来，还吊着一小块布条，堂堂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穿成这副寒酸样儿，确实“有碍观瞻”。更何况，他一会儿要去见的是一国元首，于国礼也不符。

柴成文从裤袋里掏出一把指甲刀，给彭德怀的袖口进行“修剪美容”。可是，指甲刀作用不大，尽管彭德怀和柴成文努力了一番，袖口依然一副破烂模样，彭德怀索性不再理会，就这副样子去见金日成。

大敌当前之际，急于了解战场情势的彭德怀先于自己的士兵深入到变幻莫测的战场，而战争另一方的军事指挥官麦克阿瑟此刻正在一千多公里以外的东京豪华官邸里抽着大烟斗，喝着咖啡调兵遣将。

10月21日上午9时，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朝鲜北部大山之中叫作桧木洞的一个废弃的金矿洞子里，在“充满中朝两党和两国人民亲密友好的气氛中，开始了历史性的首轮会谈”。

金日成为防止敌人侦测到他的位置，下令电台保持静默。而彭德怀带的电台车掉了队，尚未赶到。这样一来，两位最高统帅都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彭德怀对金日成说，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毛主席已决定派39个师入朝。第一批入朝部队25.5万人。第二和第三批入朝的24个师正在组建中。彭德怀当然不能把中国高层制订的“出而不击”和“尽可能避开美军打韩军”等战略指导思想暴露给金日成，告诉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将首先集中防御，等待苏联飞机到来后再主动出击。眼下除非敌人发动进攻，志愿军不会主动向“联合国军”发起打击。

彭德怀特别指出，中央和毛泽东作出这个决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自己也面临着许多困难。他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目标是消灭美国军队，帮助北朝鲜使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同时，他们还得防备万一美国向中国宣战并轰炸东北和中国的沿海地区。

彭德怀还说：“中国参战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我们



能够消灭敌人，确保达成一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第二种可能性是，我们可以站稳脚跟，但战争相持不下，陷入僵局；第三种可能性是，我们在朝鲜站不住脚，被迫回到国内。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力争实现第一种可能性。”

金日成感谢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委员会，并向彭德怀简要介绍了当前的形势。他现在只有3个完整的师：两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师，再加上一个工人团和一个坦克团。所有在南部受到沃克第8集团军重创的部队，目前正在往中国境内撤退，或藏在深山里打游击。

会谈结束后，他们只看见大批敌机掠空而过，听到隆隆的炮声由远渐近，对前线的情况却不明。彭德怀上不通中央，下不联部队，对敌情也是两眼一抹黑，急得在洞子里踱来踱去。下午，他索性跑到矿洞后面的小山头上去瞭望，希望能发现志愿军的先头部队。但他看见的是身背各式包裹，沿着山路向北逃难的人群。

彭德怀回到屋内，气呼呼地坐在土炕上说：“本司令现在真正成个光杆司令了！”

正是人少目标小，给他们带来了幸运。

1968年9月25日，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当时的情景，写道：“我与金日成会谈时，问了当前敌情，金答：‘还在德川附近，离此约200里。’其实敌军异常骄横，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敌先头部队由德川经熙川窜到我与金会谈的大洞东北方向的桧木洞，已绕到我们住的大洞后边去了。我志愿军刚过江不远，即与该敌遭遇，我与金（日成）幸免被俘。”

与彭德怀交臂而过，绕到他后面去了的是南韩军第6师（亦称青星部队）7团派出的一支侦察部队，他们的目标是进至鸭绿江边的楚山。按照韩国媒体的说法是，就是要“在鸭绿江里浸浸刺刀”。

10月26日，韩军士兵果真在流经楚山镇旁边的鸭绿江里浸了刺刀，还舀了一壶水，作为珍贵的纪念品，敬献给他们的老总统。

盛满鸭绿江水的水壶在很短的时间内送到了李承晚博士的手里。

于是，历史上鲜有机会骄傲一回的韩国人，马上不遗余力地让这张照片红遍了整个大韩民国，甚至闹腾到了西方世界。这件事当然会被浓墨重彩地写入韩国历史，史称“鸭绿江献水”。

2005年，南韩军“青星部队”一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正用水壶去鸭绿江里舀水的照片被“六·二五战争纪念馆”用高科技手段制作成

了声光图像，在大屏幕上不间断地映出，舀水的战士则被做成蜡像，供游人参观。这个水壶也被当作“国宝”，存放在韩国首尔的战争纪念馆里展出。

国家电视台还请第6师战士再现了当年的情景——只不过舀水的地点是汉城南边的汉江，而不是中朝边境的鸭绿江——并且采访了曾参与这次行动的健在老兵。

不过，必须要郑重指出的是，他们成为了战争开始到迄今为止，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抵达鸭绿江边的南韩军队。

中国出兵后，彭德怀拒绝把志愿军的指挥权交给金日成，导致在很多方面与朝鲜方面矛盾重重。

最初一段时间，中朝军队甚至是各行其是，双方很少配合。中朝军队联络不畅，作战当中又不协调，经常出现矛盾和误会，甚至多次出现误把对方作为敌军打击的情况。

如在第一次战役中，双方电台均保持静默，吴信泉的39军正前出接敌时，突然遭到刚刚在中国通化结束休整，重返战场的人民军坦克部队的袭击。

宋时轮的9兵团预备队26军也在江界附近的厚昌地区，挨过朝鲜人民军坦克部队的误击，打得官兵们措手不及，骂声连连。

更有甚者，志愿军入朝帮助金日成夺回平壤后，金日成居然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不允许志愿军使用已经军管的铁路，迫使志愿军只能以卡车运输。交通线被美军飞机炸瘫痪后，遂改为步行，美军每次空袭，都给志愿军造成极大的损失。

为此，彭德怀提出两军如何配合作战的问题。但金日成的意见是不由他统一指挥中朝联军就不行，他同意向志愿军派出参谋进行联络，而不同意两军联合作战。

直到第二次战役开始后，12月3、4日金日成到北京与毛泽东会面，才解决了这一问题，决定建立中朝联合司令部。

12月7日金日成回国后与彭德怀商谈了具体办法。联合司令部的指挥权在彭德怀，他是司令员兼政委。副手有朝鲜人朴一禹作为朝鲜代表常驻司令部。具体作战由司令部统一指挥和部署。

但金日成作为朝鲜领导人，并不归彭德怀指挥。相反，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停战问题，都需要同金日成协商。



简单说，军事上，中朝两国的军队均由彭德怀统一指挥；政治上、战略上的事情，彭德怀必须征求金日成的意见。

## 2. 志愿军师长光着脚上阵杀敌

10月24日，志愿军第40军118师师长邓岳率部跨过鸭绿江后，顶风冒雪，经过连续5天5夜的行军，到达了朝鲜北镇附近。

邓岳12岁参加红军，后被团长秦基伟选中，先当勤务兵，后当警卫员。16岁就当上了连长。这年32岁，早已熬炼成一员身经百战的骁将。

部队为了保密，电台一律保持静默状态，各支部队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驻扎，全都是按照预先制订好的作战计划行事。可一旦钻进朝鲜北部的大山沟里，他们就成了聋子、瞎子，既不知敌军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敌我情况都不明，又身处人生地不熟的异国他乡，邓岳心里没底，觉得憋闷得慌。

好在他多年带兵打仗，养成个习惯：一有问题就看地图。于是想找个地方先看看地图，查查自己现在到底到了什么地方。

他对司机说：“往前走，找个能避风雪的地方停下来。”

他和政委张玉华同坐一辆吉普车，越过队伍向前开去。

太阳下山，夜色笼罩下来的时候，张玉华突然说：“前面有几处房屋。”

邓岳喊道：“停车，停车。”

两人跳下车，打算进屋去看地图。

可是一进门，发现屋里到处都是朝鲜人民军。他们背着冲锋枪，还带着小手枪，个个穿着笔挺的呢料军装，戴着帽檐嵌有红色装饰线的军帽，马裤皮靴子，军容整洁，英姿勃发，一看便非寻常之辈。

邓岳让翻译问：“你们是哪部分的？”

对方虎视眈眈地盯着他，闭口不答。

张玉华再问，对方还是不回答。

邓岳急了，这兄弟党的部队架子好大啊！没办法，他只好先自报家门，说：“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118师的师长和政治委员，是来抗美援朝，帮助人民军弟兄打美国佬的。”

听罢闯入者的自我介绍，一位军官这才冷冷开口说：“我们是金日成首相的卫队。”

原来这是人民军的总部，金首相在这里呀！邓岳惊得伸了一下舌头，难怪他们一个个全都这么神气！于是问自己的搭档：“玉华，我们干脆见一下金首相？见了他，不就一切情况都弄清楚了嘛。”

张玉华也没遇见过这样的事，也不知道该不该去见一下。便说：“按说来到国外，上面没有指示，现在各部队都按要求，严格实行无线电静默，想请示也没法请示。我们两个中国来的师级干部，去见人家的首相，那恐怕不行。”

邓岳说：“对首相要尊重嘛，我们带兵抗美援朝来到这里，向他请求指示，这个不会犯错误吧？”

“好吧，问金首相去！”张玉华说，“我同意。”

翻译把他们的意思转告卫队。卫兵没说什么，派了个人上车来，就把他们往沟里带。

两人坐在车里暗喜，邓岳还悄悄捅了一下政委：“嘿！想不到一出国，就见着朝鲜的头号领袖人物了！”

“嗨！咱这是运气好呗！”张玉华也喜不自禁。

吉普车走了一两里路，遇着一个栏杆，挡住了去路。

里面出来一位人民军副官，听了这两个莽撞的志愿军军官的意思后说：“跟我来吧。”就让他俩下车，把他们往离公路十几步远的一栋坐北朝南的日式房屋带去。

这时杨凤安出来了，一见来了自己人，非常高兴，向人民军说明情况后，马上将邓岳和张玉华领进一间屋子。

一进门，邓岳更惊讶了：正在室内踱步沉思的，不是彭老总吗！

他俩“啪”的一个立正，大声喊道：“报告司令员，118师师长邓岳、政委张玉华前来晋见！”

彭德怀一听惊喜地叫了起来：“好啊！总算把你们盼来了！”上前紧紧握住两人的手问：“吃过饭没有？没吃饭赶紧搞饭吃！”

两人就像商量过似的，想也没想便一齐回答：“我们吃过了。”

其实，此刻他们连宿营地都没找着，上哪儿吃饭去？肚子正“咕

咕”叫得凶哩。但怕打扰彭老总，两人都不约而同撒了谎。

警卫人员给他们倒上白开水，但邓岳和张玉华没敢喝。

彭德怀又热情地问：“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邓岳说：“我们走到这外国地儿成瞎子啦！想看看地图。”

一听他想看地图，彭德怀立刻招呼自己的军事秘书：“杨凤安，快拿地图来！”

随即，杨凤安拿出一张四十万分之一的作战地图，铺在桌面上。

看完地图，邓岳又问：“司令员，现在情况怎么样？”

彭德怀又招呼杨凤安：“拿电报来！”

杨凤安立刻拿来两封电报给邓岳和张玉华。

一份电报内容是向中央报告朝鲜方面提供的情况：美韩军眼下正猖狂冒进，人民军不得不放弃重武器和车辆，转入山区，向北撤退。

另一份是彭德怀打给邓华和毛泽东电报的底稿，大意是：想在妙香山地区打好阻击，隔断东西线敌军，然后集中西线3个军伺机歼敌。

由于崔伦处长带领的电台车跑丢了，金日成的电台保持静默，彭德怀把电报拟好了，还未能发出去。

然后，彭德怀说：“我刚刚会见了金日成首相。13兵团的机关正在往这里赶，部队都在向前开进，没有电台，联络不上，情况紧急、形势严峻啊！你们路上碰到敌人没有？”

“没有。”邓岳说，“一路上只听到炮声隆隆，响得厉害，敌人应当已经上来了。”

“敌人攻占平壤后就肆无忌惮，分头冒进。我们的飞毛腿这次怕是赛不过他们的汽车轮子喽，很可能赶不到预定地域进行防御，过了北镇，你们就要准备随时和敌人打仗了。”

“是！”

听了彭老总介绍的战地情况，邓岳和张玉华很是吃惊，一路做瞎子，当聋子，没想情况竟然已经到了这么严重的地步！人民军已经没有了防御线，被打得成了满山遍野跑的鸭子了。

张玉华担心地说：“彭老总，敌人这么疯狂，您在这里太靠前、太危险了！我们给你留一个营，作警卫部队吧。”

彭德怀手一摆：“你们已经上来了，我还有什么危险？把部队都

带到前面去，多一支枪，多一份力量嘛。”

张玉华老将军晚年在家中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对记者回忆道：“彭老总谈笑风生，告诉我们过了北镇就要随时准备同敌人遭遇。还一字一板地指示说：‘你们40军是全军的先头部队，要打头阵。出国第一仗一定要打得漂亮，打出威风，打开局面，打掉敌人的疯狂气焰，掩护我军的集结和展开。目前按原计划，争取赶到预定地区进行防御，如果情况有变，你们就要独立自主，果断处置，用阻击、袭击、伏击等各种手段，不失时机地歼灭敌人。’”

听了彭德怀的指示，邓岳与张玉华说：“是！请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慎重初战，打好出国第一仗。”

获知眼前的情况后，两位年轻的指挥员还是坚持给彭老总留下一个连，临时充当警卫部队，然后带着部队，一阵风向温井方向奔去。

很快，两人追上了行进中的师指挥所，参谋长汤景仲见着他们就问：“师长、政委，你们跑哪去了？我正准备向军里报告，118师师长和政委失踪了呢！”

“没那么严重，我俩去见彭老总啦！”

然后，邓岳绘声绘色地把见彭老总的情形讲了一遍，最后说：“我们到了朝鲜，像个瞎子、哑子，情况不明，因此一定要更加小心，随时准备战斗。嘿嘿，我们是入朝部队第一个见到彭老总的，不第一个打胜仗，这脸没地方搁啊！”

邓岳“打个胜仗”的希望果真变成了现实。

不过，118师第一仗打得来干脆利落，邓岳师长却“胜之不武”，实在有伤“大雅”。

一走出大榆洞沟口，他们就听到了从熙川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

“炮响四十里”，基于丰富的战争阅历，邓岳决心不主动去与敌人接触，而是争时间，抢速度，夺温井。

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温井距北镇17公里，原命令要我们25日拂晓前赶到，按我们的铁脚板，两个小时赶到当无问题。但有可能在途中和敌人遭遇。敌人昼行夜宿，车载行军，能得到充分休息；而我们夜行昼宿，徒步机动，在人困马乏的状况下和敌人交手，非常不利，倒白白让敌人捡了以逸待劳的便宜。不如我们现在就放慢速度，缩短行军距离，以预期遭遇的姿态进占北镇至温井间公路以北高地，



提前宿营，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就可将不利变作有利。”

张玉华、汤景仲、政治部主任刘振华都同意他的想法，当即作出部署：前卫第354团暂不过温井，在温井以北的丰下洞和富兴洞地区隐蔽休息、占据有利地形，让辛苦了一夜的官兵们抓紧时间睡觉，一边轮流派人构筑工事，准备阻敌北犯。

师主力集结于两水洞和北镇地区，视情况投入战斗，倘敌不来，则明晚继续前进，同时保持无线电静默。

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决定，它不仅直接带来了出国第一仗的胜利，也对整个战役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天，118师就在北镇和温井附近一带分散宿营了。

354团在距温井45公里的一片山林中就地而眠。

第二天上午8点钟时，温井村头荡起了烟尘，敌人果然来了，先是步兵，接着汽车大队越过步兵，沿着温井通往北镇的公路，浩浩荡荡而来。

隐蔽在山林的战士们都说：“鱼儿上钩了。”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战斗眼看就要打响，谁知354团政委陈耶却怎么也找不着团长褚传禹了！一问，才知他昨晚下各连队设伏地点巡回检查，还没回指挥所呢。

陈政委本是个慢性子，此刻却急得团团转：“老褚也真是的，老褚也真是的。这都啥时候了，还下去到处乱跑！”

他让作战股长给3个步兵营打电话，还是没找到团长。俗话说“蛇无头不行”，出国首战，事关重大，这一仗没团长咋个打？他只好说：“通信股打开电台，向师部请示。”

谁知师指挥所的电台处于静默状态，怎么呼叫也没反应。

陈耶急得大喊：“叫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和作战、侦察、通信、组织、宣传、保卫等各股股长，赶快来开紧急会，研究打法。”万般无奈之下，陈耶只得来个赶鸭子上架，以政委之身代行军事主官之责。

众人都是久历过战阵的，见过鬼的不怕黑。加上人多智谋广，柴多火焰高。三言两语当场就定了个“把敌人放进来打”的方案。然后，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敌人越来越近了，前面是两辆中卡，载着探路尖兵，车头上高高架着机枪，一面太极旗迎风飘扬，敌军头戴的暗绿色钢盔闪着



阳光。

眼看战斗就要打响，这时作战股长才在1营3连找到了褚团长。

陈耶一听喜出望外，赶紧接过话筒：“老褚……”三言两语把眼前情况和作战布置简单说了。

褚传禹说：“好，你这个慢郎中治住了急惊风。好好打它一场歼灭战。我马上赶回来！”

陈耶一放下电话，敌尖兵已经闯入了354团防地。这些尖兵好张狂，既没人搜索，也没人来一番“火力侦察”，嘴里啃着大苹果，嚼着口香糖，嬉戏打闹，谈笑风生，你说这是前来观光的游客哩，却又个个都抱着枪。

而几乎就在同时，负责西线战场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将军在他的指挥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得意洋洋地宣称：“‘联合国军’的各支部队万事如意，非常之好。”

当满载着南韩军的大卡车转过山脚，驶过一座涵洞桥时，“嘭！嘭！”两声，车轮压响了志愿军埋下的触发雷。

地雷威力不大，没伤着汽车。他们居然连停都没停，继续若无其事地“前进”。

尖兵后面紧跟着3辆满载大兵的大卡车，再往后便是中型卡车牵引的榴弹炮，一辆接着一辆，一共12门。再往后又是20多辆汽车，运着辎重和步兵。

战士们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紧扣着扳机，但陈耶的计策是“慢桨摇船捉醉鱼”，没下战斗的命令，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从山下鱼贯驶过。

汽车速度较快，步兵走得很慢，队伍距离越拉越长，前后拖延好几公里。

陈耶为了把敌前卫营都放进来，却让先头汽车跑出了团设防的范围，一头闯到了师指挥部驻地两水洞！

如此一来，这出国第一仗，就打出了一点喜剧色彩。

师部浑然不知敌人的尖兵已经大摇大摆到了跟前，邓岳师长还在抓紧时间酣然大睡，指挥车还停在公路边一株大树下，电台设在公路桥的涵洞里。

自过江以来便昼伏夜出，翻山越岭的官兵们此刻正在村子里高

枕无忧，大补瞌睡哩。敌人的尖兵一下就发现了他们，一边前进一边开枪，机枪先扫着了指挥车，玻璃窗被打得粉碎。司机正在汽车里睡觉，猛然惊醒，慌忙跳下车，没命地往山沟里跑。报话员也抱着无线电台从涵洞里钻出来，顺着沟渠往山上跑。

师首长和前指人员都在两水洞村里睡觉，听到枪声，慌忙从屋里冲了出来。

邓岳师长被骤然响起的枪声惊醒，抓过棉军装往身上一笼，连棉裤都没来得及穿，光着两条脚杆，提着枪就冲出屋，指挥师部机关人员冲出村口，抢占制高点。

好在师侦察连就在村口，立刻开枪还击，机关枪和掷弹筒向两辆汽车不停轰击，前一辆汽车被击中，车头一歪，横在路上不动了。车上的南韩军士兵刹那间就被打死了十几个，这才结束了“旅游”，惊慌失措，狂呼乱跳下了车。

落在后面的敌大部队还在继续向前开进，只是略显迟缓了些。等一个整营都“放”进来了，有“慢工巧匠”之称的陈耶政委果断地朝刘玉珠参谋长点了点头。

刘玉珠立即下令：“打！”机枪、步枪一齐开火，迫击炮、掷弹筒也射向敌群。

中国军队一旦到了战场上，出手是非常狠的。这里面凝聚着很多仇恨，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美国人干涉台湾的愤怒——用中国老百姓最朴素的话来说：“你美国佬不是对我们搞武力封锁吗，反正咱们一时半会儿也解放不了台湾，那就豁出去，帮咱朝鲜小兄弟打吧！”

中国人战斗的情形，在南韩军第1师的阵中日志里能清楚地看到：

营的车辆纵队浩浩荡荡地进入山里的隘路，完全出乎意料地立即受到了来自前方和左右高地的猛烈射击。

但是，判断其兵力并不多，所以马上发起了进攻。

可是越前进，敌人的火力越猛烈，情况好像跟原来一直战斗的北朝鲜军队不一样。

不久，当觉察到时，后方已经被切断，营在没有任何依托的河谷中被包围了。

不一会儿，敌人开始夹击，每人胸前挂着十几个手榴弹的突

击兵（敢死队员），在两侧火力的掩护下向前接近，他们以哨音为号，一齐投掷手榴弹，随着弹幕逼近过来，其口令分明是中国话。

营的指挥机构瞬间遭到破坏，不久，官兵们丢掉装备，各自四处逃散了。

这一瞬间的战斗就丧失了营的顾问C.约翰中校和350名官兵，以及全部装备。<sup>①</sup>

志愿军经过连日行军，早就憋足了劲，好比下棋一样，出手就是当头炮。

爆炸的火光耀眼，响声刺耳，敌兵乱了套，像下饺子似的纷纷从车上往下跳，你撞我，我踩你，人仰马翻，连滚带爬，有的爬到公路边的水沟里胡乱开枪，有的钻到汽车底下不敢露头，有的在军官威逼下集结冲锋，企图夺占有利地形。

这时褚传禹团长也赶回了团部，急忙下令：“吹冲锋号。”

号声一响，1营和3营同时发起冲锋，快刀斩蛇，把敌人割成了几段。顿时，公路上、稻田里、河岸边、汽车下到处都是战士围追堵截，追歼溃敌。1连战士孙文励边向前冲边射击，一枪一个，连续击毙6个南朝鲜兵；战士田贵祥则用手榴弹逞威，连投了3颗手榴弹，敌夺路逃跑的一个班被打垮。在中国人的猛烈打击下，南韩军丢下汽车，放弃了抵抗，只顾逃命。

新兵陈雨庆端着刺刀冲过公路，想抓个活的，朝一个大个子追去，大喊着：“缴枪不杀！”可这句在国内很灵的抓俘虏“咒语”，这家伙却听不懂，跑得更快了。

陈雨庆火了，一个箭步冲去，揪住大个子的衣领骂道：“看你杂种跑的！”

他以为这回大个子可没跑了，谁知南韩军的衣服是带拉锁的，“哧啦”一声，就像脱皮一样，衣服在他手里，人却泥鳅似的脱出了他的虎钳。陈雨庆气坏了，扔掉衣服，一枪把那大个子给撂倒了。可他撂倒大个子后，枪打了几发，就卡壳了。

陈雨庆立刻跑回公路，路上歪歪扭扭地停着四五辆汽车，车底横躺竖卧着鲜血淋漓的敌人尸体。他爬到汽车上，想找一支新枪。车厢

<sup>①</sup> 引自《韩国战争史》。此书为韩国士官学校教官金东明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翻译，国防出版社1979年版。



里木匣子、铁箱子、布口袋、大锅小灶，乱七八糟的。他一脚踢在一个鸭绒睡袋上，挺沉的，用手一拽，露出一个猥猥琐琐的脑袋，他猛然一惊，后退了一步，端起那支哑巴枪，缴下了敌兵的自动步枪。陈雨庆押着这个俘虏，把他送到山腰的树林里时，那儿已围坐着百十个蓬头乱发的俘虏。

被中国人全歼的是南韩军第6师第2团的先遣部队第3营，他们原计划今天开到鸭绿江边去。

在围歼战进行时，4连在最前面负责“卡口子”，艰苦地抗击敌后续部队。中午，被分割包围的敌人已被歼灭，只剩下超越354团闯到师部的部分尖兵，还在与侦察连僵持对射着，等待后援部队。邓岳师长立即命令两水洞以北的353团1、3营跑步投入战斗，协同354团3营歼灭这伙残兵。

353团参谋长邢维邦得令，立即带领3营插到九龙江西岸去迂回包抄敌兵。353团一赶来，势如猛虎地冲下山，毙伤一些敌兵，捉了50多个俘虏，乱战中，还打死了美军顾问约翰，活捉了顾问赖勒斯。残敌见势不妙，慌忙徒涉九龙江，爬山逃命，结果又多数人被机枪、迫击炮杀伤，只有少部分人逃了出去。

下午3点，战斗全部结束。这一场遭遇战，118师共毙敌325名，活捉161名，缴获汽车388辆，火炮12门。

这一战打响了志愿军出国第一枪，振奋了国威军威，也扼制了南韩军第6师的猖狂冒进，保卫了统帅部驻地的安全。

紧接着，邓岳率118师以每晚40公里的强行军，赶到龙谷洞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对全部搭乘汽车而来的南韩军6师7团实施攻击，歼灭该团大部，缴获汽车70辆，炮10门。

这一仗本来计划是118师协同148师作战，邓岳不等148师赶到，就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当机立断下了手。

穿着大裤衩指挥部队打了胜仗的邓岳，被接到捷报的毛泽东赞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

118师3个团，只有352团没参战，战后全团干部战士个个把嘴巴翘得老高。

团长忍耐了两天，最后还是没忍住，找到师长发牢骚：“打仗了，师里事前怎么也不跟我打一下招呼！”

邓师长脸一板，张着两手说：“敌人事前没跟我打招呼，我怎么

跟你打招呼？”

团长还是不信，说师长你偏心眼，打仗只通知那两个团，心里就没装着352团的干部战士。

这时，张政委说话了。“师长真的没骗你，敌人打到师部时，师长连棉裤都没来得及穿就跑了！”

政委这一说，谁知团长回去以讹传讹，随后40军上下都传开了：“我们118师这回打响了出国第一仗，立大功了。可师长当狗熊啦！嘻嘻，一伙敌兵冲到师部，师长连裤子都没来得及穿，就光着腚上了山。”

几个邓岳师长平时“看得最重的”战斗英雄听说此事，觉得这事关乎118师的荣誉，结伙跑到师部去探个究竟。

邓岳一听，板着脸，鼓着一对銮铃大眼骂道：“妈那个巴子！你们也不想想，我堂堂一个志愿军大师长，打了20年的仗，会被敌人追得来光着屁股逃跑吗？棉裤没来得及穿，大裤衩还在身上的嘛，哪儿就光着腚了？真他娘的好事不出门，丑事传千里！”

118师在“揭幕之战”中，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首战获胜。稍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将118师首战两水洞和120师进行云山阻击的10月25日，定为志愿军入朝作战纪念日。

### 3. 中韩两将军一决高下

被载入中华民族煌煌史册的10月25日这一天，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一决高下的，还有大韩民国国防军第1师师长白善烨将军。

交手地点是匍匐在北朝鲜巍峨大山之中的小城云山。

战后，白善烨在回忆录里记下了发生在云山的这场突如其来的战斗。负责云山左侧正面的是白善烨麾下第12团团长沙金点坤，金团长向白善烨建议，最好动员美军的战车小队去侦察前方的情况。金团长说他之所以需要战车前出侦察，是因为必须掌握在他的部队前面出没的敌军来历。

进攻平壤之前，白善烨请求美军第1军军长弗兰克·米尔伯恩将



军，将分给他指挥的美国第8集团军预备队的5辆M46巴顿坦克车组成的一个小队，分配给了金点坤的12团。这是战争爆发前一年才配备给美军部队的最新型战车。巴顿这一名字来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擅长坦克战的名将乔治·巴顿将军的名字。金团长要白善烨出面“动员”而不是命令美国坦克出任务，是因为他这个一团之长，根本就指挥不了在南韩军中处于“太上皇”地位的美国大兵。

师长的面子毕竟比团长大，经白善烨一番温言软语的“动员”后，美国大兵终于驾着5辆巴顿坦克“轰隆隆”地出发了。这支战车小队驰往12团正前方搜索前进不一会儿，就同敌军发生了冲突；而且金点坤从枪炮声听出，双方打得非常激烈。

等到这支坦克小队重新回到12团的战车队列时，金点坤团长觉得有点奇怪，5辆坦克中，有2辆的颜色完全变了，变成了一片血红，而其余3辆的颜色没有变化。

金团长通过翻译了解后才知道，原来是战车小队在前进时突然受到了中国士兵的猛烈攻击。从公路两侧的大山中一拥而出的中国士兵们蜂拥而上，爬上了最前面的两辆战车，他们力图打开炮塔盖，用手榴弹进行攻击。

一开始美军很慌张，但是因为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士兵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比较老练，所以很快重新找回了冷静，并展开机敏的应对。他们立即开始朝着站在另外坦克的敌军射击。美军坦克小队关上炮塔盖后在坦克里面用无线电交换战况，并让走在最前面的两辆战车交替用机关枪扫射爬上对方坦克上的敌军士兵。用这样相互协作的方式，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激战。最后两辆坦克成功地甩掉了紧跟不舍的中国兵。

坦克小队一回来，金点坤的部队就像炸开锅了一样骚动起来了。看着这两辆仿佛刚刚从浓稠的血水中捞出来的战车时，整个部队开始变得乱哄哄的。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从变成血红色的战车里，跳出来一名美军战车士兵；紧接着，他就突然“哇哇”狂叫着奔跑起来。

战车小队长也随即从坦克里跳下来，甩开步子去追他。两人的距离一会儿近一会儿远。跟在后面的小队长最后扑上去试图截住他，上演了一幕美式足球中的截球场面。

小队长终于追上了自己的兵，这才发现他已经疯了。

对发生在自己眼前的情景，白善焯在回忆录里写道：“在被中国士兵的鲜血染红的坦克里，不断袭来的恐惧感让这个美国青年丢魂落魄，彻底摧毁了他最后的一根神经。”

发生在南韩军第12团的这充满血腥的一幕，仅仅是云山战斗徐徐拉开的序幕而已。

此时整个大韩民国都把击败敌人的重任寄托在了执掌国防军精锐的第1师的白善焯将军身上。

白善焯能够获得韩国人民的厚望并非他指挥的第1师战功有多么超凡卓越，也不是他长着一张连硬派电影明星也羡慕不已的脸蛋和强壮的身体，而是因为，就在这次跨过“三八线”向鸭绿江进攻的战斗中，他率领他的第1师，抢在包括美军在内的所有“联合国军”前面，成为了第一支攻占北朝鲜首都平壤的大韩民国军队。

这样的荣誉是千载难逢，独一无二，有资格载入大韩民国煌煌史册的！不仅韩国，连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流媒体上都登载着白将军头戴钢盔，身着夏季作训服，双手交叉于胸前，傲然挺立于通往鸭绿江公路上的英武硬朗形象。

从那一刻起，所有大韩民国的军民都视他为南韩军中的头号英雄。直到许多年后，白善焯才在他的回忆录里如实地道出了个中原委。原来，这样一个扬名立万的机会，居然是他成功地说服了米尔伯恩军长让给他的。

1950年9月5日，美军成功在仁川登陆，立即扭转了战争形势。28日，“联合国军”光复了汉城两个小时后，一辆吉普车驰入忠南道办公大楼的庭院里，白善焯从车上跳下来，大步走进已经成为“联合国军”第1军司令部的道政府办公大楼，领取作战计划。

从美国人手里领到作战计划后，白善焯迫不及待地翻看着美国人分配给他的任务。作战计划上清楚地标明，美军第1骑兵师等两个师从汉城向平壤进军，而他的第1师的任务则是沿着海岸线向海州方向前进。

白善焯一下就着急了，他不能理解，在占领敌军首都的过程中，这片土地的主人——韩国人却被排除在外，“怎么也不能只是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发生”。白善焯马上在这幢楼里找到了美军第1军军长米尔伯恩将军，强烈要求改变作战计划，让他的大韩民国国防



军第1师负责进攻平壤。

五六年前，作为日军间岛特攻队中的一名韩籍军官，在中国华北战场深入到八路军后方，与神出鬼没的八路军进行过多次激烈战斗的职业军官，白善焯当然知道，说服美国军长改变作战计划就意味着改变后勤、通信、运输等一系列作战细节。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他依旧迎难而上，因为他太知道第一个率领韩国军队攻占北朝鲜首都，对他受尽列强屈辱的国家、民族，以及他个人来说，会有多么重大的价值和意义——为达成这一目的，他必须竭尽所能，不遗余力！

他给米尔伯恩讲第1师的作战能力，鼓吹部队的士气，甚至追溯到了50多年前，日军成功攻占由大清王朝的辫子军队守卫的平壤的作战方略。

说到高丽民族苦难屈辱的历史，白善焯情不自禁，热泪潸然而下。

他动情地对美军上司说：“我和我弟弟的童年就是在平壤度过的，大同江哪些地方深，哪些地方浅，我都一清二楚，因为大同江是我和弟弟自小一起打滚玩耍长大的地方，我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平壤的情况，我弟弟现在是韩国国防军第17独立团团团长，和我一样，也正在为解放北朝鲜，统一祖国而履行自己的神圣责任。将军阁下，我想你一定能够理解，一个韩国国防军的将军如果能够成为打进平壤的第一人……啊，对不起！我已经激动得有些失态了。”他说得太动感情，以至于哽咽失声，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的确如他所言，白善焯出生在平安南道江西郡，童年、少年都在平壤度过。1939年日治时期，他从平壤师范学校毕业，随后被日本人作为优秀青年挑选出来，送往伪满洲国奉天（今沈阳）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分配到了专门从事情报与暗杀行动的间岛特攻队，越过长城，进入华北地区作战，多次九死一生，总算福星高照，让他活着离开了中国。直到日本战败投降后，白善焯才回到平壤，就职于平安南道人民政治委员会，担任有着“朝鲜甘地”称号的朝鲜民主党创始人曹晚植的秘书。

1945年12月，白善焯全家成为“脱北者”，到汉城后加入韩国国防警备队，由于他过去的从军经历，1950年成为南韩军第1师师长。美军仁川登陆后，白善焯磨刀霍霍，踌躇满志，早已做好了率领



第1师杀回故乡平壤的准备。而美国人制订的这一份作战计划，无疑将他的美梦击得粉碎。

当白善焯说得泪飞若雨的时候，米尔伯恩军长不得不注视着眼前的这位虽然长着韩国男人通常都有的一副单眼皮，却依然年轻英俊、精神抖擞的将军，陷入了沉思……大约一分钟后，他拿起电话，通知自己的参谋长，命令他立即修改作战计划。

白善焯在心里高喊了一声：“米尔伯恩万岁！”然后庄重地向美国军长敬了个礼，转身疾步去了参谋长办公室，足足等了3个钟头，才拿到修改后的新的作战计划，然后满怀鸿鹄之志，飞一般驰回部队。

为了抢在美军第1骑兵师之前进入平壤，白善焯动员了一切力量。包括允许当初弃守汉城时溃散的第1师官兵重新归队，他对质疑溃散士兵忠诚的军官们说道：“大韩民国成立还不到两年，我们现在正经历巨大的国难，任何人也没有相互埋怨和相互怀疑的资格。过去的一切就让它随着临津江的河水一样过去吧，让我们重新团结起来，为了此刻进攻敌军的首都团结一致。大家回来就好好跟着我干，我绝不会追究过去的事情！”

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极有政治头脑的优秀军官。

行军途中，白善焯要求士兵日夜兼程，不少人脚上打起了血泡，只能一瘸一拐地前进。为了振奋军队士气，白善焯在行军途中经常带着士兵们大声呼喊“平壤”，士兵们也大喊着“平壤”。

“平壤”马上成为了第1师最响亮，也最能激发官兵士气的口号。

在平壤边缘地带的一栋几乎被美军飞机炸成废墟的建筑里，第1师的通讯参谋找到了人民军的通讯线路，接通了平壤总司令部的交换台。但由于没有平壤口音，担心在通话中露出破绽，于是，参谋找到了在平壤长大的白善焯。

白善焯接过电话，问道：“同志，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人民军总司令部的接线员非常焦急，甚至没有顾得上询问对方的身份，便慌张地说：“全都撤退了，我们也得撤，我们也得活下去呀！”

由此，白善焯判断，平壤已经惊慌失措了，于是他马上命令第1师不顾一切，高喊“回家”的口号，向着平壤城里冲杀而去。

当大同江出现在白善焯眼中时，他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他7岁时的



往事。那时，父亲刚刚病死，母亲把家从平壤附近的江西郡搬到这座城市。没过几天，走投无路的母亲把3个孩子带到大同江大桥上，准备投江自尽。幸亏13岁的姐姐对妈妈说：“树也得3年后才能生根，我们刚来平壤，不能就这样死去，让我们就抱着必死的决心，再活一次吧。”母亲改变了主意，于是，平壤成了他们的故乡。如今，白善焯带着军队打了回来，面对已经映入眼帘的熟悉的城市，他的“眼角开始发烫，心也跟着狂跳起来”。

白善焯的第1师距平壤只剩下8公里了，他由于得到美国空军F-80喷气式战斗轰炸机发射的火箭弹的支援而欣喜万分。

10月18日下午，白善焯向参谋们部署了突破平壤前面5公里处的敌军最后一道防线的作战行动。12团将在美军一个坦克小队的炮火支援下，率先在当天晚上向这座城市南部的水上门户——大同江大桥发起主攻，11团则前去夺取平壤机场。

整个晚上，白善焯的两个团打得很激烈，美军坦克越过堑壕，粉碎了敌人的机枪和步兵，却未能突破由碉堡群组成的坚固防线。防线那边是一片平地，有利于坦克和炮兵行动。

最后，就在19日破晓时，得知美国空降兵已经在肃川和顺川附近同时实施空降行动后，担心受到美国包围的北朝鲜军队开始主动撤退。白善焯的第1师在美军坦克的协助下，把其坚固的战线继续往前推进。

当白善焯得知大同江大桥已被炸毁后，便命令11团在几公里外的上游浅水滩涉水过江，他小时候曾在那里游过泳。11团没有遇到任何麻烦，随后向西往这座城市开去。快到上午11点时，2营到达被炸毁的大桥的北端。

美军第1骑兵师一支先遣小部队也从大同江涉水过来，他们登岸后，看到一名南韩军士兵手里拿着一个牌子，笑容可掬地从桥上走近他，牌子上写着“大韩民国第1师欢迎美国骑兵第1师”。

白善焯是5年前离开平壤的，当时他背着一个包袱，里面包着他的全部家当。现在他作为一支征服军队的指挥官又回到了家乡。这会儿也许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在向平壤进军的日子，他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尝到了这种令他陶醉的滋味。

终于，流着泪水争取到做“联合国军”先锋的白善焯将军第一个率领南韩军第1师，进入了已经是空城的平壤。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来到牡丹峰首相官邸金日成宽大的办公室，坐在金日成的椅子上，把双脚放在金日成宽大的办公桌上，思考着整个战争的来龙去脉，历史以及未来，思考为什么朝鲜半岛会陷入这一场连着一场的“充满血腥味的同族相残”。

接下来，他把地图摊开在办公桌上，和幕僚们一起商量如何完成下一步的作战计划。美国人给他的任务是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占领高高耸立在江面上的水丰大坝。

他还在金日成的办公室里接受了美国《时代》周刊的专访。

“美国人给我配属了几辆坦克。”他高兴地对《时代》周刊的两名记者说，“这太好了！有了美国人的帮助，我们现在可以像巴顿将军那样进攻了。我的战术就是一直向前！向前！”

在他猛打猛冲的劲头儿备受记者赞扬后，他说这主要是因为他出生在平壤。

此时此刻，他不担心自己的生死，但是，他对他一直留在首都的一个妹妹和她的孩子感到担忧。

10月23日，白善烨将军率领第1师，沿清川江流域向安州和新安州进发。

人民军已经从新安州弃城而去，但在离开前，他们毁掉了那里的跨江大桥。不过，在安州东北34英里的地方，第1师占领了清川江上的一座木桥，桥虽然遭到损坏，但基本完好。

修桥工作立即展开，并且一直持续到深夜。到10月24日上午9点，卡车已经可以从上面通过。

当天上午，一个侦察巡逻队在这座桥上游3英里处找到一个坦克可以涉江而过的地方。配属给他的美军坦克小队便从此处渡江，去增援担任前卫的金点坤的第12团。同日下午，这3个团在清川江上正朝着东北方向的云山进攻。人民军没有进行多少抵抗便一溃而散。而此地距离鸭绿江，只有55英里了。

南韩军第6师穿过山峰连绵、崎岖不平的地区，于10月23日夜里到达熙川。从熙川向前，山峰更加巍峨险峻。北朝鲜军土崩瓦解的迹象随处可见。

在熙川，该师缴获了20辆稍加维修便可使用的T-34坦克。第6师从该城转而向西，后又折向北去，其目标是鸭绿江畔的楚山，距此地

不足50英里。

此刻，南朝鲜第6师已经把“联合国军”各部远远抛在了后面。

1950年10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取消了他10月17日发布的一道命令。

那道命令要求，除南朝鲜军之外，所有军队都应限制在距满洲边界大致30到40英里一线以南。

这条限制和9月2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给他的信中指示的在边界附近不得使用非南朝鲜军的意见是一致的。

麦克阿瑟现在取消了对“联合国军”地面部队的所有限制，他指示他的各级指挥官全力以赴，向朝鲜北部边界进军。

就这样，麦克阿瑟在事先没有给参谋长联席会议打招呼的情况下，便贸然取消了华盛顿精心制订的不让“联合国军”，尤其是美国军队接近鸭绿江，以避免和红色中国直接对抗的计划。

开过几次高层会议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质问麦克阿瑟何以如此行事。尽管这件事惹人生气，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质问仍是温和的。他们说，他们知道他有“正当的理由”这么做，但是，他眼下所做的是一件“令华盛顿颇感忧虑的事”。

麦克阿瑟就事论事地回答说，南朝鲜军队不够强大，不足以单独完成对北朝鲜的占领，而且他们的指挥官常常感情用事，不太可靠。所以，他才基于“军事需要”，做了变动。

在麦克阿瑟看来，战争打到这个份上似乎就应当结束了。只需一鼓作气，打到鸭绿江边，把北朝鲜军的残部收拾干净，便算大功告成，即可凯旋了。

有相当证据表明，麦克阿瑟与在朝鲜的大部分美国人一样，真的相信中国的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并且相信战争几天后就会结束。

证明这一点的例子如下：

10月22日，麦克阿瑟批准了沃克将军的请求，把不久就要到达朝鲜的满载军火的轮船转开日本，因为他觉得现存朝鲜的军火已经足以满足未来作战的需要了。

麦克阿瑟还采取措施，让正驰往远东的6艘军火船转向夏威夷，或者返回美国。倘若麦克阿瑟当真想到他的所作所为会引起中共的激烈反应，他不可能断了其部队马上要用的军火。

虽然中国发出多次警告，但在急切向前推进的美国、英联邦和南

朝鲜的军人前面，似乎并没有中国军队出现的蛛丝马迹。

25日清晨，白善焯已经率领第1师一路势如破竹，兵不血刃地挺进到平安北道云山，并把师部设在云山南侧宁边的农业学校主楼里。起床后他突然感觉到天气奇冷，连日一直飘飘洒洒的小雨丝，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刺骨的碎雪粒儿。

一切都太安静了。在第1师驻扎的云山似乎萦绕着一种奇怪的孤寂感。于是白善焯拿起望远镜，登上楼顶天台，观察起四周的动静。

他知道，从云山北上就是狄逾岭山系，翻过去，再穿越江南山脉，就是滔滔的鸭绿江了。从云山到鸭绿江边，只剩下55英里的距离，眼下受到总追击命令鼓舞的各个师，无不像竞赛一样，分头继续向前推进，都以最先到达鸭绿江为荣誉，全不顾左右的协同和相互支援，只是一味地想早一刻到达朝中国境线。

此刻不仅仅是韩国人，全世界的目光都紧紧地盯着他们哩！

而白善焯的第1师此刻的目的地已经改变为鸭绿江边的碧潼。

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他崇拜的打败了拿破仑的惠灵顿公爵在回忆录里说过的一句话：“战况瞬息万变，在山后面的敌人企图干什么，我们并不知道。所以，高明的战争指导者，在于他有看穿山背面的洞察力。”

不过眼前出现的情形恐怕惠灵顿转世也没法看穿山背面的情况。因为不知什么时候，远处起伏的群山似乎像是着了山火一般，至少有十余处冲腾起袅袅烟雾。针叶树燃烧升起的烟雾笼罩着云山与温井的上空，阴沉沉的雪云增强了这些浓烟飘忽缭绕的效果，就连老鹰般在天上四处张望的美军侦察机，也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动向。有的官兵认为这是偶然的失火，也有人认为这是不祥之兆而隐隐地感到了不安。

后来白善焯才知道，实际上这山火是中国军队利用这里的自然条件，点燃了树林和灌木以及稻草施放的对空烟幕。

从这以后的一周时间里，这种烟幕在成为战场的任何有山林和稻草地方的上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

云山是一块危险之地，自古就因地处“云的中间而得名”。

云山北侧便是非常陡峭的狄逾岭山系，狄逾岭在韩语里意为“中国鬼子越过的山岭”。可能这里是北方的契丹、女真、蒙古或大陆的



军队侵入的主要路线，所以才取了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名字。

白善焯的第1师3个团所分布的云山北侧20公里处，彭德怀麾下的志愿军早已严阵以待。

当然，这是事后才了解到的情况。志愿军隐蔽地分布在狄逾岭山脉的各个角落，白天不活动，也不生火煮饭，再加上用遮天蔽日的烟雾作掩护，用这样的手段，成功地让美军侦察机成为了摆设。

路上没有人，也没有车，战争爆发后路上曾有的难民队伍也丝毫不见了踪影，此时置身在整个“联合国军”最前线的白善焯将军，心中袭上一缕挥之不去的不祥之感。而这种不祥之感在他派出去的侦察队抓回一名俘虏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

这名被编为1号的俘虏刚一送到，白善焯立即进行审讯。

穿着竖条纹状棉军衣的1号俘虏只会说中国话，他招供：“中国的大军，这几天一直在这一带的大山中埋伏待机。”

他是中国兵，在中国打过仗的白善焯一听就知道。下午陆续送来的2、3、4号俘虏也都只会说中国话。

这就证明：中国人说到做到，美国人一越过“三八线”，他们的军队就真的跨过了鸭绿江！

俘虏们说：

“我们是被强制当的‘志愿兵’，志愿军没有军衔也没有证章，属于临时编成的小股部队，受北朝鲜军队的指挥。”

“各部队分别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39、40军各抽出约3000人临时编成的，编制相当于步兵团。从东北出发时，所有的志愿兵已经宣布脱离了中国军队的军籍。”

“入朝的总兵力大约9000人，夜里从临江过的鸭绿江。”

金东明在《韩国战争史》中说：“他们好像是一枪未放自动投降的，据说全都是地道的农民出身，看上去很老实。所以没有人怀疑他们是不是特务。精心安排携带假作战计划的军官故意投降敌人中，把假情报交到敌人手里，这样的诡计古今中外绝不鲜见，可是当时却无人表示有任何怀疑。虽然后来不少学者怀疑那是中国军队精心安排的欺骗行为。”

事实上，这几名俘虏全都是北平和平解放时编入部队的原国民党的士兵，都属于第42军第124师。

他们被美军审问时，声称是10天前过的江。在问他们的最高指

挥员时，他们统一回答是“林彪”。这是因为彭德怀上任初期只有少数师以上干部知道，这些士兵当时只按照过去在四野时的知识来回答，这几名志愿军俘虏的“无知”没想却误导了“联合国军”总司令，以至于麦克阿瑟至死都以为是林彪而不是彭德怀在指挥志愿军与他作战。

白善焯立即向他的美国上司报告，一句“八路军来啦！”足以表明当年他在华北作战时聂荣臻麾下的八路军在他心灵上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俘虏们的供词，以及韩国人报告的“八路军来啦”的惊呼并没有引起白善焯的美国上司们的重视，因为从总的方面分析，中国军队介入的战机已经过去了。如果是在釜山防御阵地苦战的时候，或者是在仁川登陆兵力分散的时候进行有效的军事介入，无疑会事半功倍。但是，在北朝鲜军队几乎全军覆没，“联合国军”转眼之间就能抵达鸭绿江的这个时候介入，在政治上自不消说，在军事上也是毫无意义的。

但，事实上来自中国的“八路军”士兵已经参加了和“联合国军”的战斗，眼前的俘虏就是确凿无误的证据。

严重的问题是，他们究竟是按中国政府的意志派出的正规军，还是以个人名义参战的志愿兵，尚无法肯定。

结果，权威的情报机构经再三研判后，慎重地作出了如下结论：“温井和云山周围出现的中国兵，表明中国为阻止‘联合国军’向国境推进，以一部兵力对北朝鲜军队进行了增援。然而，这些中国兵是以个人身份参战的，没有证据证明中国军队已正式参战。因为不管怎样，丝毫没有中国公然介入的征候。”<sup>①</sup>

这是沃克的第8集团军在发现中国人介入时作出的最初判断，其语句中明显地流露出一种“中国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情绪。当这样一份来自前线的重要情报送到比沃克更加不屑把中国人当回事儿的麦克阿瑟手中时，更要命的事情便紧接着发生了。

如果说“第一个率军进入平壤的韩国将军”使白善焯“呼啦啦”瞬间飞升到了荣誉的顶端，成为大韩民国万人景仰的大英雄。那么，

<sup>①</sup> 引自美国第8集团军定期情报记录206号，美第1军作战命令第15号附件。



紧接着发生在云山的这场不期而遇的战斗，则使他从云端“咚”的一声跌落下地，并且摔得他鼻青脸肿，成为一辈子的恨事。

他根本想不到，就在眼前什么也没有发现，覆盖着厚厚白雪的狄逾岭的大山深谷里，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已经完成了结集，将他的南韩军最精锐的第1师从三面包围起来，准备待机攻歼。

紧接着，南韩军第1师以及支持他们的美军将会在云山遭到惨败。仁川登陆后一直像风卷残云、一马平川进攻的“联合国军”，也会随着这场遭遇战的突然恶化，不得不步步后退。

美国人把这次战斗写进了他们的军史中：“韩军第1师在同中国军队的首次遭遇战中，缺乏击破敌人的意志和勇气，有90%的官兵遗弃装备四处逃散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并推测说，“韩国兵对中国人有潜在的恐惧心理”。

可以想象，当白善焯率领他的第1师在云山被不期而遇的中国人打得屁滚尿流，被迫仓皇撤出平壤，再次离开大同江时，他的心情将是何等的惆怅！

半个世纪后，头上戴着大韩民国唯一的“名誉元帅”桂冠，已经垂垂老矣的白善焯率领一个韩国友好代表团访问北京时，他才从出面会见他的柴成文这位老对手口中了解到，当年与他在云山执戈厮杀的中国将军汪洋，居然与他至少有4个共同点：

1. 都是30岁的青年才俊。
2. 都是指挥万余兵马的一师之长。
3. 都是知识分子型的指挥员。
4. 都是大帅哥。

熟悉这场战争的人们都知道，在北京大本营运筹帷幄，克敌制胜的最高统帅是毛泽东，亲自率领百万大军喋血异域，功在千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是彭德怀。

但是可能并不清楚，中美两军第一次交手的时候，打败美军百年常胜之师的那位中国将军是谁。

收复平壤，攻克汉城，最先突破了“三八线”，进军“三七线”，作战纵深最远的中国将军，又是谁？

这一连串的“谁”，全部指向了汪洋将军。

这位英姿勃发、年轻儒雅的将领不仅是杰出的军事将领，并且还在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上，演绎了一段英雄美人的“战地浪漫曲”。



在年轻英俊的白善焯将军的第1师驻扎的云山城对面延绵不绝的巍峨山峰上，与他同样年轻英俊的汪洋将军也在用望远镜观察着战场的动态。

来自中国的大帅哥汪洋与来自韩国的大帅哥白善焯此刻初战于云山，稍后又在临津江隔河厮杀血拼，却说不上“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战果证明，二位帅哥的屡次交手，显属胜负立判的高低手对局。

## 第九章

# 大国风范

### 1. 打韩军没想打出了美国兵

1950年10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秘密入朝，立即展开对“联合国军”的阻击。此时以美韩军队为主要力量的“联合国军”在麦克阿瑟发出的“感恩节前结束战事”的口号鼓动下，正向着中朝边境浩浩荡荡地突进。志愿军总部决心乘敌分散冒进之际，集中兵力，以勇猛神速的行动，首先将冲杀在最前面的南韩军各个歼灭。依照志愿军总部部署，39军首长决定，由汪洋的116师担任主攻，115师和117师协同，以关门打狗之势，围歼冒进到云山地区的南韩军第1师。

和白善焯以及部署在白善焯的第1师身后的美国人在云山交手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的39军。军长就是彭德怀在丹东参加的聚餐会上那个脸红筋涨地吼出“怕他个尿啊，美国鬼子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咱就拿他这纸老虎当真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的老红军吴信泉。

2001年记者的采访，将病榻上的汪洋将军带回到了50多年前在异国土地上的那场惨烈的血腥搏杀。

他回忆说：“云山是朝鲜北部的一座小城，处于小盆地内，四面环山，丛林茂密，河流纵横，公路四通八达，是美军和韩军的重要交

通枢纽，由南韩军主力部队第1师防守。1950年10月29日，我们39军将韩1师从三面包围起来，准备待机攻歼，但万万没有想到，满门心思打韩军，却打出个美军来。”

云山之战，担任主攻的116师肩上的担子最重。

志愿军司令部命令，11月1日19时30分，全军对云山发起总攻。孰料，战场情况，瞬息万变。

下午4时左右，汪洋骤然紧张起来，通过观察发现，云山东北方向的敌坦克、汽车和步兵开始向后移动，云山城附近的敌人也开始往来频繁。

同时，右翼前沿的观察所也向他报告，他们发现正面的敌人背上背包，登上汽车开始后撤。

汪洋第一个反应就是：云山的南韩军已经察觉到自己三面被围，正要逃跑！

战后得知，南韩军第1师在云山被39军包围后，麦克阿瑟为了挽回被动局面，紧急调遣美军战略预备队骑兵第1师从平壤赶来增援韩1师，企图继续北进。

汪洋察觉到的敌人的异常动静，其实是已经赶到的美骑1师先头部队正在和韩1师换防。

汪洋当然不可能知道敌情已经发生变化，他还以为对面是韩1师呢。他看看手表，下午4时整，距离原定的进攻时间还有3个半小时，他担心如果不立即进攻，韩国人就跑远了！

汪洋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抓起电话，接通了军指挥所，向吴信泉报告了敌人阵地上的情况后，急促地说：“军长，绝不能让敌人跑掉，我建议提前发起总攻！”

吴信泉果断采纳了汪洋的建议。“好！打他个措手不及，汪洋，你们抓紧战前准备，提前到下午5点开始进攻！”

在中国军队发起攻击的瞬间，刚刚完成换防的美军骑1师第8团，就代替白善烨麾下的12团，和中国人劈面打开了。

此刻39军面对的是自建军160余年来从无败绩，百战百胜的美军王牌部队骑兵第1师，力量也随之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云山不仅有尚未撤走的韩1师12团，还有陆续赶来接防的给美军骑8团加强的炮兵、坦克兵、航空兵5000余人。战斗打响后，骑1师第5团又奉命赶来增援。云山战斗期间，美骑1师和韩1师两支部队进入云山战场的兵力，



已接近万人。

中国人抢先动手。39军的炮火于11月1日下午4时40分开始。五颜六色的信号弹在黄昏的天色中腾空而起，各种火器发出的声音震荡着云山山谷。紧跟在炮火之后，志愿军步兵向云山发起了冲击。

汪洋的116师在主攻方向动用了4个营8个突击连，一齐开始向云山之敌攻击。在肃清云山外围的各小高地的战斗中，白善焯麾下南韩军防线很快就被突破。

美骑兵团团长约翰逊上校看见了退下来的南朝鲜士兵，他后来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他们是泥塑的部队，完全是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对于我的吉普车、对于附近时而发生的枪声全不在意，全无表情，同我在巴丹见到的投降之前的美国兵一个样。中国军队几乎看不出队形的攻击人流，在各个方向时隐时现，瞬间便冲到了美军面前。中国的炮火十分猛烈，检查弹道，发现是二战中曾在斯大林格勒出现、让德军胆战心惊的82毫米‘喀秋莎’火箭炮。这种武器的出现，意味着进攻的军队不是一般的军队。”

这是初尝败绩的约翰逊有意夸大了中国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好给自己的失败寻找一个让他不太尴尬的借口。因为首批入朝的中国军队，根本来不及换装苏式武器，更不要说威力巨大的重型武器喀秋莎火箭炮了。志愿军最早使用喀秋莎火箭炮，应当是在第三次战役的时候。据笔者考证，炮兵第21师是我军入朝参战的唯一一个喀秋莎火箭炮兵师，其前身是四野第48军143师。不过，无论如何，过去从未与中国军队作过战的约翰逊指挥官遭到劈头盖脸的打击后，已经开始正视现实了。

汪洋师长麾下的突击部队沿着松亭洞东南的高地，向龙浦洞和云山城里突击。

在116师指挥所里，参谋人员大声地重复着观察所传来的报告：“262高地上发出了占领敌人阵地的信号！”

汪洋师长按捺不住心头的高兴，撂下耳机，便走出了掩体。他要亲自去看看这颗报告初战胜利的信号弹。

但是，他走到外面信号弹已经熄灭了，站在那里观察的一个参谋激动地向汪洋报告：“两颗绿颜色的，是两颗绿颜色的！”

在不断赶来的美国人的增援下，白善焯的第1师好不容易稳住阵

脚，然后收拢部队，在优势炮兵弹幕射击和紧密的空中火力支援下，向中国人的阵地发起了猛烈的反击。

他们的阵中日志记载：“中国步兵的装备差，火力弱，以迫击炮以下的轻型火器为主。但他们依托经过巧妙伪装的深堑壕进行了极顽强的抵抗，所以进攻毫无进展。第15团主攻的262高地和第12团主攻的龙浦洞高地，一夜之间变成了蜂窝一般的要塞。我军每迫近一步，都有下雨般的手榴弹劈头盖脸地砸来。中国军队善于挖壕，很会伪装，战斗顽强。中国士兵是土作业的天才。”<sup>①</sup>

天已经全黑下来了。敌人带有曳光弹的弹道以及坦克的射击，在夜空中发出刺眼的光亮。

347团的一个叫张生的中国士兵在部队受到美军机枪射手的阻击停止前进时，绕到这个机枪阵地的后面，他没有用枪，而是抱住美军的机枪手一起滚下了山崖——类似的情景在云山四周山岗上如墨的黑暗中层出不穷，到处发生。

云山外围的一个个高地随之被突破，美国士兵们在他们听不明白的呐喊声和尖锐的小喇叭的吹奏声中不断地死伤或争相逃命，美军的防御阵地被迅速压缩。

在肃清云山外围的战斗中，汪洋手下348团2营的官兵，创造了一项朝鲜战争中的纪录。他们沿着三滩川东岸向云山方向攻击，在一座公路桥上与美国士兵进行了白刃战，消灭了敌人。当副连长张玉峰带着1排冲到三滩川岸边沙滩时，1班副班长李连华在炮弹爆炸的火光中发现前面不远处有4个房屋大小的物体。他想：战前勘察地形时，这里是一片开阔地，怎么现在变成了高坡？他谨慎地向前摸过去才看清，这里居然停着4架飞机！原来，这个开阔地成了美军的临时机场。

他把手向前一挥，3个战斗小组呈三角队形向那4架飞机冲去。守卫机场的敌人凭着野战工事，集中所有火器拼命地封锁必经之路。李连华带领的1班伤亡严重，他一看，身边只剩下两名战士了。他们冲到飞机跟前，一口气打掉两架飞机上的敌人。战斗到最后，李连华和另一名战士虽然也都负了伤，但始终没有倒下去，直到把最后一架飞机的驾驶员从机舱里抓出来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sup>①</sup> 引自金东明《韩国战争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翻译，国防出版社1979年版。



两名中国士兵听到了一团惊叫，才发现飞机上竟然挤满了人。

这时，更多的中国士兵冲进了这个临时机场，他们把飞机上的美国人赶下来，立即用人力企图把沉重的飞机推到隐蔽的地方藏起来，但是飞机岿然不动，结果中国士兵们只好用大量的玉米秸秆把4架飞机掩盖了起来。

天快亮时，指挥左翼团进攻的副师长张峰来到了这里。他用大嗓门问道：“这4架飞机是哪个连缴获的？”

“我们4连刚刚缴获的，还有驾驶员和好多洋人哩！”

“好呀！好呀！怎么不拖到山沟里去隐蔽起来？”

“副师长，我们没有牵引车。”

“用人推行不行？”

“我们推过了，推不动呀！”

“那就派一个班，赶快用苞米秸子伪装起来。”

没想到刚伪装不久，上午10时，美军飞来8架野马式战斗机，“叮叮咚咚”发射机关炮和火箭，把这4架飞机全炸毁了。

后来，英语翻译审问俘虏时，志愿军才知道这4架飞机的来历。

准确一点说，这是3架轻型飞机、1架炮兵校射机，是由美军远东总部派来的，飞机上坐着慰问团和新闻记者。11月1日下午从日本东京机场起飞，是打算飞到云山来慰问和采访美军骑1师官兵的胜利的。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连骑1师官兵的面都没见到，就做了中国人的俘虏。

当志愿军向云山发起攻击，这4架美国飞机为什么没有起飞呢？那是因为云山这个临时机场没有夜航设备，志愿军的炮火压制了敌人阵地，他们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直到348团4连李连华这个班的战士们冲到飞机面前，他们才发觉形势不妙，大祸临头，准备起飞逃之夭夭，但为时已晚矣！

最初，39军向上级报告战果，总部有的首长还不相信他们缴获了美国人的4架敌机。

副团长屈太仁带领3营到达云山后遭到敌人顽强抵抗，又遭到敌人炮兵火力的压制。他们以少数部队牵制敌人，主力利用沟渠逼近敌人，组织了全营的轻重机枪、迫击炮突然开火，向敌人进行密集的射击，随即发起了勇猛冲击，突破了敌人野战工事。他们没有顾得上肃清两翼的敌人，沿着大街向街中心冲去，就这样把敌人冲垮了。

当7连追至街西十字路口，看见敌人10余辆满载汽车，在坦克引导下向东逃窜。1排当即占领了临街房屋，用冲锋枪和手榴弹大量杀伤敌人，敌人弃车南逃。8连沿街向东追歼敌人，于中街路口与346团4连和348团7连会合了。

这时候，云山街里的巷战处于混乱的状态。因为是夜间，有一些敌人也随着3营向街心溃逃，3营不得不用一部分部队掉过屁股，打溃逃下来的敌人。

白善焯听到军号震天，看到满山遍野的中国士兵正分多路向他的第1师防守阵地杀来时，他已经驱车行进在阵地通往云山城的山区公路上。

不一会儿，他突然发现距离他乘坐的吉普仅300米处，中共军的枪口正瞄准着他们。敌军就在前方的弯道处。作为指挥一万多名兵力和被调配来加强他的第1师的美军坦克分队的韩军主力师师长，自视不凡的白善焯赤裸裸地暴露在了敌军的枪口下。车内除他以外，还坐着驾驶兵和师参谋长文炯泰。“怎么会这样呢？”这一刻，他突然感觉到既尴尬羞愧，又惊恐万状。

白善焯立即命令驾驶兵调头。当时这辆吉普车上连接着一辆用来装运现场指挥时野战中所需的毛毯和帐篷等物的小拖车。可就是它坏了大事。驾驶兵试图在狭窄的公路上快速调头时，因为公路太窄，拖车被挂住了。

驾驶兵飞快地从吉普车上下来，先把拖车卸下，然后再跳上吉普车调头、再下去把拖车重新挂在车尾，接着才出发。

当时，志愿军第39军分布在巍巍大山中的各个角落，绕开南韩军第1师阵地的正面，再加以穿插围击，各个歼灭。

虽然中国人的攻势凶猛凌厉，但是，白天韩国人的大炮和战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再加上美军强有力的空中支援，勉强可以保住阵地不失；不过到了夜里，就不得不孤军抵抗中国人展开的凌厉攻击了。

天亮后，白善焯将军仔细检查了夜间前来袭击的敌人尸体，然后，他向第1军军长米尔伯恩报告说：所有尸体都是中国人的，他可以肯定包围他的第1师的所有的军队——他估计不少于一万人——全都是中国的“八路军”，而不是传闻中“混在北朝鲜军队当中的个别中国人”。

奉命赶来云山增援的美骑兵第1师第8团在北进途中，第8集团军



情报部长汤姆森上校曾特意用电报提醒帕尔马团长注意，“在云山采取攻势行动的很可能是中国军队”。却没能引起帕尔马上校和他的参谋的重视。他们仍然未能摆脱过去的一般思维定势——中国人绝不可能在这无力回天的时候介入朝鲜战事。

这时，南韩军第2军军长俞财洪将军作出决定，至少要尽力把已经遭到中国人重创的第6师第2团遗弃在温井战场上的车辆和大炮抢回来。进攻战打响后，南韩军第6师第19团和第8师第10团正在熙川。俞将军命令他们立即向温井发起进攻，夺回那里的重型装备。

10月28日，这两个团的先头部队到达了离温井不远的地方，从那里他们可以俯视第6师遭到打击的战场，并看见了遗弃的大炮和卡车。不过，他们的此次征程也就到此为止了。

10月29日，中国人击溃了这些南韩军队，幸存者落荒而逃，把他们的车辆和所有的大炮全丢在了那里。

到此时，3个南朝鲜团中的大部分队伍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被中国人摧毁，作为战斗部队，他们已经不复存在。

同一天上午，在古场孤立无助的南韩军第7团开始出发，去和其他各部会合。在古场以南大约20公里处，即遭遇了中国人设置的路障。很快，全团人马都投入了战斗。由于白天美国战斗机实施了近距离空中支援，对中国人的阵地进行打击，第7团这一天才得以守住阵地。但是到了夜里，飞机一走，志愿军便突破了南韩人的阵地，南韩军队纷纷溃散。尽管有些人在阵地上一直坚持到最后，但大部分士兵在夜里逃进了山里。天亮时，抵抗已经停止。

美国军史说：“引人注意的是，据后来缴获的一幅手绘地图显示，只有一个营的中国军队执行了这次伏击任务，他们摧毁了南韩军第7团。该团总共有875名官兵最后逃到军隅里，与这个师的其他各部会合在一起。这意味着有将近2700人被打死或被俘。活下来的唯一一个美国人是南韩军第7团的顾问弗莱明少校，他浑身15处受伤，成了俘虏。”<sup>①</sup>

白善烨将军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中共军在夜间将能引起不安感和恐怖感的笛声和攻击巧妙地结合，笛声犹如开战初期人民军战车行驶时发出的声音，让他备感恐怖。

<sup>①</sup> 引自（美）约翰·托兰《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对于穿着夏装的第1师官兵们来说，越过狄逾岭山脉袭来的寒风也是一大敌人。

10月31日，白善焯再次去了云山前线，首先拜见了美军第10高射炮团长威廉·亨尼格大校。美国人表情严肃地忠告他，要他向指挥南韩军第1师的美军第1军军长米尔伯恩提出撤退的建议。

白善焯虽然感到很难接受，但不得不正视现实。

他再次巡访了位于前线的11团、12团和15团，并接见了已精疲力竭的各团团长，并竭力给他们打气。

几位团长异口同声地表示“现在的情况非常严重”。向云山北侧进军的15团所处的情况最严重，其他团的情况也相当危险，真有点四面楚歌的样子！

韩国帅小伙在和中國帅小伙的对决中，出师不利，遭到了迎头痛击，被打得晕头转向。

在云山东北隅，汪洋将军的一个营向云山前进途中与云山溃逃之敌遭遇。由于部队歼敌心切，先头连未待上级命令就发起了冲锋，把敌人压缩到云山城东北角的一所学校里。

这里空场地很大，周围有残缺不全的矮墙，敌人105榴弹炮阵地就部署在这里。敌人拼命地抵抗，随后3营一部分部队也赶到了，立即对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11月2日2时，左翼3营于朝阳洞加入战斗，当7连2排进到云山东侧街口，看见街内敌人车辆拥挤，人员混乱。

班长么兴福抱着爆破筒勇猛地冲上第一辆坦克，将它炸毁。敌人丢掉车辆南逃，2排乘胜猛追，与从西南方向退下来的300余名逃敌相遇。2排长吹响了牛角小铜号，全排出击，用冲锋枪、手榴弹、刺刀杀向敌人，与从西面追来的347团战友们协同围歼了这股敌人。

半夜时分，中国志愿军的一支穿插分队到达云山以南15公里的公路口，截住了一队从云山逃出的美军坦克分队。

在惨烈的混战中，中国士兵赵顺山、于世雄和田有福各自和美军士兵扭打在一起。

60多年后，赵顺山回忆道：“那个美国兵很高，很胖，搞不清他是司机、军官还是机枪兵。”

无法知道第一次和一个身强体壮的美国佬进行肉搏的赵顺山在殊死的肉搏战中是什么感觉，就在脸对脸的瞬间，在火光激烈的抖动



中，赵顺山看见“他的眼珠是黄绿色的”。扭打中，美国兵掏出了手枪，可赵顺山腾不出手来制止，于是他就喊：“于世雄！快帮我把这家伙的手枪抢过来！”

于世雄听见了，腾出一只手打掉了那个美国兵的手枪。

就在这时，与于世雄抱在一起的那个美国兵趁机掏手枪向于世雄的腹部开了枪。愤怒之极的赵顺山发现了美国人身上插着的洋镐，于是他“哗啦”一声拔出来，向被自己压在身下的美国兵的头上猛击下去。

在惨厉的叫声中，骑在于世雄身上的那个美国人也在洋镐的连续砍击下像摊泥一样倒下了。最后，3个美国人的脑袋都被赵顺山用洋镐击打得像烂西瓜。

“恶战结束了，”赵顺山说，“于世雄和田有福都躺在工事旁边，他们已经昏迷了。我跪在于世雄身边，他的左手还紧紧地握着敌人的手枪，牙齿咬得紧紧的，我擦着他身上的血迹，在他的肚子上找到枪弹的伤口。我心里非常难过，他是为了救我受伤的。田有福躺在于世雄旁边，他的右腿已经断了，整个裤腿被鲜血染红，他的腿是在肉搏之前就被炸断的，可是当敌人扑上来时，他仍然用仅有的一条腿跳起来抱住敌人，一直拖到我把敌人击打死为止。这就是我的出国第一仗。这一仗我真正试了试美国人的斤两，所谓的‘王牌’，也不过如此。”

这时云山城内已经陷入混乱之中。冲入城内的汪洋的116师346团的先头部队4连到达了公路大桥。

守桥的是美骑兵第1师第8团3营M连。

美军战史记述道：“一个连的士兵纵队沿着通往龙山洞的干道严肃而整齐地接近南桥面。警戒该桥的美军士兵可能认为他们是南朝鲜军队，没有查问就让其通过了，因为他们是堂堂正正、十分肃静地走过来的。纵队通过桥以后一直在干道上北进，不久接近了营部。突然间吹起了军号，开始一齐向营部袭击。”

4连的军事行动如同是在舞台上演出，除了胆大包天之外，中国士兵的机智勇敢在此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据中国第39军军史记载，“中国士兵通过桥梁的时候甚至还和美军握了一下手”。

第8团3营营部立即混乱起来，中国士兵呈扇面队形展开，营部周

围一片白刃战的格斗声。

美军战史详细描绘道：“中国人胡乱开火，不断向车里扔手榴弹、炸药包，车被打着了。可指挥所周围的有些分队还在狐洞或隐蔽工事中呼呼大睡，显然他们是等待撤退的命令。”

其中一个士兵后来回忆说：“醒来时仗早已打响了。有人叫醒我后，问我听没听见一群马在奔腾嘶鸣。片刻间我们的驻地被打得千疮百孔。当我听到远方的军号声和马蹄声，我以为我还在梦乡，敌人仿佛腾云驾雾，从天而降，人影模糊不清，他们见人就开枪，甚至用刺刀捅。”

战斗进行到11月2日17时，美军顶不住了，面对漫山遍野杀来的中国人，骑1师师长盖伊将军不得不下达了丢弃伤员和重装备，紧急后退的命令。

关于当时的心情，许多年后盖伊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军人的生涯里有许多悲伤的回忆，但都没有这次定下决心时那样辛酸、痛苦和悲伤。”

这天夜里，在定州宿营的澳洲营营长格林中校，在“中国人的骚扰性战斗中被打死了”。

当时的《朝日新闻》以“澳洲军司令官战死”为标题，作了显著报道。

这个报道给人这样一个感觉：在“联合国军”马上就要前进到朝中国境线，战争眼看就要结束的时候死去，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情啊！

毋庸置疑，所有的南韩军在和中国人首次狭路相逢时都没有尽力战斗。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中共军队突然而又激烈的攻击产生了盲目的恐惧心理；另一个原因则源自于朝鲜人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对中国军队所怀有的传统恐惧心理。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南韩军第6师第2团3100名官兵中竟然有2700人后来成功地逃过了清川江。这就有力地表明，当遇到中国人的时候，他们逃跑的成功率高得惊人！



## 2. 军法从事

志愿军的手榴弹把美军营长罗伯特·奥蒙德少校炸成重伤，他和一个叫作麦卡比的上尉逃出营部，麦卡比的钢盔立即被打飞，肩胛骨钻进了一颗子弹。由于失血过多，他躺在路边不能动弹了。

这个时候，令这个美军上尉奇怪和幸运的事情发生了：几个中国士兵用刺刀指着他，但却没有刺他，甚至没有缴他的枪，只是互相说着什么。

麦卡比用手指了指南边，中国士兵掉头就走了。

麦卡比活了下来。他至今也惊奇自己到底是怎样活下来的，他认为那几个围着他的中国士兵互相说的话是在商量什么，而商量的结果是他可能不怎么像敌人。

天亮以后来了“蚊式”飞机和轰炸机，在云山公路大桥这个被中国军队占领的交通要道上进行了轰炸，美骑兵第1师8团3营这才有机会清点人数。但死亡的人数已无法点清，光是在由3辆坦克构成的小小环形阵地里，就躺着170名伤员。

志愿军冲入云山街头的第一个先头班只剩下4个人还没有负伤。他们3人一组，沿着街道搜索。但是被一辆美军坦克封锁住前进的道路，坦克上的重机枪火力使后续的中国部队受到很大的伤亡。

先头班班长赵子林恼火了，他爬到一间小商店旁边，从与美军坦克对射的友邻部队那里弄到一根爆破筒，便攥着爆破筒向那辆坦克爬过去。美军坦克掩护着几辆载满美军士兵的卡车，疯狂地向这个越来越近的中国士兵射击。

为了掩护赵子林，中国士兵拼死与美军纠缠，赵子林终于接近坦克了。坦克的声音很大，震得街道的地面剧烈地颤抖。赵子林突然在坦克的正面站了起来，一直到坦克开到他眼前的时候，他才拉开了爆破筒的导火线。他没有来得及隐蔽，巨大的爆炸声惊天动地，赵子林最后用力地睁开了眼睛，他认识和不认识的弟兄们，正穿过黑色的硝烟向美军士兵冲去。

下午，设在龙山洞的美骑兵第1师指挥部收听到一架L-5型观察机上的观察员的报告：“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奇怪的情形。有两大队中国军队的步兵在云山西边明当洞附近东南的小路上行进，尽管我们的

炮弹直接落在他们的队伍中，他们仍然片刻不停地前进。”

云山城的美军开始向南逃跑，但是他们的后路已经被截断了。中国志愿军第39军115师345团的士兵已经抢占了一个叫诸仁桥的公路路口。这场战斗结束时，几十个美军士兵在猛烈的攻击下举着白旗投降。他们对翻译说，他们的军官说过，投降有四个条件：一是没有子弹了，二是没有干粮了，三是联络中断了，四是突围不了了。他们符合投降的所有条件。

被压缩在云山南面狭窄开阔地的美骑兵第1师8团四面受敌的命运来临了。

11月2日拂晓，美第8集团军命令全线撤退。

西海岸的美第24师接到的命令只有一句话：撤退至清川江一线。

这个师的美军官兵们此刻充满着不安的情绪，是苏联军队参战了，还是中国军队把后路切断了？或者是北朝鲜彻底投降让战争结束了？美国兵们在悲喜交织的谣传中忐忑不安。

美军战史称：“官兵们抱着失望和被狐狸迷住了一般的情绪，开始了后退。”

电报、电话、侦察机的报告雪片一样地向美第8集团军司令部飞来。在大量片断的、悲观的情报中，还混杂着持乐观看法的报告，它们给沃克的参谋们造成了判断上的灾难。

美军战史在描写当时的气氛时写道：“这是终日歇斯底里、狂热工作而效果最差的一天，也是发生了若干错误的一天，一个接一个的朝令夕改的命令，流水般地不停地发出。”<sup>①</sup>

这时，美骑兵第1师5团从博川方向急促增援而来，但是当它们行至云山以南龙城洞至龙头洞之间的公路附近时，受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阻击的部队是中国志愿军第39军115师342团，团长是12岁在延安参加红军，时年27岁的王扶之。<sup>②</sup>

美军动用坦克和重炮向中国阻击阵地猛烈轰击，美国空军的飞机在阻击阵地上洒下倾盆大雨一样的汽油，然后发射出燃烧弹，中国阻击阵地顿时成为一片火海。阻击异常艰苦。

在343团3连的阵地上，天上是美军几十架战斗机在扫射轰炸，

<sup>①</sup> 引自（美）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sup>②</sup> 王扶之以后相继担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等职。系中国共产党第11、12届中央候补委员。



地面上是一拨又一拨的坦克配属步兵的冲击，阵地上原来茂密的树林已经变成了一片焦土，全连180人，打到最后只剩下不到40人。

但是没过多久，空军的支援就减少了。那是因为中国军队放火烧着了云山北面和东北面的森林。在不同地点燃起的大火至少有十处之多，烟雾直冲云天，一连数日，遮住了“联合国军”的空中观察，并且掩盖了中国军队的运动情况。

在简陋的团指挥所里，王扶之用望远镜聚精会神地观察1营的主阵地。只见敌人打过来的炮弹一排一排地爆炸，光秃秃的树木、石头、土块被炸得到处乱飞。8架美国飞机在空中轮番扫射、投弹，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扔下来的凝固汽油弹，在已经燃烧着的山头上掀起了更加凶猛的火焰，大火裹着浓烈的烟尘，向着四处蔓延开去，将整个阵地吞没。

“1营阵地上打得好惨啊！”指挥所里的警卫员和通信员小声地嘀咕着。

突然，王扶之看到1营3连的阵地上出现了异样，3连还活着的战士全都撒丫子往后跑了，美国兵呐喊着拥上山去，星条旗在阵地上迎风飘扬……

生死关头，大浪淘沙，志愿军里也并非全是英雄。

在极其惨烈的战斗中，1营3连的阵地首先失守了。

3连没能守住阵地，不怪战士，是因为干部首先出了状况。一开始1营副营长表现还不错，带着3连和敌人打了几个回合，受了轻伤也仍然在阵地上坚守着。可是，当敌人一批又一批炮弹打过来，当敌机扔下的凝固汽油弹在阵地上到处燃烧，当敌人坦克沉重的履带声传来，这个副营长吓坏了，临阵脱逃了。生死关头，干部是战士的主心骨，干部一逃，士气一下就垮了，3连阵地也随之被敌人占领。

敌人占领了3连阵地后，趁热打铁，立即向1营主阵地发起进攻。天上，敌人的强击机和轰炸机从几架次到几十架次，疯狂地轮番轰炸和扫射。地下，敌人步兵在坦克的配合下，一次又一次猛烈地进攻。1营阵地上原来一片茂密的树木，几小时后变成了一座光秃秃的山，许多大树被打得连根拔起，最后飞机把树枝全打光了。部队伤亡惊人，七八百人的一个营，很快就去了一半。

过去打仗，从来没有遇到这么多的飞机，这么多的大炮，这么重大的伤亡。

就在这样的严重关头，1营教导员一看部队打成这个样子，情知阵地就是拼了老命也守不住，就掏出手枪把自己的手掌打穿了，然后对1营长谎称自己负了伤，一头窜下了阵地，逃命去了。1营长原本受了轻伤，一直咬着牙在坚持，见教导员自伤先逃，也动摇了，扔下自己的队伍，跟着教导员逃下了阵地。

战士们一看当官的逃了，哪里还有信心和冲上前来的美国大兵拼命？也都扔下阵地，一窝蜂争先恐后地跟着逃了。最后导致二线阵地也被敌人突破。

在异国他乡作战，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老百姓也不会给他们吃的，这几位干部会往哪里逃呢？原来，他们都伪装成伤员，逃到后面团里的伤员收容所去了。

在那里负责收容伤员的团组织股长刘本忠看见了，马上打电话向团长王扶之报告。

“报告团长，1营教导员自伤下去了。”

“报告团长，1营营长、副营长丢了阵地，轻伤躲进了收容所。”

王扶之大怒，喝令刘本忠马上把这几个贪生怕死之徒抓起来，立即送到团指挥所。随即叫人把侦察股长薛强叫来，说：“现在，我命令你代理1营营长，指挥全营，去把阵地给我夺回来。你给我把92步兵炮连拉到凹口上去打。”

“团长，敌人炮火打得正猛，拉不上去呀！”

“上不去一个连，拉上去一门炮也好。”

“团长，我马上执行！”薛强说完，带着人硬是把92步兵炮连的几门炮全拉到凹口上去了。

到了这万不得已的时候，王扶之才把预备队2营拿了上去，加强已被打残了的1营向敌人进行反击。结果薛强很争气，把3连失去的阵地重新夺回来了。

然而，激战并没有停止，也没有间断。

在2营阵地上，敌人的飞机马上又来轰炸，敌人的大炮又开始了射击。敌人的大炮射击和飞机轰炸结束后，坦克开始出动了。坦克上的自动武器不停地扫射，接着，步兵紧紧地跟在坦克后面前进。敌人以为2营阵地被他们摧毁，大概没有人能够待住了。头戴钢盔、手持



卡宾枪的美国士兵们，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爬几步停下来观察一下，爬几步又停下来观察，而是脚步不停地往山上冲。

王扶之从望远镜里看见，当敌人进攻到离山头只有20公尺的时候，薛强带着1营的干部战士不知从哪儿跳出来，仿佛是站在大火之中，用一切火器一齐向敌人猛烈射击，成批的手榴弹落在敌群中炸开了。被打死和打伤的美国兵，像一段段的木头滚到山下去了，没有被打着的敌人往回逃命，战士们用火力追击着。在反击中，被烈火烧烂了军装的中国士兵还抓到了40多名美军俘虏。

美军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烧不死，其实中国人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在阻击阵地上组织士兵挖防火沟，农民出身的中国士兵对挖沟驾轻就熟，他们在弹片飞舞之中不停顿地挖沟，把烈火和阻击士兵藏身的工事隔离开来。甚至当战斗将要结束的时候，王扶之走上阵地，他看见他的士兵们依旧在疯狂地挖沟！

王扶之当然不会忘记处置1营的那几个贪生怕死的干部。战场上军法如山，参与逃跑的十几名干部们被押上刑场，军法从事。他们也清楚自己活到了头，没人奢求饶命，只提出看在自己革命多年的分上，不要将他们辱没祖宗，殃及家人的丑事通知家属，只说他们是被美国人的飞机炸死的。

这样的要求不可能得到满足，“被美国人的飞机炸死”，无疑应当被定性为烈士，成了烈士，家属就有相应的优抚待遇。你们这样的表现，家人能享受优抚待遇么？制定军法的目的，就是为了“奖勇惩怯”，要放你们一马，那么多志愿军士兵，心里会怎么想？

王扶之手一挥，枪声响了……

### 3. 中国将军的两大遗憾

公路大桥桥头工事里的美国人始终在疯狂地射击，突然，他们看见一个中国士兵向他们走过来。士兵李富贵把自己身上准备买一支钢笔的东北币掏出来交给他的班长，表示不炸掉这个工事他就不回来。

他赤脚跳下已经结冰的小河，在河中央他的左肩中弹，疼痛令他



流出了眼泪，但他没有停下来，他一直走到美军的工事前，把5颗捆在一起的手榴弹塞进美军的工事里。手榴弹爆炸了，一个班的美军士兵的躯体连同工事的水泥钢铁一起飞扬起来。

血人般的李富贵站在小河中笑了，他刚要抬腿跟随自己的部队追击，却一头栽倒在水里，原来他的双腿已经和河水冻在一起了。

夜晚来临了，作为预备队的美骑1师7团派出一个营再次增援，企图解救出正在被中国军队逐渐吃掉的骑1师8团。

这个营的一个上尉排长，后来当上驻日美军陆军司令部情报与作战处长的麦克霍恩回忆说：“看到若无其事走过来的部队认为是韩国军队。可是样子又不像。因而连长就问营长：‘有南下的韩国军队吗？’回答说：‘不知道。’又问：‘那么可以射击吗？’回答说：‘再等等。’当察觉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作出反应了。”

汪洋回忆：“11月2日凌晨2时，我将第二梯队346团投入战斗。并告诉吴宝光团长，要发挥我军近战、夜战和小分队灵活机动、穿插包围的长处，打击敌人的短处，这些战术在云山战斗中非常见效。随着隆隆的炮声，3个团从东、西、北3个方向先后攻入云山城内。346团4连从美军间隙直插街内，当他们到达公路大桥时，守桥的美军把他们当成了韩军，给他们让路，4连战士猛然开火，打得美军猝不及防，晕头转向，死伤惨重。战斗在街内形成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杀声四起。美国兵从未见过如此神速的猛扑，更不适应这种刺刀见红的白刃战，很快乱了阵脚，溃不成军。云山战斗进行中，麦克阿瑟从博川急调骑1师第5团增援骑8团，遭到我军115师的顽强阻击。美军的飞机、重炮、坦克狂轰滥炸，阵地一片火海，苦战两天，未能前进一步。115师有力地保障了我116师云山战斗的胜利。”

美军的惯例是不在夜间进攻的，但是这个夜晚对这个营的美国兵来讲，比进攻还可怕。

美军战史描绘：“整整一夜，高地的四周响起的军号、喇叭、哨子此起彼伏，中国的少数侦察兵在这个营的四周转来转去，在不合时宜的时间，吹奏不合时宜的乐器。第一次与中国军队对阵的官兵，在不了解实情的状态下，整夜不得安宁，被弄得神经过敏。这是一种原始的但却是极有效的神经战。因此，美军给这个高地取名为‘喇叭高地’。”

在第39军围攻云山的时候，40军一个负责穿插的连队迅速深入



敌后，顺着敌人炮弹出膛的声音寻找了5公里后，才发现了美军的炮兵阵地。他们立即展开攻击使之瘫痪，俘虏了30多名美军士兵。这是这个连的战士们第一次看见美国人，“个子高高的，皮肤白白的”，中国人惊奇地这么形容美国大兵。

中国人俘虏了太多的南朝鲜士兵，有一个连就抓了200多号。没有东西给这些俘虏吃，于是俘虏就把老百姓的白菜拔光，还把老百姓挂在屋檐下的玉米生吃了。

这在中国士兵眼里是“严重地违反群众纪律”的事件，于是在缴了枪支后，把他们全部放了。根本没有意识到，战俘到了谈判桌上，会成为自己的一张牌。

俘虏中有几名是美军骑兵第1师的人，中国士兵们看着他们奇怪地问：“嗨，美国的骑兵怎么没有马？”

战斗中虽然有不少南朝鲜部队跟随美军推进，但战斗打响后就很少能看见他们的影子。这些南朝鲜部队的士兵都是穷苦的市民和学生，以及一些日伪时期的旧军人。很多人是因为二战后生活艰难而到军队谋生，没有见过什么大阵势。战斗开始后，这些部队就四散了，有些混杂在美军队伍中，有的凭借熟悉地形，干脆丢掉武器，换上平民服装，抄小道跑回了兴南。

现居住在韩国光州的金姓退休警察曾是南朝鲜老兵，在战争中跑过6次之多。志愿军部队也在战斗地域附近遇上过不少这样形迹可疑、不兵不民的南朝鲜逃兵，因为战斗正酣，没有工夫搭理这些赤手空拳的人，随他们三五成群四散逃去。

经过正面突击，侧面迂回，侧后包抄，116师终于对云山的骑1师第8团和韩1师的部队形成了合围。战斗十分残酷，骑1师利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绝对优势拼死抵抗，战斗持续到11月2日1时，116师才突进了城区。

半个多世纪后，汪洋将军为记者描绘当年的战果时，还显得十分兴奋：“战后，我巡视了胜利后的云山战场，到处都是佩戴马头臂章的美军尸体和坦克、大炮、汽车、给养。”

汪洋将军算了一笔账：“云山战斗中美军运尸体的8辆道奇大卡车被我们截住，车上每层10具尸体，头脚颠倒放置，一共装了5层，共计50具，8车共400具，每具都穿一套全新的白线衣裤。以此来推算，美军在116师正面伤亡即1200至1600人，而这个数字是只按其收

容的数字计算的。实际情况还有许多死伤者被遗弃在战场上，因此，实际伤亡人数远不止于此。因美军伤亡主要是被我轻武器所致，故受伤的比例更大。”

谈到云山战果时，汪洋将军说 he 有两个遗憾：一是没有组织小分队搜山，仔细打扫战场。战后第三天，配合116师作战的志愿军炮2师，在搜山时搞到大批物资，还有50辆汽车、15门榴弹炮，并捕获美军130多人。二是缴获了的敌人汽车和坦克、火炮，未能及时转移。天亮后，美军用飞机轮番轰炸，基本上都毁掉了，十分可惜。

朝鲜北部大山之中这个名叫云山的小城，想必是在中国士兵吹响的喇叭声中幸存下来的，也是如果今天还在世，已是白发苍苍的美国军人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

云山一仗，对西方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了中国人的预料。

美国随军记者罗素·斯伯乐在《韩战内幕》一书中写到了发生在云山的这场战斗。“1950年11月1日下午，第1骑兵师师长霍巴特·盖伊少将意识到第8团的处境危险。它侧翼的南朝鲜各师即南朝鲜的最精锐部队，正迅速崩溃，数千名惊恐万状的士兵在向南方逃窜，抛弃了大量的装备和辎重。在盟军进攻法国时，将军曾任巴顿将军的参谋长，他从不习惯撤退的行动，进攻是他的一贯信念。此时，战事发生了急剧变化，他备感无力应付局面，要求撤离云山，但遭到拒绝。这时，一切已经太晚了。向被困于云山的伙伴靠近的增援部队发现，中国军队已在周围的小山上修筑了工事，并阻塞了通道，炮火和飞机都无法支援他们。到夜幕降临之时，第8团已陷入被优势中国军队的三面包围之中。”

下面是这个美国记者叙述美国骑1师遭到志愿军39军沉重打击的情景：“1950年11月1日，在不明身份中国军队的打击下，第1营的防线很快被瓦解。步枪班——认定不是北朝鲜人后——仓皇退向稻田里，司机和机械人员也急忙拿起卡宾枪，跳入战壕。21时，攻击者突破防线，这时美军的弹药已基本用完。一股股的中国士兵冲向云山城，并扑向稻田，切断了美军的退路。美军被这锐利的攻势所震惊，他们从未经过这样的战斗。黑暗中，中国人像猫一样向他们扑来。他们利用夜幕的掩护，靠近阵地，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准确地插入防线的薄弱地带。这种战术的运用似乎是经过仔细推敲的。虽然他们也遭到了一些迎头的反击，但是，袭击者全然不顾伤亡，不断地冲上来。



全部行动是由军号、哨音和偶尔的锣声指挥的。一位见识颇广的美国士兵似乎辨认出了这些可怕的声音，他惊恐万状地喊道：‘上帝，这是一场中国式的葬礼！’”

第2营随即也遭到攻击，幸存者潮水般地逃向云山，其中混杂着数百名惊魂未定的南朝鲜人，他们向西溃逃，渡过了三潭江。第1营的败兵也加入了这伙人群。他们已精疲力尽，武器早已丢失。指挥官约翰·米利金少校来回奔跑，企图重新组织起防线，但是，包围圈进一步在缩小，子弹从四面八方射过来。月亮已经升起，一些熊熊燃烧的卡车和房屋将大地照得如同白昼。米利金命令未带武器的车辆开上南逃的道路，第1营和第2营的卡车队随即拉着一些火炮，越过稻田，从浅水处逃过河去，在他们后面跟着一群群逃窜的败兵。在云山南面的大道上，大约有100辆被丢弃的吉普车和卡车，并混杂着近10门门炮。米利金少校等军官正在重新召集8团1营和2营的士兵，凌晨几个小时的混乱，已把他们分为几段。他们试图冲出中国军队的包围，向南部的安全地带突围，但是，在困境中侥幸生存下来的第3营官兵，已经完全失去了突围的机会。

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与中国军队首次交火的消息迅速在前线传开了。在云山和南朝鲜军队待在一起的美国空军的战术指挥队调度员用无线电把消息报告给空中的一架蚊式侦察机，飞行员立即把消息发往第8集团军司令部。

在战术上负责西部前线的美国第1军司令部当天夜里也收到了详尽的报告，并做出特殊安排，把中国战俘空运到设在平壤的第8集团军前敌指挥部，并立即对他们进行审讯。到10月26日太阳下山之前，又有3名中国战俘被专机送到平壤。

李奇微在《朝鲜战争》一书里写道：“当李承晚军节节败退之际，为了挽回失败的态势，这时麦克阿瑟和第8军军长沃克中将决心起用位于二线的王牌师——骑兵第1师。这个师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并在独立战争时期是常胜师，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号称常胜师。该师技术装备先进。然而，他们被小米加步枪、加小炮装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打败。这是麦克阿瑟和沃克用兵不可预测的惨败。”

李奇微还写道：“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8骑兵团第3营的进攻，也许达到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第8骑兵团在云山总共损失一半以上

的建制兵力和很大一部分装备。”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女儿在《哈里·杜鲁门》一书中写道：“在朝鲜开始发生了惊人事件，战无不胜的第8骑兵团几乎溃不成军。”

云山之战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作为模范战例，被日本陆军自卫队干部学校收入《作战理论入门》一书。

隔岸观火并借机大发洋财的日本人评价道：“对中国军队来说，云山战役是与美军的初次交战，尽管对美军的战术特点和作战能力还不十分了解，还是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对孤立分散的美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进行包围，并积极勇敢地实施了夜间白刃战。”

东西两线分头并进的“联合国军”在没能最后判断出与他们交战的军队来自何方的情况下已被击溃，当头挨了重重一击的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克中将调整部署，明智地将已经过了清川江的部队向江南撤回一部分，抓紧构筑工事，作出一副由攻转守的样子。虽然第一线的兵力得到了增加，但各部队仍然处于分散的状态。

在北京，志愿军初战告捷使毛泽东情绪高涨，信心大增。他对麦克阿瑟的分析准确无误，非常自信正引诱这位最高司令往陷阱里跳。

由于沃克不知怎么地已把其大部分军队安全撤过了清川江，毛泽东认识到硬要按他原来的计划发动进攻将是蛮干。志愿军的补给已经消耗殆尽，因此在前一天，他命令彭德怀在东西两线同时突然停止了进攻。

11月5日，第一次战役画上了句号。

就像前些时候志愿军突然从千峰万壑之中杀出来一样，此刻，又如同水银泻地般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 4. 麦克阿瑟命令：“沿着鸭绿江飞！”

毛泽东认为，虽然没有完全实现当初制定的在头13天里的歼敌计划，但已经歼敌15000人，挫败了麦克阿瑟迅速占领整个朝鲜的计划，朝鲜的形势已经稳定下来，为重新做出判断和金日成重组其被打

残打散的军队，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个“碰头彩”，还使中国人民志愿军获得了在与装备重型武器的敌人作战的经验同时，在北朝鲜建立了一个稳固的阵地。

毛泽东估计，由于这次突然大踏步后退，自认为已经打退中国军队的麦克阿瑟将使部队继续向北推进，从而冒险延长他自己的供应线。然后志愿军可以从其在树林茂密的深山里的隐蔽处出击，赢得即将发起的决定性的战役。

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麦克阿瑟带着一大群幕僚和记者再次飞往朝鲜半岛，走马观花、蜻蜓点水似的在 frontline 视察，并于10月25日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平壤机场举行了阅兵式。

阅兵式结束后，麦克阿瑟在接受记者的拍照和采访后，下达了全线进攻的命令。在眼看着坦克的隆隆发动和记者们处于一种莫名的兴奋中，在向全世界发出了“联合国军”开始“感恩节攻势”的电讯之后，麦克阿瑟觉得这里已经没有他这个总司令的什么事了，于是他登上专机，飞回东京。

可是登上飞机之后，他对飞行员下达的指令又让所有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朝西海岸飞，然后沿鸭绿江往北！”

他居然要飞到鸭绿江上空去，俯看一下中国军队是怎样浩浩荡荡开进朝鲜半岛，来和自己麾下的军队作战的。

随行参谋们立即说不行，因为即使这架专机有自卫武器，有战斗机护航，朝鸭绿江飞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何况自卫武器与护航战斗机一样都没有。

麦克阿瑟说：“我要看看地形，看看中国人的动静。用不着什么保护，敢于进行这次飞行的胆略，就是最好的保护！”

任何反对意见在麦克阿瑟面前都是没有效果的。

记者们害怕了，嘟嘟囔囔道：“有必要这么冒险吗？”

麦克阿瑟的高级助手惠特尼将军换了一种方式，小心提醒：“是不是需要带上降落伞？”

“你这个绅士愿意的话你就带上，反正我不需要。”麦克阿瑟叼着他的烟斗，脸上浮现出的显然是一种睥睨天下般的威严。

专机起飞了，很快在西海岸上空转弯，然后到达鸭绿江的入海口。

麦克阿瑟命令：“沿着鸭绿江飞！飞低一点！”

此刻，飞机的高度为5000米，而中国人此时使用的苏制37高射炮的最大射程，是8500米。

机翼下是一片白雪皑皑的山地和平原。鸭绿江已经封冻，江水特别湍急的江心偶尔露出黑色的江面。沿江巨大的荒原上崎岖蜿蜒的道路被厚厚的积雪覆盖，没有任何人迹和交通工具通过的迹象，荒原在迷蒙的风雪中一直延伸到遥远的西伯利亚渺无人烟的远方。

惠特尼将军后来对他从飞机的舷窗向下看到的景象所感到的畏惧记忆犹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极目远望的是无穷无尽的穷乡僻壤，崇山峻岭，裂谷深峡，近乎于黑色的鸭绿江水被束缚在死一般寂静的冰雪世界之中。”

惠特尼感到麦克阿瑟不要降落伞是明智的，因为他认为，如果遇到紧急情况，宁可与飞机同归于尽，也比降落到“这冷酷无情的荒郊野地上”好。

70岁高龄，早就老眼昏花的麦克阿瑟除了中朝边境连绵不绝的群山和白雪一定什么也没有看到，更别说待在5000米高空之上俯看“中国人的动静”了。

但是，这趟鸭绿江飞行被随行记者吹嘘成了英雄壮举。麦帅叼着大烟斗飞临敌区视察的照片登在了所有美国和西方国家主流媒体的头版上，而且还被美国空军授予了功勋飞行勋章和战斗飞行荣誉徽章。

麦克阿瑟在记者们无比崇敬的目光中结束了边境飞行“侦察”后，他的专机这回真的向着日本海对面的东京飞去了。

当飞机掠上蓝天，消失在云层中的时候，留下来指挥美军作战的沃克中将低声嘟哝了一句：“简直是胡闹。”

沃克的声音虽然很低，但在场所有的人事后都说自己清楚地听见了。

后来，麦克阿瑟亲临鸭绿江上空“侦察”的事被官兵们知道了，他们说：“这个老头子还是很有勇气的。如果飞机掉下去，中国人一定会把他的玉米芯大烟斗送给斯大林的，因为从照片上看到，斯大林和他一样，也喜欢玩大烟斗。”

美国军史把毛泽东描写得像一个能掐会算的诸葛亮、刘伯温似的人物。“毛泽东半躺半卧在床上，一连几个小时研究中国古代史。他从未上过军事院校，但具有独到的打仗天才。他学自他本人多年成败



的经验。彭德怀崇拜毛，但有所保留。毛似乎对现代武器不闻不问，更着重诸如孙子等古代兵法家惯用的韬略权谋，而那些玄奥的东西无法编成明确的教材训导官兵。”<sup>①</sup>

继13兵团与“联合国军”初次过招之后，第50、第60军也紧随着跨过了鸭绿江。

兵力的优势很快便迎来了制胜的战机，彭德怀针对敌人兵分两路，分进合击的态势，要给“联合国军”一次更为沉重的打击。

他制订的战役计划是“东顶西攻”：以志愿军一部在长津湖战区层层设防，阻截东线由阿尔蒙德指挥的美第10军；以主力在敌人西线突破插入，正面进攻配合纵深迂回，切断齐头并进的“联合国军”的南北联系，给美第8集团军以重击，并相机歼灭一部于清川江以北地区。

1950年10月25日，不期而遇的双方先头部队在云山打响了规模不大的遭遇战，随后中国军队又突然消失在北朝鲜茫茫的雪原之中。中国志愿军的退，不过是为了更好的进。两支迥然相异的劲旅，决心在冬日扑朔迷离的北朝鲜巍巍群山里一决雌雄。

彭德怀这一方针，主要是从分析敌情与我情入手的。他认为，敌人虽然吃了个败仗，但主力并未被击溃，志愿军实力也尚未完全暴露，美军迷信其空军威力，还未放弃打到鸭绿江边的意图，根据情报分析，极有可能重新组织反攻。这就为志愿军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带来了机会。

另一方面，志愿军虽然旗开得胜，士气高昂，但困难也相当艰巨。如部队连续作战10余天，已经相当疲劳；交通线遭到空袭破坏，粮弹运输困难；再加严冬已至，房屋大多已遭炸毁，官兵们长期露营，苦不堪言，战斗力极难维持。

为此，彭德怀主张主力后撤30至50公里，让敌人更加放胆深入，使敌人的战线拉得更长，便于志愿军集中兵力、火力，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当毛泽东得知麦克阿瑟已上钩，立即同意了彭德怀的作战计划，命令彭德怀25日拂晓发起全线总反攻。

<sup>①</sup> 引自（美）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这无疑将给沃克以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

根据彭德怀的建议，毛泽东命令志愿军采取扩大正面运动防御与游击战相结合的方针，“如小敌则歼灭之，如大敌则边打边退，诱敌深入，以便主力部队消灭之”。

志愿军总部随即命令各部逐步减少节节抗击的时间，使敌军认为志愿军军力不支。比如，在撤退途中故意丢弃一些枪支和器材，制造出志愿军已溃不成军的狼狈样子。转入敌人侧翼和进入山区的部队，则昼伏夜出，严密伪装，电讯静默，保持行动肃静，隐蔽在敌进军路线两侧的崇山峻岭之间。

彭德怀使出的这一系列招数，果然进一步加深了“联合国军”的错觉，因仁川登陆而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更加骄纵，错误地认为中国志愿军是“象征性进攻”“装备低劣，怯战败走”。为此，他认为中国人的干预不过是虚晃一枪。他打算继续他的攻势，他也是这样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旦第8集团军能够重新部署并获得补给，就开始对中国军队猛烈进攻”。

麦克阿瑟对他的空中优势坚信不疑，认为它完全可以阻止中国人从东北跨过鸭绿江的增援，并且还将“消灭已在朝鲜的中国军队”。这次空中轰炸以后，他将于11月15日发起攻势，彻底消灭中共军队，把他的旗帜插到鸭绿江边。

他在上呈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计划里毫不客气，用恫吓的口气威胁他的上司们：“如果不这样，任何计划都将彻底削弱我的部队的士气，而其心理上的后果将是无法估计的。这将使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北朝鲜无限期地停滞在一条极其困难的防线上，并且毫无疑问地会在南朝鲜人中引起极大的不满，以致他们的军队会垮掉，甚至会掉转枪口打我们！”

面对麦克阿瑟的犯上言行，出席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军政大员们几乎全都被刺激成了好斗的公鸡。

当时，华盛顿对是否大批用地面部队还在犹豫不决。为此，三军参谋长们正在通宵达旦地进行研究。

参谋长联席会议倾向于在远东采取守势，因为美国在西欧采取攻势的策略，尽可能守住西欧，并以此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作战部根据他们的意见拟定了一个计划，其主旨是：“西欧对美国的整体安全具有最为重大的战略价值，必须反复强调这一点。”它认为在远东地



区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日本、冲绳和菲律宾，以及“防止台湾落入苏联人或者中国共产党人之手”。该计划的亚洲部分明确指出，“不提倡向中国或苏联西部发动进攻”。

待在东京的麦克阿瑟与在前方指挥作战的沃克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他对朝鲜战场上的形势没有丝毫的紧张迹象，甚至感觉已经稳操胜券。11月14日，他对政治顾问威廉·西博尔德说，他的近期目标是摧毁鸭绿江上的桥梁，这样便切断了东北和前线之间的联系。

与此同时，远东空军将摧毁敌军后方的集结地域，这样，中国军队就“不能在国外生存下去”。

他还对政治顾问说，向鸭绿江挺进的准备正在进行之中，而且在鸭绿江封冻之前赶到那里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的进攻能够在封冻之前成功的话，这场战争就结束了。

3天以后，即11月17日，麦克阿瑟在与美国驻韩国大使穆乔的谈话中坚持说，渗透到北朝鲜的中国人不可能超过3万人，如果多于这个数目，就不可能不被空中侦察发现。

他已经发出了“全线进攻，将在10天之内扫荡仍在北朝鲜人和中国共产党人手中的所有地区”的命令。然后，他将把所有中国战俘押送到鸭绿江边，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释放他们，接着再把第8集团军撤到日本，让第10军与“联合国军”部队，当然还有大韩民国的军队占领朝鲜。

但是，与美国人并肩作战的盟国政府的首脑们表现得并不像麦克阿瑟那样信心满满。11月中旬，很多国家的外交官都向华盛顿转达了警告。瑞典驻北京大使报告说，大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开往朝鲜。缅甸大使馆认为，“中国人民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援助北朝鲜”，并且报告说“中国人正声称联合国军打算入侵东北”。11月17日，荷兰向美国国务院转达了荷兰驻北京大使发回的消息，说中国人干预北朝鲜的动机是担心东北受到侵犯；如果“联合国军”停止在鸭绿江以南50英里处，中国人就不会再前进。英国军方首脑在给艾德礼首相内阁的一份报告中说，他们认为“北朝鲜对民主国家没有重要意义，没有任何必要为了征服整个北朝鲜这个微不足道的胜利，而冒爆发世界大战的风险”。

不过，盟国们的忐忑不安，也促使杜鲁门总统和国务院进一步“试图减轻中国人对于入侵的担心”。

11月15日，艾奇逊在华盛顿召开的关于外交事务的会议上，向北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排除中国人头脑中可能会有的任何误解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们担心自己的边界，那么正在采取各种措施使他们懂得，他们的正当利益将会得到关照。但是，如果他们不遗余力地挑起一场真正严重的危机，那么美国就要坚定地这一危机予以迎头痛击”。

第二天，杜鲁门在记者招待会上援引了联合国关于中国的决议，作为已经采取的行动的根据，以表明美国没有对中国采取敌对行动的故意。联合国和美国的政策都是“使冲突地区化，而且一旦形势允许，就立即从朝鲜撤出其军队”。

杜鲁门说：“如果中国共产党当局或中国人民不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这只能是因为那些从延长和扩大在远东地区的违反所有远东人民利益的冲突中得到好处的人，正在欺骗他们。”

显然，他指的是躲在中国人背后的斯大林。

可是，美国历来就不止一种声音。

就在美国国务卿和总统都在先后摇动橄榄枝的同时，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却争辩说，在麦克阿瑟向鸭绿江进军时，不应设置任何障碍，尤其不应采取一些来自“国务院某些分子”的建议。

陆军作战总部的查尔斯·博尔特少将11月20日的一份报告的语言尤其尖刻，报告大胆地指出，英国和法国的压力对国务院“影响极大”，使它赞成沿中朝边界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博尔特写道：“陆军作战总部坚决反对建立一个缓冲区，作出这样的承诺会严重地束缚美国和联合国军的军事行动，而不会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的任何得益会来自中国共产党人。”

博尔特对中国人的能力并不感到担忧，他写道：“不必设想中国共产党人会成功地把目前投入到朝鲜的联合国军队赶出朝鲜，除非他们在物质上得到苏联地面和空中力量的援助。鉴于目前的普遍形势，麦克阿瑟的部队拥有足够的力量守住北朝鲜的任何一条战线。”

陆军计划处在一份相关的报告中指出，采取比地面攻势更为激烈的行动，应该通过联合国或由美国单方面向中国人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他们离开朝鲜，否则美国就对满洲的军事设施从空中和海上发动攻击。”报告还写道：“总统如果下命令时，美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步骤，确保有能力立即使用原子弹打击中国共产党人。”



11月27日，美军飞机先后以5批13架次侵入中国领空，扫射东北边境地区集安、丹东等地的火车站、机场等。29日以后，美军飞机不断继续侵入中国领空，对中国城乡进行轰炸扫射。中国边境人民遭到杀伤，财产遭到破坏。对此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了严正抗议。

麦克阿瑟对周恩来的抗议不屑一顾，虎视眈眈，决心对中共军队发动规模更大的进攻。这位“联合国军”总司令确信，他的持续半个月的空中攻势，已让北朝鲜化为一片焦土，并且成功地阻止了中国军队从鸭绿江上进入朝鲜境内，摧毁了中国军队的交通补给线。残留在北朝鲜境内的中国志愿军无论在数量上和战斗力上都已微不足道。他下令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一西一东，兵分两路，加速向鸭绿江挺进。

然而，沃克似乎还没从不久前遭到的打击中恢复信心，他小心翼翼地指挥部队越过清川江，一路上控制交通要道和桥梁，以备情况发生变化时，部队能有闪转腾挪的空间和机会。

沃克似乎觉得，两个星期之前那些从天而降的中国军队，吹着小喇叭向他的部队发起前仆后继的冲锋，把他们赶到清川江以南之后，便突然销声匿迹了，只有少数部队还在边打边撤。

这使他突然产生了一种预感：似乎中国军队不知在什么地方埋伏好正等着他。这种担心使沃克的推进变得小心翼翼，战战兢兢，于是便召来东京麦克阿瑟的严厉申斥，一封又一封相当严厉的电报催促他加快北进的速度。但是由于沃克不断地强调后勤跟不上，发起总攻击的时间比麦克阿瑟要求的时间推迟了一个星期。这几乎使沃克相信，一旦这次军事行动结束，麦克阿瑟便会因为他一再延缓向清川江以北进攻的速度而将他撤职。

不过，比起将来可能遭到的撤职的担心来，他更加忧心忡忡的是北朝鲜阴险沉寂的山谷，天知道那些像幽灵一样的中国人会在什么地方突然出现。

对麦克阿瑟相继提出的“感恩节回家”和“圣诞节前结束战争”提出强烈质疑的，远不止沃克将军一人，连同总统杜鲁门和包括李奇微在内的美军高级将领，都认为麦克阿瑟是在走钢丝。

在一次杜鲁门召集的会议上，陆军副参谋长李奇微对麦克阿瑟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认为麦克阿瑟把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隔着狼

林山脉和赴战岭山脉，互不相连地分成两路进攻，是给了善于穿插和分割的中国军队一个绝好的机会。“这种部署是西点军校最低级的见习学员才会干出的事”。他接着以嘲笑的口吻讥讽了麦克阿瑟的所谓进攻：“尽管麦克阿瑟把这次向鸭绿江的推进称作进攻，但实际上不过是一次接敌运动。在未弄清楚敌人的位置之前，在敌军部队根本就未与你的部队接触之前，你是无法向敌人发起进攻的。很多野战部队的指挥官都相信，中国强大的部队一定在什么地方待机。而且，有一两位指挥官还对不顾侧翼安全、不与两翼友邻部队取得联络，而盲目向前推进的做法十分明智地表示怀疑。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知难而退，而且很多人还表现出总司令那种过于乐观的情绪。”

杜鲁门也对麦克阿瑟“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论调表示怀疑，尽管这种怀疑是在事后说出来的：“我们当时应该做的是停止在朝鲜颈部的这个地方（他用手指着一个地球仪说），那是英国人所希望的。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边界线有近100万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但麦克阿瑟是战地指挥官。你挑选了他，你就必须支持他，这是一个军事组织得以运转的唯一方式。我得到了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意见，而在前线的这个人却说，这件事应该这样做。所以我同意了。这是我作出的决定，不管事后怎么看。”

连总统本人都拿麦克阿瑟没有办法，其他的高级军事幕僚们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国务卿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政府失去了制止朝鲜走向灾难的最好机会。所有有关的总统顾问，不论是文的还是武的，都知道出了毛病，但是什么毛病，怎样找出来，怎样来处理，大家都没有主意。”

麦克阿瑟作为一名驻国外的军事将领与本国政府和本国最高军事决策机构的关系，已经成为二战后世界政治史和战争史上最奇怪和最荒诞的关系。

“他总认为我们是一群毛孩子。”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将军极其生动地比喻说。

美国作家约瑟夫·格登说得更妙：“五角大楼的主要罪过是因为胆小怕事。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麦克阿瑟面前，就像学校的男孩子在城里遇到街头恶霸一样怕得发抖。”



## 5. 大国风范

麦克阿瑟发动了“感恩节回家”的全线总进攻，指挥“联合国军”由东西两线，同时直扑中朝边境。

这位“联合国军”的总司令有充分的理由催促沃克率领第8集团军高歌猛进，因为他的情报官威罗比上校提供给他的情报是，“中国军队是因自我消耗过大而退出战斗的”。

根据他们对战俘的审讯记录，情报专家们都知道，“中国步兵只携带最多3至5天的食物，弹药的配给也同样少得可怜，基本上是一个士兵口袋里和一条粗布卷袋子里能够携带的东西”。

一些美国军民也同样认为中国人不会再出现了，朝鲜严酷冬季的到来，更支持了这一假设。日复一日，第三周都过去了，中国人仍未露面。

在这个阶段，连已经和中国人交过一次手的海军陆战队第1师谨慎的师长奥利弗·史密斯少将都产生了错觉，认为最坏的日子已经过去，他对记者们说：“甚至成吉思汗也不敢在冬季的朝鲜北部大山里打仗。”

1950年11月23日是美国的感恩节，“联合国军”的北方前沿已经连续3个星期听不到枪炮声。这让盼望着过节的美国大兵心情大爽，无不关心起感恩节他们的总统会送给他们一份怎样的菜单。美军在朝鲜战场的后勤物流能力，也因为这一原因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以美国人在工业和科技上遥遥领先全世界的能力，从本土送些肥滚滚的美国火鸡过来显然算不得什么难事，所以在感恩节的这一天，美国士兵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前沿阵地上，享受到了传统的火鸡大餐。

“联合国军”的其他部队也跟着沾了光，尽管很多英国士兵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感恩节。而绝大多数的土耳其人，连一句英文也不会讲。他们的总司令麦克阿瑟“感恩节回家”的承诺，分明已经开始让从容吃大餐的士兵们，把中国军队的威胁抛诸脑后。

10月底到11月初，中国人像东北虎一样凶猛地扑向“联合国军”，却又在激战正酣之际突然脱离了接触。英国政府几次想对美国人施加影响，劝说他们不要试图靠近鸭绿江，以至于彻底打破这一地区的战略均势。然而却鲜有几个美国高官对这些英国老古董的提议表

示出什么兴趣。

自从仁川登陆成功后，“联合国军”的统帅麦克阿瑟在人们的眼里，已经变成了一尊法力无边的战神。在感恩节的第二天，他便向自己那些刚刚把上万只火鸡送进肚肠而口齿留香的部下们，下达了直捣鸭绿江的命令。

而这次的猎物，是整个金日成的北朝鲜。

与以往不同，这次旨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攻势既没有像样的炮火准备，也没有明显的进攻发起线，因为在宽达两三百公里的战线上，根本就没人知道中国人的阵地在哪里。

在悠闲得犹如阳春三月去郊外踏青般平静的进军途中，一位苏格兰士兵在家信中写道：“宝贝，快把衣服脱光等着吧，我就要回来啦！”

在朝鲜冰锁雾冻的重重大山里，两支大军都摆开了进攻的架势，然而，只有其中一支知道另外一支的存在。

中国军队早在一个月之前，就宣示了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联合国军”清楚地知道，中国人此时就在冰雪覆盖着的大山里，就像无数只凶猛敏捷的东北虎一样，猫着腰，静静等着他们的到来。

问题是，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中国人在前面等着他们。

此时的志愿军入朝参战部队为齐装满员并得到50军和60军加强的第13兵团和精锐的第9兵团，一共9个军，33个师，作战部队总计38万人。这还不算18万民工，不下10万名铁道兵和工程兵。此外，还有数万名北朝鲜游击队在“联合国军”阵线后方卓有成效地活动。

38万大军如同一根紧紧压缩着的弹簧，在狂风暴雨中静静地注视着自己的猎物，等待着刀锋一般锐利的北朝鲜群山，把本就松散的“联合国军”的战线，一步步劈开、撕碎。

为了更好地诱敌深入，11月16日上午，彭德怀召集邓华、洪学智等将领继续研究第二次战役的准备情况。

参谋长解方说：“自11月6日敌人向我试探性进攻以来，我军即按照预定计划，以部分兵力实施节节阻击，缓慢后移，诱敌深入。9日，西线我38军112师主动放弃了飞虎山一线阵地；10日，39军115师又放弃了博川。东线我军7日即放弃了黄草岭。10日，西线敌人全线推进，东线敌人也自黄草岭、丰山、明川分3路继续向北进犯。不





过，敌人的行动十分缓慢。”解方稍微停了一下，又忧心忡忡地接着说下去：“到昨天为止，西线之敌仅进至博川、龙山洞、宁边、德川一线。东线之敌也仅进至碣隅里及丰山、明川以北一线，只分别前进了9至16公里，距我预定歼敌地区还比较远。”

韩先楚说：“看样子敌人是有了上次冒进挨揍的教训，变得小心了，谨慎了。是不是112师在飞虎山顶得太硬，把沃克吓住了，对我们产生了怀疑？”

“照这个慢吞吞的样子，敌人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我们的攻击线呀？”邓华和洪学智也焦急地说。

彭德怀一面聆听大家的意见，一面沉思。经过认真考虑后说：“电令各军，主动再大步向后撤十几公里。不过，撤退的时机和方式一定要掌握好火候。”彭德怀端起搪瓷盅子喝了一口茶水，又说：“一定不要让敌人发现我们的意图，看出我们是引诱他们钻口袋。要想尽办法给敌人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是真的打不赢他们，是狼狈逃窜了，他们才好放心大胆地钻进我设伏地区。”

这样，11月17日，西线志愿军继续北撤，主力转至云山、球场线以北和宁边东北地区；东线20军也在柳漂里以西及其西北地区完成集结，接替吴瑞林的42军主力在黄草岭以北的阻击任务，40军主力则开始向宁边东北地区转移。

这时，政治部主任杜平提出了释放战俘的建议。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毛泽东的批准。他在回电中说：“你们释放一批敌俘很好，应赶快放走，而后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

彭德怀看完电报后对杜平说：“不要等到明天了，今晚就放，越快越好。可以告诉俘虏，我们的粮食供应困难，没有吃的，正忙着退回中国。美国官员不是说志愿军入朝是为了拆除鸭绿江水电站的设备，大捞一把么？不是说他们的空军很厉害，使我们的后方运输和交通线完全瘫痪了么？我们就要帮助美军加强这个印象，来它一个就汤下面。”

杜平恍然大悟，马上找来组织科长司东初和自己的小车驾驶员王大海，亲自交代他俩去完成这一特殊任务。

司东初坐着王大海的车来到战俘收容所，向负责人说明了任务。收容所的同志挑选了103名俘虏——美军俘虏27人、南韩军俘虏76人——给他们理了发，洗了澡，换了新衣服，发了路费，晚饭时所里



还特意加了两个荤菜。最后，还把全体战俘召集拢来开了个欢送会。司东初即席讲了话，对战俘进行了简短教育。

11月18日深夜，乌云密布，一阵阵的寒风吹得挂满冰凌的树枝瑟瑟发抖。此时，刚刚经历过厮杀的战场，难得地呈现出一片宁静。

司东初带着战俘们来到公路边，登上了3辆罩着篷布的大卡车，他则坐着王大海驾驶的吉普车，向着云山方向驰去。

到了志愿军的前沿阵地，车队停下，战俘从车上下来。

司东初对他们说：“你们万一过不了美军的警戒线，还可以回来，我们志愿军欢迎。等打完了仗，再安全地送你们回去！”

这时，公路上出现了令司东初感到十分惊讶的一幕，许多战俘伸出大拇指喊叫：“ok！”有的感动得泪奔，哭腔哭调地说，感谢中国人民志愿军救了他们的命，并高喊着发誓：“我们永远忘不了志愿军的大恩大德，从今以后，再也不与你们为敌了！”

以上反映的不过是志愿军若干战俘收容所释俘的一幕。

39军吴信泉军长晚年回忆：

11月20日，我军接到志司为诱敌深入我军主动向后转移的指示，同时接到叫我军释放俘虏的命令。军指挥所由龙水洞向后转移到了院丰里。

当晚，我和徐斌洲政委召集了各师的领导同志到军里开会，在研究部队行动的同时，确定了各师释放受伤和有病的美军战俘。

115师抓的俘虏较多，释放战俘由政治部主任尹培良和保卫科长张子修等同志负责。各师将首战云山的一批美军伤病战俘，经过教育和包扎治疗后，选择在阵地前的公路上释放。派俘虏回去通知美军：派人派车前来接运回去，我方不开枪，不打炮，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

晚上，没有枪炮声，两军阵前的公路上安静下来了。我方人员将受伤、有病的战俘用担架抬到公路上，然后撤出公路。

这时，许多被释放的俘虏，想起被俘期间受到我军人道主义的待遇，望着眼前被释放的情景，感动得掉下泪来，不停地向我们管理战俘的指战员招手，通过英语翻译说：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刻！”

“我们今后再也不会打中国人了！”



“万分感谢你们，再会！”

不一会儿，美军的医务人员乘着卡车开到这里，把这些战俘接回去了。<sup>①</sup>

11月24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你们释放美俘的行动，已在国际上收到极好的效果。请准备于此次战役后，再释放一大批，例如三四百人。”

中国军队释放战俘立即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同时，也引起美军情报局的极大恐慌。美国人极力想知道中国军队此举将对他们正在进行的战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韩国将领中屡次和中国志愿军交手的白善焯将军，对志愿军严明的纪律印象深刻。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

中共军与朝鲜军在许多方面都不一样，这是我们在前线的战斗中经常听到或感受到的。他们在给平民带来麻烦这个事情上极度敏感，就算是他们参加韩国战线后多次与国军及美军交手时也是如此，中共军都非常注重这个问题。中共军的指挥部向一线士兵们下达了命令，要尽可能不给韩国的普通百姓造成麻烦。

如果他们进入韩国人的民宅宿营，他们必须遵守几条原则。例如，如果屋内有人不得进入，不得随意带走或损坏民宅内的食物和家具等诸如此类的规定。朝鲜军在南侵初期也基本上履行了这点，这是朝鲜指导部为了美化形象而下达的命令。但被我军击溃撤退时，朝鲜军的行为发生了变化。他们粗暴地展开行动，以肃清右翼人士为借口，非常残忍地杀害老百姓，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变得非常粗俗。

也有传言称，他们从曾占领的首都等南方地区撤走，越过“三八线”撤退时，朝鲜军遭到了普通百姓的强大进攻，这都是他们为随意处置人，破坏老百姓的东西，给居民们造成严重损害所付出的代价。

相比之下，老百姓对中共军的印象还不错，因为他们比较好地

<sup>①</sup> 引自吴信泉《三十九军在朝鲜：1950—1953》，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遵守了首脑们下达的不准给老百姓造成麻烦的命令。在拼死的战场上，朝鲜军和中共军全都是猛烈地向我军袭来的战士，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在掌握整个战争的方法上，两国军队存在差异。

美国军史家莫里斯·艾泽曼也在《朝鲜战争》一书中写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是怎样对待“联合国军”战俘的。

战争双方都曾经残暴地对待战俘。朝鲜人民军因其残忍地对待敌军俘虏和被怀疑支持南韩的平民而臭名昭著。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美国士兵经常无视《日内瓦公约》（保护战俘的国际协定），出于对失去战友的愤怒，或者认为战俘是一个带来麻烦的负担，美国人在一些场合对落入他们手中的北朝鲜军队和中国人开枪射击。但是如果战俘在被捕获时生存了下来，他们此后受到的对待和最终生存的机会，都相对好一些。

落入中国人手中的美国人要相对幸运一些，在战争初期，中国人确实主动地释放了一些他们俘获的美国人，并给他们饭吃，还发给他们香烟。（此举旨在瓦解美国军队的士气，使他们更倾向于投降。）中国军队在1950年11—12月之间的攻势行动中俘虏了数千名敌人。绝大部分的战俘并未遭受拷打和折磨，但缺乏充足的食物，也没有必要的医疗条件。

美军战史资料显示他们当时曾分析说，中国人往往要求被释放的战俘明白：“你们是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牺牲品，只有逃脱帝国主义的地狱，才能获得共产主义天堂的自由”，要求战俘把中国军队的人道主义精神“告诉你们的同伴”，“敦促你们的同伴掉转枪口对准你们的军官”。

这些言论的出现是因为西方人还根本不了解中国人和中国军队。西方人不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当还是一支农民游击队的时候，其制定的第一部军规中就明确写有“不许虐待俘虏”的条款，而且后来还列入了规范人民解放军行为准则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在第一次战役处于收尾阶段的11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曾专门给金日成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介绍中国军队优待俘虏的政策和经验。



由于自古以来战争中士兵的命运飘忽不定，战俘的命运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很有必要再次抄录彭德怀长信的主要内容，从字里行间，可见一个有着两千多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的道德标准。

彭德怀像个德高望重，宅心仁厚的兄长一样，对比他年轻得多的金日成循循善诱：

由于我们采取了上述俘虏政策，使敌人的战斗力逐渐减弱，并争取了广大俘虏补充了自己。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有一部分战士就是由俘虏兵补充的。在解放战争中，我们的兵源主要是依靠俘虏。这些被解放过来的俘虏，经过教育改造之后，很多都愿意参加革命队伍，有好些人已经在解放战争中成了战斗英雄和人民功臣，这证明俘虏是可以争取和能够改造的，也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宽待俘虏的政策完全正确。

在我们革命初期，甚至以后个别地方，有些同志愤恨敌人的残暴，对俘虏官兵采取报复态度，这是很难免的。但这种报复行为，对革命非常不利，因为这种报复仇杀的结果，足以给敌人以造谣的借口，只能促进敌人内部的团结，增加敌人的战斗力。如果个个敌人都要硬拼，那么取得革命胜利的代价就更大了。因此，对有的同志这种错误的报复行为，必须进行耐心的、坚决的说服教育，使之彻底改正，才能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取得革命的胜利。

朝鲜人民进行的战争，是争取朝鲜独立、民主和自由的革命战争，经过宽待俘虏，将这一真理传达到敌军中去，根据中国的经验其效果将是很大的。对俘虏进行宽大和教育改造工作，这正表示了劳动人民及其军队光明磊落的伟大气魄，具有这样气魄的革命军队必然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

上述经验特为介绍，供你们今后对待俘虏的参考。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  
卫祖国  
就是保家乡

ISBN 978-7-229-13086-2



9 787229 130862 >

定价：98.00元